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甘地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甘地生平

甘地，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现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甘地主义的创始人。

甘地的一生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他出生于英国殖民桎梏下的印度，成长在一个虔诚信奉仁爱、不杀生、素食、苦行的印度教的家庭。他自幼腼腆、羞怯、循规蹈矩。13岁便依父母之命与一同龄文盲女孩结婚。16岁丧父，第1个孩子出生便夭折。从小学到中学，甘地一直平庸无奇。少年时代虽受当时革新之风的感染，曾经尝试打破素食以强身健体、振兴民族国家，终因摆脱不了从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废。19岁时，不惜被开除种姓身份，远涉重洋，赴伦敦求学。异域的文明曾令甘地产生过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脚下，宗教陈规的约束使他在一个全新环境里无所适从。短时的迷惘与摸索之后，他终于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坚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并兼收并蓄其他宗教教义，接受了英国法制思想的教育，取得了伦敦大学的律师资格。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在孟买从事律师业务，却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就因临阵怯场而砸锅。半年后打道回府，在家乡拉奇科特靠兄长和亲友的资助维持律师业务。律师业务的毫无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环境，使他倍感苦闷压抑。当有个来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处理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历程。

在南非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无所不及的英国殖民地，甘地作为有色人种先后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歧视与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难驱使他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正是在南非这块充满种族歧视的土地上，甘地对他曾经倾慕过的西方文明产生了否定，培养和锻炼了自己从事公众工作的能力，掌握了作一个成功律师的秘诀，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社会政治观。他在南非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为南非印度人争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权利，他从中也试验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不过，在这种反歧视过程中，甘地对英帝国仍充满幻想。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国初年，他坐三等车游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一年以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试验并发展了非暴力学说。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换取英国的开恩，给予印度自治。“一战”后殖民当局的种种作为使甘地由一个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变成了不合作者。1919年3~4月间，为抗议反动的“罗拉特法”，他发起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由于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和群众的暴力反抗，甘地一度宣布暂缓非暴力抵抗运动，试图与政府合作，但英国政府继续在哈里发与旁遮普问题上倒行逆施，打破了甘地的幻想。在印度全民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趋于成熟，并率先在哈里发运动中发起群众性的抵制殖民政府的立法机构、法院、学校、封号与洋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而推广为全民反帝斗争形式。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12月的那普尔年会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争取“印度自治”成为国大党的现实斗争目标；国大党也因此由一个少数上层分子主要依靠宪政手段从事活动的团体变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依靠群众

性直接斗争进行全面反帝斗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不论甘地是否在国大党内任职，他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1922年2月，因运动中出現暴力事件，甘地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挫伤了士气，引起国大党内的思想混乱。甘地也身陷囹圄。出狱后甘地致力于重振民心士气。1929年12月31日，国大党拉合尔年会通过争取印度独立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新的不合作运动。1930年3月他率领78位志愿队员开始“食盐长征”，揭开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序幕，给英殖民主义者以巨大打击。运动进行中甘地又与总督谈判，并出席圆桌会议，群众运动因此而松懈，被英国残酷镇压下去。1934年10月，甘地因与国大党领导层再次出现严重分歧而宣布退党，但仍在关键问题上指导国大党的工作。1939年9月3日，英国代表印度宣战后，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有条件支持战争的主张发生尖锐冲突，以致他两次被免职，又因英国政府顽固不肯满足国大党的要求，国大党两次请甘地复出。这期间，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1942年4月，在印度国内广大群众反英情绪高涨和日本侵略者逼近印度的形势下，甘地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并先后发起了1940~1941年第三次不合作运动和准备发动第四次不合作运动，均被英国镇压下去。甘地入狱直到1944年5月。战争结束后，处于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慑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起的压力，答应印度独立的要求。但因印、穆两教的分歧对立由来已久，加之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印、巴分治已成定局。甘地为维护印度统一不懈努力，终无回天之力，只好接受分治。独立后甘地获得了印度人民和国大党的崇高敬意，但他却大权旁落，其终身为之奋斗的非暴力理想也被束之高阁。面对分治以后的宗教仇杀与混乱，甘地殚精竭虑，利用自己的威望与绝食帮助平息了大规模教派仇杀，自己却成了教派冲突的牺牲品，死在了一位狂热的印度教徒的枪口之下。

甘地的思想极为庞杂。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言论记录，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宗教的与政治的混为一谈，而且资产阶级思想与小生产者思想兼而有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然而甘地主义的核心却是其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提出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面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提出的唯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用甘地的话说，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看起来令人费解，难以让人信服，但它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因为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人民大众熟悉、了解的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团结起来，勇敢无畏地追求真理。这无疑为印度资产阶级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吸引群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武器。同时因为它提倡非暴力，不仅适应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武装的权利，一直受宗教成见麻痹的现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披着议会民主制外衣、富于统治经验的殖民者接受；不仅能发动群众，又能始终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很适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代条件下，既希望利用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

标，又要防止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几度汹涌澎湃，虽历遭挫折，却历久不绝，并最终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迫使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应该说，甘地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甘地把非暴力作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则，明显地具有种种弊病和缺陷，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绝对的非暴力不可能实现；贬斥一切暴力，给群众运动制定清规戒律，不准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只要发生暴力就停止运动，必然挫伤士气，丧失革命时机，延长革命过程；群众性自苦和自我牺牲，总有时间和环境的局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徒手的抵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注重小处着眼，认为注重手段目的自明，往往导致轻重倒置，目标模糊；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众的蒙昧落后意识，不利于群众的真正觉醒；等等。尽管如此，甘地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仍在理论和实践上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甘地的一生复杂多变，极富争议。无论对于他的敌手，还是他的亲密同事抑或一般群众来说，他始终是个谜。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坛，毁誉不一。在一些人看来，他简直是“神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是“欺世盗名的救世主”、“矫揉造作的阴谋家”。曾几何时，他被斥责为“印度封建主义不折不扣的辩护士”、“帝国主义的帮凶”、“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叛卖者”，但时至今日，人们一般都承认，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对印度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功不可没。

甘地的伟大人格几乎是举世公认。他具有赤诚的爱国热诚，崇高的牺牲精神，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坚强的意志，坚韧的耐心，随机应变的本领；他待人谦恭、诚实、光明磊落，不分贵贱善恶一视同仁，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他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他关心下层人民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并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活清苦，安贫乐道；他尊重女性，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和谐；他的道德修养堪称楷模。正因为如此，甘地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东方人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阶级的人的景仰和爱戴。

## 甘地传

## 一、历经挫折的青年律师

1869年10月2日，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古老神秘的东方大国——印度西海岸卡提亚华半岛的波尔班达城降生。

这一年正是英国经过2个多世纪的经济掠夺和将近1个世纪的军事征服正式将印度变成其殖民地的第20个年头。当时的印度已失去了一个文明古国的辉煌与尊严而屈服于异族的统治，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殖民地。其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民族国家软弱涣散，政治生活腐朽反动，人民大众缺衣少食，愚昧落后，灾难事件层出不穷。有资料表明，当时印度的麻疯病人数和瑞士的居民一样多，僧侣数目不亚于比利时的总人口，整个荷兰也容不下印度的乞丐，此外，印度有1100万沙陀，2000万土著人，900万15岁以下的少儿已婚或丧偶，1000多万印度人过着半流浪的生活，靠弄蛇、算卦、卖唱、杂耍、打井、玩魔术、走钢丝、卖草药为生，印度每天有38000个婴儿出世，其中1/4在5岁前夭折。印度每年有1000万人死亡，其中很多死于营养不良或天花、霍乱等疾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印度，人比田地更多产，人们信神信得发狂，而对可怕的自然灾害却束手无策。这个国家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现状却变化莫测，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它那样问题堆积如山。”

甘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苦难的国家。甘地的家族信奉印度教，属于毗湿奴教派，为第三种姓——吠舍的一支，班尼亚种姓。甘地家族曾世代经商，但甘地的祖父乌塔昌德弃商从政，先后担任过卡提亚华半岛上几个土邦的首相，甘地的父亲及其叔父也做过波尔班达邦王公的首相，这使甘地家族在卡提亚华享誉一方。

甘地的父亲拉姆昌德·甘地曾因丧偶先后连续结婚4次，一共生有3男3女，甘地排行最小。甘地认为他父亲“忠勇侠义，慷慨大方，热爱宗教”。虽然性情有些急躁和纵情肉欲，却因其廉洁公正而闻名遐迩。他淡泊名利，无意升官发财，虽然没有给甘地留下雄厚家财，却为之树立了良好的家风。甘地的母亲为一虔诚圣洁的宗教信徒。她对宗教的笃诚给甘地留下了深刻印象。据甘地回忆，她母亲每日必参拜神庙，每餐必作祷告，每遇宗教忌日，她必绝食祈祷，而且时常许愿，有时甚至许下最不易奉行的誓愿，她仍信守不渝。不过，甘地的母亲虽是文盲，却并非寻常的家庭主妇。她熟谙世理，知晓国家大事，她的才识曾得到过土邦王宫里一些贵妇人的赏识。幼年的甘地曾多次随母亲出入王公府邸，在一旁聆听母亲与王公寡母们的谈话，母亲的志趣对甘地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甘地在波尔班达度过了孩提时代。大约7岁时，他的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去拉奇科特做王府法庭的法官，他也前往那里，并在那里念完小学和中学。与很多政治家早年生活不同的是，甘地并非一个天资聪颖的学生。他勤奋刻苦却反应迟钝，记忆欠佳，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成绩平平。他也不是一个活泼顽皮的孩童，他生性腼腆，胆小怕事，是个诚实规矩的孩子。有一次，一位督学到甘地所在的学校视察，要求学生们默写5个单词以测验他们的拼写正

---

这一教派奉行仁爱、不杀生与素食，提倡苦行。

印度教社会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贵族）、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四大种姓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被蔑称为“贱民”。他们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不能在大路上行走。这些奇特的种姓还被分成将近3000个小种姓。每一种姓都有传统的职业和特定的生活方式与习俗。

确与否，甘地写错了其中一个，站在一旁的教师用脚尖轻触了他一下，暗示他去抄身边一个学生的写法，可憨实的甘地却不解其意，以为老师是在警告他别左顾右盼，结果除他以外，别的学生都对了，他也因此挨了老师一顿骂。

当时印度教社会盛行童婚陋习，13岁那年，甘地与一位目不识丁的女孩嘉斯杜白结为夫妻。两个无知的孩子由此被投入了人生的大海，过早地涉足了成人的生活。甘地这位后来成为世界禁欲主义象征的人很快发现夫妻生活的乐趣，并因此坠入情网，迷恋家室。好在当时印度教社会对于童婚这种残酷习俗有很多的限制，如做父母的往往不希望年轻的夫妇长年厮守，童妇大半时间要消磨在娘家，加上婚后还要读书，沉重的作业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而甘地才没有终日沉溺其中。

因婚事辍学一年后，甘地又返回学校，继续读中学。老师为弥补这种损失，让甘地跳了一级。进入四年级后，由于大部分课程用英语讲授，计地简直如坠五里烟云。新课《几何》对于他过于高深莫测，梵文则要死记硬背。因为家庭的熏陶，他似乎对宗教情有独钟，而且悟性很高。总的说来，中学时代的甘地仍平庸无奇，他对自己的才能缺乏信心。

甘地的少年时代，革故鼎新的风气已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大陆悄然兴起。当时一些印度知识分子试图给积贫积弱的印度注入生命活力，开始倡导印度现代化运动。他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他们喊出了“以理智与推理代替纯主观的教条和信仰，以科学与进取，代替玄想与保守，并以新的宗教观念代替旧的偶像”。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甘地所在学校的许多教员和知名人士开始破除教规，喝酒吃肉。在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英人雄纠纠，印人何其小，肉食者治人，身躯六呎高。”甘地的好友，一位体格强壮，身姿矫健的小伙子，也不时在甘地耳边宣传吃肉的好处：“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所以能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并说自己之所以体魄强健，也是因为吃肉的结果。从小在素食环境里长大，却一向瘦小纤弱、胆小怕事的甘地不能不为之心动。他开始相信吃肉能使自己身强力壮，胆识过人，如果全国一致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

革新热情和好奇心驱使他第一次背叛自己的父母和信仰，和他的同伴一起偷偷摸摸地找到河边僻静处，生平第一次看见并吃了山羊肉和面包。初次的尝试很糟糕。山羊肉的粗糙和膻味让他无法下咽，加上心理作用，他最后不得不抛下山羊肉走开了。当晚他做了一夜恶梦，仿佛总有一只活山羊在肚子里苦苦哀叫，然而一想到肉食并非为顺从口腹之欲，而是出于为自己和同胞的强壮英勇这样一种责任，他便心安了许多，并已还要进一步尝试。

他们不再像做贼似的龟缩在河边僻静处，而是频繁出入政府宾馆大厅，享用色香味俱全的荤宴。潜移默化中，他不再厌恶洋面包和山羊肉，也不再为山羊而心生怜悯，而且渐渐爱上了荤食。这种尝试大约持续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了，因为美味佳肴尽管有益健康，但价格高昂，一般印度人不敢问津。再者，老是背着父母去做这些事情有悖甘地的天性。甘地本人认为吃肉固然重要，可是欺骗父母，过不诚实的生活，岂不更坏。所以甘地决定在父母健在的时候，暂且遵从他们的愿望，尽一份忠孝之心。

在进行肉食体验的前后，甘地情不自禁有些放浪形骸。他曾和同伴一起光顾妓院，因他木讷怯懦徒然遭到一阵羞辱而落荒而逃。他也开始嗜好吞云吐雾。由于家中管教甚严，他没有钱买烟，只有捡烟头抽；烟头找不到，就去借钱；借不到就偷佣人的零用钱，甚至偷偷地从哥哥的手镯上刮下一块金

子去变卖。在干着这一勾当的时候，他内心所受的折磨使之曾尝试过自杀。

最后甘地毅然向父亲忏悔。他向当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写了一封悔过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发誓不再偷窃。甘地本来以为暴躁的父亲会高声呵斥，捶胸顿足。然而父亲却老泪纵横，一言未发。父亲的眼泪与宽恕在甘地看来是一堂非暴力的实物课，他深深领悟了忏悔的力量。

甘地 16 岁的时候，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父亲因久患痼疾终于卧床不起，妻子偏偏又在这时有了身孕，孝顺的甘地和母亲及家中的一个老仆人一起担当起看护病人的责任。甘地常给父亲清洗创口，敷药、配药并协助其吞服，每天晚上还坚持在父亲腿上按摩，直至有人接替或父亲安然睡去才肯离去。可是年轻的心思却常使他一心二用。虽则每晚忙着为父亲按摩双腿，心中却记挂着有身孕的妻子。终于有一天发生了甘地追悔莫及的事情：约莫晚上 10 点半到 11 点钟左右，甘地的叔叔接替他服侍病人，他便乐不可支地直奔房间与妻子温存。仅仅五六分钟后，佣人扣响了这对年轻人的房门并告之父亲去世的消息。甘地闻言，羞愧难当，他为自己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份孝心却耽于与妻子缠绵而无地自容。他认为这是他终生难以洗刷和忘怀的污点，为自己的纵情恣欲而深感羞辱。在这之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几天便夭折了。这些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他后来产生节欲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

1887 年甘地念完中学，通过统一考试进入巴纳加尔城的萨尔马达斯学院就读。然而他听不懂教授的讲课，也谈不上什么兴趣，学习生活很不如意，一学期后他趁着学校放假打道回府。

正当甘地为下一步学习愁苦不堪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一日，甘地家的世交，一位学识渊博的婆罗门马福济·达维先生前来拜访甘地的母亲和长兄。当来人得知甘地在萨玛尔达斯学院就读时，便建议道：“当今时代，如果你们不受适当教育，就别想继承祖业。但如果按部就班地在国内就读恐怕也很难如愿。倒不如送他到英国去学习。不仅经济，而且时髦。等他学成归国，帝万的职位便会送上门来。”这个建议很合甘地的口味。他当即询问长兄能否送他去英国学医。哥哥说：“我们毗湿奴教派不应做解剖尸体的事，父亲希望你能当律师。”马福济·达维也附言道，“我倒不像你父亲那样反对学医。不过，你要是拿个医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也就担当不起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做律师倒是个好差事。”

客人告辞后，甘地便开始构思他的出洋计划，然而现实却不像甘地想的那么简单。首先，是宗教陈规的约束。因为毗湿奴教派禁止其教徒航海旅行，儿子要漂洋过海，这对虔诚信教的母亲是件极为痛苦而难以接受的事，寡居的母亲为此心烦意乱。她对儿子说：“叔叔现在是家中的长者，我们必须先和他商量，然后再作考虑。”母亲的意思是希望她的小叔子能制止甘地的幼稚行为。为实现赴英理想，一向胆小怕事的甘地居然雷厉风行，他立即动身前往波尔班达去向叔叔求援。正如甘地的母亲所料，叔叔对甘地远涉重洋前往英国忧心忡忡。他说：“我所遇到的那些从英国回来的大律师，我看不出他们和欧洲人有什么区别。他们对饮食没有禁忌，他们嘴上永远离不开雪前，他们穿的衣服也和英国人一样丢人。所有这些都和我们家的传统背道而驰。我怎么可能答应你到英国去呢，你还是回去问你的母亲吧。”

甘地只得回去恳求母亲。为说服母亲，甘地求助于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家中的老顾问贝哈吉·史华密出来说情。自己也对母亲庄严保证：不吃肉，不喝酒，不接触女人。最后，母亲经不住儿子的死缠硬磨，总算答应放他远行。

筹措经费也是个非同小可的问题。父亲逝世后虽仍有津贴，但家用日紧，要筹措这笔盘缠，显然力不从心。甘地的哥哥提议甘地去找波尔班达邦现任财政官李立先生，请他出面为甘地谋得政府资助。但财政官同甘地的叔父私交甚笃，甘地叔父既不答应他出国留学，财政官当然也不会帮忙，甘地自己给李立先生写了封信，希望求见，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无可奈何的甘地最后只好变卖妻子的首饰，并向为人慷慨而又始终关心他的兄长求助。好不容易凑足了经费，然而好事多磨，当甘地告别母亲、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在哥哥的陪伴下，欢天喜地前往孟买时，6~7月间印度洋上风高浪急，使他马上成行的希望破灭。哥哥将他安置在孟买的一个朋友家里静待时机，自己回到拉奇科特。

甘地在孟买焦虑不安，度日如年。可偏偏节外生枝，甘地所属的种姓又发难了。甘地是莫德·班尼亚种姓里第一个出国的人，这在保守封闭的种姓社会是件了不得的事情。他们召开种姓会议，要甘地回去接受讯问，甘地以少有的勇气接受了挑战。在种姓会议上，甘地的一个远亲宽德族长声色俱厉地告诉甘地：“依照本族规矩，你去英国是不妥的。我们的宗教禁止航海远行。我们还听说到了那里如果不损害我们的宗教，便无法活下去，有的人不得不和欧洲人同饮食。”

甘地据理力争：“我并不认为到英国求学是违背了宗教。我到那里的目的只求深造，而且我已答应母亲，不做你们最害怕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能确保我的安全。”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在那里要保持我们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同你父亲的关系，你应当听从我们的劝告。”族长反驳道。

“我知道那些关系，而且我把您当成我的长辈。但在这种事情上，我无能为力。我去英国的主意已定。再说先父的朋友和顾问，一位尊敬而有学识的婆罗门也未反对我出国，家母和家兄也未反对。”

“可是你竟敢不服从本种姓的命令！”

“我实在没办法，我想种姓本身不应干预此事。”

族长恼羞成怒，他当众宣布：“从今日起，这孩子不应被看成本种姓的人，谁要帮他或到码头去送行，就得交1卢比4安拿的罚款。”

这件事后，甘地一刻也不想呆下去。幸好这时有个律师要到英国去执行公务，将于9月4日乘船启程。甘地便和这位律师结伴于9月4日乘船离开了孟买，一路乘风破浪，驶向他心中神往但又一无所知的国度。

出国成行的短暂兴奋过后，新的忧虑接踵而来。除了不懂欧洲礼节出尽洋相外，生活的不习惯也令甘地无所适从。他很不习惯用英语跟人交谈，也不会使用刀叉。进餐时，往往弄不清荤素，加上菜价之昂贵，味道之难吃常使他望而生畏。很长一段时间他仅仅只吃从孟买带去的食物，在半饥半饱中苦度时日。

初来英国，生活极不安定。一开始，甘地和律师马兹慕达寄住维多利亚旅馆，因费用昂贵及孤独难耐，他们又经熟人介绍租了一处房子。然而陌生的际遇与难解的乡愁还是常使这位来自印度西海岸的18岁青年黯然神伤。每

当夜阑人静，他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饱尝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苦无告。

没过多久，同乡梅赫达医师来看他，甘地听从其建议，搬到里奇蒙的英国人家里，以便更多地了解英国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主人和蔼体贴，常教甘地一些英国人的规矩、礼仪。与这家人的相处使甘地渐渐习惯用英语讲话，但是饮食依然很成问题。由于发誓素食，他所能吃的东西十分有限。早餐的麦糊倒还可以凑合，午饭和晚餐多是蔬菜、面包与果子酱。青菜一般只是用水煮过，且不搁印度人一刻也少不了的盐或香料，甘地实在难以下咽，况且这些东西对一个胃口很大的印度人来说根本不顶事。出于礼貌，他每次只吃两、三片面包。和善的主人见状，就劝他打破戒律。屡劝无效，主人也急了：“如果你是我弟弟，我就送你回去，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坚守这种誓言是纯粹的迷信。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执拗在这里不会有好处。你吃过肉，而且觉得好吃，你在绝对不需要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该吃肉的地方却不吃，真是不可思议。”但不管别人怎么劝，甘地仍坚守一诺千金的古训，决不违背誓言。一个月后，甘地搬到伦敦一个英印混血种家里，依然因饮食不习惯而苦撑苦熬。

百无聊赖的时候，他也经常翻翻报纸。久而久之，读报便成了习惯。他每天至少花一小时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保尔·马尔公报》，从中产生了对时事的极大兴趣，并获得了很多知识。闲时他也出去逛逛，顺便找些能吃素食的地方。有一天，他在法林顿大街找到了一家素食馆和一些有关素食的书籍。这一发现令甘地喜出望外，这不仅使他开始摆脱进食的苦恼，而且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素食体验者。以此为契机，他阅读了不少有关素食的著作，了解了素食的宗教、科学、实践与医学的根据。他订阅了英国素食者协会出版的周刊，并参加了这个协会，还一度成为该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他还在自己居住的地区主办了一个素食者协会，将一些趣味相投的人网络在一起，交流感受与心得。正是在伦敦，甘地同那些被认为是素食主义者的知名人士有了往来，并开始了关于饮食方法的不断体验。他不再吃特意从国内带来的糖果，对于香料的嗜好也逐渐消失，出于经济与健康考虑，他不再喝茶和咖啡，有时还不吃淀粉质的食物，只光顾廉价的素食馆，靠面包、水果、奶酪、牛奶、鸡蛋之类度日。不过，总的来说，甘地在英国的素食体验主要是从经济与养生之道出发，至于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则是到南非以后。

甘地在逐步摆脱孤寂与饮食方面的困扰时，也在尝试适应英国的社会环境，摆脱窘境。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自己的衣着服饰、言行举止具有绅士风度。为此他不惜重金，特意买回了一顶漂亮的丝帽、一套高档晚礼服、一双锃亮的皮鞋、一双白色手套和一支镶有银球饰物的手杖。还叫他哥哥寄来了一条双层金链表。他还买了一瓶美发油，梳整他那桀骜不驯的头发，每天花上几个钟头站在一面大镜子前连续不断地练习打领带。当有人告诉他做绅士必须学会跳舞、法文和演讲术时，他不假思索地到一个跳舞班去学跳舞，还专门请了个教员教他演讲术，并开始攻读法语。他说他当时就像一个古代隐士，为养只猫捉鼠，结果要养头牛供他吃牛奶，还请专人来饲养牛。尽管这样煞费苦心，他仍然找不到英国绅士的感觉。

这种生活大约持续了3个月左右，终于有一天，甘地如梦初醒。他意识到自己花那么大的代价来英国不是为了作一个英国绅士，以便在这里呆上一辈子，而是为了求学深造。如果这样不务正业，岂不愧对自己与家人？他决

定改弦易辙，不再为刻意追求绅士风度而枉费心机，重新恢复自己省吃俭用的生活习惯，调整了追求目标，打算从知识素养方面向英国绅士看齐。

在英国，要取到学位必先取得英国大学的入学资格。甘地首选的大学是闻名于世的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然而这两所大学所需费用之高昂令他望而却步。最后他选择了入学考试难度较大却费用相对低廉的伦敦大学。为准备入学考试，甘地开始进军拉丁文和法文，参加了一个私人开设的大学预备班。由于时间紧迫，甘地单独租了一处住所。他深居简出，节衣缩食，废寝忘食地苦干了半年，虽然第一次考试未能通过，他却并不气馁，反而以加倍的克勤克俭迎接第二次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伦敦大学的一名学生，攻读法律。

甘地在学习期间非常刻苦，他不仅读遍所有的课本，还特别深入细致地攻读了拉丁文的《罗马法》，花了9个月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如布罗姆所著的长篇巨著《普通法》、斯尼尔的精深难懂的《平衡法》、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威廉士与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从而获得了较为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

除阅读专业书籍外，他还广泛涉猎各种宗教书籍。在伦敦的第二年末，甘地开始阅读英译本的印度圣诗《纪达圣歌》。书中一些充满哲理的论断引起了甘地的强烈共鸣：“人如果注意感官之物，那就将受它的诱惑，诱惑生爱好，爱好生欲火，欲火置一切于不顾。藩篱既破，浩气无存，终至精神丧失，身心同归于尽。”甘地认为这些书就像无价之宝，是人们认识真理的至上佳作。此外，他还读到《亚洲之光》、《通神学入门》并初次接触《圣经》。他对《旧约》兴趣不大，对《新约》却爱不释手，其中《登山宝训》中所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拿你的内衣，你就连外衣也让他拿去”，对甘地颇有影响。他还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和《登山宝训》里的教训贯穿起来进行领悟。他读过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对先知的伟大、勇敢与严肃的生活激动不已。所有这些，对甘地后来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曾对母亲立下誓言不近女色，在这一点上他同样经受着严峻考验。当时到英国留学的印度学生不多，未婚的更少。但大家多以单身汉自居。这些人或许是对自己童婚的历史羞于启齿，或许是担心道出真情会不利于同自己寄居的那个社会的年轻姑娘们幽会，反正很多印度青年实际上过着一种很不真实的生活。受此感染，此时已是育妇之夫而且做了父亲的甘地一度也冒充起单身汉来。甘地生性羞怯，不善交际，可偏偏也能得到一些年轻女子的喜爱，最后甘地不得不如实告知真相以求解脱。

1890年，甘地留英的最后一年，一件意外遭遇几乎使他误入歧途。那年在朴茨茅斯举行了一次素食者会议，甘地和另一位印度朋友得到邀请。朴茨茅斯是个海港，住有很多海军人员，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看好那块地方。甘地和他的同伴下榻的房东就是那样一个女人。他们晚上开完会后回到寓所，常在一起玩牌。按规矩女主人也得参加，相互之间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也属正常。可甘地的同伴却是一个精于同女人打情骂俏的角色，一开始甘地也参与了这场危险的游戏，而且越来越魂不守舍，不由自主。最后他猛然想起了自己在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当即从现场“狼狈地、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像一只被追逐的动物逃脱了他的追逐者”。经过一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第二天他便一个人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甘地认为他能在

关键时刻逃离堕落，是因为他当时好像是得到了神的启示，是他对神祈祷、膜拜的结果。

1891年6月10日，甘地完成了预定的学业并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级法院注册。

6月12日，甘地告别英伦，启程回国。一路上，甘地心潮起伏，感慨万端。伦敦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英国人的彬彬有礼与社会的繁荣发达、秩序井然，令他无比向往与留恋。即将开始的生活又使他深感茫然。他认为自己虽读了不少书，取得了律师资格，但与生俱来的紧张羞怯、对人情世故，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法律与社会环境的一无所知，令他无限忧虑，他不知道自己将如何开展未来的事业。

带着满腹憧憬而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甘地踏上了故土。从孟买上岸，他便从哥哥的口中得知他朝思暮想的老母已不在人世。这个噩耗使返回故乡的游子悲恸不已。得知母亲逝世的伤痛未了，甘地的种姓问题又起波澜。甘地回国后，原来所属的种姓分成两派，一派主张马上恢复他的种姓，另一派依然拒甘地于种姓之外。甘地虽然可以淡然处之，但他的亲友却不能不为之苦恼，因为在印度，被开除了种姓就意味着被社会抛弃。最为这事伤脑筋的是甘地的哥哥。哥哥是个名利欲极强的人，当初他为甘地出国深造费尽心机。现在，弟弟学成归来，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当然不希望甘地因种姓问题而影响前程，所以他竭力讨好主张恢复甘地种姓的那一派。甘地一回拉奇科特，哥哥便忙乎着把他带到圣河里进行了沐浴，并且大宴宾客，忙得不亦乐乎。出于对哥哥的尊敬，甘地勉为其难，任其摆布，加之甘地本来是个本分而诚恳的青年，虽任性执著却并不遭人嫉恨，所以他才算躲过了种姓问题的风波，被所属的种姓接纳。

为了满足哥哥的厚望与家用日益窘迫的需要，甘地决定尽快开业。甘地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先到孟买去闯荡一番，因为那里的高等法院可以给他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与熟悉印度法律的环境。在孟买，甘地挂牌营业。他接下的第一宗案子是由中间人介绍过来的一桩小案，按规矩甘地得给中间人一份佣金，但他认为这有悖于他的为人准则而执意不肯给，尽管他对当事人的收费比别人低得多。作为被告的辩护人，甘地第一次出现在孟买的小案法庭上，按程序他得先向原告的见证人提出诘问。可事到临头，他竟胆小如鼠，一站起来就浑身发抖，头昏目眩，竟然不知该问什么。他只好告诉代理人说他不能受理此案，让他另找高明，自己灰溜溜地逃出了法庭。好不容易等来的第一宗案子就这样给办砸了。这次受挫使他失去了再受理案子和到法庭露面的勇气，也没人再敢找他打官司了。

官司打不成了，怎么办呢？甘地愁苦地彷徨着。一天，家乡波尔班达的一个贫苦的人因土地被没收，找到了甘地门下。案子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了，但甘地还是答应为他草拟一份状子。虽然甘地不善言辞，毕竟文字上有功底，状子写得很有说服力，得到同行的肯定。后来甘地就主要靠给别人写状子来支撑他的事务所。由于收入极为微薄，不能日敷其用，考虑再三后，甘地决定重返拉奇科特。这样，甘地在孟买一共只住了6个月，便背起自己的全部家当，带着满腹苦涩又一次打道回府。

毕竟拉奇科特是甘地的家乡，利用甘地家族的名望，做律师的哥哥及其朋友们的帮助，甘地的律师业务还能运转起来。给人写写状子，平均每月尚可获得300卢比的收入。此时的甘地也放弃了先前的作法。在孟买时他坚持

不给中间人回扣，可在拉奇科特，他却按一定比例付给办案的辩护士一点酬金。

得益于哥哥帮助，甘地虽得以勉强维持生计，但性格倔强，自尊心极强，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甘地实在很难适应环境。这期间，他又遭到一次重大打击。这件事是由他的哥哥引起的。有人控告甘地的哥哥在出任波尔班达王公的秘书与顾问期间曾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这一状告到了对其兄素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甘地在伦敦期间，曾与这位政治公署的长官有点交情，哥哥想让弟弟去为他说情。甘地本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但耐不住哥哥的要求，硬着头皮去见这位英国官员。不料这位昔日的伦敦故交不仅毫不留情予以拒绝，而且粗暴地叫听差把他推出门外。刚从伦敦归来，尚未脱离那个社会文明举止的甘地感到自己蒙受了一场奇耻大辱，他要求那位老爷道歉并声称如果不赔罪就要去告他。可是，这些在殖民地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惯了的英国官员根本不吃他这一套。甘地窝了一肚子火，向亲友、同行、乃至大名鼎鼎的律师请教，该如何去告这位老爷，但大家众口一辞，劝甘地忍耐为妙，因为这种事司空见惯，世故如此，法律如此，你奈他不何。

这件事使甘地陷入了深思。为什么同是一个英国人，在伦敦时，他能和你成为朋友；可是在印度，当双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又无比凶狠，不可一世，同先前判若两人？他认为这正是制度使人变得如此可怕。

甘地感到压抑，不仅因为他冒犯了这位英国长官，而且也因为他讨厌这里的一切。卡提亚华本是由许多小邦组成的，各邦之间互相猜忌，官吏之间勾心斗角。置身在这种龌龊的环境中，甘地感到窒息。他既不愿撇开尊严，曲意逢迎，又不愿忍辱负重，苟且偷安，更不愿昧着良心同流合污，去作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甘地满怀忿愤与忧伤，再一次卷起铺盖。

这一次他回到了祖籍波尔班达，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甘地在其祖辈、父辈们曾经供职的该邦王公手下谋得一份差事，其使命就是为波尔班达王公争得更多一点权利。这里的行政官员虽有些是印度人，但其嚣张气焰并不比那些英国老爷逊色。在为波尔班达王公争权夺利的过程中，甘地注意到许多贫苦佃农的惨况，接触到法律的不公正与执法者的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官场的黑暗，现实的残酷令甘地无比痛苦，自己身为律师，不能捍卫法律的尊严，对一些贫苦的当事人往往爱莫能助，也使他内心充满矛盾。

正当此时，一桩来自南非的案子改变了甘地的命运。甘地的同乡，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在南非开办的公司与另一家南非印度人公司因4万英镑的债务纠纷，正在南非法院打官司，案子久拖未决，现在这家公司希望懂英文和英国法律的甘地能去那里协助他们所聘请的律师尽快了结这宗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官司。聘用期为一年。甘地因国内的律师业务备受挫折，能有机会摆脱这令人生厌的环境去一个新的国家碰碰运气，也非常高兴。对他已大失所望的哥哥也赞成他到那呕去闯闯。虽然对方给予他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商店店员的待遇，但甘地毅然决定应邀前往。

甘地此番前往南非与当年赴英的心境有所不同。当年他青春年少，充满幻想。现在他已经历了异国他乡的漂泊奋斗，经历了初当律师的挫折失败，甚至经历了尊严受辱，理想折翅的痛苦，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已深有体会。母亲早已作古，故乡除了一些伤痛的记忆已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只有对妻儿的牵挂使他有些不忍离去，但南非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他对家庭的眷恋，所以甘地在安顿好妻子后立即动身去孟买，坐上了去南非的头等舱

位，开始了他的南非之旅。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航行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着他的将会是一个新的战场。

## 二、声名卓著的印侨首领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于 1893 年 5 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一上码头，他便发现印度人在这里并不受人尊重。前来接他的达达·阿布杜拉先生本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富有商人，但甘地隐约觉得当地人看阿布杜拉先生的眼神中含有鄙夷。

甘地被安排到阿布杜拉商行的住处。阿布杜拉是位精明的商人，他见前来协助处理这宗案子的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禁顾虑重重。好在案子尚在德兰士瓦进行，他盘算着先不急于送甘地到那里，考察一下甘地的能耐再说。

想不到甘地对《可兰经》及伊斯兰教的了解帮了他的忙。这位很看重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商人因为和甘地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而对之产生了信任 and 了解。两三天后，阿布杜拉便把甘地带到当地的德班法院，介绍他认识几个人，并让他坐在他的法律代表身边。甘地身着欧洲人的长礼服，缠着印度人的头巾，这违反了当时南非法庭对印度人的歧视性规定，即印度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庭长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认为庭长的做法侵犯了他的自由，因而断然拒绝并愤然离庭。

当时南非是英国殖民地，这里有着深刻的种族歧视与偏见，而且这种歧视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早在 1860 年前后，欧洲殖民者发现在南非从事种植和采矿有利可图，他们同当时的印度政府取得协议，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聪明能干、刻苦耐劳的印度人在这块土地上充分施展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种植蔬菜，引进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还经营起小本生意，进入商界，很多人从劳工地位上升到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印度国内的商人也随之而来，定居经商，这种情况使当地白人心怀戒惧。加之印度人与欧洲人在种族、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上大不一样，使那些自视高人一等的白人加倍敌视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的印度人。他们想尽办法，采取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进行种族迫害与歧视。由于印度劳工大多不识字，商人为了赚钱而忍辱负重，在政府机关就职的低级职员不会也不敢斗争，加之印度人因职业、信仰、种族关系错综复杂，无法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步步紧逼的迫害。

甘地则不然。他受过英式教育。懂得自由平等乃天赋人权，而且熟悉殖民者的法律。对于这种明白无误的种族歧视与偏见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忍气吞声。

从法庭出来后，他当即给报馆写了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予以披露，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支持他的勇气，有人批评他的冒昧。在欧洲人眼里，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但甘地却因此而出名。

没多久，阿布杜拉商行接到他们律师的来信，要求阿布杜拉亲自或派代表去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打官司。阿布杜拉决定让甘地代表他前往那里。

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之行是甘地与南非真正接触的开始。阿布杜拉公司给甘地买了头等车铺位，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因为这里不同于印度，他可能会遇到麻烦。

火车于晚间 9 点左右抵达纳塔耳省城马利兹堡。从这一站上来一个乘客，他从头到脚审视了甘地一番，一声不吭地走开了，一会儿带来几个官员，他们强迫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地解释他有头等车厢车票，官员不听，又叫来了警察，不由分说将甘地赶下火车，将他的行李也一块儿扔了出来。茫茫夜色中，火车开走了，甘地孤零零地被抛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当时正值隆冬，甘地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蹒跚在没有灯光的候车室里静待天明。在这月黑风高的漫漫长夜，甘地经受着寒冷的威逼和内心痛苦的双重折磨。他感到自己所遭遇的不过是种族歧视的病症，重要的是设法去掉病根，哪怕因此遭受再多的痛苦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清晨，甘地给铁路局局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陈述了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并通知阿布杜拉去见那位局长。局长认为铁路当局的做法无可非议，因为南非的法律承认其合理性，但他本人表示将指示各站站长保证甘地能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则打电报给马利兹堡的印度商人请他们到车站对甘地加以关照。当天晚上，夜车开来，上面有给他订的一个铺位，甘地这才乘车离开了这个令他终生难忘的车站。

接下来是坐马车从查里斯城去约翰内斯堡，可是马车的白人领班从中作梗。他认为甘地不能和车里面的白人乘客同座，要甘地坐在马车夫旁边，甘地为赶时间，只好顺从了他的意思。可车到巴德科夫驿站时，白人领班又从马车夫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到脚踏板上，示意甘地坐到车夫旁边的脚踏板上。这种侮辱也太过分了，甘地忍无可忍，表示不从，可话音未落，凶蛮的白人领班便冲上来对甘地拳脚相加。所有的乘客都目睹了这一暴虐的场面。这是甘地平生第一次挨打，也使甘地亲身领略了南非种族歧视的严酷现实。

到达比勒托利亚之后，甘地拜见了阿布杜拉公司的律师阿·伍·贝克先生。贝克先生虽是位著名律师，却热衷于宗教事业，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甘地早在伦敦的时候，就对研究各种宗教产生了兴趣，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朋友。贝克先生是南非宣教总会董事之一，在他主持的祈祷会上，甘地又结识了不少基督教朋友，如赫丽斯小姐、嘉碧小姐和柯慈先生等等。那两位女士都上了年纪而且未婚，她们邀请甘地每周日下午到她们住处喝茶，这又给甘地提供了一个与基督徒扩大交往、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机会。每周日下午，他都如约前往，聆听两位女士的叙说，顺便把自己一周来的宗教日记拿给柯慈先生看，并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同时贝克先生也不惜冒种种非难和不便，陪甘地去参加新教派的基督徒每隔几天召开一次的大会，希望会上使人感奋的宗教气氛和赴会者的热忱与诚笃能感染甘地。

甘地与基督徒的广泛接触交往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宗教热情与向往。他开始系统地研究各种宗教经典。除《圣经》、《吠陀》外，他又买了《可兰经》及其他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进行仔细研究，并保持同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权威的通信往来，不断探索宗教问题。在和他自己所信奉的印度教比较之后，甘地基本形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宗教观：即宗教没有好坏善恶之分，都是平等的。

为处理案子，甘地结识了本案的被告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哈齐汗在比勒托利亚和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声望旗鼓相当，他们都是南非印侨中举

---

印度教的经典，成书于公元前 1500 年到 1000 年之间。

足轻重的人物，哈齐汗还热衷于公众活动。了解这一点后，甘地便极力求助这位知名人士的帮助。在哈齐汗家里，甘地召集了一次大会，邀请比勒托利亚所有印度人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甘地平生第一次对公众讲话，论题是“商业上的诚实”。在此之前，甘地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讲诚实，诚实只属宗教上的事情。甘地的讲话就是力图驳斥这种观点，促使印度商人从钱眼里走出来，注意民族的尊严与形象。他说：在国外，诚实格外重要，少数几个印度人的行为实际上代表着他们的亿万同胞的品格和形象。我们不注意环境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要时刻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讲话结束时，他建议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局交涉，并表示自己将为这个协会尽力。

甘地的讲话有感而发，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他的真诚第一次打动了这些在异族统治下备受欺凌却习惯了“将金钱和屈辱一起装进口袋”的人们，与会者表示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那次集会很成功。从此以后，定期集会成了惯例，几乎每周或者每月都举行一次。通过这种形式，大家交换意见，群策群力，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增强了团结斗争的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走上了带领群众自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甘地为改变南非印度人所受的不公正遭遇作过不少努力。他求见比勒托利亚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先生，向他陈述了当地印侨的苦处，虽未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引起了对对方对印度人处境的同情与重视。他曾写信给铁路当局，痛陈自己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迫使其作出答复，即印度人只要服装合适，都可以买头等和二等车票。他还对德兰士瓦和奥伦次自由邦的印度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中他发现，在南非这个种族隔离、歧视和偏见无所不及的国度，印度人的权益和尊严毫无保障。这些严酷的事实使甘地得出一条结论：南非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能呆下去的国家，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他不断地思考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可是他来南非的主要责任是尽快了结阿布杜拉的案子。这是一宗由商业交易引起的大案，充满了无数错综复杂的事实和十分微妙的法律问题。为打赢这场官司，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主要负责给律师准备原告的案由和挑选一些有助于他的证据。甘地的这个角色使他得以有机会研究这些经验丰富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的工作过程，也从中了解到他们取舍材料、使用证据的一些秘诀。甘地的工作能力因此大有长进。

甘地对这个案子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办事一向认真细致，刻苦耐劳。一段时间后他便掌握了有关这些交易的所有文件。他还对簿记进行了专门研究，参考了大量法律书籍，查阅了大量有关案例。结果他对本案的了解甚至超过原告和被告本人。他认为此案胜诉已确定无疑。

不过，他不想按常规去打赢这场官司，而准备在法庭外解决。因为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到法庭上见分晓，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律师费却在急剧上涨。虽然当事人都是富商大贾，恐怕也难支付庞大的诉讼费用，况且这件案子已占了他们太多的精力，相互之间的恶感将随着对簿公堂而与日俱增。如果继续拖下去，双方都将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为此甘地一再向原告、被

告晓以利害。他费尽唇舌，终于说服被告认输，阿布杜拉获胜。

甘地并未停留在只是打赢这场官司，他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着想。他考虑到，如果阿布杜拉要求哈齐汗立即付清全部赔偿，后者将面临绝境，要么破产，要么食言，而这两者都是铁布·哈齐汗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甘地提出了一个协调办法，就是阿布杜拉同意哈齐汗分期偿还这笔款项，阿布杜拉答应了。这样一宗旷日持久的纠纷案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甘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他做律师以来所打赢的第一场官司，而且是一个久拖未决的官司。这不仅使他掌握了打官司的诀窍，而且学会了利用人性善良的一面去打动人心，从而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风格：就是努力使相互怀恨的双方言归干好。在其后多年的律师生涯中，甘地一直信守这个原则，竭尽全力使数千件案子私下解决。虽然他失去了高额的律师费，却因此而声名远扬。

甘地打赢了这宗官司，他来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立即从比勒托利亚赶回德班，准备启程回国。阿布杜拉执意为甘地饯行，并准备在西登罕为他举行饯别宴会。

阿布杜拉的盛情举动意外地改变了甘地的人生轨迹。在西登罕时，甘地习惯性地翻阅报纸，无意间发现了一则有关“印度人选举权”的新闻。从这则新闻，甘地得知当时纳塔耳立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法案要剥夺所有印侨的选举权，而且还准备相继出台一系列不利于印侨的法案。甘地非常气愤。饯别会上，甘地向阿布杜拉打听此事详情，商人表示了他的无奈，“这些事情我们能懂什么呢？我们只懂那些关系到我们生意的事情。况且我们都是些不中用的人，我们没受过什么教育，看报纸一般只为弄清当天的行情，懂什么立法不立法。我们最好的信息来源就算是这里的律师了！”

“可是，”甘地不解地问：“这里有那么多本地出生的印度青年，难道他们不帮你们吗？”

阿布杜拉失望地叹了口气，“他们从来不曾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老实告诉你吧，我们也更不耐烦买他们的帐。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得仰承白人牧师的鼻息，而这些牧师又受政府管辖。”

阿布杜拉的话使甘地明白了侨生与侨居的印侨之间的鸿沟。他认为有必要消除双方的隔膜。他对大伙说，“这个法案如果通过而成为法律，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难，这是置我们于死地的第一步，它将使我们从根本上失掉做人的尊严。”

甘地的责任感再次打动了这些印度商人深层的忧患意识，他们不仅把律师告诉他们的有关选举权内幕和盘托出，而且真心挽留甘地能再多住一月，带领他们进行抗争。只要甘地肯留下，他们愿意出钱出力，甚至包下甘地的全部开支。

甘地答应暂且推迟归期，留下来解决争取印度人选举权的问题。不过他表示他个人的费用不用大家支付，但是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活动经费。事实上，这不只是一个月的暂时延期，而将是一个长期斗争的开始。

当时南非纳塔耳印度人中，经济上首屈一指的人物要数阿布杜拉·哈奇·阿丹，在公众事务方面最负众望的领袖则是哈齐汗·穆罕默德。甘地认为：要进行斗争，必须取得他们两人的鼎力相助。甘他说服了这两位知名人士，在阿布杜拉家里召开了一个由他主持的会议，商讨对抗选举法案的对策。

这次大会不仅侨居印度人受到邀请，在纳塔耳侨生的、大多数信奉基督

教的印度青年也在邀请之列。到会的不仅有富商大贾，也有一般职员，德班法院的译员和一个教会学校的校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人全部主动登记为志愿人员。会议气氛热烈，所有与会者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面对侨团的苦难，这些来自印度不同角落，分属不同宗教、种族、种姓的印度侨民及其后裔，无论年龄大小、职务高低，不分贵贱全都表现出同样的忧虑与愤慨，都愿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

会后甘地立即给纳塔耳立法会议会议长发去电报，要求他延期复议。同样的电报也发给当时的总理约翰·鲁宾逊爵士和达达·阿布杜拉的朋友、内阁阁员艾斯埃比先生。议氏答复将该法案推迟二天考虑。

初战告捷，甘地一帮人大受鼓舞。他们立即拟好请愿书，连夜誊写数份并征集到不少人在上面签字，送交各新闻单位和议会。有几家新闻单位全文刊载了该请愿书并发表了有利的评论。这份请愿书同样在议会引起强烈反响。不过尽管如此，法案还是被通过了。

这一结果证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只有团结起来，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改变人和制度的深刻偏见，赢得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面对现实，大伙寄希望于当时的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能出面干涉。他们准备给里朋勋爵送去一份大请愿书。甘地负责起草这份请愿书。他对南非印侨的了解大大派上了用场，他还参阅了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请愿书旁征博引，以大量雄辩事实说明纳塔耳印度人享有选举权实属天经地义。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艰苦努力，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他们便征集到1万多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将请愿书复印了1000份，一份呈送里朋勋爵，其他则分别寄给报馆和出版社，以诉诸公众舆论，大造声势。纳塔耳印度人的状况第一次被公诸于众，引起极大反响。《印度时报》在一篇论述这份请愿书的社论里，对印度人的合理要求表示坚决支持。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支持。后来里朋勋爵慑于压力，否决了这一企图剥夺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

事情刚刚开了个头，甘地原定多住一月的期限已到，但印侨各方人士都强烈要求甘地长期住下来，甘地拗不过众人的盛情挽留，他自己也不想半途而废，便准备定居纳塔耳。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很快便在纳塔耳租了一栋房子，购置了一些家具，办起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有20多位商人当即聘请他当法律顾问。

甘地到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在这之前，他曾在孟买高等法院申请并获得注册律师资格，他的英文证书已交存孟买高等法院备案。这次申请只需附上两份品行证书即可。申请书一般是通过律师递上去，但如果是由警察长直接递上去，还可免收费用。甘地请当地的警察长，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艾斯埃比先生替他递交了申请书。

法律协会由清一色的欧洲人组成，他们反对甘地的申请，理由是他的申请没有附上英文证书原件。其实这是托辞，真正的原因在于欧洲人担心有色人种涉足法律界会使之失去在纳塔耳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但当初制定律师入会手续时尚未考虑到这一层，因而关于有色人种能否入会尚无明文规定。为了挫败甘地，律师协会聘请了一位杰出的律师来支持他们。

这位大律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关系，他主动约见甘地并建议甘地找他的同乡阿布杜拉替他出具品行证书。甘地照办。经过一番周折，最高法院最终

接受了甘地的申请。登记注册并例行宣誓后，首席法官让甘地摘下印度缠巾，这一次甘地奉命执行，对此他的许多同胞，包括阿布杜拉都颇有看法。但甘地认为这样做并非屈服，而是为了保存力量以应付更大的斗争。

甘地获准成为高等法院律师，这是有色人种第一次跻身于先前只被欧洲人占据的领地，应该说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如果甘地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或许会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生活优裕的大律师，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为南非印侨争取权益上面，这也正是他继续住在纳塔耳的目的。

他认为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将纳塔耳的印侨组织起来。来南非一多时间，他早已注意到了南非印侨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致命弱点，这种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于维护印度民族的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团结起来维护自身利益。甘地和阿布杜拉及其他几位友人商量并达成共识，认为成立一个印度侨民的正式组织很有必要。1894年5月22日，南非印度侨民的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在甘地的组织下宣告成立。

大会成立那天，印度侨民济济一堂，挤满了阿布杜拉那间宽大的房子。全体到会代表情绪高昂，气氛热烈。讨论通过的大会会章简明扼要，并规定会费为每月5先令，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鼓励多交。阿布杜拉月交2英镑，名列前茅，甘地也不顾自己微薄的收入，决定月交1英镑会费，大多数人都是月交10先令，大会当场就接到许多捐款。

甘地是大会秘书，收集会费的任务便落到他的头上。开会时人们一时冲动，慷慨解囊，信誓旦旦，可一旦热情消逝，收集会费便很成问题。甘地为收集会费不得不每月四处奔波，有时还要碰钉子。后来甘地建议重新考虑将月会费改为年会费，这一大难题才得以大大简化。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吸收了当地出生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在大会的赞助下，侨生印度人教育协会成立，会员也多是些有知识文化的印度青年。他们交纳名义上的会费，协会则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启发他们的思想，使他和印度商人接触，也为他们提供为侨团服务的机会。协会还是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集会宣读有关各种问题的论文，还设有小图书室。

大会注重宣传，意在使所有英国人和印度人都了解纳塔耳的真实情况。为此，甘地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撰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一个英国人呼吁》，它用大量事实真实地报道了纳塔耳印度人的现状。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也是以大量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印度人选举权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两本小册子当时曾广为流传，为南非印度人赢得了大量同情者与支持者，也向南非印度人指出了一条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吸收大量非熟练工人和契约劳工。因为会员入会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能承担一定的会费，下层人民就被拒之门外了。作为一个有觉悟的印度侨民，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革命活动家，甘地也意以到南非印度人斗争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拥护，他们也是最需要关心和保护的人，甘地一直在寻找机会同他们建立联系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解除他们的疾苦。

这样一个机会很快就来了。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成立不久，有一天，一个遭到主人毒打的泰米尔人找到甘地门下。这个可怜的人名叫巴拉宋达朗，是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里做工的契约工人。主人盛怒之下，打掉了他的两颗门牙，来找甘地时，他还满口流血，手里拿着头巾。同胞的不幸遭遇激起了甘

地的无比义愤，他决定为这个可怜的人伸张正义。他先把巴拉宋达朗送到一个白人医生那里治伤，并要医生出具受伤性质的证明，而后他又带巴拉宋达朗找县长，递交了他的起诉书。县长立即传讯了那位雇主。

甘地的意图并非要惩罚施暴的欧洲人，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为巴拉宋达朗争得一点起码的权利——解除对他的契约或让他转给别人。按照当时有关契约劳工的法律，如果一个普通佣人擅自辞去，主人会到民事法庭告他，而要是契约劳工这么做，他就会被告到刑事法庭。在这种情况下，契约工人就像奴隶一样被视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解雇他，契约工人则不论遭遇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开主人。甘地前去拜访了巴拉宋达朗的雇主，说服他同意了将契约转给别人，他还替巴拉宋达朗找了一个新的雇主。

甘地解救巴拉宋达朗的消息不胫而走，南非各地到处传诵着一位高等法院的律师为一个契约工人申张正义的神奇故事，其影响甚至远达印度的马德拉斯省。甘地便成了这些下层人民心中的救星和朋友，因而赢得南非甚至印度国内契约劳工的爱戴。从此以后，契约工人源源不断地涌进甘地的律师事务所，向他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甘地也借此与南非的印度劳工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了解。

1894年，纳塔耳政府又打算对印度契约劳工征收年税25英镑。为取得英印政府同意，纳塔耳政府已派员前往印度。甘地迅速作出反应，他将此事提交纳塔耳大会讨论，大会开始组织必要的反抗，如组织宣传、利用舆论工具向南非纳塔耳政府和英国殖民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不同意征收25英镑年税而同意收3英镑人头税。即便如此，甘地认为总督不应作此让步，虽然名义上赋税有所减轻，但考虑到契约劳工的实际承受能力，这种加收3英镑人头税的做法也是残酷的。为了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甘地一直致力于从根本上取消这种苛捐杂税。实际上，直到20年以后，由于侨团和南非全体印侨的共同努力，3英镑人头税才最终被取消。

1896年，甘地旅居南非3年之后，决定回国一趟。当时他在南非不仅建立了颇为良好的律师业务，而且在公众工作方面声名卓著，他知道自己将在南非长住，此番回国，是想把妻儿带来，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引起国内公众对南非印度人的注意。

这次航行激起了甘地学习乌尔都语和泰米尔文的极大兴趣。船上乘客很少，其中有两名英国官员与甘地过从甚密。有位医生给了甘地一本《泰米尔文无师自通》。甘地满心欢喜。在南非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为和穆斯林取得密切的联系，应具备乌尔都文的知识。同样道理，只有学会泰米尔文，才能够和马德拉斯的印度人有密切往来。因此甘地很快在船上学起这两种语言。后来他对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进一步学习实际上是在南非的监狱中进行的。

轮船经过24天航行，在一个天气晴朗的夏日平安抵岸。甘地搭乘当日的火车赶赴孟买，在孟买作了短暂逗留后，又直接回到拉奇科特。在这里，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出版了一本有关南非局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书中，甘地着意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的境况，但所用文字却比先前那两本小册子要温和得多。

这本小册子一共印了1万份，分发印度各报和各方领袖。《先驱报》首先就这本小册子发表了社论，路透社经过摘要夸大后发到英国，又由伦敦摘发纳塔耳，同时每家报纸都对这个问题大加评论，一时引起轰动。

留居拉奇科特期间，孟买发生了瘟疫，弄得附近的人惶惶不安，拉奇科特也很紧张。甘地自告奋勇参与防疫委员会，调查居民卫生情况，他特别留意各区的厕所情况，并设法建议改善。在调查“贱民”区的环境卫生时，只有甘地愿意前往。

在拉奇科特期间，印度全国正在筹备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盛典，甘地应邀参加了拉奇科特筹备委员会。早年受过英国教育的甘地对英国充满难以忘怀的感情，虽然在南非这个英国殖民地他耳闻目睹了种族歧视的种种罪恶，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臣民，他也亲身经历了这种统治下的种种屈辱，但他一直相信，英国的统治整个说来对于被统治的人民是有好处的，那些丑恶现象不过是暂时、个别地方的现象，是和英国传统背道而驰的。

为唤起公众舆论对南非的注意，他打算组织几次集会，为此他前往孟买，拜见了有关知名人士，特别是得到了人称“孟买之狮”的费罗泽夏·梅赫塔爵士的帮助。

在梅赫塔爵士为他举行的群众大会上，甘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虽然讲稿是由别人代念，但甘地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还是赢得了广大听众。

梅赫塔爵士的帮助使甘地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于是他又从孟买赶到浦那去。他首先去见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曼尼亚·提拉克，这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告诉甘地：“你需要各方面给你帮助是对的。在南非问题上，不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你得有一个无党派人士来担任你的主席。”

与提拉克晤面之后，甘地又去拜见国大党温和派的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事后甘地对他在回印期间拜见的三位人物各不相同的风格作了生动的描述。甘地的印象是：梅赫塔爵士仿佛是喜马拉雅山高不可攀；敬爱的提拉克像海洋可望不可即；戈克利却像恒河一样让他感到亲切而自然。

最后，甘地去找那位似乎已息影政坛，专心做学问的无党派人士潘达卡博士。这位孤做的大学者竟然也被甘地打动了，同意出任由提拉克与戈克利联名举行的集会的主席。

接着，甘地便赶往马德拉斯参加集会，由于解救巴拉宋达朗的缘故，甘地在那里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甘地在欢迎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的讲话虽是铅印的，也很长，但听众却细心地谛听了每一个字。大会结束的时候，甘地照例要宣传他写的关于南非印度人状况的小册子，他拿出一万册经过修订的第二版，很快便被抢购一空。

在这里甘地还得到《马德拉斯晚报》的主笔、对南非印度人问题颇有研究的格·巴罗梅斯朗·皮莱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后者曾将《马德拉斯晚报》的专栏交给甘地自由处置；《印度教徒报》的格·苏伯罗曼尼安博士也对他很表同情。

之后甘地便从马德拉斯赶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的情形与甘地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的情形很不一样，甘地在那里没有熟人，工作也开展得并不顺利，不过也还是结识了一些朋友，如《英吉利人报》的主笔宋德斯先生就把甘地视若知己，把他的办公室和报纸都交由甘地处理，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2月初，一封发自南非德班的加急电报打断了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因纳塔耳立法会议即将在1月开会，那里的侨团需要甘地立即回去。甘地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和已丧父的外甥搭乘阿布杜拉公司新购进的“科兰”号汽船第

二次远渡南非，同时开往德班的还有“纳德利”号。两条船的乘客共有 800 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兰士瓦。

这两条船直开纳塔耳，中途不停，所以航程只用了 18 天。在离纳塔耳只有 4 天航程的海上，甘地一行遭受了一场异乎寻常的可怕风暴。令人胆颤心惊的风暴肆虐了 24 小时后，终于过去了，然而这场风暴却考验了甘地的勇气、胆识与能力。他对风暴并不恐惧，在整个过程中，他都在乘客中走动，照顾和安慰乘客，协助船长渡过危机，这些使他在这场自然风暴中与同船过渡的人溶为一体并赢得了他们的信赖。

但是当“科兰号”和“纳德利号”船先后在德班港抛锚时，等候他们的却是一场更大的“风暴”。按常规，经过远洋航行的旅客，必须经过卫生检查才能上岸，以防传染病。由于这两条船启程时，孟买正流行鼠疫，因此等待他们的首先是严格的检查和漫长的隔离。其实这一隔离除了卫生上的理由外，真正的目的是德班的白人想通过对乘客和代理行公司的威胁恐吓，禁止甘地及其他印侨登上南非大陆。

德班因此闹得很凶。少数印度人和他们的几个真正的英国朋友与在武器装备和财富上占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展开了一场极不平等的斗争。

在这场紧张的对峙中，就像在大海上对待可怕的风暴的威胁一样，甘地镇定自若。他不断在乘客中走动，给他们打气，还给另一支船上的乘客送去慰问函。他在船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让乘客乐以忘忧。在圣诞节那一天，船长宴请了头等舱的乘客，甘地及其家眷是主要宗客。在这种特别的氛围里，甘地一边和大伙谈笑风生，一边在思考眼前的这场特殊战斗。甘地认为是自己引发了这场斗争，从而牵连了船上的同胞，达达·阿布杜拉公司为了他正冒着巨大的风险，乘客们的生命在遭受威胁，他的家眷也将因此难逃厄运。他的心情其实十分沉重，最终无法同这份欢乐的情景完全协调。

日子一天天艰难地过去。威胁、利诱、最后通牒都没有能够让甘地和船上的乘客屈服，白人当局只好在 23 天期满时的 1 月 13 日，下达了准许乘客登陆的命令。但这一天上午 8 点，2000 多白人聚集港口，示威游行，坚决抵制亚洲人入境，并以甘地为主要对象，准备必要时实施武力，以达到阻止其入境的目的。支持白人骚动但又与阿布杜拉公司有私交的警察局长艾斯坎比先生一面通知船长，希望甘地及其家眷最好在黄昏时再上岸，由港务警官护送，一面对游行群众进行疏导，使人群大多散去。甘地为了显示自己决不屈服压力的勇气，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上岸，准备前往 20 英里以外的罗斯敦济先生家里。

甘地刚一上岸，便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一大帮人很快围上来。劳顿先生见势不妙，便叫了一辆人力车，然而这帮青年不让甘地上车，并恐吓车夫。开始劳顿先生从中劝解，他们还不敢动手，随着围攻鼓噪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上前拉开了劳顿先生，于是甘地被围在人群中，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有人上前扯碎了他的头巾，几个耳光便将甘地煽倒在地，另一些人则拳脚相加。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勇敢的白人女士挺身而出，阻止了暴徒的毒打，警察也及时赶到，把遍体鳞伤的甘地安全送到罗斯敦济家。

然而骚动的人们仍不肯罢休，他们包围了罗斯敦济的住所，并高声喊叫，要活捉和吊死甘地。最后甘地只好遵从警官的意见，穿上一套警察制服，化妆逃出了这所房子，躲过了白人对他的围追堵截。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立即电告纳塔耳政府依法严惩肇事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办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示：如果甘地认出殴打他的人，法院一定严惩。

但甘地却不准备报复那些对他施暴的人。他说：“我不打算控告任何人，我可能认出一两个人。不过，把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信谣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如果他们确系听信了这些报道而忿怒，那就不足为奇，应该责怪的倒是那些领导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甘地还接受了《纳塔耳广告报》记者的采访，把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副本一起交给记者，并向他们指明他在印度所说的全都在南非说过，他还向记者说明“科兰”和“纳德利”两船的乘客来南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人有很多是老侨民，而且大部分人都不打算住在纳塔耳而准备到德兰士瓦去。

甘地对记者的谈话和他拒绝控告闹事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德班的欧洲人开始惭愧自己的言行。如报纸开始宣传甘地的无辜，并谴责那些暴徒，甘地在南非的声望更高，南非印侨的形象也令人刮目相看。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英布战争实际上是英国殖民者和荷兰殖民者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人提出的作战理由却是说布尔人虐待南非境内的印度人。甘地出于多种考虑，决定站在英国一边，为保卫英国的利益而战。他召集了300名印度人，组成一支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行军20到25英里，常常要经过黄沙蔽日的战场从前线将伤病员运到后方救治。

1900年2月，英军逐渐制服维做不驯的布尔人，印度救护队完成了2个月的战时救护工作后奉命解散。1902年5月31日，布尔人投降，英国报界对战时印侨的服务精神一致予以赞扬。因为救护队的工作，甘地及主要负责人都得到一枚勋章。

这次为英国充当救护队对印度侨民是一次新的体验。一方面英国的嘉奖使印侨对英帝国产生了更大的幻想，以为印度侨民的苦难从此将会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布尔人和英军相比处于劣势，然而他们敢于同英军对抗，他们的英勇斗志与自我牺牲的精神，特别是妇女儿童表现出的勇气和热情，使甘地肃然起敬；同时，印度人由此而试验了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同种族、信仰与阶层的印度人第一次以一个团结的整体出现，这是一次实际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印度人因此而获得了自信心。这些都为甘地后来进行群众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甘地留居南非原定一个月，现在一晃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打开局面，甘地自己的工作重心将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定离开这块生活战斗了6年多的土地。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恋，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甘地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

1901年12月，甘地抵达孟买。时值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甘地和本届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塔爵士乘同一列火车前往赴会。甘地在大会上提出了《代表南非印

---

荷兰人的后裔。

一说是1100人。

侨的呼吁》的议案，并获得大会通过。

3 天的大会期间，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大会主席华恰先生对他印象极好，称赞他“善良、热忱、活泼，富有活力”。可是甘地对国大党却相当失望，他认为大会流于形式，服务人员毫无训练，没有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作风懒散，办事拖沓，陈规陋习不少，卫生条件极差。

大会闭会后，甘地在加尔各答继续居留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他通常将一天的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为了南非的工作去拜访加尔各答的名人，一半是参观和研究这个城市的宗教和公共团体。他起先住在印度俱乐部，以后在戈克利盛情邀请下，搬进了戈克利的豪华寓所。戈克利这位被甘地描述为像恒河一样的大人物对他不仅从生活上悉心关照，而且极善言传身教。甘地对戈克利钦佩不已。

在这期间，甘地曾去缅甸观光过一次，一路上感受颇多。他认为那里的妇女多勤劳自强，男子则极懒散。虽是佛国，但缺乏虔诚；而且居然还有印度同胞帮助英国人欺负缅甸老百姓。

从缅甸回来后，甘地便向戈克利告辞。与戈克利相处的一个月，甘地自觉获益匪浅，此番离别，非常难过，但想到自身的使命，他必得自己去创一条路。

他告诉戈克利准备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亲自体验一下三等车旅客的疾苦，并考察印度的国情。戈克利对此表示赞同，甘地动身的时候，戈克利亲归到车站为他送行。

第一次在印度坐三等车的经历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们所得到舒适那样可怜，而铁路当局对此漠不关心，旅客自己也麻木不仁。这种状况与他在欧洲甚至南非的情形相去甚远。对于这种恶劣的状况，甘地认为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车，以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所以从这时（1902 年）起，甘地一直都是乘坐三等车，直到 1918~1919 年甘地得了一场大病，才迫使他事实上放弃乘坐三等车旅行的做法。

甘地苦行告一段落后，戈克利曾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执行律师业务，同时帮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使他拒绝戈克利的建议，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最初他也很烦恼，对在这里开展律师业务同样缺乏信心，直到他受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心里才又激起希望，打算到孟买去创业。

两星期后，甘地动身前去孟买，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刚搬进事务所，次子曼尼拉尔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并有肺炎并发症。当时曼尼拉尔年仅 10 岁，前几年得过一场天花，差点死去。对于多灾多难的儿子，甘地忧心如焚。医生告诉他吃药作用不大，建议给他吃鸡蛋和鸡汤，甘地拒绝这个建议，他认为这有违素食的信仰。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爱的儿子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变信仰。为了兼顾信仰与儿子的生命，他决定冒险试一试偶然学到的水疗法，他开始每天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且接连 3 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开始时毫无效果，病情日益加重，甘地也一度对这种做法产生过动摇，但他还是始终不渝地按着“神的旨意”，继续水疗法试验。最后，奇迹终于出现了，儿子的病居然逐渐好了起来。以后成了甘地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曼尼拉尔的康复究竟是由于神的恩典，还是由于水疗法，或者是由于细

心饮食和看护，谁也说不清，但甘地却坚信是神帮了他，因而更相信神，或者说更相信自己了。

甘地在孟买的活动再次被来自南非的急电打断，原因是英国人从布尔人手中夺取了政权后，仍旧继承布尔人歧视印度人的法律。英国人还建立了一个亚洲人事务部，专门对付印度人，南非印侨很紧张。正好此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即将访问南非，当地侨团希望甘地回去利用这次机会为他们争得一些权益。甘地当即停止了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把妻儿安顿在国内，带了几个年轻的帮手，其中包括后来非常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者，甘地的侄子摩干拉尔·甘地，准备重返南非。

和妻儿再度分离，甘地不免难过，但他已习惯了不安定的生活，他认为在这个世上要指望安定是错误的，只有至高无上的神本身代表着确定。

甘地如期赶到德班。但和张伯伦的初次会晤令甘地大失所望。张伯伦此番前来南非是为了赢得南非英人和布尔人对皇室的效忠，他对印度代表团没有兴趣。他说：“帝国政府对自治领土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努力帮助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和他们友好相处。”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以自己的效忠来换得英王的开恩，可现在张伯伦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诉了他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意味着将有更艰苦的斗争等着他们。

1903年1月1日，甘地从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亚，他得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成备忘录，准备提交张伯伦。比勒托利亚的地方当局本来存心不让甘地入境，当他们看到甘地居然来了，不禁惊奇。亚洲人事务部主张根据新颁发的治安法将他逮捕（该法规定，凡未持有入境证者，即可将之拘捕入狱）。当他们得知甘地持有合法入境证，便以入境证发错了为理由，要甘地离开比勒托利亚，并强行将甘地的名字从请愿代表团中删掉。这对甘地简直是奇耻大辱，但为了侨团的事宜，甘地不计较个人的屈辱与否，建议让另一个印度律师——乔治·戈克莱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戈克莱先生领着侨团代表去见过了张伯伦，张伯伦先生在答文中谈到甘地没有参加请愿的事十分轻描淡写：“与其反复听取同一个代表的话，换一个新人岂不更好吗？”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侨团要甘地做的事似乎已完结，但甘地不是肯轻易屈服的人。他不打算立即回国，也不准备返回纳塔耳，就留在德兰士瓦，而且还要在德兰士瓦最高法院登记为律师，他不相信他就对付不了亚洲人事务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侨团就会被赶出这个国家，他们将永远只能过没有尊严的日子。

同比勒托利亚及约翰内斯堡的印度人讨论了之后，甘地决定在印侨最多的约翰内斯堡成立事务所。

约翰内斯堡已成为管理亚洲人的官员的据点，这些官员从来没有替印度人、中国人或其他亚洲人做过一件好事，只是一味地敲诈勒索。不断有人找甘地诉说，甘地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出来主持公道。

他开始搜集证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长。警察局长看过全部材料并找证人核实后，答应将想方设法对付那帮无恶不作的家伙，不过他和甘地一样清楚：在南非要找一个白种人陪审员来审判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极其困难的。虽然甘地当时怀疑一大批官员，但由于没有无可辩驳的材料对付所有的人，所以他的指控只针对两个人。这两个人虽然受了审判，结

果却是陪审员不顾昭然若揭的事实，宣判两个人无罪释放。不过，由于甘地的工作，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官员因民愤极大，还是被革除公职。亚洲人事务部从此收敛了一些，印度侨团也有了一些保障。

在德兰士瓦为印度侨民的利益奔走呼号的时期，甘地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次留居南非时，他和基督教徒过从甚密，但对宗教仍然谈不上很深的研究。现在他又和通神学的朋友交往，开始系统阅读印度教的经典如《瑜伽经》、《瑜伽论》以及印度教的圣诗《薄伽梵歌》。甘地对《薄伽梵歌》尤其喜爱，他每天清晨沐浴时，在墙上按上纸片，写上几首梵歌，一边洗漱一边背诵。他用这种办法背诵了十三年，并以此作为每日行为的指南。圣诗中的“不占有”与“平等”的教训更是深深地吸引了甘地。他以为圣诗中叫人不占有，是说人生在世，钱财不过身外之物；正如司库出纳，过手钱财虽多，却不能据为己有。人如能抱不占有和平等的观念，即可收到“洗心革面”的效果。受此影响，甘地放弃了原准备投入的1万卢比的人寿保险，他写信给他的哥哥：“我曾多次写信给你，我的全部积蓄可望到1万卢比，准备送你；但从现在起你不必再作指望。因为将来如有任何积蓄，我将用于印侨的公益事业。”他的哥哥为此极不开心，很长一段时间兄弟俩断了通讯。

简朴的理想逐步实现，宗教的意识日益活泼，甘地把素食当作一种使命的热情日趋高涨起来，因此他曾为濒临倒闭的两家素食馆慷慨解囊。由于生活力求简朴，甘地觉得求医问药也属多余。他本有便秘和头痛症，一向药不离身，他决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吃早餐，并严格限制进食量，以鲜果和硬果作主要食谱，戒绝牛奶，这样治愈了头痛。对于便秘，他则采用自然疗法，用冷水掺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上，醒来时取掉，这种办法效果很好。事实上，甘地后来一直对土疗和水疗法深信不疑，他认为绝大多数的病，几乎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可以用有规律的饮食、水疗、土疗和类似的家常办法治好。

在人际关系方面，甘地崇尚博爱、平等。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使他同各阶层的人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往往一视同仁，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陌生人，是同胞还是洋人，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还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人，他从不同区别对待，只要有会他都尽可能提供帮助。甚至是他极为痛恨的贪官污吏，他对他们个人也并无私怨，他认为人和行为是两码事，一个好的行为应该引起赞许，而一件不好的行为就应该受到谴责。但对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则不能因其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恶其罪而非恶其人”。甘地认为这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必要部分，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

1904年，《印度舆论》创刊，一开始它是用英文、泰米尔文、古吉拉特文和印度文4种文字发行。虽然名义上是由一位颇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青年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为第一主编，但事实上这个刊物的经营是由甘地负主要责任，它很快成为甘地在南非从事宣传的有效阵地。从它创刊到1914年，几乎每一期都有甘地的文章，它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征服了读者和批评家。通过这种形式，甘地与读者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甘地抵达南非的第10个年头，甘地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在一次旅途中，一位朋友送给甘地一本《给最后的一个》作为旅途的消遣，这是甘地初次阅读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翰·鲁斯金的著作，他被深深吸引住了，以

致整晚无法入眠。他发现这部 1862 年初版的书里，正反映着他自己曾经思考过的许多思想，如个人的好处包含在众人的好处之中；律师的工作同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劳动的生活，即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最有价值的生活，等等，他决心照着这本书的理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准备开辟一个农场，把《印度舆论》搬到那里。在农场里每个人都要劳动，领取同样的生活费，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无论什么人和什么肤色，每月一律支取 3 英磅的生活费。

甘地很快行动起来，10 天之内，他便筹资 1000 英镑，通过广告征购到德班附近凤凰村一块 20 英亩的土地。当时那里是一片蛮荒之地，人烟稀少，杂草丛生，自从甘地和他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了这里，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便有了生机与活力。拓荒者们自己动手，风餐露宿，日夜奋战。在他们挥汗如雨的劳作中，一间长 75 英尺、宽 50 英尺的印刷厂拔地而起。这里虽然肤色、人种不同，但没有阶级压迫，人人自食其力，一派和平安详。这正是甘地崇尚的乌托邦理想，或者说正是甘地按理想建立的一块试验版本。

《印度舆论》报仍每周出版。为减少开支，配合印刷设备的条件，周刊改为仅发行英文版与古吉拉特文版，周刊的宗旨是增进爱德华统治下欧印人民的合作，教育舆论，消除误会，并检讨印度侨民本身的缺点，使其明白争取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甘地原打算逐渐摆脱律师业务，在凤凰村住下来，靠体力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这个愿望很难实现，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业务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他去处理，因而凤凰村的房子还没盖好，他就不得不重返约翰内斯堡。

律师业务和凤凰村的事情已使甘地脱不开身，短期内返回印度已不可能。1905 年初，他回印度把家眷接到了南非。

为了公众工作的需要，甘地在约翰内斯堡的寓所是一栋拥有 8 个房间的两层楼的西式楼房，四周有花园，前面是空地，居住条件较为舒适、优雅。同居的人包括甘地夫妇，以及他们的 3 个儿子——10 岁的曼尼拉尔、8 岁的拉姆达斯和 5 岁的迪瓦达斯，还有与甘地志同道合的好友波克拉夫妇和另外一个印度伙计。这个大家庭同灶共生，亲如一家。甘地也按照鲁斯金的思想，自己动手做家务，勤俭治家。

甘地的日常生活紧张而有序。他每天 7 点半起床，不进早餐就离家，9 点走到事务所，拆阅信件，口授书信，直到 10 点半左右，即到法庭出庭。下午 1 点午餐，约 1 小时，这时通常和助手或朋友们一道进餐，5 点钟离开事务所，7 点到家和全家人共进晚餐。晚餐通常两道菜，第一道是各种蔬菜，外加一碟豆子，新鲜沙拉，奶油与面包，第二道是鲜果与牛奶，最后是咖啡或柠檬水。晚餐席上通常是谈些轻松愉快的话题。

饭后，全家通常静坐听甘地朗诵《薄伽梵歌》，波拉克读亚罗德的圣歌。甘地常就疑难之处提出讲解，然后大家自由讨论。遇有各国来的神学会会员客人在座时，则由客人讲些亲身经历。

甘地对孩子们的教育与众不同。他不给孩子们请家庭教师，也没有送他们上学，他要孩子们在家帮忙推磨并清扫庭院，这是一部分生活教育；他每天带孩子们徒步往返于从家里到事务所之间，以锻炼他们的体魄，这是体格教育。他和孩子们谈话限于使用古吉拉特语，以培养他们的民族认同感。他认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用英语思考和谈话，那就剥夺了他们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

1906年4月，南非发生了所谓祖鲁人叛乱。甘地对于祖鲁人没有私怨，祖鲁人也不曾伤害过印度人，可以说甘地对叛乱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当时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益于世界这种思想深信不疑，这再次驱使他向纳塔耳省督请纒，表示准备组织一个印度救护队为英帝国效力。甘地的献议很快被接受，他立即解散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凤凰村，自己则前往德班去征集队员。他共招到24个志愿队员，其中包括19个业已满期的契约劳工，一个帕西族人和4个古吉拉特人。印度救护队换上军服，立即开赴前线。

到达“叛乱”区，甘地才发现所谓叛乱事实上不过是一种抗税行动，他因此转而同情祖鲁人，当他得知救护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救护祖鲁人伤员时，心中感到了一丝安慰。其实，这些所谓伤兵，也并非在战场上受伤，而是被怀疑曾参加叛乱而遭致残酷鞭打所致。因此，印度救护队的工作也常常受到白人士兵的刁难。

对祖鲁人“叛乱”的耳闻目睹令甘地眼界大开。他觉得先前的“布尔战争”不像这次“叛乱”令人感到战争的恐怖。他亲眼看到了白人如何残忍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他们鞭打他们，却不愿救治他们的伤患，也不乐意印度救护队来照顾他们”，他认为“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

另外，由于这次祖鲁人叛乱发生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这种原始而幽僻的所在常令甘地陷入对人生的深思之中。多年来，节欲的想法一直困扰着他。早年因情欲所感而没能在父亲弥留之际尽孝曾使他痛悔不已，现在他的思想已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他认为凡是想以全副身心为人类服务的人就必须清心寡欲，一个人不能同时享受灵与肉的生活，否则为家庭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将会发生冲突，只有节欲，两者才能协调。而节欲不仅仅限于控制个人的情欲，同时要达到控制所有感官的境地，即控制感情，克制胃口，少言寡语，消弭怒气，清除暴力与仇怨，总之必须使自己升华到毫无欲念的境地。

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回到凤凰村，立下了终身禁欲的誓言。1906年的一个仲夏之夜，他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妻子。为克制本能的欲望，甘地进行过各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也发展了他自己的禁欲理论。如他认为一个人的情欲是和食欲相伴而生的，因此首先必须从节制口腹之欲开始。他一般每逢宗教忌日或特定日子都奉行绝食或只吃一顿，严格限制进食量，而且只吃水果、青菜，不加任何佐料，不吃经他试验或被别人证明有可能引起冲动的任何食物。他虽然在饮食和节欲方面找到联系，但认为心灵的作用仍是主要的，“一个人如果心灵不洁净，改变饮食也没有用”。“色欲的心灵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为情感的奴隶”。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其中有关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带，供随时检验。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时进入私人住宅检查证件。凡不出示证件或是拒绝上述规定的，即为违警犯。这是南非当局有计划地限制印度人入境并一步一步赶走印度人的又一花招。

甘地认为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这项规定如果批准执行，而印侨又毫无反抗的话，则所有居住南非的印侨将被整个地毁掉。他很快作出反应，一方面将草案全文译成古吉拉特文，在《印度舆论》上公布，

以引起印侨的足够注意，同时，召集印侨知名人士商议对策，最后大家决议公开抗议。

甘地率领一个英印协会代表团就此向殖民地事务部请愿，官方答应予以考虑。9月4日，上述法案由政府向议会提出。11日，甘地等在约翰内斯堡的犹太帝国剧院召集了一次印侨代表大会，有3000余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很多重要文件，其中有名的是第4号决议案，它表示印侨宁愿忍受一切牺牲而决不对上述法案屈服。甘地在会上大声疾呼“只有一条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屈服于这种歧视”。这是甘地第一次公开号召群众在神面前庄严发誓，决心反抗不公平的法律。

虽然遭到激烈反对，德兰士瓦立法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一歧视法案。由于德兰士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对当地的立法与行政仍负有责任，因此，甘地建议派代表团前往英国请愿，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实施补救。11月3日，甘地启程赴英。20日抵达伦敦。当日，他便向曾担任印度总督，现任殖民大臣的额尔金勋爵递交了请愿书，并多方游说。在伦敦，甘地先后拜见了当时住在伦敦的国大党元老、82岁高龄的达达拜·璃罗吉，还有印度国大党英国支部的许多负责人，向他们广泛宣传南非的情形。随后，他又拜会了伯拉格里爵士与多年任英印协会主席的纳波尔·克利芬先生，并征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11月8日，甘地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谒见殖民大臣额尔金，向他陈情：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臣民，理应享受。不列颠人民的同等待遇，因而恳请殖民地大臣至少应当指派一个委员会，研究南非现有的一切管理印侨的法令是否合适及如何改善的问题。额尔金爵士对此甚表同情，表示尽力而为。

上述临时组成的代表团，随后又拜会了印度事务大臣莫内，他们还晋谒了英国首相坎贝尔·班纳曼。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请甘地也参加。

甘地的努力赢得了英国舆论的支持。《泰晤士报》曾将甘地的备忘录全文刊载；《每日新闻》著文支持甘地；《论坛报》、《导报》等都派记者访问甘地。

在伦敦紧张忙碌6星期后，甘地准备返回南非。临行前，甘地在他所住的老爷饭店举行了一次早餐会，答谢所有帮助过他的各方友人。席中大家建议成立一个南非英印委员会，由班纳嘉利爵士任主席。

由于甘地的努力，在他返回南非的途中，英国殖民大臣额尔金就已宣布：在未取得帝国政府重新考虑之前，德兰士瓦政府的亚细亚法应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可实际上，甘地的伦敦之行只不过推迟了反印立法的执行。1906年12月6日，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立即通过了一项法案、基本上是1906年印侨管理法的翻版。1907年3月21日，该法所有立法手续完成，5月英国政府批准该法，7月1日起生效。因而，所有印侨限于7月31日以前前往登记。

甘地对此挑战，态度非常明确，他表示，德兰士瓦政府既然有决心和勇气贯彻此法，那么我们就将以更坚决的行动和英勇的斗争来拒绝遵守。

为赢得各方支持，甘地成立了一个“消极抵抗协会”，吸收了不少会员。在他的主持下，“消极抵抗协会”举行了多次公开集会，每次集会都是先讲解时局，然后大家宣誓消极抵抗。政府方面的计划是分区登记，而且是从印

度人组织最弱的比勒托利亚开始的。为抵制登记，甘地率领消极抵抗协会会员不断举行集会，挨户游说，在整个比勒托利亚到处张贴标语，因而，该区1500名印侨只有100名前往登记。当时的华侨也与印侨采取了同一立场。

登记处在印侨居住地接连设立，印侨也全面反击。每一通往登记处的路上，都有义勇队员劝阻印侨前往登记，同时，又要保证不与警察发生冲突，如遇逮捕则欣然就范。

7月31日，登记的最后一天，比勒托利亚举行了一次印侨群众大会。2000多名群众聚集清真寺广场前示威抗议，加上其他各地代表陆续前来，达13000人之多。南非当局的官方代表在会上讲话，试图麻痹人们，甘地一边翻译，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我们对此法低头，谁能保证这就是最后一次同类立法。很显然，本法如获执行，势必产生各种类似的地方性法规，结果是整个国家都要被弄得一塌糊涂。”

政府虽然百般威胁利诱，但无法让印侨以及华侨自动前往登记，只得将登记期限一拖再拖，直到11月30日，13000名指定应前往登记的人，仍然只有500名履行登记。

当斗争继续开展时，甘地感到“消极抵抗”一词尚不足以显示这一运动的真义，因为“消极抵抗”常被认为是无武器的弱者的武器，这暗示着一旦有武器就会变为暴力。而且一个印度人的群众运动竟要用英文词汇来表达，实为不妥，因此，他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以印度语名称代替原用的英语词汇“消极抵抗”。最后，甘地采用莫干拉尔·甘地的献议“萨达格拉哈”一词，并稍作改动为“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文“坚持真理”的意思），意为一种“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他说，“坚持真理是强者的‘灵魂力量’，弱者是不能使用的，既然如此，不论有无武器，都将遵循这种原则”。甘地运用“坚持真理”这个概念进行的斗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12月26日，移民法已在议会通过，并经皇家政府正式批准。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往警察署，并告知政府已决定逮捕他和其他24名领导人（包括一名华侨领袖），甘地向代理局长当面保证，所有的人第2天上午10点钟都会到达指定地点听候传讯。

当晚，印侨紧急会商，约1000人参加，甘地和其他被指控的领袖全体出席、大会上，甘地抨击皇家政府批准该法是置亿万印度人的信任于不顾，谴责该移民法是野蛮的法律，是“一个文明的政府，自称为基督教的政府所制定的最野蛮的法律”。在他看来，他与英帝国已到分歧的路口，“英国必须在南非和印度之间加以选择”。

28日，甘地及其同僚奉命出庭。法庭以无证居留德兰士瓦的罪名将其拘捕，并对其提起公诉。甘地这位昔日皇家政府的登记律师第一次以被告身份受审。当庭之上，甘地希望能给其机会声明其不服从的原因，未得允许。

甘地要求只发言5分钟，亦被拒绝。最后警察长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所有人驱逐出境，有的48小时内执行，有的则以一周或两周为限。

庭审过后，甘地便在政府大厦广场外对印侨、华侨及一些欧洲人发表演讲，他指出：“不论我和我的同伴遭遇到什么情况，我们的斗争必须继续，这是一种神圣的斗争，我们必须奋斗到底。”

德兰士瓦警察当局对甘地及其同仁的判决于1908年1月10日起执行。甘地发表一项简短声明，要求将他改判重刑。对于甘地这一请求，法庭倒是

不假思索，立即改判甘地 2 个月徒刑，随即将他送往约翰内斯堡监狱。

甘地刚被押解出庭，外面的印度群众即高举黑牌，抗议游行。警察前往驱散，致使多人受伤。1 月 14 日，另一英勇的非暴力抵抗主义者奈都和华侨联合会主席也被押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甘地同囚。1 月 29 日，因非暴力抵抗罪名银铛入狱者又增加了 155 人，其中多为零售商人，他们来自印度各地，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阶级的印侨。这说明非暴力抵抗运动得到全体印侨一致支持。

甘地与其同僚最初被囚于黑人监狱。这里仅可容纳 51 人，由于来人增多，不得不临时搭盖帐篷，以收容非暴力抵抗犯。普通的犯人，允许穿本人衣服，但全体非暴力抵抗政治犯则一律身着囚衣，并须服从一切规则。监狱的伙食极度糟糕，奉行禁欲生活的甘地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不过考虑到同囚其他犯人的利益，他在狱中也坚持非暴力抵抗，设法迫使监狱改善了伙食，同意以麦饼替代面糊，并使印度囚犯能自行烹饪。狱中的起居规则，他也很满意。出监以后，他还不断效法。如从此他不再饮茶，日落以前便吃完晚餐，等等。

监狱里也有种族歧视。白人囚犯，可得一张床，可带牙刷、面盆与脸巾，印囚则不准，华侨同囚则更糟。甘地迫使当局同意华侨同囚获得同印囚一样的待遇，还发给他们一张桌子，少数阅读物与文具。

监禁意外地给了甘地一个学习的机会，使他得以有大量空闲时间深入阅读托尔斯泰、鲁斯金、索里欧、艾姆生等人的著作。书中所宣传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思想非常合甘地的口味。

当甘地以乐观和轻松的心情潜心体验铁窗生活时，在印度和英国，不断有人严重抗议南非当局对非暴力抵抗者的关押。屈于强大压力，政府曾一再召集内阁会议商讨此事，两周之后，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派德兰士瓦的开明之士卡迭莱脱前往狱中与甘地谈判。

政府建议，所有印侨可改为自动而不是依法去登记，登记的项目可由政府派员与印侨磋商。建议中还规定如自动前往登记的人数超过多数，政府将自动请议会修改“黑法”，使自动登记成为合法。

1 月 30 日，从约翰内斯堡开往比勒托利亚的火车在何迭泉缓缓停下。从车上走下来几个人，坐上一辆遮盖严实的马车。马车径直驶向比勒托利亚政府办公大楼。这几位神秘人物正是约翰内斯堡警长与对手——在押的政治犯甘地及其同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去会晤英国驻南非总督史末资将军。

经过交涉，双方作了些让步，并就此达成一项谅解协议。甘地答应去登记，史末资保证修改“黑法”。秘密会晤后，甘地获释。

刚刚获释的甘地身无分文。为赶回约翰内斯堡，他向史末资将军的秘书借了些车钱后便搭乘当日下午 7 点 3 刻的班车，于 9 点抵达约翰内斯堡。从车站出来便直奔纽敦伊斯兰教清真寺。午夜时分，他将在那里组织一次群众演讲会，鼓动人们自动前往登记。

入狱之前坚决反对登记的甘地，此刻又鼓动别人去登记，引起了印侨的疑虑和不满。一个帕西族印侨上前厉声质问甘地：“当初你对我们说，按手印只有刑事犯才这样作，可是今天又劝我们去登记，这让人怎么相信你？”甘地分辩说：

“如果是为了服从‘黑法’就是签一个字也是罪孽，更别说按手印。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正如行礼——假如你强迫我对你行礼，我照办了，

那等于当众羞辱自己，但如果我是出于自愿，认你以同胞的资格向你行礼，那就是表现我的风度与人情。”

那个人显然未被说服，他恼怒地叫道：“我们听说你得了15000镑，把我们出卖给史末资了，我们决不按手印，也不准任何人这样做。我敢对天发誓，有谁敢带头去登记，我一定要宰了他。”

甘地平静地说：“凡发誓不登记的人，我不强求，但我将尽一切可能帮助任何一个帕西族印侨或其他人前往登记，而不必按手印。但是，甘地补充道，“我并不喜欢刚才这位朋友的做法，我也相信，人不应指天发誓要杀一个人。这次和政府取得变通办法，主要应负责的是我，我以替大家服务的一分子的地位，自然带头前往按手印，愿神准许我这么做。死在一个兄弟手中并不比受外人欺骗更使人难受。”

天亮之前，甘地又赶回狱中，迎接他的同伴出狱。当他和其他印侨走出监狱大门时，受到迎候在那里的群众的热烈欢迎。

2月10日，甘地和他的同志们离开非暴力抵抗运动总部，出发前往印侨登记处注册。8个身强力壮的帕西族人尾随其后，领头的名叫米尔·阿兰。临到登记处附近，米尔·阿兰上前问甘地：“你去干什么？”

“我想按十个手指印，然后领取登记证。”

甘地话音未落，米尔·阿兰对准他下腹猛击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击，当即仆倒在地，头部正撞上石头，嘴唇与两颊、额头被戳破，一颗牙齿被撞松，其他人一涌而上，对甘地拳打脚踢，直到惊动了附近的人，阿兰等才拔腿逃跑，结果被几个欧洲人逮住送进了警察局。

即便被打成这样，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证。他躺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在场的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曾保证过，只要我活着，只要神准许，我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证。”

甘地还给警长打电报，表明他对阿兰的行为不予追究，接着他对印侨发表声明，希望他们也不要追究此事，并说：“反对志愿登记的行为既已答应撤回，每一个善良的印度人就该尽力协助当地政府。”

由于目击殴打甘地的欧洲人坚持要将阿兰治罪，所以甘地的请求未被批准。阿兰等人被判3个月苦役。

甘地在医生的治疗下渐觉康复。4月，甘地已恢复工作，他又奔波于德兰士瓦与南丹两地之间，争取并组织印度侨民的合作与支持。他曾去德班召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一个人拿着大木棍直奔甘地，幸亏在场的人及时阻止才免于遭险。从这时起，他接受同僚们的劝告，开始雇用私人保镖。

5月9日，志愿登记的最后一天，已有8000印侨申请登记，其中6000人获准。可以说，印度侨民已履行诺言，现在轮到政府履行它的诺言了。

然而，政府却背信弃义。史末资将军不仅没有撤回“黑法”，而已进一步采取行动。他一方面维持旧法，一方面补充了新的措施，使凡依法在限期以前自愿前往登记者为有效，但限期以后就不再适用上项法令。他为此颁布了两项法令，规定以后新来的印侨或在限期以后申请注册的印侨均需依旧法办理。史末资将军还发表一项声明，矢口否认他曾向甘地允诺过什么。甘地就此多次去信质问，史末资概不认帐。

史末资的背信弃义使甘地如梦初醒。他认为自己“过于相信史末资的政治家风度、诚实与尊严”。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运动，是为了争取所有印度侨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人，现在既然政府已无意废止“黑法”，

他决定恢复非暴力抵抗运动来对付移民法。他警告德兰士瓦政府：如果亚细亚法不按先前谈判的协议予以撤回，并在一个明确的日期公诸于众，那么印侨所领到的注册证将当众焚毁。同时，印侨领袖通知亚细亚注册司，因为政府背信，他们要求撤回申请，请求发还申请书。政府不予理睬。

新一轮的较量又拉开了序幕。似乎一夜之间，开始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无证经营小贩。原来，这是印侨有意违抗移民法以示决心。政府判处无证经营的100多印侨罚金，但他们拒绝缴纳，却宁愿坐牢。政府很快又发现如法炮制者愈来愈多，根本没有那么多监狱来收容这些以身试法者，他们也跟着改变对策，不再判拘役，而将他们的货物充公拍卖，或将其驱逐出境。

7月21日，甘地致信史未资，自请入狱。他质问将军：“那么多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刑入狱而让我逍遥法外，这是否意味着要鼓舞我采取行动，好让多数劳苦大众受苦呢？”23日，为表示对被捕小贩的同情，甘地又组织了德兰士瓦的印度商人全部罢市。他还在《印度舆论》报上每日报道当天印侨的活动以鼓舞士气。8月16日，亚细亚新法完成立法程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印侨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期答复的那一天，甘地组织了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广场上堆满了人们自愿交出的登记证，主席台前有一火炉，公众集体焚烧登记证的工作万事俱备，只待政府的答复。当大家最后得知政府不愿改变政策的消息时，全场群情激动。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甘地开始演讲，他将上次与史未资将军交涉的全过程详尽说明。最后他说：“同胞们，假如有谁改变主意的，现在还来得及拿走你们的证件。但大家要知道，我们这样做，是要表示我们反抗‘黑法’的决心，而且有毁弃证件的力量，我希望大家三思而后行。”人群爆发出强烈的呐喊；“我们不后悔，我们不要登记证”，“反对黑法”等。在这当儿，上次殴打甘地的阿兰愧疚万分，他上前将被迫领来的注册证当场交给甘地让他焚毁。同胞之间的误解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

于是，甘地将收到的2000多张注册证当众投入火中，一时烈焰腾空，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振奋之下，一些先前未交出登记证的人也自动跑向主席台将其付之一炬。这次事件给当局极大震动。一家英国杂志认为此事可与美国独立革命前“波士顿倾茶事件”相媲美。

印侨的断然措施令南非政府极为难堪。慑于印侨的一致行动，史未资将军先施缓兵之计。8月18日，他约见甘地进行会谈。政府毫无诚意，谈判破裂。23日，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再次举行。焚烧登记证到处兴起。一些印度富商甚至以身试法，接二连三地进驻德兰士瓦，哪怕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

南非政府决定镇压，9月29日，甘地及其他15人第二次被捕，被关押到伏克斯洛斯监狱，从事苦役2个月。同时，在德兰士瓦各地，共有150名非暴力抵抗者被判徒刑。

10月16日，伦敦印侨举行集会，强烈抗议南非政府以非人待遇虐待南非爱国印侨。10月27日，甘地由伏克斯洛斯监狱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与一凶杀案犯关在一起。

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他又在约翰内斯堡恢复了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10日，甘地因夫人病危不得不暂时离开约翰内斯堡前往德班。当时甘地夫人正在德班医院救治，术后身体极度虚弱，医生主张喂牛肉汤补充能量，甘地不肯，认为这有悖信仰，并不听劝阻，硬是让夫人出院。从德班医院经长途舟车劳顿和14英里徒步跋涉，将夫人弄回凤凰村，自己负责为她治理。

一开始他尝试水疗法，没有效果，夫人病情继续恶化。甘地想起哪本书上说过身体虚弱者最好忌食盐和豆类，于是又试着让夫人进行饮食疗法，说来也怪，甘地夫人的顽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1909年1月15日，甘地返回德兰士瓦时，伏克斯洛斯警察局的警官又向他索要注册证或办理登记手续，甘地不从，因而被驱逐出境1/4英里，以后他又闯关，再次被捕，但旋即被开释回约翰内斯堡。2月25日，甘地和其他7人又以不能出示注册证并按手印罪，在伏克斯洛斯被判罚金50镑或苦役3个月，8人全部选择入狱。5月24日，甘地刑满出狱。此时，拘押、入狱、驱逐出境已成为家常便饭。

甘地有着异乎寻常的精力与毅力，他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而且还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在工作之余就地入眠，一觉醒来接着工作。甘地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在一次接见《水星报》记者时他指出：“印度人已斗争了2年，将近2000人被捕，亦即有1/3的印度居民已被德兰士瓦拘禁过，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屈服，但我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支持这一斗争。”

南非政府对甘地及非暴力抵抗者无能为力，暴力已制服不了那些手无寸铁却不屈不挠的人们，在此形势下，博瑟将军和史末资将军于6月中旬赴伦敦，与皇家政府讨论在南非成立联邦的前途问题，甘地也决定派一个印度代表团赴英，以期英国能从整体利益的立场来协调南非的未来发展问题。

甘地和一位来自德班的印度商人哈甫贝组成代表团于6月23日离开开普敦，7月10日抵达伦敦。此行伦敦，甘地下榻威斯敏斯特旅馆，这是国外归侨及国际政治家的理想住所。出于交际需要，甘地恢复了绅士作派，高级的丝帽配上考究的西服，皮鞋锃亮，在正式场合还备有硬领长尾的晚礼服。他举止儒雅，表情生动，谈吐幽默，给伦敦各方人士留下极好的印象。

不过，由于史末资与博瑟2人先声夺人，英国政府无意改弦更张，甘地除了得到一封博瑟将军的表明英国政策的信外，别无所获。信中不仅老调重提，而且措辞强硬，表示英国政府不仅不准备撤回亚细亚法或修改移民法，同时也拒绝废除久已推行的有色人种特别法，假如印度人不满于此而准备斗争，那将咎由自取。

11月13日，甘地失望地离开了伦敦。在伦敦期间，他对印度前途问题的思考有了初步的轮廓。返回南非的途中，甘地在船上奋笔疾书，写就了一部3万字的书稿，书名《印度自治》。全书用古吉拉特文写成，分12章，讨论了自治、文明、律师、医生、机器、教育、非暴力抵抗等问题，文字简洁，结构严谨。书中甘地提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自治”观。他认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已使印度精神退化，经济衰败，政治屈辱，个人贫困，因而是道德的，但英国人多受自己的商业观念影响，不会主动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就是印度起而争取自治。这种自治不仅是政治自由，还包括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协调，两者紧密相联、互为协调。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呢？甘地认为，暴力不能拯救印度，它的文化需要它用不同的、高超的自卫武器，即以“爱的福音代替仇恨。以自我牺牲代替暴力，以灵魂的力量代替野蛮”。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真理和非暴力方式。

《印度自治》是甘地思想的精华，最初在《印度舆论》上连载发表，后来印成单行本，译成英文本。据说托尔斯泰看后对它推崇备至，认为书中讨论的主题——真理与非暴力是十分重要的，不仅应为印度，也当为全人类所重

视。

甘地及其同志在南非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得到了印度国内的支持。国大党温和派主席戈克利对甘地的斗争予以高度赞扬：“甘地有着超人的精神力量，有着英雄烈士所具有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他们所从事的斗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乃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光荣与前途。”

甘地在南非的斗争使其在印度名声大噪。孟买国大党省党部提议以甘地为下届大会主席候选人，甘地因专注于南非的斗争而致电谢绝。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资格回电，目前除了德兰士瓦的斗争，我无暇顾及及其他。我希望全国同胞们，要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斗争，它的目的是全国性的，是要保持我们印度的光荣。我也许错了，但我敢说这是现代印度最伟大的斗争，因为它目标最崇高，手段最纯正，任何形式暴力手段均被摒弃，非暴力抵抗者相信，自苦乃是获得永久改革最真实有效的办法。”

印度国内对南非印度人斗争的积极反应也从客观上对南非政府有制约作用。12月24日甘地和另外6个同志再次进入德兰士瓦时，未遭逮捕，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政府想借此安抚即将在拉合尔举行全国大会的印度国大党，以免国大党激进派在拉合尔大会上拿印人在南非的处境作文章。

在12月下旬的国大党拉合尔全国大会上，戈克利向大会提交了一项有关南非问题的提案，对甘地高度评价，认为甘地是“最伟大的爱国者，印度民族优良品德之集大成者”。还有一些国大党领袖相继发言，言辞恳切，饱含深情，使与会者万分感动，大会现场收到捐款约合18000卢比，首饰无数，甘地之名首次出现于国大党决议案中。此次大会后，印度国内对南非抵抗斗争的援助达到高潮。

1910年5月30日，甘地的好友，一位富有的德国建筑师下伦巴赫将他位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一处1100英亩的农场无偿捐献给非暴力抵抗者及其家属使用。甘地和卡伦巴赫将其取名为“托尔斯泰新村”。这是因为甘地初来南非时读过托尔斯泰著的《天国就在你心中》，对托氏主张应接受基督教中爱的原则，建立没有暴力的、人人平等的天国的思想崇拜不已。甘地决定效法托尔斯泰，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

6月4日，第一批非暴力抵抗者搬进“新村”工作，随后又有许多来自印度不同种族、种姓、宗教信仰的男女老幼来此定居。大家辛勤劳作，布衣素食，分工协作，过着原始自给自足的生活。

甘地的个人生活也效法托尔斯泰，他认为一个潜心于伟大事业的人“为了真理必须使自己减为零”，以便能与千百万劳苦大众打成一片。为此，1910年他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只领取3英镑的生活费，其全部积蓄也都用于公益开支。

托尔斯泰新村和凤凰村一样，一直是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也是他们的庇护所。那些焚烧登记证的人，有的被捕入狱，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倾家荡产，这里便是这些无处栖身、无以度日的人及其眷属的避难所。

屈于南非印侨和印度国内的压力，1910年10月，英政府致电南非联邦政府，敦促其废止1907年的第2号法令，并主张撤销种族歧视法。1911年2月25日，南非政府将新法案公诸于世。这项新法宣布废止1907年第2号法令，对亚洲人的入境，不采取直接拒绝，而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新法的公布难令甘地满意，因为这实际上把大部分未受很多教育的人拒之门外。甘地又不懈地同南非政府周旋，最后取得了一项临时协议，史未资答应德兰士瓦

的印度人、中国人可自由营业，至少是 8 个月，并且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则暂停非暴力抵抗运动。

6 月 1 日，被拘捕的非暴力抵抗者全部获释。印度人都相信，这一场剧烈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1911 年 12 月，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举行，大会又就南非问题通过一项议案，向甘地与德兰士瓦的斗士们致贺。

甘地一直与国大党主席戈克利保持通讯，并邀其访问南非。1912 年 10 月 22 日，戈克利抵达开普敦。南非政府以贵宾礼遇款待他，并派专员陪同其到各地考察。印度人和欧洲人都热烈欢迎这一印度领袖，所到各地均为之举行盛大的欢迎会。

戈克利此行南非的一个重要成果是 1912 年 11 月 15 日与南非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废止“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的种族歧视内容，取消 3 英镑人头税。

此行南非期间，戈克利曾亲到托尔斯泰新村小住。甘地兼作其私人秘书，精心侍奉。临行前的 11 月 15 日，戈克利在比勒托利亚市政厅发表告印度同胞书，鼓励印侨“常常记着你们的前途，大半握在你们自己手中：我求神不要让你们在德兰士瓦已进行过 3 年的这种斗争，又将被迫再度恢复。不过，假如必须恢复，或为了主持正义或制止不义而作类似的斗争，你们的表现，你们联合行动的力量，以及你们愿意、受苦牺牲的精神，将起决定作用。”

由于非暴力抵抗者的相继出狱，托尔斯泰新村里的眷属们也渐渐搬走，剩下的几个人都是凤凰村的。因此甘地建议他们都搬回凤凰村。托尔斯泰新村学校也于 1913 年迁往凤凰村。

1913 年，当甘地正准备返回印度时，一项判决再次推迟了他的归期。

本来按照甘地与南非当局的临时协议及戈克利与南非当局的谅解，有关对印度人的歧视性立法应当废止，然而南非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对承诺迟迟未予执行，而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却使这一切问题公开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印籍居民 1912 年前往印度把家眷接到南非定居，可当他们双双抵达南非时，移民当局却不准其妻登岸，勒令返回印度。那位印籍居民请求最高法院作出公判，最高法院却站在移民局的立场不让其妻留居南非，理由是印度的婚姻不合移民法的规定。

甘地为此事多次写信吁请政府作出妥善解决，但南非政府声称无权修改法令。

3 月 30 日，甘地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群众大会，抗议最高法院的判决。他指出，维护妇女的地位和印度婚姻法的合理性，南非印侨责无旁贷。

4 月 12 日，南非政府公布了新移民法法案。根本没有采纳临时协议中同意的各点，甚至比旧法更坏。如果说该法得以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剥夺印度居民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这一切证实了甘地先前的疑虑，即政府先前所作的一切承诺不过是一场骗局。

6 月，移民法正式通过。甘地就此与政府多方交涉，没有效果。9 月 13 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宣称，“与其休战僵持，不如公开作战。”9 月 20 日，甘地在《印度舆论》上公开披露了行动计划以期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这次斗争准备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越境进入德兰士瓦，无照贸易或有照而不出示，获得被判入狱，并准备作长期抵抗。

9 月 25 日，甘地等人非法进入德兰士瓦，同行 4 人均被捕，唯独甘地没事。27 日，甘地进抵约翰内斯堡，次日，他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29 日，

数名非暴力抵抗者包括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在约翰内斯堡乔装小贩，头顶篮子，沿街叫卖。第一天安然无恙；第二天全部被捕，被判处7天拘役或罚金1英镑；结果大家都选择了拘役。

这一次行动，妇女踊跃参加。甘地想出一条计策，让妇女从德兰士瓦进入纳塔耳（这也是违法的），如果被捕，当然达到目的，如果无事，就让她们从纳塔耳进入煤矿中心新堡，去发动那儿的印籍工人罢工，一开始，南非政府并未在意这些到处乱撞的妇女，于是她们又按计划前往新堡，她们英勇无畏的精神感动了工人同胞，10月17日，3000人宣布罢工，政府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立即惩罚那些妇女非暴力抵抗者。11月21日，政府将她们拘捕。

妇女们的被捕，引起了新堡工人的更大不满。他们放下工作，一批一批地进入城区。矿主施以报复，卡断了工人的水电，扔掉他们的家具，赶走甚至殴打工人。为鼓励工人的斗志，甘地立即从凤凰村赶到新堡，劝大家作长期斗争的准备。很多人变卖家产，头顶包袱，携家带口投奔甘地，人数高达5000人之多，不少人还源源不断地赶来。望着这些已失去工作的男女老幼，甘地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这些人成为非暴力抵抗者，集体进入德兰士瓦，如果政府不逮捕他们，就将其安置到托尔斯泰新村。

1913年10月28日，一场史无前例的进军开始了。由2037名男人、127名妇女和77名孩童所组成的大军，满怀信心地向德兰士瓦进发，数千名荷枪实弹的军队已在那里严阵以待。对于面临的危险，他们心中清楚，但男女老幼在甘地的指引下热血沸腾，没有人退却，有的只是必胜的信心。

进军的头一站是新堡边境的小城查利士镇。除妇女儿童有住处外，其余的人就地露宿。大家毫无怨言，秩序井然。甘地从营地拍了一个电报给政府，告诉他们可以在行列未至德兰士瓦边境前，前来查利士镇捉拿他。同时他向政府保证：只要政府履行承诺，罢工就可停止，契约劳工们立刻复工。

一周过去了，政府方面杳无音讯，甘地下达新的行动指示：日行20~40英里，走完8天。如果不在途中被捕，就将如期赶到托尔斯泰新村。

一切准备就绪，甘地从查利士镇给在比勒托利亚的史末资去电，得到其秘书的答复是：“悉听尊便。”于是，队伍决定继续行进。

随着离约翰内斯堡越来越近，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其间甘地曾两次被拘捕，但都在取保获释后赶上了大队。预计再过4天，就可走完全部路程，大伙士气旺盛，政府则日益紧张，他们决定下手了。

11月9日下午3点，甘地第3次被捕，被押往海德伯格，队伍继续前进。11月10日上午9点，当队伍行至巴尔伏时，等在那里的3节专列将所有人全部逮捕，押往纳塔耳。

这次示威长征惨遭镇压，两千多人既无家，又无工作，不少人被毒打、监禁，一路上吃尽苦头，被押到纳塔耳后立即投入监狱。

11月11日，甘地以3项罪名被提起公诉。开庭时，旁听席上挤满了印度人与欧洲人。这次甘地获准发表了声明，他对被控的各项罪名表示同意，但他坚持认为：是由于南非当局并未履行对戈克利所作的诺言才导致了这次行动。他表示如果政府不妥协，他们将继续斗争下去。

最后，甘地被判苦刑9个月或折为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了前者。

甘地入狱立即引起纳塔耳2万工人罢工，政府实行镇压，奉行武力驱散，甚至开枪射击，均无济于事。工人们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欣然入狱者不计

其数，致使监狱人满为患。南非政府陷入困境。如果继续镇压，不仅无法奏效，而且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甘地及其同志的英勇斗争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这年12月举行的印度国大党全代会对南非问题极为关切，会议决议对纳塔耳罢工事件中南非印度居民所受的虐待表示极端愤慨。大会还呼吁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信仰，继续对他们予以支援。英国报界也发表同情的言论。《泰晤士报》指出：“就我们的记忆所及，印度工人的长征是历史上非暴力抵抗者的精神表现得最动人的一次。”即或南非当地的白人也有被印度人的英勇斗争所打动的。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南非联邦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为挽回面子，政府特地在12月11日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所罗门大法官为主席，调查纳塔耳罢工事件，委员会并通知印度政府代为提出证据，并建议释放甘地，以求和解。

12月18日，甘地获释。甘地出狱后前往比勒托利亚晤见史末资。此时，欧籍铁路工人正在大罢工，政府处境不利。甘地为表示诚意，打消了原定再次发动非暴力抵抗的计划，政府因而取得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平息内部危机。因此之故，目空一切的史末资将军不得不准备答应甘地的要求，表示尽快敦促委员们拿出方案。1月21日，甘地与史末资再次签订一项临时协定，政府释放被捕人士，甘地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同时，调查委员会虽极不情愿，但还是答应废除3英镑人头税，认可印度婚姻的有效性，持有本人手印的移民证即可准许进入南非各地等。最后，联邦政府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形成《改善印度人待遇法案》，将上述内容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1月26日，该法案以60对24票通过，这是南非改善印度移民待遇的第一个法律。所有不合上法规定的行政措施，由甘地和史末资协议解决。

法案的通过使甘地自1906年9月起所发动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最后停止。

甘地多年为之奋斗的夙愿终于实现，此刻他十分渴望能返回印度，调护病危的长兄，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返回印度时，他的长兄便已离开人世，给甘地留下了难以言状的悲伤。适逢此时正在伦敦养病的戈卡利来信让甘地取道伦敦返回印度，甘地于是决定向生活战斗了21年，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南非告别，向甘苦与共的同志们话别。

临别之时，甘地感慨万端。南非的21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正是在这块充满敌意的土地上，甘地完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及社会政治观的基本定型，在21年的苦斗中，他从一个备受挫折的律师，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成熟老练、声名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他还在这里发现了英国人鲁斯金、美国人索里欧、俄国人托尔斯泰这三位导师，找到了他所认为的，面对强敌，既不屈服于敌人的意志，又能捍卫尊严，体现仁爱与宽容，对统治者实施有效打击并迫使其最终弃恶从善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为他日后回国工作奠定了基础。

甘地行将离去，在南非卷起了话别的热潮。昔日的战友、同志甚至对手对甘地都无比依恋，各种小型聚会、茶话会、大型集会使他足足忙了两周，不少殖民地官员也都出席了欢送大会。7月18日临别之日，德班市市长亲自在市政大厅为甘地和夫人举行欢送宴会，纳塔耳主教、博瑟将军、史末资将军等均来贺电以表达对甘地的敬意。数十年以后，史末资将军在甘地70寿辰时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说：“这是我的运气，要反对一个连我也敬仰的人物。”

### 三、锋芒崭露的国大党领袖

1914年7月18日，甘地偕夫人及好友卡伦巴赫，乘轮船前往伦敦。航行中他便得知欧洲局势紧张。船至伦敦的前2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8日，若干倾慕甘地的英印人士特地在西西大饭店举行招待会，为甘地接风洗尘。到会的有阿兰达·库玛拉斯瓦米先生、天才女诗人与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奈都夫人等，因故未能应邀前来而致函表示欢迎的有英国首相、印度事务大臣及其他各政界要人与社会名流。

因为“一战”爆发，甘地在伦敦期间组织了一支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但此时他不幸染上肋膜炎，加上甘地夫人身体一直欠佳，最后甘地不得不接受大家的劝告，于12月启程回国。这一次他的挚友卡伦巴赫因是德国人，无法相偕同行，令甘地无限惋惜。

1915年1月，甘地回到孟买。甘地的凯旋归来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他还没上岸，恭候在此的印度领袖们就乘小艇上船迎接，并得到当局批准，让甘地在先前只许皇室贵宾及印度总督与印度伟人登陆的专用码头上岸。当时甘地身着印度布衣，随身携带着一个小包袱，里面唯一贵重的东西就是《印度自治》一书的手稿。

甘地回国前后，印度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早在1885年印度国大党成立后，民族独立运动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但早期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是国大党温和派领袖，他们长时期执行着一套同帝国主义殖民者妥协的纲领和政策。他们的政治目标是实行代议制和扩大印度人在统治机构内的代表权；他们依靠的是上层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斗争手段是请愿、抗议、宣传、鼓动。

在印度第一次民族独立的高潮中，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国大党激进派提出了一个包括“自治、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和民族教育”的新纲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局面曾为之一新。但人民革命斗争在1905~1908年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被镇压后，陷入低潮。极端派领袖大多身陷囹圄，剩余力量被排挤出国大党，温和派控制的国大党基本上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

在回国的最初日子里，甘地忙于在各地探亲访友，拜见要人和体察民情。此时，他的政治导师、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虽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还是坚持为甘地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甘地还前往家乡拉奇科特和波尔班达探望长兄的遗孀和其他亲友，在家乡停留一月左右，2月17

日，甘地偕夫人又前往圣提尼克但，去看望先期而至的凤凰村人，顺便拜见渴慕已久的印度诗哲泰戈尔。甘地虽然没有见到泰戈尔，却赢得其真诚的敬意——泰戈尔称赞甘地为“玛哈德玛”，意为“伟大的灵魂”，“圣雄”，这是印度人对最有智慧的人的尊称。

甘地在圣提尼克但期间，接到戈克利的死讯，甘地无限悲伤。他说：“我曾想找一位真正的英雄，在全印度只找到一个，这就是戈克利。”他立即偕夫人前往浦那参加葬礼。为寄托哀思，他决定赤足一年。

参加戈克利的葬礼后，甘地开始旅行全国，以实现戈克利的遗愿。因为戈克利曾建议甘地在一年之内，不要急于发表政治见解，而应旅行全国以广见闻，吸取经验。这期间，甘地坐三等车先后到加尔各答、哈德瓦、古鲁库尔、马德拉斯等地旅行。一路上他耳闻目睹了人民所受的种种疾苦，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他心目中美好的国度和深爱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虽然他牢记戈克利的叮嘱，多看少说，但观感使他无法保持沉默。对于陈规陋习、官僚主

义、教条主义，他不可能熟视无睹。对国大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其政策的软弱涣散他也颇有微辞：“我感觉他们没有负起神圣的责任，我相信我是想从他们那里获得智慧，可是让人失望。他们的言行都不合我的胃口。”

旅行完毕，甘地迫切需要的是寻找一个立足点，就像他在南非曾经尝试过的那样，建立一个训练非暴力抵抗战士的基地。好几个省都争相贡献一块领地，最后甘地选中了故乡古吉拉特的首府阿赫米达巴德。因为这里是印度古代手纺业中心，又是该省最为富庶的地方。甘地认为这里正适合他倡导乡村建设，也较容易得到有钱人的赞助。

1915年5月25日，真理学院在古吉拉特靠近阿赫米达巴德的一个小村子柯契拉甫正式成立。这个名称用意深远。甘地解释说：我们的信条是献身真理，我们的工作便是追求和坚持真理。“真理学院”这个名称同时表达了目标和服务的方法。

真理学院的首批学员男女共25名，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同烧一锅饭，共守同样的誓言：信奉真理、非暴力、节欲、不偷窃、不私蓄、节食。

学院使用印度语。在甘地看来，“我们管理人员相信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抛弃了本国的语言文字，便不能产生实际的进步。所以要训练学员们使用地方语并了解印度其他地区的方言，再学印度的几种主要语文。梵文是一切印度之母，所以也要学习。”

为改变轻视劳动的流俗，甘地希望教师们首先接受劳动教育。他说：“劳动是人类天赋的义务，为了个人的生存，我们必须劳动。”

年满4岁的男女小孩就可入院受教，但需通过严格的智力与体力测验。他们的父母应绝对授权院方管教。学生们将学习如何过集体生活，研习宗教、农业、纺织与文科。文科讲授均用方言，课程包括历史、地理、数学与经济学，每人必须研读梵文与印度文和德拉维底文中的一种，英文被列为次要语文。

学员到了成年时，或宣誓正式成为修道士，或结业离校。儿童在完成学业前，不准其父母前来访问，全体学员一律穿最简单的衣着，每日3餐也极简单，除了食盐胡椒外，其他佐料概不准用。院中无寒暑假及假日，但一周中有2天课程极少，学员可以做自己的工作，每年有3个月的时间让学生作徒步旅行。学员均不收费，院中日常费用全靠捐助维持。

1915年6月3日，英王诞辰授勋名单发表。甘地获得服务印度甲级勋章一枚，主要是表彰他为不列颠帝国服务之功；另一获勋的印度名人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他被封为爵士。

1916年2月，甘地答应一年内不发表政见的时限届满。适逢贝拉勒斯印度教徒大学校庆典礼，哈定总督也应邀前来主持大学奠基礼，印度各地名流荟萃一堂。甘地应国大党知名人士玛拉维亚之邀，也前去发表演讲。

2月4日是甘地演讲的日子。会场上挤满了甘地的崇拜者。因为总督驾临，整个会场宪警密布，会场布置得富丽堂皇，主席台上座无虚席，几乎都是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甘地身着土布短裤与上装，在欢声雷动中起立致辞。他的讲话和他的装束一样与大会环境极不协调，在众口一词的歌功颂德中，他发表了一番言辞尖锐的讲话。他首先对许多演讲者迷信英语而贬低本国语的现象表示不满，接着他又给那些飘飘然的听众大泼冷水。他提醒学生们不要以为自己

已经进了十全十美的学府，变成了一个伟大帝国的有用人才，如果认为

我们国家曾为之自豪而现在尚未恢复的精神生活单凭一张嘴就可以起死回生的话，那完全错了。你们永不能单凭一张嘴就会使印度的福音有朝一日能传播给世界。他批评印度知识分子在印度就像外国人一样不能对自己的民族说心里话；他强调印度要想自治，必须行动起来；他还说有些人虽然口中宣称要解决印度贫穷问题，自己却挥金如土，把老百姓的钱拿去向副王献忠心，极尽铺张与奢侈；他对满街宪警密探不能忍受，认为这样只能让人民产生极不信任感，他还谴责无政府主义和恐怖分子是懦夫，等等。

由于甘地的演讲切中时弊，言辞尖锐，使在座的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如坐针毡。大会主席和贝桑特夫人几度加以干预、制止，人群一片骚动。最后大会主席竟拂袖而去。

当天晚上，警察局下令甘地立即离开贝拉勒斯。事后，贝桑特夫人公开严辞批评甘地的演讲，舆论大哗。

离开贝拉勒斯后，甘地便直接奔赴浦那参加戈克利周年祭祀演讲，随后他又前往哈德瓦、马德拉斯等地演讲，并尽可能用印地语，极力鼓吹土布运动和土布精神。

甘地回国的最初两年，一直忙于旅行考察和发表若干重要演讲。就像过去在南非一样，现在他要开始付诸实际行

动了。这第一个行动就是为废除契约劳工制而斗争。

1916年3月，玛拉维亚在帝国立法议会中提出一个废除契约制度的议案，哈定总督在接受这个动议时宣称，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当时期内废除这个制度的承诺”。

甘地认为像这样一个空洞的保证，不解决问题，应该立即鼓动废除这个制度。

甘地采取重大行动时的一贯作法，是先同对方广泛交换意见，力图通过协议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达到目的，才采取更大的行动。事实上他已一再就此事与总督交涉，但遭到了拒绝，甘地因此认为往全国作宣传鼓动的时机成熟了。

甘地的旅行从孟买开始。2月9日，帝国公民协会主持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不人道的契约劳工制。大会通过了依照甘地的建议所拟定的议案，它要求政府在7月31日前明令废止契约劳工制。随后全印度各地举行各种声势浩大的集会，也相应通过了这个决议。

甘地接着前往卡拉奇、加尔各答和其他各地作废除契约制的宣传鼓动。甘地在各地的活动都受到警探的监视和骚扰滋事，但他不理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也不改初衷。

由于甘地不懈的努力和全国各地、包括一些著名妇女组织的鼎力相助，还不到7月31日这一最后期限，政府便宣布停止印度契约劳工出国。这样甘地早在1894年就曾建议废止的契约劳工制终于被取缔了。1920年4月，整个契约劳工制正式废止。

印度境内的另一虐待劳工的制度也引起了甘地的注意。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脚的比哈省西北部狄哈特专区有个偏僻小县，名叫三巴朗。1917年以前，到处是英国殖民者的靛青种植园。当时法令规定三巴朗的佃农每耕种20

---

对英国驻印度总督的称呼。

英国人士，当时主张自治运动，在国大党内十分活跃。

卡塔（1卡塔等于1/3英亩）土地，其中有3卡塔土地给地主种靛青，这种制度叫三卡塔制。

1917年初，甘地在农民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陪伴下离开加尔各答前往三巴朗。沿途他已从靛青农的律师布拉兹吉索·卜纳沙德及其同事们的口中了解到这里佃农的一些情况，甘地认为这种案子告到法院无济于事，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彻底推翻这种欺压他们的“三卡塔制”。为此甘地决定长期住下，卜纳沙德及其同事答应予以全力帮助。

现在甘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甘地知道，这将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他得会见千百个农民，同时还将面临来自种植园主和地方当局的种种刁难与干预。事实上，本地专员和种植园主联合会的人已经告知甘地，希望他不必介入此事，趁早离开此地。

甘地把一切情况告诉他的同事并作好入狱的准备后，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三巴朗的县城莫提哈里。人们听说甘地到来，争先恐后地向他倾诉疾苦。甘地细心倾听、记录并研究了可供利用的一些文件。当地警察局责令甘地马上离境，甘地表示在完成调查前，不打算离开三巴朗。于是甘地接到了传票，要他第二天去受审，因为他违抗了当地警方的命94令，没有离开三巴朗。

那一夜甘地彻夜未眠，忙着写信布置工作，同时拟好了一份他不在时的行动计划。

通知甘地离境和传讯受审的消息不胫而走。4月18日，莫提哈里这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偏远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数千人涌向甘地投宿的地方和法庭，甘地走到哪里，人群前呼后拥跟到哪里。甘地走进法院时，后面有二千多人要挤进去，还打破了法院的玻璃门。县长只得命令将甘地送进密室，同时动用警察看守大门，阻拦群众。

随之的一场奇特的审判开始了。政府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面对眼前远比他们名声响亮，老练、精干的同行被告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准备好了各种法律书籍，想细细研究再拿出对策。因而，政府律师要求延期开庭。甘地立即反对，他主动承认自己抗命不离三巴朗是有罪的，要他们按刑法144条宣判，还当庭发表声明解释自己抗命的原因。他说，“我入境的动机纯粹是基于人道并为国服务，我此行是应紧急邀请支援农民，因他们正遭受靛青厂主的不平等待遇。但是如不经实地研究，就不能对他们有任何帮助。因此我来此地，如果可能的话是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研究这个问题，除此再无其他动机。我不认为此行将危害公共安全引起生命死伤。我对此事自信富有经验。但当局却持不同想法。我充分了解他们的困难，也知道他们只能根据所获情报采取行动。像我这样守法的公民，本应服从政府下达给我的命令，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不能破坏我对那些邀我来此的95人所负的责任。我感觉唯有留在他们中间，才能替他们服务。所以我不能自动退出。我冒昧作出声明，无意减轻刑责，旨在说明我之所以未曾从命并非轻视合法当局，而是在遵循更高层的法律，那就是人类的良知。”

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法庭便按刑法第144条起诉，但庭长仍拿不定主意。他一再问甘地：“你是否承认有罪？”甘地道：“我不愿浪费法院的时间，我承认有罪。”庭长又说：“假如你现在离开本地，答应不再回来，本案可以撤销。”甘地回答：“不能这样。不要说现在不行，哪怕是判我入狱，出狱后我还要以三巴朗为家，住在此地。”庭长不知所措，只得宣布本案有

待再议，下午3点再行宣判。下午3点甘地准时到庭，庭长却又宣布要等到4月21日定案。结果，4月21日，在甘地到法庭接受判决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甘地的案子撤销。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的收税官也写信告诉甘地，允许他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帮助。

整个宣判过程，不像是甘地在受审，倒是政府在受审。这是甘地在印度第一次公开从事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结果令人满意。人们争相传送这一特大喜讯，报纸也大加宣传。因此，甘地的调查影响不仅限于偏僻小县三巴朗，而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从19日以后，一批又一批的靛青农不断挤到甘地寓所，向他申诉自己的疾苦。甘地每天从上午6:30至下午6:30，记录他们的报告，每一件报告都经反复查询，方予登

记。为协助这一工作，已有不少人义务充当助手，由于前来登记的人太多，甘地有时不得不关闭大门，只有情节严重的才登记办理。

4月22日，甘地动身前往培迭亚区。老百姓手捧鲜花，夹道欢迎。培迭亚车站因欢迎的群众太多致使火车不得不改处停车。甘地从三等车厢出来后，人们将他拥上马车，并将马卸下，要自己拉车，以示诚意。甘地不答应。

23日甘地会见培迭亚副区长和培迭亚厂经理。第二天赶赴劳卡里亚去找乡民谈话。25日又步行返回培迭亚。27日，甘地一行又远途跋涉，步行至巴拉赫瓦，目睹了种植园主对一些敢于提供真情的人所干的种种罪行。次日他又返回培迭亚。

多日辛苦奔波，辛勤取证，甘地已登记了几千人的倾诉。当地官员深感不安。为把甘地赶出三巴朗和毁掉他的资料，这伙人绞尽脑汁，他们威胁农民，组织请愿，向上级打假报告，并收买内奸做假证，动用报纸恶毒中伤，无所不用其极，对这一切，甘地泰然处之。

5月10日，甘地赶往帕迭拉与省长摩德会晤，省长要甘地遣走助手，甘地不同意，但表示将改善调查方式并尽早提出调查报告。11日，甘地将主要受害人名单拟好，分送摩德、当地行政长官、种植园联合会秘书及各地印度领袖们，同时附有甘地起草的调查报告及调查情况说明。6月4日，副省长在阑溪约见甘地，商议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具体处理此事，甘地亦被指为调查委员之一。13日，政府正式宣布组成调查委员会，由中央省省督及专员斯雷为主席，拟定于7月5日起开始工作，限3个月内提出报告。

甘地加入了委员会，大为提高了农民们的希望，许多人来到培迭亚。7月16日，在培迭亚集合了将近一万人。甘地忙里偷闲去会见了那些焦灼不安的农民，并告诉他们委员会的成立就是为了解救他们的痛苦，请他们最好不要在委员会办公的地方成群集会。如有诉愿，可向他的助手们讲述。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于10月3日提出了一份全体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签名报告书。政府于18日宣布了最后决定，全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11月2日，由省长摩德所提出的三巴朗农业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法案宣布废除已存在将近一百年的“三卡塔制”。自此，甘地的斗争又一次大获全胜。

甘地没有马上放下三巴朗的工作。他认为农民们受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他们没有知识。他因此公开呼吁征召义务教师，希望能多开设几所学校，让知识分子更有效地深入农村。11月8日，甘地偕志愿人员自孟买抵达

三巴朗，第一所学校便于 13 日在一所村子里开办。一周之后，第二所学校开办。此后三星期内，第三所学校亦开办。甘地要借此提高农民、工人们知识水平。当然，他的这项计划也经常遭到种植园主和厂主们的抵制与破坏。

通过三巴朗的斗争实践，甘地深切地了解了劳苦大众的疾苦并看到了他们的力量，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应走非暴力的道路，借此他也初次成功地在印度尝试了非暴力抵抗这一特殊武器。

这一年中，真理学院所在的柯契拉甫地区发生瘟疫，甘地决定另觅新址。在一个商人朋友的资助下，甘地将学院迁到沙巴玛迭河畔的一块地方，这里既无房屋也无树木，不远处可以看到沙巴玛迭监狱。甘地看中的正是这里特有的荒僻与监狱。他认为，环境僻静适于潜修，进监狱是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人的正常命运。

时值岁末，国大党年会即将在加尔各答举行，此时的印度国内形势已处于一种新的激荡之中。随着大战进入第 3 个年头，革命形势渐趋成熟，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整个国内洋溢着一种巨大的革命热情。国大党两派已趋统一、激进派重新活跃并积极开展自治运动，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携手合作，自治运动已深入人心并引起了积极反应。当时印度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是三位人物：提拉克、贝桑特夫人与甘地。提拉克到处旅行演讲，以他的勇气和雄辩口才吹奏着自治运动的号角。贝桑特夫人则以她创办的《新印度报》、《公益报》等为阵地，以其激情和生花妙笔宣传自治运动。甘地则以其爱心和不屈不挠的实干精神在三巴朗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他们互相配合，给全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与活力。不过，甘地是唯一同广大农民群众保持最密切接触同时也为他们所熟悉了解的领袖人物。

鉴于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情绪以及战事仍在继续，英国政府不得不寻找缓冲之策。英军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失利后，孟太古严辞谴责英国的印度事务大臣奥斯通·张伯伦，认为战役失利是由于印度人力物力支援未能及时抵达所致。结果张伯伦离职、孟太古出任印度殖民事务大臣。孟太古就职后，立即于 8 月 20 日发表政策性声明，指出皇家政府的政策，“就是致力于增进印度人士与各行政部门的联系，同时逐步发展自治政府机构，使印度成为不列颠国内的合法部分。进行获致在印度内部的负责政府。……余更愿补充指出，此种进展唯有按部就班始能完成/此时他已准备向国会提出此种方案，公之于众，自由讨论。

根据此一动向，10 月 6 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与伊斯兰联盟理事会又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推派一个代表团，向总督与印度事务大臣请愿，要求其支持国大党与伊斯兰联盟先前所提出的改革方案。10 月 26 日，代表团组成，其中包括提拉克、甘地、真纳、沙甫诺、莫提拉尔·尼赫鲁（老尼赫鲁）等人，等待孟太古偕总督詹姆士福德来印。

甘地虽不是国大党伊斯兰联盟改革方案的起草人，但他极力为之宣传，他向人们详细解释方案的旨意，使人们明了内容与目的。在他的努力下，有数千古吉拉特人联名签署了呈递总督的请愿书。

11 月，古吉拉特政治会议在哥德拉举行，甘地任主席。在这次大会上，甘地打破常规，免除每次会议例行通过的效忠决议，他说：“通过这样的决议毫无用处。只要我们没有叛变，我们便是效忠的。假如有人问为什么大会没有提出效忠决议，就坦白告诉他们，这是甘地的主意”。

1917年12月，国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加尔各答年会，提拉克为会议的中心人物。他提名贝桑特夫人为国大党主席候选人，温和派人士则推举巴拉吉。由于印度诗哲泰戈尔附和提拉克的意见，结果贝桑特夫人当选。大会虽为激进派操纵，表达了要求自治的强烈愿望，但也表现出双方妥协的产物。大会既通过了对英王的效忠案，同时也采纳了提拉克的建议，在原已通过的要求自治的决议案中，重新加进了“时限”一段。还要求政府释放被捕的政治犯阿里兄弟与阿萨德等。关于社会宗教问题，也一反过去消极的态度，决议向全印人民呼吁应破除不良陋习，对“贱民”予以公平正直之待遇。

国大党开会期间，穆斯林联盟同时也在加尔各答举行年会。大会主席称“国家利益至上，我们勿需争辩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谁优先，实则二者同位，争先恐后，毫无意义。”

这些表明，时至“一战”末期，印度国内出现了空前有利的革命形势。

国大党年会闭会后，甘地返回三巴朗，继续从事推进那里的农村卫生与教育工作。但没过2个月，他不得不撇下这里的工作，于1918年2月，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赶往阿赫米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问题。

这次阿赫米达巴德劳资纠纷的起因是工厂主试图削减工人的工资。因为在1917年下半年，阿赫米达巴德曾发生严重鼠疫，为使生产照常进行，厂主们特在工人每月23卢比的工资中，每人每天再补贴12安拉到1卢比。一旦疫病清除后，厂主们又决定将临时补助费由工资的70%降到20%，而全然不顾此时的物价已上涨了好几倍。工人们对此强烈不满，劳资关系紧张。甘地为此颇感为难，因为当地的富商厂主经常捐助真理学院，有人还和甘地私交甚笃。但思虑再三，甘地决计抛却个人恩怨，为劳工说话。

经过多方磋商，组成了一个仲裁委员会。甘地、班克、帕泰尔代表劳工方面，萨拉巴、雅迦培、玛勒代表资方，稽证处处长查费德被邀为公证人。可是厂方不接受仲裁，当委员会正准备开始工作时，厂方即于2月22日宣布停工，直到3月11日。工人们则以罢工来回报，并要求增加工资50%，厂主们只答应增加20%。甘地经过认真调查与再三考虑，提出折衷意见，建议增加35%。在甘地的劝说下，工人们接受了，但资方却予回绝。

甘地便站在工人一边进行斗争。为使罢工运动能顺利完成，甘地呼吁工人们必须恪守：绝不使用暴力；绝不进行破坏；不靠救济度日；坚定如一，坚持到底。工人们一致保证，除非厂方接受加资35%或将本案提交仲裁委员会解决，他们将决不复工。102

最初2个月，工人们表现尚好，但随着时日延长，饥饿的威胁与厂商奸细的活动，动摇了一些人的决心，参加集会者日渐稀落，处境艰难的工人们则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愤怒，极有可能发生暴力。甘地忧心忡忡，不断和厂商接触，希望厂商善待工人。厂商们却毫不妥协，并说：“我们这方面也有保证，我们与工人间的关系，犹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怎能让第三者来参与呢？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鼓舞工人斗志，甘地宣布绝食，他称“直到取得协议或全部工人都已离厂，否则我将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绝食出乎工人意料，受他的精神感召，工人们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同时，厂商们也被感动了，答应将问题交由仲裁委员会解决。这

---

阿里兄弟：即穆罕默德·阿里和萧克·阿里。印度著名的国大党籍穆

样，甘地才恢复进食。工人们停止了持续 21 天的罢工。在第一次开会的树荫下，人们聚集一堂，同庆胜利。

阿赫米达巴德的工作一完，甘地又赶赴凯达。凯达地区由于歉收出现严重饥荒，农民们正酝酿暂停缴纳那一年的田赋。为支持农民的斗争，在甘地向农民们提出明确建议之前，国大党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已进行过调查并且提出了调查报告，还和当地的专员讨论过这一问题。穆罕拉尔·潘提亚和商卡拉尔·巴立克也通过维达尔白·巴德尔先生和戈库尔达斯·卡罕达期、巴立克爵士在孟买的立法议会中造成了很大声势。

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古吉拉特大会也向政府递交了请愿 103 书，打了电报，但当地的英国官员态度强硬，拒不让步。其实，农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在 2 分 5 以下，农民可以完全停付那年的田赋。问题是，官方宣称当年的收成在 2 分 5 以上，而农民认为不足 2 分 5。为弄清实际情况，甘地访问了 50 多个村庄，并且亲自去看过他们的田地，结果证实收成的确不足 2 分 5；为此他建议设置一个仲裁委员会，政府却固执己见，认为人民要求仲裁是“大逆不道”。最后所有的请愿和祈求均告失败，甘地和同事们商量后，决定领导农民于 3 月 22 日开始进行非暴力抵抗。

甘地莅临指挥这场非暴力抵抗运动，对农民来说，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参加者十分踊跃。几天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志愿者申请参加非暴力抵抗，并签名立誓，坚决拒交这一年的田赋，愿承担因此而酿成的一切后果。

刚开始，政府未采取强制手段，但看到农民们坚定不移，没有让步的样子，当局便决定使用暴力，他们强卖农民的耕牛和仅有的家具，还到处张贴处罚的通告，有许多地方的农作物也被抵押。农民受此威压，有些惊慌失措起来，有的便将田赋缴清了，有的还准备拿家具作抵押。

为了使慌乱中的农民坚定斗志，甘地现身说法。他叫人把一块已当作抵押的洋葱地收割掉，搬走，七、八个人自告奋勇完成此举，因此被捕，甘地以此鼓励人们，他说：“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尽管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无异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把洋葱收割 104 起来。这也是人民学会承受惩罚和遭受拘捕的好机会，因为这些都是抗命不从的必然结果。”有甘地的领导和无畏者的榜样力量，人民重新表现出空前的积极性。

在坚持 4~5 个月相持不下的斗争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田赋管理处来人通知甘地，只要有能力的农民交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这表明政府已经屈服，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但在人们庆祝这次非暴力抵抗之胜利的时候，甘地却感到运动没有彻底胜利，因为谁是贫苦人民的决定权，不是还要由当官的来判决吗？

不过，甘地承认，无论如何，凯达的非暴力抵抗仍有其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标志着古吉拉特农民觉悟过程的开始，也是他们接受政治教育的开始。这次斗争，也使一些受过教育的公众工作者接触到农民的实际生活，使他们学会怎样与农民打成一片，古吉拉特的公众生活因而出现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

甘地在凯达从事非暴力抵抗的实践的同时，也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革新思想。如土布运动就是他最为热衷的一种改革建设工作。他主张，“我们应首先提倡在语言、穿着、思想上表现土布精神”，在服装上，他认为穿外国服装，违背土布精神，“我们自己的衣服式样是最适

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

甘地还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如 1918 年他在孟买演讲时说，女子是男子的伴侣，具有同样的天赋，她有权参加各种活动，应享有和男子同样的自由。她应该在她活动的领域中取得崇高地位，亦如男子在男性中的活动一样，这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并不一定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可是，在旧制度的荒谬势力支配下，最笨最无用的男子也能取得超过女子的地位。

“我们有很多工作半途而废，就因为女子所处的环境使然，我们有很多工作徒劳无益。我们就像小处聪明大处糊涂的商人，不能在事业上放胆投资。”

甘地还要求重视并改善三等车旅客疾苦。这是因为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后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消磨在他所选择的三等列车上，因此他深知旅客的苦处。他大声疾呼：“忽视三等车旅客，我们无疑是丧失了一个教育大众的机会，教他们守秩序、重卫生、生活有规律，以及如何过简朴的生活。”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最后的决战关头，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赢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和维持印度国内局势的稳定尤为重要。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于 4 月 27 日特邀请印度各方领袖赴德里参加作战会议，甘地也在被邀请之列。

会上总督非常希望甘地能支持募兵决议案。甘地只说了一句：“我受责任的驱使，竭诚拥护这个议案。”

甘地作出此举，使许多追随他的非暴力主义者乃至一般的朋友思想上发生了很大混乱。事后，有人质问：“你主张非暴力，却要我们拿起武器，是什么道理？”

对此，甘地后来解释说动机复杂。一则他个人虽然反战，但还没有足够能力提供有效的非暴力抵抗。面对世上的罪恶，他需要忍耐与宽容，直到找到或创造一个有效的进言机会；二则是想“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 106 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提供服务，我想不到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况且当时我相信帝国具有乐于扶助印度获得较好自由的力量。”

会后甘地又给总督写了封长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慎重起见，他托专人送到西姆拉的总督行署。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在这危急之秋，我们应当而且我们已决定自愿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帝国，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成为这个帝国的具有自治领地位的伙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之所以响应号召，乃基于我们所渴望的目的也能加速到来。就这一点来说，即使是自动尽义务，也是附带有权利的。人民有理由自信，您的演讲中所提到的各种改善，将可包含国大党穆斯林联盟联合改革方案中所已提出的主要原则。我相信也就是基于此一信念，故能促使参与会议的许多人们愿给政府以全心合作。”“除非很清楚地昭示人民，在最短时间内，必能使印度获得自治，否则印度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信中他还表示他将至死抵抗有组织的暴政。当局应向官吏呼吁，不可虐待无辜，“要体察民情，看重民意。”最后他请求皇家政府负责当局，对穆斯林国家予以肯定的保证。“我相信您知道每一个穆斯林都关心这件事，我是一个印度教徒，也同情他们的请求，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认真关切那些穆斯林国家的权利，关切穆斯林对拜神之地的情绪；适时合理地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这乃是帝国安全的基石。我这样写，因为我爱英国，我愿看见每一个印度人都对英国忠心耿耿。”甘地要求总督能将此信公开发表。他的意图是以正视听，同时也是为日后的交涉留下凭证。总督急于要得到甘地的支持，因而同意他的请求。

做完这一切，甘地首先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决定先从他曾经成功地领导过非暴力抵抗的群众基础较好的古吉拉特地区开始，6月23日，甘地向古吉拉特发出了公开呼吁：“如果我们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学会使用武器，我们的义务就是参军。勇敢与怯懦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最容易最便捷获得自治的途径就是参加保卫帝国。如帝国崩溃，我们的希望也渺茫，有人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争权，我们以后会受骗。但保卫帝国所获得的权力，也将是获得那种权势的权力。”甘地还到很多地方游说，召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印发小册子，鼓励人民自愿参军。

甘地原以为他曾领导非暴力抵抗的凯达地区的人民一定会积极响应，踊跃参军，然而正好相反，就像当年他在南非的情形一样，从前进行抗税斗争的时候，他一呼百应；可现在要人们去向那个压榨、欺凌他们的帝国效力，甚至捐献生命的时候，人们对他则避之唯恐不及。还有人向甘地发问：“你是一个主张非暴力的人，怎么叫我们拿起杀人武器呢？”“政府为我们印度干过什么好事，值得我们同它合作？”甘地是个不易灰心的人，他执拗的个性在这个时候也仍有作用，经过宣传和耐心的说服工作，还是产生了一些效果，报名应征者陆续多起来。然而，为英帝国招兵买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终于使甘地心力交瘁，疾病缠身。恶性痢疾使甘地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不得不住进医院。医生建议他稍进肉食与鸡蛋，他不肯，吃药打针也不干，这种顽固不化使他濒临死亡的边缘。好在这时德国终于战败了，英帝国赢得了战争，这似乎给他注入了一点活力，为了能尽早投入工作，甘地平生第一次违背了誓言，听从医生的建议喝羊奶，并接受了医生的手术。

#### 四、激流勇进的民族旗手 111

1918年11月，持续4年又4个多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

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印度人民来说是一场深重的灾难。“一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募了150多万士兵，其中70万人战死疆场，搜括了价值2亿多英镑的粮食、物资和1亿英镑的军费。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和供应战争的双重压力使印度国库空虚，经济凋蔽，民不聊生。战争期间因饥饿、瘟疫、流感死亡的人数就达1100万人。加上许多省份连年遭灾，农民无法抵御任何灾害的侵袭。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者弹冠相庆，却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印度人民与英殖民主义者民族矛盾尖锐激化，工人、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愤然而起。1918年，全国开始掀起113罢工浪潮，其中阿赫米达巴德、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等集中了印度大部分工业无产阶级的城市都举行了罢工。战时一直没有平息过的农民骚动有了新的高涨。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常常参与其中，成为革命斗争的新动力，表明革命形势趋于成熟。

战争也加速了印度民族革命主观力量的成熟，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减少了对印度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增加了军事订货，还在印度实现保护关税，这些都客观上有利于印度民族经济的发展。印度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而大大加强，工业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战争期间提出了自治要求，并利用战争之机推动了自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加紧了团结合作，1916年12月，国大党温和派和激进派实现了统一，确立了激进派提拉克的领导地位。统一使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成为领导全印民族运动的中心，为战后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同年，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也第一次实现了合作。在双方年会上，通过了共同制定的纲领勒克瑙协定，这是印度民族发展史上又一重要事件。这个文件重申印度人民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自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要求，如扩大立法会议权限，增加民选成员比例等。在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选举问题上，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包括在这个文件中。共同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印度在实现民族大团结上迈进了重要一步，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这为后来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穆斯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

础。

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壮大和觉醒的同时，新的思想理论和斗争策略也初步形成。甘地把他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发展起来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思想和非暴力抵抗的方法带回印度并已开始印度初试锋芒。他提出：对一切人，包括英国统治者在内都要爱；以自苦和自我牺牲来感化别人，对武装斗争坚决反对。实现印度各阶层、各宗教的大团结，吸引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参加坚持真理运动，以便壮大民族运动的力量，并使所有人在斗争中逐步提高精神境界，增强自治、自助、自救能力，达到精神完善。“一战”后期，他领导的一系列非暴力斗争——比哈尔三巴朗地区蓝靛农民反对种植园主压迫的斗争，古吉拉特阿赫米达巴德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和凯达地区农民要求荒年减税的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使国大党的影响第一次扩及偏远落后地区和下层人民之中。

同时，由于“一战”中大量印度劳工和士兵被派往国外，他们掌握了武

器，开阔了眼界，开始接触和了解世界，受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影响，民众觉醒，斗争热情高涨。

这一切预示着印度历史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

富有统治经验的英帝国对于印度内部的变化不可能熟视无睹。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它没有也不可能顺应这一历史潮流。

战争期间，为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安抚国大党，获得 115 印度对战争的支持，1917 年 8 月 20 日，孟太古宣言曾答应战后在印度建立立宪责任政府，逐步实现自治。印度资产阶级政党，无论国大党还是穆斯林联盟都以实际行动支持、关心英国的战争，并翘首盼望英国能履行诺言。

然而当战争胜券在握，英国已渡过战争危机、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它又使出了惯用的两手。1918 年 7 月，英国政府抛出了一个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蔡姆斯福特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方案”，试图以小的让步为诱饵，平息国大党的不满，并瓦解其阵线。该法案标榜将在印度“逐渐发展自治体制”，“在大英帝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印度的责任政府”。但其宗旨是在保持总督大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印度搞“双重政制”，即中央政府不变，在省一级一些次要部门，如卫生、教育等部门稍微扩大一些印度上层分子在立法咨询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席位。

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方案通过后，国大党内部对该案反应不一，意见分歧十分尖锐。以班纳吉为首的温和派兴高采烈，而激进派提拉克则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报告，却是个无用的报告。”贝桑特夫人也指出：“报告中提出的政治改革，值不得由英国提出，也不值得印度支持。”国大党决定 8 月 29 日在孟买举行特别大会，讨论该项报告。班纳吉和提拉克都写信，极盼甘地能出席国大党大会。

甘地此时卧病在床，不能参加拟议中的会议，但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对这两者的主张都不尽赞同，他自己的主见是：“有条件地接受”，他给提拉克的答复是：“我们可以接受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中的原则，但要清楚表明我们所希望修改的建议，并全力争取此种建议实现。”“报告中值得予以同情的考虑，不必整个拒绝。”

国大党大会如期在孟买举行，温和派人士班纳吉、巴素、玛桑达未出席大会。经过 4 天讨论，大会作出决议，重申 1916 年 12 月在勒克瑙所举行的全印度国大党与穆盟联席会议就自治政府所通过决议的原则立场。同时明确宣告，“唯有获得在帝国之内的自治政府，方能满足印度人民的愿望。”“大会深信印度人民适合负责政府，不满印度政府改革方案中所提出的相反论断。”“本会对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诚意谋求印度负责政府之新制，表示赞许。但鉴于其中若干建议，对目前形势之若干发展有先入为主之嫌，深感整个建议令人失望且不满足。”大会认为省与中央应同时改进，主张彻底修改国会由印度事务大臣管理的原则；财政的自主应视为印度人民传统的权利；中央立法机构中之国务会议及伦敦印度评议会撤销等修改意见。

与此同时，那些拒绝出席孟买特别大会的温和派人士于 11 月 1 日也在孟买举行会议，由班纳吉任主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印度事务大臣与总督所提出的革新建议，同时也提出了若干小的修改意见，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选出代表，前往英国，唤起英国政治家与英国公众支持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计划，从此大多数温和派领袖退出国大党，另外成立了印度自

由党联盟。117

提拉克与贝桑特夫人已决定各自派自治代表团到英国，对抗那些反印宣传。为此，61岁的提拉克不辞辛苦，在印度许多地方发表演讲，征集募捐，并于8月亲自率队赴英。

1918年12月，国大党的德里大会具有重大意义。此次大会一反惯例，没有通过“效忠案”，通过的自决议案宣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及和会（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一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决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答应让印度也像其他自治领土一样能选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并特地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三人为国大党代表。

1919年是世界历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印度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战争的结束并未给人民带来和平，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无视人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和平、民族自决和自由民主要求，却进行了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威尔逊的十四点允诺成为一纸空文，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首次高潮来临。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经过十月革命后的红色苏俄与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连成一片，猛烈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统治。

作为旧的世界秩序代表的英国在战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中国、印度、阿富汗、埃及、乃至爱尔兰等都掀起了全民反英斗争。

在此革命浪潮席卷全球之时，1919年的印度也进入了118决定性的一年。随着新年的来临，各阶层的不满与忿怒越来越按捺不住，预示着一场伟大斗争即将到来。

面对觉醒的人民，英国政府又在1919年2月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这样一个法律，在19世纪还可能维持，但在20世纪初，它注定将引起印度人民的强烈反抗。

该法提出时，甘地正在阿赫米达巴德养病。当从报上偶然得悉这一消息时，他大为震惊。在此之前，甘地对英国政府满怀信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都予以合作。无论是1899年的英布战争，还是1906年的南非祖鲁人的反英斗争，他都曾派印度人冒着枪林弹雨去支持英国，“一战”中他去效忠帝国，为此差点丢了性命。他做这些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希望以自己大英帝国的爱心与忠心来感化英国政治领导人，使其能在战后给印度自治权。所以即便1918年的孟太占——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他对英国还是抱着幻想，主张予以接受。但是“罗拉特法案”的提出大大伤害了甘地的感情，动摇了他对大英帝国的信念。为此，甘地曾多夜不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反击这一法案义不容辞。尽管当时甘地因病卧床，他还是强支病体，立刻行动起来。他在真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其中指出：“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人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我们郑重宣誓：假如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我们将拒绝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法律。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力。”

为推动这一运动，甘地在孟买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协会，并被选为主席，半个月时间，协会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宣言上签名。以后各地开始举行群众大会，积极响应，签名人数急剧增加，最后，甘地将签名誓约通过报界公诸于众。

印度各阶层对甘地的呼吁积极响应，群众大会、示威游行与罢工连绵不断，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而政府实现其建议的决心也日见坚决。甘地参加了帝国立法会议对罗拉特法案进行的最后一轮讨论。当时一些反对罗拉特法案的印度籍议员曾作过激烈而雄辩的演说，可是无济于事，政府主意已定，一切不过形式而已。结果，帝国立法会议不顾全体印籍民选议员的反对，强行通过罗拉特法案。

事后，甘地多次向总督呼吁，致信交涉，并声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采取非暴力抵抗，政府仍无动于衷。

甘地认为现在他唯一所能做的只有发动非暴力运动这条路了。为了壮大声势，他拖着病弱的身子，应邀前往马德、拉斯及南印度各地作旅行演讲。当时，甘地身体虚弱得站不起来，甚至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讲话的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浑身颤抖，脉搏异常，但他毅然坚持长途旅行，到处呼吁呐喊。在那里，甘地结识了国大党著名活动家拉贾戈帕拉夏理。不过当时除了举行公众集会外，甘地尚无进一步计划。

3月18日，罗拉特法正式对外公布成为法律，当晚，甘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据他自己说，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从梦中得到启示，那就是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让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绝食、祈祷。

甘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来又改到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说：“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种自洁与自苦的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2号法案通过的第2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做到：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原因不能绝食；第二，所有工作除公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24日，甘地又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由于他心脏衰弱，不能念完讲稿，但他还是成功地向人们传递了反抗的信号。

3月30日，因为改期的消息未能及时到达，德里提早发起了总罢市。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警

察弹压，死伤多人。面对军警的刺刀，雅利安社的著名领袖希阑达拉德身着僧袍，走在队伍前列，他的大义凛然感染了游行队伍，震撼了全印度。同一天，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和阿赫米达巴德都举行了罢工、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印度各地，尤其旁遮普的抗议运动在3月30日以后仍在继续。

4月6日，印度全国性的反罗拉特法运动开始，全印人民不分宗教、种姓和其他各种区分，达到惊人的团结。革命发动时，甘地已应班克之邀到了孟买，6日清晨，甘地率数千群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当天发表了几次演讲，他称赞

德里的斗争，以鼓舞士气。他说：“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在德里的斗争中，已有4名穆斯林和5名印度教徒遇难，24人失踪，13人重伤住院，对非暴力抵抗运动来说，这不是坏的开始。”

孟买的总罢市由于精心准备和甘地亲自指挥而相当成功，其方式是选择那些最不得人心的法律，实施不服从。如甘地建议人民无视盐税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销售禁书，并以甘地著译的两本书《印度自治》与《给那最后的一个》（鲁斯金同名书的古吉拉特文译本）为主。出售禁书一则可以坚定人们不服从的决心，同时还可以借以筹集不服从

运动的经费。甘地和奈都夫人亲自用车兜售，人们冒着入狱的风险，不惜重金，将这些禁书抢购一空。甘地还亲自主编非法刊物《非暴力抵抗》杂志，每周一上午准时出版，以破坏出版法。

7日晓，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8日到马都拉的时候，他便风闻自己可能被捕，但他不为所动，继续前往。

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后，甘地果然受到警察拘捕，并被押上一节三等车厢，尔后被带到马都拉警察局的拘捕所。次日凌晨4点，甘地又被秘密押上开往孟买的一列货车。中午时分，在沙威·马渡坡下车。这次甘地被押上头等车厢，还受到礼遇。新接替押送甘地的警官在一旁喋喋不休，其意思不过是想说服甘地，放弃去旁遮普而前往孟买。甘地明确表示他不服从，警官也无可奈何，4月11日，车抵孟买，看守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了。”

甘地被捕的消息，引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他们与当局的矛盾尖锐激化，局势很难控制。甘地下车后立即坐车前往白敦尼。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一见甘地露面便欣喜若狂，他们马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当游行队伍走近克劳靳福特市场时，一大队骑警挡住去路，警官下令驱散群众，顷刻间砖头乱飞，刀枪狂舞，游行队伍很快被冲散，有的被刺倒在地遭到践踏，有的被人挤伤，骑士和民众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游行队伍被驱散后，甘地驱车前往警察局控诉警察的暴行。

当甘地向局长描述事件经过情形时，局长强词夺理。他说：“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前进，是为了避免发生骚乱。人们不听劝告，我只好下令骑警驱散群众。”

“可是也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那结果你当然知道。”甘地争辩道。

局长辩护说：“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们不怀疑你的动机，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同意，人民的大性不是凶暴而是和平的。”

一场唇枪舌战之后，警察局长最后说：“如果你确知人们已不听你那一套，你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如此，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

走出了行政官署，甘地立即前往乔已蒂海滩上对群众发表演讲，目的是要制止任何暴力行动。在那里，甘地详细说明了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他谴责一些人在运动中缺乏自制，制造了骚动和不安，认为这不是非暴力抵抗，这比反抵抗还要有害。凡参加了非暴力抵抗的，就不容再有任

何使用暴力的行动，即使是拿一块石子去伤害他人也不可以。他说：“作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原则。”

4月6日后一周内，印度各地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警察采取镇压手段，愤怒的群众往往并不遵循甘地的非暴力信条，而采取暴力反击，流血冲突不断，甘地为此深感不安。

4月11日，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开始出现暴力行动，警察镇压。4月12日，警察局宣布全城实行军管。甘地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那里，协助当局控制局势。他在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如果通过暴力能获取自治，不择手段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甘地的演讲发生了效力，阿赫米达巴德暴力斗争终于在4月14日停止。

然而殖民当局已将刺刀提上日程，并不以甘地的意志为转移。4月10日清晨，英国当局将旁遮普的著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两位博士未加审讯便逐出阿姆利则。阿姆利则全城沸腾，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政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政府的行为。当和平游行队伍走至铁路交叉道处，宪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群众数人，引起暴动。愤怒的群众打死6名英国人，放火焚烧银行，破坏市政府大楼，割断电话线。直到大批军队进入城里，才恢复秩序。4月11日晚，狄耶将军率部抵达阿姆利则，准备血腥镇压。

4月13日，当2万多群众正聚集在四面都是高墙，只有狭小出口的广场上静听演讲时，狄耶将军率部队来到这里。他们占据四周高墙，阻住广场出口，未经任何警告便对群众开枪射击，先是朝人群密集的讲坛附近射击，继而向人群拥挤逃生的隘口猛扫，子弹打完后，这些人整队开走。这次暴行酿成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的惨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还在上演，白色恐怖笼罩印度各地，而在旁遮普最为露骨。4月13日，旁遮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其中包括500多名学生和教授。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令人毛骨悚然。直到好几个月后，这里发生的事才陆续被外人知晓。

“阿姆利则惨案”和旁遮普暴行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怒情绪，把人民的反英斗争推向高潮。反英斗争从旁遮普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在一些城镇和农村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旁遮普的农民运动尤为激烈。

甘地对政府的高压措施感到震惊，但对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动尤感不安，他认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在人民准备未成熟之前就发动非暴力抵抗。他不断向人民解释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的重要性，并在孟买组成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当时人民正在无比激愤之中，根本听不进甘地的那一套思想，因而甘地又在4月18日决定暂时停止非暴力运动，并号召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要求调查“阿姆利则惨案”，并敦促甘地要不顾一切后果立即赶赴旁遮普。甘地写信并电请总督准其前往，但未获准。甘地担心如执意前往，必将遭致逮捕，从而引起事态恶化。于是他思虑再三，决定暂不前往。

全印各地对政府在旁遮普的残忍高压感到愤怒。诗哲泰戈尔退回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并于5月30日致信总督，对政府恶行加以谴责。国大党中央委员会6月8日在阿拉哈巴德开会，要求彻底调查旁遮普戒严期间的暴行，并

指定了一个调查委员会。7月，当夏丹拉、老尼赫鲁、玛拉维亚等人前往旁遮普调查时，印度政府也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员会，国大党对政府方面指派调查委员会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听任旁遮普当局迫害人民的消息一个个传来，《孟买纪事报》主编贺里曼因著文谴责当局被调回伦敦，报纸因此被停刊。由于经营该报的另3位董事居瓦卡达斯、苏巴里、班克还掌握着《青年印度》，他们建议甘地担负《青年印度》的主编职务，为了弥补《孟买纪事报》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改为双周刊。甘地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因为他回国以来一直想有块阵地来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真谛，现在更希望有个机会可以为旁遮普的形势主持公道。甘地的一个朋友把自己主办的古吉拉特文《新生活》月刊也交给甘地处理。

这两份刊物在甘地的主持下行销很广，对甘地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建立同民众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

甘地赴旁遮普的请求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总督批准，他于1919年10月17日到那里，受到了旁遮普人民热烈的欢迎。

甘地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和同志们一致坚决抵制官方调查委员会，并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几乎是平行的调查。老尼赫鲁、奇，兰·达斯、阿巴斯、铁布、姆·勒·贾亚卡和甘地本人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甘地负主要责任。调查过程中甘地同旁遮普人民有了密切接触和了解，也发现了很多怵目惊心的事实。

在旁遮普的工作开始不久，甘地便应穆斯林领袖哈金·阿吉布·罕与萧克·阿里之邀前往德里主持11月24日召开的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甘地第一次使用了“不合作”一词。当时穆斯林领袖与甘地正讨论如何有效抵制英国的问题。甘地想到，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非暴力，但又和政府各方面保持合作，那么有效抵制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只有停止与政府的合作，才能对政府进行真正的抵抗。于是，他提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政府的合作，印度教徒将支持这一行动。”“进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号和荣誉，或者继续为政府服务。如果政府竟然在像哈里发这些重要的问题上背弃了我们，我们除了不合作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当时甘地未对不合作作进一步的解释，他本人对其含义也不甚清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为缓解紧张局势，英国政府赶在国大党年会前夕于1919年12月24日通过了孟太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作为新的印度政府组织法的基础。正式颁行的法律规定，英属印度的立法权由总督和两院（国务会议和立法会议）组成的立法机关行使。改革后的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派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构成。这就是所谓“双头政治”。其实，这种双头政治对英国政府的根本权力毫无触动。英国政府还作出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阿里兄弟是在大会开幕时才获释。

阿姆利则会议是国大党领袖云集的一次盛会。提拉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工作参加了会议，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出席国大党年会。

甘地出席了这次盛会，他认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国大党的年会。在此之前，他虽出席过几届年会，但他的发言多限于提出一些建设性主张，如提倡国语，宣传上布精神和提出南非问题决议案。出席会议也只是为了表示对国大党的忠诚。国大党多数政治家除了对他在南非的斗争表示崇敬外，并未对他特别注意。在这次会议上，甘地表现突出，他与那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声望卓著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

甘地提出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议案。他认为，真真实实地表现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

提拉克本来对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就多有异议，对他要求谴责人民的法案内心也是反对的，但是提拉克出人意外地没有阻止这一决议通过。但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遭到强烈反对。

关于改革法案的决议文，系达斯起草，提拉克附议，经提案委员会通过。达斯、提拉克反对新近颁行的改组方案，他们在决议文中称该法“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甘地则主张法案决议文应以政府对人民的合作为基础，予以相等的合作，所以甘地和玛拉维亚一样主张对原决议案进行修正，去掉“令人失望”的说法，并建议应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改革法案。提拉克、达斯、贝桑特夫人坚决反对甘地的修正案。

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以致甘地甚至产生退会的想法。为维护团结人局，大会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和解，此后通过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折衷意见，决议案称：

1. 本会重申去年谋求充分负责政府的宣言，反对一切相反的结论。
2. 依德里年会所通过的决议，衡量宪政改革，认为它不切实际，不合需要，令人失望。
3. 至盼英国国会本着民族自决原则，早日在印度采取一切可能步骤，建立充分负责政府。
4. 相信有关人士当可实践改革，加速充分负责政府之建立，实属可能。

阿姆利则大会还通过其他各种问题的议案 50 多种，如主张复兴手纺手织的土布决议，推定一委员会，修订并起草新党章。由于旁遮普事件的正式调查报告尚未提出，大会未对旁遮普问题作出重大决定。但呼吁印度政府国防大臣在法律制裁之前应解除狄那将军的职务，并认为印度政府与旁遮普省政府对未及时公布惨案结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立即解除旁遮普省督奥德维爵士的陆军委员职务，并调走总督。会中还决定指定一委员会，负责拟定一项纪念殉难者的办法并募集基金修纪念馆。

穆斯林联盟、哈电发委员会等同时也在阿姆利则开会。穆盟除通过决议抗议阿姆利则惨案、反对对土耳其的瓜分外，还就改革法案问题通过了一刊与国大党精神相同的决议。

温和派或自由派人士拒绝出席国大党年会，他们自行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等着贯彻英皇新颁法案。

虽然甘地同国大党老一代领导人的初次正面交锋遭到激烈反对，但他获得了在国大党内开展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他也行出普通代表对他极为欢迎，而且他自己在旁遮普的调查工作、在南非公众上作中锻炼出来的组织能力 & 表达能力也得到了国大党元老如提拉克、达斯、老尼赫鲁的赏识和信任，他因此对前途充满信心。

会后甘地便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致力于一些实际工作，其一就是继续调查旁遮普事件。他在经过详细调查，严格考证核实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报告书。报告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这份报告于3月25日公布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捐。为此甘地到处游说，为筹建纪念馆募集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第三，负责修改党章。国大党的党章是很久以前戈克利起草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显然已不能适应需要，过去历次年会都提出过修改党章的问题，但没有人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甘地早对国大党的组织形式颇为不满，他发现国大党年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这个时期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大党大会也是非常臃肿，软弱涣散，脱离群众，大会对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未规定。甘地认为限制和清除这种种弊端实在刻不容缓，因此他在大会上自告奋勇地接下了修改党章的工作，并以高度责任感开始了这项艰苦细致却意义深远的工作。他起草的新党章以后在国大党那普尔年会上通过。

1920年年初到年中，印度政治局势的发展，使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其中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对哈里发问题的态度。

早在大战期间，印度穆斯林为维护哈里发的地位，强烈要求英国在与土耳其签约时，为土耳其保留伊斯兰教圣地和阿拉伯属地，不要损害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地位。英国首相在战时也曾允诺这些要求，但酝酿和约的情况表明，英国当局同样不打算实现这个诺言，这使印度穆斯林大为震惊。在1918年穆斯林联盟年会上，已有人要求穆斯林立即行动起来为维护哈里发地位而斗争。1919年孟买的穆斯林首先建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人是阿里兄弟，这一运动得到许多地区赞同。甘地认为这正是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合作的好机会，并想因势利导，将其纳入反英民族斗争之中，所以甘地对哈里发委员会及其领导的运动予以全力支持。同年11月在德里召开的全印度第一次哈里发会议，决定采取坚决行动向英国当局施加压力，要它考虑穆斯林的要求，还有人提出在必要时对英国当局展开圣战。甘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合作”思想，这次会议也根据甘地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

1920年年初，对土耳其和平条款中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教皇）的权利，穆斯林认为这是反对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背弃了英国政府的诺言，极为愤怒。1920年1月，当时穆斯林联盟已派代表团前往总督府请愿，其中有后来著名的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请愿毫无效果，他们又决定由阿里率团赴英请愿。但在如何采取有效压力问题上，领袖们始终找不到办法。甘地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赶赴德里，共商对策，经过长达3小时讨论后，甘地提出了一项详细办法。此后甘地又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研究磋商。

3月10日，甘地在一篇历史性讲话里，对外宣布了他的行动计划，“如果要求不被答应，怎么办？野蛮的方法便是战争，公开的或秘密的。此一方法应不予考虑。只看其不切实际便可知。假如我能劝说每一个人，相信这不是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更快地达到合法的目的。个人或一个民族，若能拥有扬弃暴力的力量，其力量必是最纯洁有效而且不可抵御……不合作乃是我们唯一可循之途，这是最纯洁、最有效、而且绝对不假暴力的方法。当

合作变成了屈辱或损及人所信奉的宗教情操，则不合作乃成为义务。……我们可以从最高或最低的地方开始，凡拥有荣誉、职位或奖金的人，应立即退还，在政府中充当仆役的也当辞工。但不合作不适用于私人性质的个人职务。我不同意去威胁那些不愿采取不合作主义的人，唯有自愿的撤回，才能证明大众的情绪与不满。至于建议士兵脱离部队这一点，时机尚未成熟，这是最后的一步而不是最早的一步。当总督、国务大臣及首相皆不理睬我们时，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这一步。撤回合作的每一步骤，都需经过仔细考虑，我们必须缓缓进行，一定要在高昂的情绪中保有自制。”

路易·乔治在3月17日接见阿里代表团时拒绝了穆斯林的要求，印度穆斯林立即作出激烈反应，他们决定以3月19日为国耻日，在这一天他们将举行绝食、祈祷。

3月19日即国耻日这一大，甘地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议案。议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项抗议与一项祈祷。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立场，希望英国的部长和政治家能同情印度穆斯林的宗教热忱，求得光荣的解决。第二部分是警告有关方面，假如解决的结果完全相反，则印度极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第三部分是正告国人，不得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决议案中最后是穆斯林的一条保留意见，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实现正义，他们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5月14日，印度官方报号外公布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上与伊斯兰圣地的和平条款。同时，亨特委员会的调查书也于5月28日通过，该调查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满纸胡言。这两件事给甘地当头一棒，使甘地真正认识到英国当局不但根本无意兑现战时谎言，而且蓄意侮辱印度人民的感情，“再不配享有印度人民的好感与合作。”

这两件事也等于在民怨沸腾的印度火上浇油，大大激发了印度人民同英殖民者的矛盾。甘地审时度势，决定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推动反英斗争的发展。

5月28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地所提的不合作运动方案。5月30日，国大党中央委员会在贝那勒斯召开，甘地主张：为了抗议对土耳其的和平条款以及亨特报告书所宣布的政府对旁遮普事件的决定，国大党应立即通过不合作运动方案。但国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与阿姆利则会议所通过的原决议精神不符，且在国人尚未能明察全部情况之前似乎不宜立即有所行动，因而一致决议，年内另于加尔各答召开一次特别全体会议，讨论甘地的建议。

6月1日，印穆两教300多代表集会，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沙甫诺、秦塔玛里等人出席，贝桑特夫人试图劝阻在场的代表不要参加不合作运动，但代表们不置可否。大会未获具体结论，但甘地借此已了解民心所向，他已不能再等国大党作最后决定。

6月9日，全印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举行，一致重申甘地不合作运动的原则，同时还指定一执行委员会草拟各项行动细则，并决定给总督一个月的时限，过此则在甘地领导下发动运动。

6月22日，甘地再次上书总督，希望总督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但毫无结果。7月7日，不合作委员会颁布行动方案，其中包括退回封号、辞去荣誉职位、抵制学校与学院以及拒绝法院诉讼与退出立法会议、推进土布运动等。

8月1日，在被定为不合作运动发动之日，20年代印度政治舞台上最具声望的国大党领袖提拉克逝世。提拉克是印度伟大的民族英雄，早在1895年他就首先提出自治口号，一直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1905~1908年印度民族斗争的实际领导人。在1915年温和派领袖戈克利去世后，开始了国大党历史上的提拉克时代，在他的努力下，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终于携手合作，为印度民族革命高潮的来临准备了基础。提拉克的死使印度全国陷入空前的悲哀之中，甘地闻讯悲恸万分。这天早上，甘地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小尼赫鲁）立即从信德省赶往孟买，加入了万人参加的送葬礼，在万民悲咽声中，提拉克的遗骨在薄暮浓雾中火化。

提拉克的死给甘地巨大打击，甘地在《青年印度》中写道：“我最坚强的堡垒垮了，提拉克已不在了，我很难相信他已经死了，他是人民这么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像提拉克这样获得群众支持，他受同胞的爱是无可比拟的。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见他狮子般的吼声。”

提拉克之后，谁将领导印度？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1920年8月1日，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政府，发出了不合作运动的讯号。

总督对甘地此举大光其火。他指责不合作运动为“最无用的”、“设计恶劣的”、“内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形容整个运动是一切方案中最愚蠢的，企图以此挫败甘地的信念。

甘地随即予以回敬。他说：“不幸得很，就在阁下的讥讽侮辱中，此一运动将渐次扩大，亦如政府之高压即将来临，任何一项伟大的运动都可能打消，但决非暴怒、忽视或辱骂其创始人所能奏效。我乃注意行动之人，又是不合作委员会之一员，负责领导此一运动足见它不是空洞的，它也不会不切实际，只要人民响应。”

不合作主张一开始在国大党多数政治家中也得不到支持。批评、怀疑、责难来自四面八方。有人怀疑非暴力不合作将导致暴力，认为群众一旦被广泛发动起来，要控制在非暴力范围内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完全不合作没有必要，殖民当局已宣布实现改革，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也算是多年斗争的结果，实现不合作等于前功尽弃。还有人对不合作计划中包括的各种抵制能否行得通表示怀疑，等等。

为了廓清误解，让其主张深入人心，甘地通过他主办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杂志，大力宣传不合作运动的真义，从各方面阐述不合作运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青年印度》

当时的发行量已由2500份上升到40000份，甘地的宣传自然在各阶层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了撰写文章外，甘地经常采取的另一手段就是到各地旅行演讲。这一次，他同萧克·阿里及其他穆斯林领袖分别赶赴旁遮普、信德、马德拉斯各地。甘地赤裸双脚，身缠土布，鼻端架着钢架眼镜，出现在偏僻落后的山村、人群密集的都市或三等车的车厢里，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也不论是刮风下雨，他从不停止演讲。其实他不仅仅是用他的语言、思想，而且是在用他的赤诚忠心和整个人格力量在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在饥谨肆虐的印度，在宗教影

响无所不及的印度，甘地苦行者的形象及其惯常使用的宗教语言与仪式赢得了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崇拜偶像的人们的狂热拥护，人们把他作为印度的先知和神明加以顶礼膜拜，这是国大党其他著名领袖望尘莫及的。

为了让国大党接受他的不合作方案，甘地没有坐等国、大党特别会议讨论通过后再采取行动，而是先开展运动，以便充分显示效果。由于他注意宣传和组织群众，运动开展后得到积极的响应。在信德、旁遮普、古吉拉特、联合省、比哈尔、孟买、孟加拉、马德拉斯等地，运动都开展得有声有色。

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国大党领导机构不可能再坐等旁观，而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新旧力量的一次激烈的斗争，出席代表5800多人，几乎包括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人，如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甘地前去参加会议时，见这阵势，也不免有些惶恐，对于他正在开展的运动能否得到通过没有把握。他回忆说：“我像是处在茫茫大海中，不知谁将支持谁将反对，……我只看到众多老将都已出席会议。”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其代表人物有老尼赫鲁、达斯、贝桑特夫人等。甘地在会上提出了他在旅途中起草的不合作运动决议案，尽管有贝桑特夫人等始终公开强烈地反对甘地意见，但会议结果却令人满意，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在提案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

这主要是因为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有许多支持者。一是来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们多属资产阶级下层，即普通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二是受甘地影响最直接的和原来政治上不太发展的地区的代表，如哈里发运动最早发动的联合省、阿姆利则惨案发生的旁遮普、甘地领导过坚持真理运动的比哈尔与孟买省内古吉拉特的代表，他们投甘地票最多。三是孟加拉、孟买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四是国大党

内的穆斯林代表。上述四部分人支持甘地，说明甘地的策略得到资产阶级、广大小资产阶级及普通知识分子的拥护。

但多数老政治家还不准备后退，按规定，特别会议决议须经国大党年会最后认可，所以他们决定在年会上作最后较量。特别会议之后，首先面临的是抵制立法会议问题，必须明确表态。国大党内的反对抵制的势力鉴于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好公开对甘地的纲领和观点提出反对，加之群众对抵制立法会议选举积极拥护，使一些政治家们从维护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的角度考虑，也不敢贸然行事，所以选举前夕，达斯、麦尔卡尔等人改变了态度，也宣布抵制选举。多数政治家宣布抵制选举，这就从根本上打乱了反对势力的防线。

抵制立法会议选举充分显示了不合作运动的力量。由于大批人拒绝投票和作候选人，使选举信誉扫地。如中央省只有22%选民投票，52个选区中有7个选区没有候选人，有33个选区只有一个候选人。其他省份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只在20%~30%，比例最高的孟加拉省也不过40%。

不合作运动在其他方面也有些进展，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有44名律师抵制出庭，46名治安长官放弃职位，33名自治机构成员退出自治机构，61人退回勋章或放弃荣誉称号，120名政府职员和教员放弃公职。不合作运动在资本家和商人中所获支持加强。不过，由于国大党许多政治家对不合作

还三心二意，所以这些方面的进展不如群众性抵制立法会议选举那样引人注目。

由于抵制立法会议不成问题，对甘地的不合作纲领反对的焦点转移到抵制学校、法庭和放弃公职等问题上。

1920年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召开，出席代表14582人，创历史最高纪录。

甘地的优势从会议的头一天就显示出来，选举提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是除孟加拉外，所有省份都是甘地支持者占多数。持反对意见的一些著名领导人本已作好各种联合起来反对的准备，但会上的倾向性如此明显，他们只好服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向甘地。结果甘地的不合作决议原案经过些许修改补充后，由达斯提议，甘地附议，比·帕尔、拉·拉伊、穆罕默德·阿里等各位领导人署名支持，获得一致通过，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

这次年会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斗争目标是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这是国大党第一次把争取自治明确纳入党章。党章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国大党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点是：建立中央常设办事机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中常会）领导日常工作；各省党组织按语言区建立，党组织建到县级（某些地方建到税区一级）；国大党年会代表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这样改革的结果是“使国大党真正具有了群众性、代表性与能动性”。尤其是它把原来很少受国大党注意的普通群众和原来落后地区的群众大量吸收到党内来，使各省在党内决策上具有同等待位，从而打破了先前由孟买、孟加拉等少数几个省的头面人物把持国大党的局面。它也意味着最积极拥护不合作策略的力量进入国大党，取得重要地位，这为今后贯彻执行不合作策略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土布等，从此国大党籍的印度教徒党员便负起了从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的责任；国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工农大众建立实际接触，大会通过的为哈里发问题进行不合作的决议则是国大党为促进印穆团结所作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尝试。

甘地在那普尔会议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孟加拉纪事报》称那普尔年会是“甘地的大会”，一位英国高级官员在给总督的信中说：“这次会议的显著事实是建立了甘地个人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统治。”

国大党的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那普尔年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标志着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与策略终于被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家们共同接受，也标志甘地在国大党内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亦即国大党“甘地时代”的开始。国大党在甘地领导下焕发出新的精神面貌，它不仅同广大群众建立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以不合作代替响应性合作，以群众性直接行动代替了宪政鼓吹，从而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向深度、广度发展，并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即非暴力的道路。

那普尔年会通过甘地的不合作计划，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开展的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开辟非暴力革命的途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进行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同时劝告律师辞职、学生退学。

不合作主张首先在孟加拉获得了积极响应，1月初，成千上万的男女学生走出公立学校。甘地对群众的热情积极鼓励，他访问了帕迭拉，主持该地

的比哈尔民族学院开学典礼，不到4个月时间，在帕迭拉、阿利迦、阿赫米达巴德、孟买、贝加勒斯、德里等地都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孟加拉、古吉拉特、比哈尔等处创办了国立大学，甘地与穆罕默德·阿里合办了国立伊斯兰大学。

律师停业、官员辞职也蔚然成风。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一百盾的薪水为公众工作服务，尤其老尼赫鲁这位收入丰厚、从思想到生活方式都模仿西方的知名人士也同过去的生活告别，的确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再如鲍斯这样一位风华上茂、才华横溢的政府官员，也受到甘地人格的感召，放弃高官厚禄，出任刚刚创立的加尔各答民族学院院长，积极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在这次运动中，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携手，表现出空前团结、友善的气氛。有些正统的印度教徒甚至请穆斯林到其家中吃饭并参加伊斯兰教集会，穆斯林也常举行集会请印度教徒参加，穆斯林领袖常请甘地为他们举行的集会演讲。

不合作运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一个饱经忧患的苦难民族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开始了新的生活。即使在偏远乡村，国大党、自治、旁遮普事件、哈里发问题也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甚至哈里发一词也被人民理解成“反抗政府”的意思。正像尼赫鲁所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

一方面是群众热情高涨，另一方面是政府的威信日薄西山。一个失信于民却又不愿顺应时势、改弦更张的政府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威胁利诱、恩威并用。此时贝桑特夫人及其亲信与自由主义分子结成联合阵线，反对不合作方案，与国大党分道扬镳。英国政府加紧拉拢这批人，试图借此组成一支有影响的阵线。于是一些自由主义分子很快跃居改革方案实施后的部长或高级官员职位，帮助政府反对不合作运动，如班纳吉获得爵位，辛罕爵士被任命为第一个印度籍比哈尔·奥利省省督。沙斯迭里则被冠以皇家特使的头衔受命前往英国各自治领土乃至美国等地访问，等等。

3月中旬，政府开始镇压行动，它下令禁止所有未经许可或不受津贴的活动，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行动也大加限制，但是这些不仅无济于事，相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合作运动各项计划仍在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也在各地不断发生。1921年，全国的罢工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虽是非暴力运动，但群众在斗争中，往往冲破非暴力约束，如在联合省、孟加拉省、旁遮普省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马德拉斯省的摩普那农民的起义时间最久，规模最大，起义者宣布成立“哈里发王国”，建立村管机构。

时局的发展令甘地感到棘手，在甘地看来，暴力斗争是对他殷切期望的运动的严重打击。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而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土布运动。1921年7月18日，依新党章选出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国大党的中心工作是限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同时加紧提倡手纺手织的土布工作。工作委员会号召国大党党员从8月1日起均不得穿着洋布衣服。

为表明禁绝洋布、推广土布的决心，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乌玛索巴

里广场举行焚烧洋布的群众集会。数千群众参与了这一烧布壮举，他们将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集中起来，付之一炬，当火焰腾空而起时，群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笑声，仿佛他们因此挣脱了枷锁。

8月1日，甘地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讲述了这次焚烧运动的深远意义。他宣称：“不接触洋布是一种德性。”“因此我们昨天所做的，乃是一种高贵的牺牲。……个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得救。我们昨夜所燃起的，乃是真实的、必须的牺牲。”“昨夜我们所烧的火应为烧除我们内心污浊之火的象征。我们净化了理智，必可指示我们土布的真正经济价值。我们净化了内心，必可使我们能够坚决抵制住洋布的诱惑。”

甘地聚众烧布令很多人不可思议，甚至包括甘地的追随者。如安德列斯就写信给甘地：“当你的一切罪行，如酗酒、吸毒、不可接触制、种族歧视等作巨大打击，甚至在处理娼妓问题上的那些美妙意念皆使我们感到极大快慰。可是当你叫人烧掉洋布，指穿洋服为宗教上的罪恶，要大家将海外兄弟姐妹的高贵产品付之一炬时，我们的愤慨简直难以言表。”

然而，甘地在孟买点燃的烧毁洋布之火并未就此熄火，印度各地争相效法，成批成批的英国布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表明人们誓不穿洋布的决心。

甘地发动此一运动并非一时冲动，甘地认为这是印度经济与道德自救的关键。从伦理道德上讲，他认为爱好华服正像嗜好烟酒、女色一样，会导致道德沦丧。而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角度讲，正是英国殖民者的入侵，破坏了印度以手纺手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其得以低廉价格购买印度的棉花，然后运往英国工厂加工成产品，以高昂的价格在英国垄断的纺织品市场上出售，从而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为了挫败英国工厂的机器，甘地多年来苦苦探索、实践，终于发掘了印度世代相传的木制纺车。他想让印度自纺自织代替进口洋布，以阻上印度的滚滚财源流入英国人的腰包。多年来甘地一直为这个发现作不懈地宣传。

1921年9月，为进一步推动土布运动的开展，甘地郑重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决定放弃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纺织制作的缠腰和披巾。正因为这个原因，甘地后来惯常的装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时才搭上一条土布披巾。不论是对群众演讲，还是同对手谈判，不论是在印度各地考察，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不改常态。对于自己的装束，他后来曾解释说：“淡泊生活，志虑深远”；“腰布代表简朴，代表印度化。它代表着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环境等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特征”；“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地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苦同胞谋福利。”

甘地每天抽出半小时纺线，从不间断，同时他敦促同事们也这样做。每天的纺线成了一个宗教仪式，纺线时间成为祈祷和禅坐的间歇。不管怎么说，从此以后，一项普通的纺线活动成为全国人民团结扛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象征，成为甘地领守和平革命的象征，成为民族团结和自由的标志。

正与甘地缓步推行其个合作计划时，阿里兄弟领导的哈里发运动却在急速发展。7月初，中央哈里发委员会由阿里兄弟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历史性决议，宣布“穆斯林如继续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或促旁人入伍，在宗教意义上皆系非法”。并宣称，“如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不能得到满足，则国大党阿赫米达巴德全会将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

9月14日，阿里兄弟被捕。两天以后，孟买省督发表一项公报，宣称逮捕阿里兄弟及其同僚5人的原因是他们企图煽动印度军队叛乱。

10月1日，卡拉奇政府判处阿里兄弟及其被捕同行两年苦刑。

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运动的发展，甘地原定9月30日为完成抵制洋布的期限，并开始发动民事抵抗。为了表示对穆斯林战友的声援，甘地决定提早发动群众性不合作运动。

9月21日，甘地剃光了头发，他认为这是一个哀悼的记号。10月4日，甘地在孟买召集各方领导人会议，并联名签署发表一项宣言。宣言针对政府逮捕阿里兄弟的理由，郑重宣告：无保留的言行自由是天赋人权。不管他批评的对象，是与政府合作或受雇于政府者，也不答是针对民政抑或军政部门，我们认为一个印度人竟去充任民政人员，特别是投身行伍，协助一个造成印度经济、道德、政治的堕落的制度，并使用军警镇压民族的愿望，以及使用部队摧残并未危害印度的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人的自由，这些都是违反民族自尊的。我们更认为，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这实际上是甘地不合作运动的更高发展：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10月5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孟买召开并通过决议，支持上述宣言。宣言在各地也一再重复通过。

因为这次行动，甘地终与他所崇敬倾慕的诗哲泰戈尔发生重大分歧。泰戈尔认为甘地这么干是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假自由的美名行毁灭自由之实。他要人们不要盲从，要以科学的态度从事理智的斗争，“经济学家必须找出实际的解答，教育工作者必须教书，政治家去运用手腕，工人必须上作。……”从而公开地与甘地的不合作计划唱对台戏。

阿里兄弟的被捕、受审及被判刑2年的判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11月4日，德里举行的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的孟买决议，授权各省自行负责，展开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包括拒绝纳税。

为防止群众的轻举妄动，甘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让他率先示范性地在古吉拉特的一个税区巴多里领导一次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对此，自然有人反对，认为应同时在各处发动运动，但甘地另有他的道理。他一向奉行持久渐进的战略，每次行动都倾向了从小处着手，然后缓步推进，步步为营，直至迫使对于作出让步。所以在操作上，他不主张一开始就伞面铺开战线。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定于11月17日——威尔士王子抵达孟买之11日举行。当这位英国皇室贵宾到达时，除了少数人表示欢迎外，广大人民反应冷漠，而且成群的市民集中到帕里，参加焚毁洋布的示威。甘地当场宣布：他将赴巴多里亲自开展和平反抗运动。可能会有人民被军警扫射，但不管将来巴多里发生什么事，他要求孟买市民保持冷静。

可就在甘地演讲的时候，一些市民对那些参加欢迎仪式的人施行报复。他们将那些人所穿的洋服和所戴的洋帽撕下来放火烧掉，还砸毁了酒店，焚烧电车和警察局，打死打伤警察。孟买的暴力行动，使正准备取道孟买去巴多里亲自指挥民事不服从运动的甘地，痛悔万分。当晚他便决定取消巴多里之行，并让儿子迪瓦达斯前往巴多里，让大家暂停一切准备工作。

次日，遭受攻击的一方，包括英印混血儿及犹太人，采取了报复行为，报复继之以反报复，使孟买陷入极度的紧张与混乱，局势的发展令人无法控制和预测。

甘地深感痛心，他为群众不能理解他的非暴力主张和良苦用心深感不

安。这样下去势必打乱他的全盘计划。面对这些群众，他似乎又一次感到无计可施，不得不再一次使用他的致命武器——绝食。

11月19日，甘地正式宣布绝食的决定。“除了饮水以外，我将不吃不喝任何东西，直到孟买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能和帕西族、基督教徒及犹太人和睦相处，直到不合作运动者能与同政府合作的人和睦相处。”他还召回他的幼子迪瓦达斯，并公开宣称：如邻区再有暴乱发生，他的儿子将被当作“牺牲品”，送至乱区，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绝食使那些已丧失理智、陷入滥杀的人们逐渐恢复了平静，市区的秩序趋于正常。11月22日，甘地开始进食。但他自此决定，以后每逢周一，便绝食24小时，直到印度获得自治。

鉴于孟买市民的表现，甘地认为，在群众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时，群众性非暴力斗争不可操之过急。11月23

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开会，决定巴多里运动暂缓发动，同时关照各级党部，在征收义勇工作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时，一定要宣誓服从非暴力，且言行一致，并以此耐心劝告国民。

运动的松懈使政府有了喘息之机。11月19日，孟加拉政府宣布凡国大党及哈里发委员会下的各种义勇工作队均属非法组织，同时禁止举行政治性的会议。旁遮普、联合省、比哈尔及阿萨密各省省政府也接着颁布同样的命令。大规模的搜捕便接踵而来。正在阿拉哈巴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的联合省全体负责同志55人，被警察机构悉数逮捕，国大党主席达斯于12月10日被捕，其他知名领袖，如老尼赫鲁、阿萨德及小尼赫鲁等也相继被捕。孟加拉和联合省闹得很凶，在这些省里，不仅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和工作人员全部被捕，连一些穿戴甘地服饰的人也受到百般侮辱，有的义勇工作人员甚至被警察剥光衣服抛进泥池中，警察奸掳烧杀，无所不为，普通的志愿队员入狱的不计其数。对政府的高压，群众毫不畏惧，如在一些城市里，自愿去坐牢的人源源不断，有许多向来不参加国大党活动或任何政治活动的人，受了群众激愤情绪的影响，也坚持要被捕坐牢；甚至有些政府小职员，晚上下了班不回家，却走向监狱高墙；有时警车带了逮捕证去捉人，实际上带回的人数却比原来规定的多得多。监狱官对这种现象无所适从，后来他们也改变手法，只抓有名的工作人员。据估计，从1921年至1922年1月，因参加不合作运动被判处徒刑的大约有33万人。

残忍的高压政策也难以奏效，一些与政府合作的人相机而动，他们开始出面调解，如玛拉维亚建议总督与甘地谈判。当时，总督也希望威尔士王子的印度之行能有完满结局，他授意玛拉维亚先去与甘地谈条件，甘地的答复是：“政府若不悔悟，谈判必然流产。”

12月的最后一周，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

大会期间主要有两派意见。玛拉维亚想要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即建议召开一次圆桌会议，此案遭多数否决。多数代表对政府大肆逮捕爱国人士表示极为愤慨，建议对政府实施反报复。穆盟主席摩汉里建议修改党章中的奋斗目标与斗争路线，主张在政纲中正式标明独立的字样，遭否决后他又坚持与英国断绝一切关系。纵使哈里发问题获得满意解决，也不再和英国人合作。甘地认为这类建议不合实际，提议否决。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议案则获6000名代表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对政府的所有法律一概予以民事不服从，同时遵守非暴力原则。虽在政府禁令

之下，亦当继续举行群众大会，并盼全印人民踊跃加入义务队，随时准备接受逮捕。”

大会授权甘地为“执行统领”，除变更全国的信条和与政府议和须获国大党同意外，甘地有权决定一切。

大会再次呼吁国民加紧手纺手织，宗教团结，禁酒，解除“贱民”。

当绝大部分的领袖已锒铛入狱后，依然自由的甘地成为这场运动的唯一统帅。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利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加上锐利无比的笔锋与口才，坚强地支撑着这场运动。他在《青年印度》上不断刊登被捕者的名单，公布来自监狱的报道和呼声，连篇累牍地发布反暴檄文，传送非暴力抵抗的真谛。当时印度的天空尽管黑云压城，但人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明媚。

1月14日，玛拉维亚与当时已脱离国大党的著名领袖真纳，联名在孟买召集了一次各党派会议，讨论和解条件。不合作运动者以来宾而非代表资格出席。

玛拉维亚与真纳已准备好一份和解条件的草案，其中没有包括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穆斯林政治犯的条款，甘地坚持必须有这一项。大会接受并通过一项决议，以释放阿里兄弟及其他哈里发政治犯作为举行圆桌会议的先决条件，谴责政府的高压措施，吁请国大党暂缓民事不服从运动，以待与政府磋商，同时建议负责当局早日召开圆桌会议，解决哈里发、旁遮普及自治问题。

总督没有接受调解条件，甘地早已预料到结果会是如此。他激励人民加紧准备不可避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工作包括：登记新志愿队员，土布宣传，废除“贱民”，促成各教派与各阶级间的团结及加强非暴力教育。

1月29日，帕泰尔主持巴多里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得到甘地同意。1月31日，工作委员会在苏拉迭开会，训令其他各地应对巴多里运动合作，暂不发动集体的或个别的民事反抗，除非获得甘地的正式认可。2月1日，甘地向里丁总督发出最后通牒，强烈谴责政府对印度人民的迫害，要求政府恢复人民的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并限政府7日之内作出政策性宣告，否则将采取若干非暴力抵抗运动。

2月6日，政府发布公告，拒绝甘地所提各项要求。总督还坚持把镇压措施说成是孟买暴乱及不合作运动带来的结果。2月7日，甘地又向政府提出抗议，指出政府歪曲事实。

当甘地还在与政府唇枪舌战时，人民早已按捺不住。一些地方的暴动已先期而起。2月5日，在联合省哥拉克坡区的一个小村乔里乔拉村，村民游行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射击，弹尽后退出警署。愤怒的群众纵火烧掉警察局，致使21名警员丧生。这则新闻直至2月8日才被当时正在巴多里指挥运动的甘地获悉，甘地惊愕之余，立即作出反应，决定取消集体民事反抗计划，撤回对政府的最后通牒。

2月11日，甘地要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撤销这一计划，他还决定从12日起绝食5天以自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屈于甘地的压力，最终决定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织、改革和教育性的建设性工作。就这样，人民期盼已久、甘地和国大党为之精心准备多时的大规模集体抵抗运动流产了。2月24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德里举行会议，在一片灰心失望与反对抨击声中，巴多里协议经过些许修改后获得通过。这次大会的一个保留意见是如国大党省党部同意，即可开展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对于甘地的突然中止运动，国大党著名领袖差不多都表示愤慨与不满。如老尼赫鲁、拉吉佩迭·雷及其他诸领袖均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反对他的决定。当时在狱中的尼赫鲁对此万分苦恼，他说：“尽管乔里乔拉事件与非暴力精神完全相反，但难道因为穷乡僻壤一群激动的农民的行动，我们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就该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吗？如果说这是个别暴力行为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么非暴力斗争的哲学和技术一定有缺点。”“因为在我们看来，要保证不发生这类意外事件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必须使3亿多印度人受了非暴力行动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后才能前进吗？即令如此，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说，我们在警察极度挑衅的情况下还能斯斯文文呢？即令我们办得到，但是那些打进我们运动中来的暗探及内奸采取暴力行动或煽动别人从事暴力行动，我们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这是非暴力运动的唯一条件，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必然失败。”

可是，甘地却不这样认为。他在2月12日的《青年印度》上说：“神对我充满仁爱。他曾三度警告我：在印度坚持非暴力与真理以展开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所谓非暴力的反抗就是说，应是温和的、合乎真理的、卑微的、自知的、自愿的，同时又是出于爱心的，永不伤害他人的。”“而乔里乔拉事件是前车之鉴。它显示如果防范稍一疏忽印度很容易挺而走险。如我们不要非暴力中卷入暴力的漩涡，则我们应赶紧止步，重建和平空气，重订方案，不要再想发动集体民事反抗之事，直到我们确信和平业已取得。”

不过，当时也有人认为甘地停止不合作运动并不只是乔里乔拉事件，可能有他不肯承认的理由。如尼赫鲁就认为乔里乔拉事件只是导火线。他的依据是甘地做事往往凭本能，那个时候，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组织、纪律正在消失中，如果运动继续下去，若干地方必然发生暴力行动，政府则会用血腥手段加以摧残，建立恐怖统治，而使人心涣散，意志消沉，从根本上扼杀运动，所以甘地才会断然中止这项运动。

但不管怎么说，突然中止不合作运动大大挫伤了群众士气，使几个月来一直被运动弄得焦头烂额的政府第一次有了主动镇压运动的机会。印度事务大臣孟太古当即宣布：“如果因为帝国的生存受到挑战，英国政府在印度履行责任时受阻就误以为英国将从印度撤退而提出要求，则印度对世界上最坚决的民族所提的挑战，决不能获胜。且吾人将必以所有的决心和力量，再度答复挑战。”保守党的发言人贝铿赫德爵士警告印度：“英国并没有丧失‘骨气’。”

甘地在他认为形势不利时可能进行妥协，但他不会屈服于暴力。2月23日，他在《青年印度》上以《摆脱魔神》为题，撰文回答英国人的挑战。他说：“贝铿赫德爵士已提醒我们，英国人没有丧失‘骨气’，孟太古更坦白指出英国人是世上最有决心的民族，决不容任何人干预其目标。可贝铿赫德爵士及孟太古都很少知道，印度早已准备好了试一试越洋而来的所有英国人的骨气。”

## 五、困顿中的艰难求索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于甘地的主动撤退很快进入低潮。在群众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政府虽将许多国大党领导投入监狱，但对其真正的领导人却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害怕稍有不慎会引起印度军队和警察的动荡。现在运动骤然停止，逮捕甘地已是时候，2月24日，国大党巴多里决议通过的当天，孟买政府便已接到密令：一旦决议通过，即可将甘地缉拿归案。同时有关甘地即将被捕的风声越来越紧，甘地身边的人提心吊胆，担心甘地随时可能从他们身边消失。此时的甘地正在沙巴玛迭真理学院一如既往地从事日常工作。

3月10日深夜，当甘地忙完一天的工作准备就寝时，警察局来人逮捕他，同时被捕的还有《青年印度》的出版商班克。甘地平静地与真理学院的同事亲友一一话别，在一片祈祷声中，甘地跟着来人上了囚车，前往沙巴玛迭监狱。他随身只带了2条腰布、2条毯子和5本书。这5本书是《薄伽梵歌》、《罗摩衍那》、《古兰经》、真理学院用的《圣诗》与《登山宝训》。

11日中午，甘地与班克接受初审。甘地被控犯有背叛政府罪。罪证是他曾在《青年印度》上发表过4篇文章，即《背叛为一种德性》、《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班克因负责出版发行“难辞其咎”。初审时甘地即表示“认罪”。

对甘地的正式审判于1922年3月18日（星期天）开始，旁听席上坐满了甘地的追随者。当身材瘦小、身裹腰布的甘地和他的“同案犯”班克被带上庭时，整个法庭都自动起立向他们致敬。甘地望着他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感到无比欣慰。他对旁听席上的女弟子、诗人奈都夫人说道：“你就靠近我坐着；当我昏倒时好扶持我。”在这种场合，他仍保持着惯有的幽默、风趣。

负责审理的首席法官是阿赫米达巴德的布诺姆斐德法官，担任主控的则是警察长斯脱兰格潘爵士，甘地和班克未请辩护律师。

对甘地的正式起诉与原控诉书有些出入，它只认定甘地在《青年印度》上所撰写的三篇文章，即《收买忠心》、《疑团与解答》、《摆脱魔神》的内容构成反政府罪。

法官宣读起诉书后问甘地是否认罪服法，甘地供认不讳。

当法官再问甘地有何意见发表时，他先作了口头声明，而后呈递了一份长篇书面声明，阐述了他的公众经历及其非暴力动机。说明正是英国的一再背信弃义和对印度的殖民压迫与剥削使他从一个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与合作者逐渐变成一个反对英帝国的不合作者。

在法庭上甘地还要求法官判他以最重的刑罚，与当年提拉克所判徒刑一样，他不求赦免，也不希望减刑，而且还说法官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对他处以重刑，要么辞职不干，最后甘地如愿，被判处6年监禁。

整个庭审历时100分钟，实际审讯时间并不多。在整个过程中，甘地表现出诚心诚意地认罪服法，但始终神态自若，有着百折不回的勇气。法官本人也表示，甘地是他所审判和即将审判的人中最不同的一种人。即便与他持不同政见，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有着崇高理想、过着圣洁生活的人。

甘地认为法官对他的审讯出乎意料地彬彬有礼。庭审结束后，人们带着难以言表的伤痛和虔诚的景仰之心去握他的双手，吻他的脚尖，向他们心目中的圣雄告别。

1922年3月20日深夜，甘地与班克被押上一列特别专车，从沙巴玛迭

监狱移往一个未知地点，警察局长亲自押送。押送途中，甘地和班克还受到特别优待，他们得到一篮水果，狱医也准许甘地挑选他所惯用的食物。随车照料的副警察局长受命给甘地供应羊奶，给班克以牛奶。甘地一行在契尔基下车后，一辆等在那里的囚车将其送到了浦那的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和班克被分开囚禁。甘地被囚在一间品字形的囚室里，与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印地语的阿拉伯籍的囚犯关在一起，囚室内仅有很小一点的空间可以自由活动。囚室四周筑有很厚的砖墙，墙低的一边装有电网，门外有一个小院子，囚舍中的一排房子前有一条分界线，甘地不得走过。后来因为一个地方官的干预，这个三角形的地带才向甘地开放。

监狱对于甘地早已不是陌生的处所，他曾多次以轻松、乐观的心情提及铁窗生活，还从苦行禁欲的角度欣赏和自动模仿过狱中的生活，然而那拉伏达监狱的灭绝人性连甘地也难以忍受。这里囚犯的饭菜不仅份量不足以填饱肚子，质量之恶劣甚至比不上猪狗食。狱卒的凶暴与草菅人命更是少见。他随身带的5本书被搜走，每天关门之前，囚犯都要例行接受搜身，甘地身上除了一块粗糙的土布缠腰别无他物，但狱卒仍不放过他，总要翻他随身带来的卧毯。甘地的亲人和同事来访，狱卒不仅不让他们坐下，而且时常粗暴地干预他们的谈话，使甘地一再表示抗议。甘地托人送来的纺车也被扣留，对此甘地不得不进行绝食，经过一段时间，情况才有所改善，纺车和那几本书也送到甘地手中。

不过总的说来，甘地认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一旦进了监狱，就应当停止抵抗，服从管束。这是为迎接自治所必受的自苦训练。他说：“我们非暴力抵抗一方面是要拒绝服从政府的苛法暴政，但另一方面却必须忍受因拒绝服从法律所遭受的苦刑。在监狱中，他不应借非暴力抵抗而要求特权，应在监狱中树立模范，使周围的刑事犯受其感化。同时打动狱卒与狱长的心。”因此，甘地不主张有破坏狱规的行为，他认为这并不是胆怯，而是为了表示力量，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说到做到。

由于甘地遵守狱规，又是特殊犯人，经过最初的不愉快后，他与监狱当局的关系有所改善。监狱当局顾及外界的影响，对甘地常有破例的待遇，如甘地可以食用羊奶、羊奶酪，甚至可以自己烧麦饼，除了两床新呢毯外，还拥有垫被和布毯、枕头等类别的犯人得不到的东西，可以洗澡，等等。每当狱方给他这些，他总是要求狱方能同样提供给其他犯人。如果要求不被答应，他往往宁愿放弃“特级犯人” 享受。

监狱对于意志薄弱者是人间地狱，但对于坚强的革命者却是一所学校。这正是他们从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抽身出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丰富革命理论的难得机会。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正是经过铁窗生活的磨炼，不断走向坚强与成熟的。甘地充分利用了狱中的这段特殊日子。

每天早上，甘地4点起床早祷，默颂祷文和圣诗，6点开始阅读和温习乌尔都文。由于监狱里不让室内有灯，他便充分利用日光，直到傍晚天黑看不清东西时才停止工作。8点晚祷后休息。一般读书要占6小时，另外4小时用于纺纱和编织。

纺纱是甘地狱中比较热衷的事情。他往往1小时纺纱，3小时做棉条。他认为他每天这4个小时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因为劳动的果实就摆在眼前，伸手可及。而且纺线过程本身还是一个排除杂念、潜心修炼的过程。当然，甘地如此迷恋纺纱，还因为纺车对于甘地是代表着贫困的印度的经济自救，

纺车是印度争取独立自主的象征。

甘地有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狱中的日子他孜孜不倦，分秒必争。从1922年3月入狱到1924年2月出狱，他一共读完了150种宗教、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书籍。除了《薄伽梵歌》、《古兰经》、《罗摩衍那》这些不朽之作外，他还第一次读完了全部的《大战史诗》及古吉拉特文的《印度教哲学六论》、穆勒的《奥义书》、卡宾斯的《佛国的福音》、大卫的《佛教要义》、阿里的《伊斯兰精神》及沙拉辛史的《先知生活》、阿里博士注释的《可兰经》、法拉的《神的追求》、詹姆士的《宗教经验谈》、霍普金斯的《宗教导源与进化》、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培根的《古人的睿智》、葛一佑迭的《欧洲文明史》、契德的《社会演变》、莫迭勒的《荷兰共和国的兴起》、威尔斯的《世界史大纲》、基迭的《城市的演变》、雷契的《欧洲的道德》、罗斯伯里的《皮特传》、哥德的《浮士德》、泰戈尔的《沙达拉》、萧伯纳的《人与超人》及基普林的《兵营小调》等等，这些图书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

1924年1月11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住进了浦那的沙桑医院，施行了手术。这次急症几乎置甘地于死地，但却因此中止了甘地的狱中生活。2月5日，英国政府鉴于甘地的健康原因，将甘地提前释放。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3月10日，甘地迁往孟买海滨茹湖疗养，这处面向大海，棕榈树环抱的疗养胜地因此而一度成了印度知名人士川流不息的地方。

此时的甘地哪能做到真正的潜心静养呢？在他入狱以后，印度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国大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对国大党领袖们的改革感到失望的群众开始脱离国大党，国大党领导机构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除了无条件追随甘地的“不变派”以外，国大党内部形成了主张改变争取自治的斗争策略的一个有势力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拥护者在一个重要问题——利用非暴力手段实现不合作纲领方面与甘地没有分歧，但是他们反对抵制立法机关，认为这种抵制有助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些机关为自己牟利，并认为，为了使整个管理机器丧失活动能力和从内部争取自治，也应把争取自治的斗争搬到立法机关进行。被称为“主变派”（即“自治派”）的这个集团的领导者是国大党的两位著名领袖奇·兰·达斯和莫提拉尔·尼赫鲁。

国大党两派意见分歧的最早表现是在1922年7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关于新形势下如何进行不合作运动的讨论会上。“主变派”赞成国大党人参加选举和立法机关，而“不变派”则坚持原有的不合作立场。两派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此后关于抵制或是参加立法机关的问题便成为国大党内部激烈争论的焦点。是年12月的国大党迦雅全印委员会上，两派的分野更加明显。达斯主张参加议会，在议会内进行抵制，如达不到目的，再开展不合作运动。但达斯未能说服会议多数代表改变立场，结果，国大党秘书长拉贾戈帕拉曼查里的“拒绝参加议会”一案以1740对89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

迦雅会议后，主变派不仅没有停止努力，而且加紧活动。达斯和老尼赫鲁决定另辟蹊径。他们于1923年3月成立了自治党，但仍留在国大党内，达斯任主席，老尼赫鲁任书记。5月，达斯辞去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主席之职。

自治党成立后便在全国广泛展开了争取国大党结束抵制立法机关的宣传。“不变派”则集中全力实现甘地的建设性纲领，为了巩固同自治党人作

斗争的阵地，保持群众对于甘地的斗争方式的信心，不变派于1923年4月在那普尔领导了地方性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但这个运动的规模不大，很快就以和当局的妥协而结束。

国大党内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加之中央立法议会和省立法议会举行本届选举的日期已经逼近，国大党的非常会议于1923年9月在德里召开。这时，自治党人已经加强了在国大党中的地位，取得了许多有势力的国大党人的支持。同时，“不变派”的地位由于甘地尚在狱中而大大削弱了，结果，这次会议上，自治党人得势，他们获准参加1923年的立法会议和省议会选举，国大党停止反对参加立法机关的宣传。

1923年9月，德里非常会议通过的参加立法机关的立场在1923年12月科坎纳市举行的国大党例会上得到确认，此后自治党组成了阵营齐全的竞选班子，准备参加1923年11月的选举。由于擅长辩论的达斯和精于组织训练的老尼赫鲁巧妙搭配，结果自治党在各省立法议会的选举中获得将近半数席位，在中央省立法会议中，也形成绝对多数。

1923年，印穆关系急剧逆转。由于不合作运动突然中止，革命热情过去后又没有一个共同纲领使双方结合在一起，一些阴谋家从中挑拨离间，致使一连串教派冲突发生。在较大城市中，教派冲突日见严重，恐怖主义开始抬头，除中间有些间歇外，它差不多成了20年代印度政治生活中的经常现象。

千头万绪迫使甘地必须尽早地投入工作。

4月3日，甘地便恢复了给《青年印度》撰写社论的工作。他写的第一篇社论题为《致〈青年印度〉今昔读者》，在这篇社论里，甘地重申了他的非暴力思想主张，以统一人们的思想，坚定人们的信念。由于甘地复出，一度销路大跌的《青年印度》再次畅销，成为甘地领导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舆论阵地。

对于当时自治派的活动，甘地也采取积极干预态度。甘地出狱给当时正热衷于议会活动的自治党人以很大压力，慑于甘地的威望，老尼赫鲁、达斯于4月中旬前往茹湖拜见甘地，他们既是为了对昔日的老同志表示问候，也是想借以试探甘地的态度，并向他阐明自治派的立场，希望求得甘地的谅解与同情。但甘地的态度十分坚决。5月22日，甘地发表公开声明，明确表示了态度。他在声明中说“关于国大党加入立法会议的问题，我很抱歉地说，我看不出我和自治派有什么相同的主张……我坚持认为加入议会与不合作运动的宗旨相背离，而且这种分歧也不单纯限于‘不合作’一词的解释问题，而是涉及到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我们所持基本精神的不同。此一精神关系到‘不合作’本身的成败，而不是限于实际上能得到一些什么效果。正是基于此一观念，所以我认为不加入立法议会，对我们的国家更为有利”。

面对既成事实，甘地的主张是既然德里与柯坎纳决议已准许自治派进入议会，那么自治派就有理由参加立法机构，维持派的人对此最好保持中立，看看效果再说。在声明中，他还建议自治派应改进方式，即不应一般性地消极阻挠立法工作，而应当积极提出国大党所主张的建设性方案。他号召，维持派的同志不要担心自治派的言论，只需集中精力从事建设性工作，从实际工作中显示自己的正确性。

甘地最为关心的是印穆团结，他希望大家能认真体会他先前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以领会其精神实质，也希望大家能交流意见和信息。

这一时期，由于整个印穆关系的紧张，相互猜忌和相互攻讦的现象屡见

不鲜，甘地也不时受到不同问题的包围。对于如何解决印穆冲突及回答人们的各种议论，甘地撰写了《论印穆冲突》一文，呼吁不同教派的人们接受非暴力为最后的信条，以协调不同种族间的关系，达到自治的目的。他说：“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与帕西族人决不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争取自治的方法必须是非暴力的。”“只要我们恢复信仰非暴力，则目前的纠纷冲突便可消除，因为在我看来、两教派间采取非暴力态度乃是讨论缓解目前紧张局势的先决条件。双方都必须遵守一个共同原则，即不诉诸武力而诉诸法律。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了纠纷，就请第三者仲裁，如果愿意则诉诸法律。非暴力的意义深远，尤其对教派纷争最为适用。”甘地还提出了一些处理教派问题的基本思想，如领导带头、多数带头。“多数应该带头，少数才能相信并效法。任何改革，必须有权有势者先行，不必等到弱者反应。”等等。

尼赫鲁深为佩服甘地在印穆关系问题上的见解，认为甘地“有眼光，有识别力”，“抓着了有价值的现实”，但当时的其他许多领导人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在教派问题上你争我夺，讨价还价，致使教派关系始终得不到改善。

1924 年头几个月，达斯与老尼赫鲁所领导的自治派一度取得很大战绩，如达斯走马上任加尔各答市市长，老帕迭尔出任了孟买市议会主席，小帕迭尔成为阿赫米达巴德市议会主席，卜拉沙德充当了帕迭拉市议会主席，小尼赫鲁则接受了阿拉哈巴德市议会主席的职务。浦那的市议会曾不顾政府的反对，替提拉克建了一座铜像；孟买及阿赫米达巴德议会通过了向甘地的致敬书；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的市议会，决定不出席总督的国宴。但所有这些，不过炫赫一时，时隔不久，它给群众带来的热情和新奇便消失殆尽。因为自治派所能做的只有这些，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即解除殖民统治的桎梏和枷锁，人们对自治派的那一套渐生厌倦。

甘地审时度势，开始对自治派发起了主动进攻。1924 年 6 月，国大党在阿赫米达巴德举行年会，甘地提出四个议案：

1. 党员每日至少纺纱半小时，每月 15 小时，至少需向党组织交纳纺纱 3 英两；
2. 党的负责人员如不接受指示执行任务，将被视为失职，而由他人递补；
3. 凡忠实履行下列五抵制者，才有资格承担党内负责工作。即抵制洋布、政府法庭、学校、封号、立法机构，凡已在位而不能履行者应辞职引退；
4. 谴责政治暗杀行动，确定暴力行动有悖自治目的与非暴力原则。

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讨论甘地的建议案时，老尼赫鲁和达斯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批评甘地行动专制。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在甘地正式提出第一个议案时，他们和一大批拥护者退出会场。尽管决议案最后都获得多数通过，但由于自由派退出会议和老尼赫鲁、达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也大大影响了甘地贯彻这项议案的决心，从顾全大局的角度考虑，最后甘地还是迁就自治派，比如纺纱的规定只作为任人选择的办法，等等。

甘地虽获得了这次挑战的胜利，但他深知这一胜利十分勉强。为了重振旗鼓，争取获得更多的支持，他根据当时国内的各种离心倾向，如自治派与维持派的争吵，国大党与自由主义分子的对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纷争，婆罗门与非婆罗门鸿沟的加深的现实状况，他准备集中一年的时间，脚踏实地地推进建设性方案，致力于全民的团结工作，以迎接新的挑战。

1924年8月31日，甘地在孟买的豪华戏院演讲时全力推动建设性工作。他主张集中力量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工作，他认为这是“最起码”的团结方法。9月11日他又在《青年印度》上著文强调团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说，“我们的不合作变成了互相的不合作，而不是对政府不合作。似此偏差，反足以帮助那我们要推翻的政府。我们的不合作原是活泼的、积极的、非暴力的力量，用来抵制一种主要是基于暴力的统治制度，不幸的是不合作从未成为积极的非暴力。我们仅以弱者的物质的非暴力为满足。我们既未能以此推翻政府，政府乃乘势给我们以加倍反击。倘不及时振作，就有被摧毁的危险。”“我亦如过去，坚信5项抵制原则。但我清楚看到，在全代会中的代表们尚且不能信守，故推进的希望实很渺茫，在弥漫着不相信的气氛中，每一行动都被曲解或约束。当我们自个儿唇枪舌剑私斗时，窥伺一旁的敌人已蓄势待发。因此我提出最低调的办法，以便能团结各党派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这是对内发展的工作，没有它，便不能发挥外在积极的政治力量。我们一定要能进步地代表群众。他们没有接触政治，我们必须分担他们的痛苦，同情他们的遭遇，了解他们的需要。”

甘地的呼吁引起极大反响。连最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青年印度》中发表声明：“我准备支持甘地所提三条计划作为国大党的行动纲领，如国大党负责当局接受此议，我将再加入国大党。”甘地重新赢得了人民和同志们的信任，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候选人。

甘地全力为印穆团结呼吁呐喊，但宗教感情与利益关系仍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教派仇杀并未因甘地的呼吁而停止动作，反而在全国各地泛滥开来。其中尤以1924年9月科哈特地区的仇杀最为剧烈。在这次暴力冲突中有155人被杀死，财产损失达数10万卢比。

甘地得知此事后非常不安，9月18日，甘地宣布他将在阿里兄弟的寓所绝食21天，在这期间，他将只喝清水和盐水。他从德里发出如下声明：“最近发生的仇杀我不能忍受，尤其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不能忍受，我的宗教告诉我，遇事困扰，不能解决就绝食祈祷，这是受苦，也是自洁。”他想以此哀求两教派的人千万不要自相残杀，也希望各方领袖，包括英方人士共同会商制止骚乱。

绝食期间，甘地没有停止工作，他躺在床上仍在为制止暴乱呕心沥血。这期间，他先后写了《神只有一个》、《我们的义务》、《不工作，不投票》、《论绝食》等数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讨论宗教信仰自由及和睦相处问题。

甘地誓死要捍卫团结的决心和诚意再一次令印度举国上下为之感动。朋友们和追随甘地的各方人士都赶到德里，会商扑灭仇杀的各种途径。然而此路仍布满艰辛。9月26日，在甘地绝食的第8天，老尼赫鲁主持了一个团结会议，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其中包括印度区总主教维斯迭柯迭博士、贝桑特夫人、萧克·阿里、哈金、希伦达兰德、玛拉维亚及摩汉里诸人。大会招待组由穆罕默德·阿里主持，开幕式以祈祷开始，与会各人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崇拜方式一齐祈祷甘地长寿。27日，大会通过决议：对圣雄甘地此次绝食的原因深感忧虑，并一致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基本原则，不论其属于何种宗教，不得破坏其宗教场所，亦不得干涉其入教或转教，更不得有强迫其接受任何信仰、摧残他人的权力。大会向甘地保证，决心竭尽全力贯彻此一原则，并谴责破坏此种原则的人。

大会授权主席亲自向甘地提出上项保证，并盼甘地即日打破绝食，使大家都能获得甘地的合作，以阻遏日益蔓延全国的宗教仇杀。

28日，甘地给老尼赫鲁回信：“我请你向会议诸君保证，如我能为大会所愿，我必乐为之。但我经一再思量，发现我仍不能打破绝食。我的宗教告诉我，为了有价值的目标而作的诺言与誓言，是不能打破的，你知道我的生活规律，四十年如一日。”他希望与会各位将决议案所显示的对甘地的爱化为坚强的工作，为团结而奋斗。

大会进行多日，通过不少议案，但气氛一直非常紧张，激烈的争执与互不相让随时可能导致大会流产。幸亏国大党穆斯林领袖阿萨德的积极努力，大会才得以通过最重要的几个议案。如争论较为激烈的第二议案也获通过。它规定：“为了报复或惩处而自行玩法，不仅是违法之举，且亦违背宗教，因而所有争论，理应经过仲裁判决或甚至诉之于法。”由于甘地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一刻不容缓的形势，随着时日推进，大会的友好气氛渐趋浓厚。

10月9日，甘地绝食的最后一天。早晨4点，天空尚未破晓，人们便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分聚集在树影摇曳的草坪上早祷，甘地身披一袭黑毯，出现在星光下的早祷人群中。8时，大批的访问人群陆续到来，正午前后，所有的领袖和朋友们都已聚齐，举行了停止绝食的庄严仪式。仪式之后，甘地艰难地对阿里、哈金、阿萨德讲了几句话，意思是说他为了印穆团结奋斗了30年，可是没有成功，他不知道神的意旨如何，但今天他要他们以生命担保，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定要团结，不要冲突。得到肯定的保证后，医生拿上一杯橘子汁，甘地接过来喝了，绝食便告终止。在场的人无比欢欣鼓舞，激动非常。

1924年10月25日，孟加拉省政府根据一项行政命令，在加尔各答及孟加拉省其他各地大举非法搜查民房，其中大部分为国大党分支机构及党人住宅。加尔各答市长达斯的得力助手鲍斯及自治派重要人物均遭逮捕，搜捕的理由是有人举报他们藏匿军火武器，但结果并未搜出证物，警察仅带走了全部文件资料。

政府的挑衅行动，激起印度各地反抗高潮。群众举行了数百次集会，抗议政府的行动，沙斯迭里、真纳等本来反对自治派主张的人也一致谴责政府，甘地对此不义之举更是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政府的挑战，使国大党内部歧很快缩小。11月6日，甘地、达斯、老尼赫鲁紧急磋商，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表示共同谋求国大党各派的通力合作，团结各方力量共同对付政府的高压。国大党也决定自即日起，除不用外国布外，其余不合作运动一律停止，以保证各集团、党派共同行动，转而致力于四大中心工作，即手纺手织、服用土布、印穆团结、解除“贱民”。所有参加中央及地方议会的自治派人士更当以此作为代表国大党的重要工作，自定规则，自筹资金，全力推行。凡年龄未满18岁，未在执行党的工作或参加政治运动、党的活动时着用土布衣服，或未月缴自纺土纱2000码，或因故未缴同额他人所纺土纱者，一律不得充任党的各级委员会或分支机构的委员。

甘地与自治派达成协议后，开始积极努力，以使这一决议为12月的国大党年会认可。这一时期，他不断在《青年印度》上撰文阐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同时致力于各种组织工作。

12月26日，国大党第39届全代会由甘地主持如期举行，甘地希望在这

次会议中，能真正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大会的组织非常成功。这次会议对甘地、达斯、尼赫鲁协议予以批准，党章第7条予以修改，即将月缴4安那改为缴上纺2000码为党费。印穆团结也得到特别强调。在大会开幕辞中，甘地首先对英印政府的外交、内政严厉批判，他说，“这种压迫乃是痼疾的象征。它的公式是欧洲人统治，亚洲人屈服。这有时比白人压迫黑人还要神秘……。”接着，他提出了印度当前的目标是在最短时间内能消除教派对立观念，选举应该是普遍的民选而不是按宗教区分采取分别选举，任何的公职服务机会应该是不分性别与信仰一律平等。但在教派对立观念尚未完全消除以前，少数教派对多数教派的疑惧是必须容忍的，多数教派应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印度政治目标是“应该争取一个友善而相互依存的联邦而不是独立的邦联”。“在我看来，如果英国政府真乐意言行相符，帮助我们获得平等地位，则保留在不列颠联邦之内，将是一次伟大胜利，所以我将为印度在帝国之内的自治而奋斗。但是如果由于英国的错误而迫使我们不得不退出联邦时，则我将毫不迟疑地主张断绝对英国的关系。这问题我们留待英国人去决定。”甘地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充满信心，“作为一个国大党员，我愿意国大党能维持完整。我主张暂停不合作运动，因为我看出我们全国的准备不够，但假如政府无动于衷，一成不变，我决不能也不愿长此采取像现在的政策。不只是一种政策，而且是一种信仰。不合作与非暴力乃是同一棵树上的分枝，同属非暴力抵抗的根本，是我的创造主。非暴力抵抗是追求真理，神是真理，非暴力乃是引导我接近真理之光。自治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大会后，甘地接受工作委员会授权，与达斯、尼赫鲁共同负责确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人选提名。为达到团结目的，甘地有意改变其中维持派占多数的现象，他将代表维持派的拉贾戈帕拉曼查理、帕迭尔、班克3人取消，而提名贾雅卡、阿雷、达斯、老尼赫鲁、奈都夫人、穆罕默德·阿里、阿萨德、沙达·马迦罕、奈都博士为工作委员会成员。

甘地对自治派领袖的妥协，曾令维持派人士不满，他们认为甘地的协议即使不是背叛也算是偏差。一些在自办的临时学校中就读的学生对此尤为疑惑，他们认为假如不合作运动停止，他们就是最大的牺牲品。许多英方人士更是大肆渲染，认为这是甘地向自治派、暴力集团的屈服。甘地表示，这是有意义的屈服，而不是对暴力集团的屈服。因为他不相信自治派是属于暴力的政党。现在自治派面临困境，“在自治派需要声援的时候，如果我不挺身而出，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实。”

事实上，甘地作出此种妥协也是出于对形势的更深层的考虑。甘地出狱后，进一步认识到对自治党人让步的必要。因为结束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群众的失望情绪比甘地所预料的更严重，作为甘地纲领的非暴力原则甚至遭到一些有权威的国大党人士的公开抨击。在国内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提出革命的反帝方法来与甘地的主张抗衡。在某些省份恐怖活动具有极大规模，警察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此种情况下，甘地认为对自治派实现让步能防止国大党分裂，并阻止革命方法拥护者的地位加强。

从1925年起，在自治党人领导下的国大党把全部注意力首先集中于立法机关的工作。自治党人按照他们的纲领性宣言，参加了立法机关，以便改变它们的性质，使其有利于争取自治或结束它们。他们在立法机关的行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露帝国主义政策，但在印度的殖民制度条件下，这两个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不仅如此，自治党内还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同殖民当局

妥协和把党变成一个宪法反对派的趋势。

自治党人在立法机关中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任务，党内某些集团又出现了与当局合作的倾向，这两种情况大大动摇了自治党的威信和影响，在 1926 年举行的立法机关选举中，自治党丧失了许多席位，其地位明显削弱了。加上殖民当局也坚决拒绝自治党领袖们想达成某种协议的一切企图，结果是自治党人实际上放弃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正如莫提拉尔·尼赫鲁和他的拥护者在 1926 年 3 月离开立法会议时的宣言中所说，自治党人试图和印度政府建立合作，在 2 年半时间内一直试图促进实现改革，但是除了受辱外毫无收获。

1925 年，甘地的主要活动是到各地旅行演讲，以推广他的建设性方案。上半年，他主要旅行了卡提亚华、中印度、孟加拉、马拉巴特和特拉凡哥尔、马德拉斯，下半年则在比哈尔省和联合省各地活动。正像尼赫鲁所说的，甘地时常对他懒惰而人心涣散的人民进行教育，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但他不是通过强迫命令和物质诱惑，而是用和蔼的表情，温柔的语言，尤其是自己的榜样力量去打动他们，甘地苦行者的言行使他更容易与人民打成一片。

旅行中，甘地常走村串户，或深入城市贫民窟中，人民对于甘地这样一位当代圣贤，更加狂热地崇拜，向他倾诉他们的疾苦。“贱民”们赤脚站在烈日下迎接甘地，他们告诉甘地：“那边有清凉的水井，可是不准我们去汲水，我们又无钱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井。”甘地则安慰并引导他们：“我一定要让你们得到清凉的用水，但你们也不要再吃死牛肉，你们不改正这种坏习惯，我自然还是和你们亲近，但不能使婆罗门教徒接近你们。”当有的“贱民”躲在角落不敢出来、怕玷污了他时，他主动走近他们，打破他们的顾虑。他举止亲切，平易近人，并与之娓娓而谈。可是对一些专门欺压百姓、为害乡里的江湖骗子，他却毫不客气。他常利用机智戳穿他们骗人的把戏。有一次，甘地碰到一个自称会预测吉凶、占卜未来的祭司，甘地就让他给自己算命，祭司知道甘地不好对付，谎称历法书没有带来，甘地让人取来历法书，随手指着上面的几行字让祭司念出来，祭司只得承认他并不识字，算命不过是他谋生的一种敲门砖而已。

1 月 8 日，甘地出席卡西河瓦政治会议，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土邦人民及王公应有的责任。23 日，甘地前往德里，主持全印各党代表会议，会中讨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拟定印穆团结方案及起草争取自治纲领。

3 月底，甘地从脱拉瓦柯返回自己的家乡。4 月底，他转往孟加拉省，这里工作的同志出于对甘地的健康考虑，为他在旅行中安排了头等车厢，甘地极力反对：“假如我把自己包在棉花包里，我的旅行将毫无意义。我必须尽可能像千千万万平民一样地生活，一样地旅行。”

5 月 6 日，甘地考察了孟加拉各地的乡村，他一路风尘仆仆，爬山涉水，实地考察了许多地方。他对这里关注最多的是手纺手织问题，他为那里的乡村推广土布的成绩感到满意。在甘地的莅临指导和影响下，孟加拉首先实现了国大党关于缴纱作党费的新党章，纺纱运动蔚然成风，从贩夫走卒到高级知识分子，都对甘地的纺车运动极为拥戴。

应达斯的劝请，甘地曾在大吉岭休息了 5 天，各路新闻记者、甘地的崇拜者纷纷涌到那里。甘地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高招，凡索要甘地的照片和签名者必须答应每天纺纱半小时，同时保证穿着土布，他自然而然地把这里变成了推广土布运动的总部。

甘地在大吉岭的小住成了他与达斯这位斗士相处的最后日子。6 月 18

日，甘地得知达斯在大吉岭突然死亡的噩耗，才作过达斯上宾的甘地不胜悲恸。他当即打消阿萨密之行，返回加尔各答参加葬礼。20日，甘地在自治派的机关报上发表悼文，题为《德希班多万岁》，以祭奠这位同时代的名人。

7月16日，甘地参加自治派会议，会上，甘地提议由老尼赫鲁出面领导国大党，他准备在9月间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正式提出这一建议。

甘地此举再次激起各地维持派的不满。本来上一年甘地与达斯签定协定，维持派就很不满意，但碍于甘地情面，勉强同意。现在甘地又未和大家商量，就答应让老尼赫鲁出来领导国大党，这使他的追随者大感恼火。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不在国大党内另起炉灶，而偏要屈服于自治派。甘地回答说他并不自命为领袖或者说自己有一个党，他必须适应、多变的环境，但不管怎么变，他的根本主张不会改变。他呼吁大家保持团结，尤其在即将召开的工作委员会上更该如此。

1925年的国大党年会于12月26日在康坡举行。会前，甘地支持奈都夫人为下年度的主席，获得当选。甘地认为，这是印度女性第一次荣任主席，是光荣，也是权利。

由于长年奔波劳苦，甘地的身体状况很差。康坡大会后，甘地决定遵医嘱回沙巴马迭真理学院静养。这期间，他除给《青年印度》撰稿外，开始撰写自传，经过连续3年的刊载，写成《我体验真理的故事》一书。

1926年12月20日，甘地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又开始旅行演讲。这次旅行历时一年，1927年上半年，他旅行孟加拉、比哈尔、中央省、马哈拉斯特拉、卡那达克等省邦；下半年又旅行迈索尔、马德拉斯、泰米尔纳德等地，着重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

这次旅行，甘地总与夫人形影不离。有一次出席科隆坡的欢迎会，有位听众写了张纸条给甘地，问跟随他左右的是否他的母亲，甘地笑着点头。第二天，甘地出席又一次演讲会时，听众中便有人问他，为何他的母亲不到。甘地幽默地答道：“昨晚有位先生，将她看成我的母亲，对她或者对我来说，这不仅是可原谅的错误，而且是我们所欢迎的错误。我们相互同意，她不作我的妻子已经40年了，将近40年前，家母弃世，以后她就代替了作我母亲的责任。她是我的母亲、朋友、护士、厨子，为我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她不来照顾我，我就不能吃早点出门，也不会有人替我料理身边的许多小事，所以我们双方取得一个谅解，就是我享荣誉，她服劳役。”

1927年12月，国大党年会在马德拉斯举行，刚从欧洲回国的尼赫鲁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议案，如争取印度独立、印度加入国联反对帝国主义阵线等。甘地出席了国大党公开会议，但他不参与政策的制定，这是自从自治派得势以后甘地在国大党中采用的一贯立场。甘地虽然认为尼赫鲁的方案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暂时未作公开批评和反对，尼赫鲁的议案一个个都获通过。

1928年初，甘地重返真理学院，不久，出席了在此开幕的国际基督教团契会。在这次各国代表云集的大会上，甘地发表了他自己对宗教问题的看法，即：所有宗教都是真的；所有宗教都有缺点；对所有宗教应一视同仁。

1月末，甘地在真理学院为其第3子拉摩达斯举行婚礼。婚礼移风易俗，堪称典范。婚礼前，这对新人都绝食斋戒，并共同打扫牛栏，用水浇树，表示同心同德。婚礼上没有音乐，也没有礼物，仅有的贺礼是新娘母亲送的一

架纺车和甘地送的一部《薄伽梵歌》。新郎新娘身着白色土布服，面对一堆篝火，携手共诵圣诗，聆听长辈教诲。甘地勉励他们要以梵歌为指南，做到安贫乐道，立志为国服务。甘地在为这对新人祝福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1928年是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民族运动已走出低潮而日趋活跃。无论是在产业工人、农民、中产阶级青年中间，抑或一般知识分子之中都是如此。

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七八年前成立的全印总工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有代表性的团体，不仅会员增加，组织发展，而且思想上更激进，更富斗争性，罢工斗争已成为经常现象。

农民运动也起来了，佃农集会抗议的现象已是家常便饭。在古吉拉特，政府与农民之间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原因是政府企图提高税收。萨达尔、瓦拉拜、帕迭尔领导的巴多里坚持真理运动，使全印度刮目相看，巴多里变成了印度农民的希望、力量和胜利的象征。

1928年印度还有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青年运动的发展，到处都成立了青年团，青年会议开始讨论当前迫切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一般说来，它们倾向于彻底改变现状。这一切变化预示着新的斗争高潮即将来临。

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达印度。两门调查团由英国的主要政党即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代表组成，其使命是前来印度调查研究英国管理印度的效果，以便提出下一步改革的建议。调查团准备从孟买到德里经加尔各答赴马德拉斯，最后到拉合尔。

调查团没有吸收任何一个印度社会人士参加，这样一个明显有背民族自决原则的代表团的前来，极大地刺激了印度反帝斗争的情绪。

2月3日，西门调查团到达孟买时，人民用抗议性罢工迎接它。各大工业中心都打出了“西门滚出去”的黑旗。见这阵势，西门调查团赶紧离开孟买，前往德里，在这里等着他们的也是一片抗议之声。这帮人俨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面对愤怒的群众，他们宛如惊弓之鸟，只能经常呆在旅馆里。

警察为挽回面子，拼命挥舞屠刀。国大党元老拉吉佩迭·雷在警察开枪镇压时临危不惧，竟被殴打后致死。警察的暴行，使矛盾迅速激化。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也使各党各派重归于好。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左派影响上升，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趋发展，有些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苏俄的暴力方式。

甘地反对群众用苏俄式的暴力手段进行斗争，而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他在《青年印度》上称：我必须承认，我尚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只知道它取消私人财产制。这是将不占有的道德观念用之于经济方面。假如人们自愿接受或经由和平手段劝其乐于接受此一方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就我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主张使用暴力，而且采用没收私人资本，由国家集体所有的制度。不过，不管怎样，在布尔什维克理想的背后，有无数男女为之而作了纯洁的牺牲，这是受列宁所感召的牺牲，是不会徒劳无功的。

1928年5月，一个与西门调查团针锋相对的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由老尼赫鲁牵头，印度社会各党各派（如国大党、自由主义联盟、穆斯林联盟等）代表组成，旨在回击那些认为印度领袖自己提不出一套宪制方针，需由英国代劳的论调。它力图制定出一个能满足印度资产阶级和地主需求的自治方案。7月，宪法起草委员会很快提出一个草案，主张采取全民

普选制，成立印联政府，在大英帝国之内获得自治。这个报告的温和性质很合甘地心意，他说：“我敢建议此一报告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而且处处站得稳。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大家对这份报告，再增加一点耐心，一点互重，一点互信，一点迁就。”报告经8月所举行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又送交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全委会讨论。这次全委会上，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种不同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相左。尼赫鲁极力反对委员会所起草的方案，老尼赫鲁则坚持。甘地采取折衷步骤，他提出，“如果本报告所拟宪法，不能在1930年12月31日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则国大党将不受该草案约束，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劝大家完全接受这一报告。他说，“我并非对你们的目标浇冷水，独立之火在我心中烧燃，烧热的程度并不低于国内任何一个人，但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同。也许我的政治生命即将结束，那时你们可以不听我的话，而将我抛弃，但现在我还要为国家贡献余力。”

甘地的提议也遭到以尼赫鲁、鲍斯为首的代表的激烈反对，反对的关键在自治领地位问题。他们认为如不脱离与英国的关系便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面对国大党领导层陷入重大分歧，甘地只得进一步让步，他答应将英国接受宪法的限期由2年改为1年，同时准许独立派以国大党的名义宣布独立。尼赫鲁等人仍不满足，主张现在就该宣布独立，甘地非常生气而予以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可以嘴里高唱独立，……但如果不是真心诚意，只是一味空喊毫无意义。如果你们不履行诺言，哪里会有独立。独立是需要脚踏实地的奋斗，而不是舞文弄墨可以办到的。”最后，大会通过了甘地的提案。

国大党全代会后，赞成自治领地位的国大党积极支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而对温和派立场不满的民族资产阶级则在城市里组成“独立大同盟”。在许多省份，独立大同盟还与当地的工农党进行了合作。

1928年12月，国大党全代会闭幕后，甘地加紧发动倡导抵制洋货与推行土布运动。1929年1月1日，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开幕式。他规定凡购买土布满2卢比的顾客，均可参加观礼，每一发票上均由甘地亲自签字。这一着很见效，当时就卖掉了价值5000卢比的土布。甘地还规定，以后全国各地出售的土布，都必须盖上全印土布协会的图章，并且标明价格。

正在这时，真理学院发生了几件“丑闻”，使甘地急忙从加尔各答返回学院。所谓丑闻实际上是几起违反院规的事。一个是甘地的侄儿挪用公款和违反院规，私自储蓄了1万卢比；二是甘地夫人接收了各地朋友送给她的约200卢比的礼物和4卢比的私人捐款；三是修道院内一寡妇与一位孤儿院长大而来校内定居的男子发生暧昧关系。甘地责令院方严肃惩处，而且他本人亦为学院中发生的“罪恶”引咎自责。他还在《斯瓦拉吉》杂志上发表《我的悲伤，我的耻辱》一文，对外宣布了全部事件始末，以此警醒世人。

1929年6月，甘地从报上得知他已被提名为下届国大党主席的候选人，他立即拒绝此项提名，而推荐尼赫鲁。他的理由是自己的思想已赶不上所发生的形势，他与年轻一代存在距离，在工作中应主动让贤退居后位。

虽然甘地已拒绝提名，但在各地选举中，仍有10个省提名甘地，另有3个省分别提名帕迭尔与尼赫鲁。9月，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瑞举行临时会议，甘地一定要尼赫鲁出任主席，大会接受。甘地对这位久经铁窗考验的年轻人推崇备至，态度极为诚恳。他说，“有人担心，权力由老一辈手中转移到年轻人手里，这不是好现象，我不担心。应该担忧的倒是，像我这种麻痹状态

的人还要握权，那才是可怕的现象。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曾私下问过他是否挑得起这付重担。他的答复是‘既然是落在我的肩上，我也不畏缩’。就勇气来说，他是足够的，难道我们担心他不爱国吗？有人指他太激动，可是在现在的时候，这种个性是需要的。如果他富有战士般的冲动，他也不缺乏政治家的谨慎。由于爱护纪律，他虽在最尴尬的时候，仍能表现出他的自制。无疑，他是一个不为环境所影响的最具远见的人。可是他在关键之处，仍能谦虚、实际，并不冒进。他纯洁如水晶，真实而不容置疑，他是仁侠的骑士，在他手里，国家是安全的。”

两门调查团遭致印度举国一致的抵抗，说明英国的计划如不顾及印度民意，一意孤行，必遭破产。因而调查团回国后便建议工党首相麦克唐纳邀请英属印度和印度各土邦代表举行一次会议，然后再作打算。这个建议为英国政府接受。欧文总督根据这一动向和印度国内正在酝酿的革命形势，于1929年10月31日赶在国大党年会之前匆忙发布了一个声明，表示他准备举行圆桌会议，以便能就印度宪制问题形成具体建议，提供国会讨论。同时声称“政府认为1917年宣言中所暗示的印度宪治地位乃是自治领”。

总督的声明发布后，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了“领袖会议”。会议通过一项联合宣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总督的公告。条件是拟议中的圆桌会议的所有讨论应以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为基础。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方面，国大党应占优势。

欧文总督在印度所发表的声明，引起英国国内轩然大波。麦克唐纳首相随即发布声明予以澄清，他说这并不是表示英国政府政策改变，也不是加速给印度自治领地位。

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面代表人士在德里的会谈照常进行，但是此时欧文总督的口气也改变了，会谈无果而终。

## 六、跌荡起伏的独立运动

总督与印度各政党代表的会谈无果而终，使甘地再次面临抉择。早在一年前的加尔各答年会上，甘地曾将尼赫鲁、鲍斯的“独立方案”推迟一年考虑，现在限期届满，而自治领地位仍遥遥无期，甘地不得不改变思想。此时的形势也令甘地感到欣慰，到1929年岁末，国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显著扩大，对西门调查团的抵制又吸引了在通过巴多利决议后，曾退出国大党的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分子重新加入国大党队伍。国大党的抵制洋货，反对不可接触制的斗争和争取印度自治的非暴力运动的宣传，甚至深入到还没有国大党员的农村，连过去坚持与政府合作的自治派领袖老尼赫鲁这样一位一切依靠宪法行事，并且惯于讲究法定程序和方法的大律师，在环境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改变了立场。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狂澜席卷欧美宗主国家，印度深受其害。在宗主国和殖民地矛盾尖锐激化的情况下，甘地已不能指望人民群众满足于自治领地位。

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度高涨的情况下，1929年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如期开幕。这次大会几乎是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几千名会议代表中，投反对票的仅20人），宣布这一决议案的时间，特意选在旧的一年结束和新的一年开始的1929年12月31日午夜。决议郑重宣称：印度所争取的乃是完全独立。与此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开展群众性全面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

国大党拉合尔年会奏响了民族独立的号角。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议规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全国人民将在这一日宣誓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1月9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发表他的独立宣言：“在圆满的非暴力气氛与加紧推进建设性工作的前提下，几个月内，我就准备着手领导一次全民不合作运动，作一次成功的斗争。我们深信，享有自由以及经由劳动所获得的果实并保有生活必需品使得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乃是印度人民以及任何人民不可否认的权利。我们也相信，如果有一个政府剥夺其人民的此种权利并予以迫害，则人民就拥有更进一步的权力改造或消灭它。”

1月26日独立日，印度举国欢庆。这天清晨，数千名大学生、职员、商人和知识分子在国大党领导下，走上孟买街头，游行队伍举着“非暴力万岁”的标语，和平示威，后又有10万工人的游行队伍加入了国大党领导的示威游行。除了孟买，全国其他各地，无论城市乡村都举行了庆祝独立日活动，人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独立誓词。

1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了11点要求。这些要求是：把卢比的兑换率降低到1先令4便士；降低田赋50%；减少军费50%以上；减少英国官员的薪金50%；实行保护关税率，限制外国布匹与服装进口；给印度船队以内河运输的特权；取消刑事侦缉局或对其确立监督；给印度公民以带武器自卫的权利；废除政府的食盐专营法，取消盐税；禁止出售酒类；（11）释放除“犯杀人罪或教唆杀人罪以外的全部政治犯”。

甘地的11点建议，引起了英国报界的猛烈抨击。国大党内也有很多人以为甘地是在放弃独立的大目标而只注重11点要求。甘地反驳说，独立不是英国人撤走这个形式，而应该是像11点建议这样具体、实在，而又能有益于百姓。

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了他对即将开展的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想：一旦他被捕，不要像1922年那样只作静静的消极的抵抗，而当发动最积极的非暴力斗争，以便每一个信奉非暴力的人都能尽其最大努力和意愿进行斗争；这次运动一开始只由真理学院的师生以及那些能够恪守行动纪律的人参加。有了好的开始，全国可群起响应；必须尽最大可能阻止暴力的发生，但非暴力运动一旦发动，只要有1个人活着，就不应停止。在同一期《青年印度》上，甘地还公布了国大党义务工作队员应遵循的准则，即“不得怀恨，但要忍耐对方的愤怒，不可杀人而且不可报复；对无理的命令不可因畏惧而服从。不可伤害或诅咒他人，但要保护对方使其不受伤害，甚至甘冒生命危险；不得拒捕或被没收私人财产，但受托管的基金则万万不可交出，即使因此而丧生；一旦被捕入狱应严守狱中规矩；在团体行动中，必须接受上级命令，万一有严重分歧时，则不妨辞职；作为一个义勇工作队员，别希望组织会照顾其眷属。”

此时甘地已成竹在胸。这一次的不合作运动，他决定拿食盐专营法作文章。在多年的节欲生活中，甘地早已不用食盐，但在气候炎热的印度，盐是每个居民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大海赐与人们取之不尽的食盐，然而英国政府却实行食盐专营，借提高盐价和赋税搜刮民财，使千百万印度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甘地认为：“食盐法是最不人道，非人所能忍受的。”所以，破坏这一苛刻的法律必具重要意义，并一定能起到轰动效应。他准备亲自率领一批非暴力信徒从真理学院徒步前往200英里开外的丹地海滩去淘捞海盐，制造贩卖，搬运私盐，以示抵抗决心。同时在沿途进行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声势，引导运动发展。

3月2日，甘地托人给总督送去一封信，陈述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给印度造成的灾难及英国顽固不肯改变政策，促使人民群起而要求独立的客观现实，并表明了自己的非暴力立场和行动计划与要求，希望总督提出解决办法。总督的答复简洁明了：“你的行动必然导致暴力破坏法律，恕不考虑。”

这一结局不出甘地所料，甘地深知，“英国乃是一个从不轻易给与，也很不容易悔悟的国家。条约毫无意义，它所知道的只有实力。”甘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深刻用意可能就在于让英国政府公开向世人诏示这一点，使其民心丧尽，让所有印度人清楚这一点，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反英斗争。

为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甘地作了精心部署。甘地打算从真理学院那些训练有素的学员中挑选敢死队，他认为：“如果真理学院办不到这一点，那么15年以来的心血就算白费。”甘地也曾考虑过挑选女志愿队员，但他随后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对方的做法，这一次我们要受苦受难的，甚至准备接受严刑拷打。假如先头部队中安插女性队员，则政府可能不敢使用原定施展的苦刑。最后经过精心筛选，甘地挑选了78名真理学院中严守纪律，确信非暴力真理，言行相符且绝对遵守院规的学员。这些人祖籍为印度各省区，年龄16—61岁不等，其中穆斯林2人，基督教徒1人，“贱民”2人，其余均为印度教徒。

除极少数妇女儿童作留守人员外，整个真理学院全体动员，准备长征。古吉拉特学院也暂时停课，除16岁以下学生外，其余师生员工准备沿途交替为长征队服务，还临时办了一次两星期的讲习，其中选了20个学生作长征队前锋，提前出发去动员组织沿途居民，当有长征队员被捕，后备人员就替补进去。

3月6日，甘地派出一员虎将帕泰尔动身前往波沙德，准备先行组织民众，以战斗的阵式接应甘地的队伍。但政府很快便将帕泰尔逮捕。

9日，75000名群众聚集在真理学院门前，庄严宣誓：“坚决向着独立的目标前进，不得自由誓不罢休！”“坚决信守真理与非暴力。”10日，甘地对集会群众宣讲了长征的日期，并向群众阐述了采用非暴力方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告诉人们，历史经验证明，没有哪个国家——无论英国、美国或苏联——会容忍暴力抵抗，但是印度采用的非暴力斗争却使政府无计可施。“只要有了自愿入狱的准备，面对刺刀与炸弹也会无所畏惧，政府便无可奈何。”“假如印度70·万个乡村，每一村庄只要有10人自己动手制盐，破坏食盐法，哪怕是最暴虐的魔王，我看他也不能拿大炮来轰击这些徒手的和平民众。假如你们只要少少自制一点食盐。我看政府立刻便会瘫痪。”

甘地每天不厌其烦地给群众灌输这一思想，回答问题，并在早祷和晚祷中发表演讲，鼓舞士气。他要求大家能够前仆后继，破釜沉舟，并坚守非暴力原则。他还特别鼓励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参加斗争。

1930年3月12日清晨6点30分，甘地带领他的78名信徒，离开真理学院，开始向大海进军。群众前呼后拥，各国新闻记者穷追不舍，跟踪采访这支奇异壮观的游行队伍。沿途村庄的人们手捧鲜花，潮水般涌到甘地一行即将通过的路旁。道路被清扫干净，路面撒上了花瓣，而后人们跪立道路两旁，虔诚地等候圣雄从身边走过。甘地手拄拐杖，背部微驼，但却步伐坚定，精力过人。在古吉拉特热浪滚滚的路上，他们日行10公里以上，风餐露宿。甘地沿途不断发表演讲，号召人民停止对政府效忠，不服从食盐专营法。他还照常祈祷、纺纱、写日记，为《青年印度》撰文写稿，向各地发布指示，指导工作。全印各地都关注着甘地的长征，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在头版通栏刊登甘地的照片，各国电影院纷纷上映有关他的活动的新闻纪录片。

1930年4月5日傍晚6点，甘地一行经过24天的长途跋涉，走过了将近241英里的漫长道路，终于抵达离丹地城不远的印度洋海滨。经过一夜祈祷之后，4月6日开始破坏食盐法。这天凌晨，甘地在早祷时向他的信徒们宣布，如果他被捕，就以泰伯喆为领导人，之后依次由奈都夫人补上。随后，他们跳入大海举行宗教洗礼。在万民注目之下，甘地俯身在海滩上淘捞一把海盐，然后将大海恩赐、而殖民当局禁止人民自由享用的白色盐末洒向人群，并当场发表演讲：“就技术或仪式的意义而言，现在已经破坏了食盐法，任何人都可以破坏食盐法。只要不怕坐牢，人人都可以自制食盐。国大党的各地同志，都当告诉周围的人也都这么干，当然也要让他们知道，这是犯法的。”

甘地在丹地破坏食盐法，是全国人民等待已久的战斗号令，整个印度半岛沸腾起来。在大陆沿海各地，甘地的支持者们淘制海盐，分发给群众，全国各地到处是告诉人们如何提炼海盐的传单和小册子，私盐在各地公开销售，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国大党趁此东风，号召所有各大城市和乡村在4月中旬举行一天罢工和群众性反政府示威游行，庆祝不合作运动开始。4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地方委员会发出指示，要他们普遍组织纠查队，不让人走进酒铺和出售英国货的商店及开展其他形式的不合作运动。

各阶层踊跃响应，集会、罢工风起云涌。甘地夫人身先士卒，带着真理学院女性学员出门查酒。帕泰尔辞去议长职务，并写信给总督，“10万人准

备牺牲，100万人准备入狱”。

国大党基层组织常常直接组织抗议性示威。作家、诗人、新闻记者、教师、大学生在举行公民不服从运动时，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工作。他们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印行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和反英小册子以及传单到处流行，宣传队深入各地，直到田间地头，鼓舞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人民不仅充分动员起来了，而且充分觉醒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革命洪流，英国殖民当局报以残酷镇压。4月16日，尼赫鲁被捕，被判6个月徒刑，老尼赫鲁代理国大党主席。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都发生枪击群众事件，集会游行也被禁止。运动的参加者一般遵照甘地的号召，通常不积极抵抗警察，而自然走进监狱。但是，警察蓄意挑衅，百般侮辱，甚至连甘地最忠实的信徒也忍无可忍。和平示威也往往演变成与警察的冲突，甚至武装暴动。如4月18日，群众袭击了吉大港警察署，23日发生了白沙瓦起义，印籍士兵拒绝向群众开枪，甚至把武器交给群众。虽然起义者最后都惨遭镇压，但群众运动仍轰轰烈烈。

对于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府的镇压行为，甘地一并斥责。他呼吁“迷信暴力的人们，不要妨碍我们非暴力运动的自由”。

这一时期，总督还接连颁布了各式各样的禁令。禁令也只能更加扩大非暴力抵抗的范围，因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专做政府所禁止做的事情。政府每颁布一个新法令，国大党就会通过一个新的决议案，告诉人们如何去对付这个法令。政府逮捕了许多国大党的委员，但新委员又替代他的工作，工作委员会照常运转。全国一律执行来自国大党的指示。

5月1日，甘地就暴政问题写道：“死算不了什么，人民的义务很明白，他们必须用最大的受苦，来对抗有组织的迫害。”他自己则通知总督：“假如不废止盐税和撤回对人民制盐的禁令，他将前往达沙拉盐场领导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食盐法运动。”

总督的“答复”很快来了。5月4日午夜时分，一位区长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官和30名武装警察偷偷摸进了距丹地城3英里的甘地住处，以1827年的防叛乱法所定的叛乱罪将甘地逮捕，押往耶拉伏达监狱。

甘地被捕，全印震怒，人民报之以更大规模的斗争。全国布商决定抵制英国布，一次10万人的游行使警察束手无策，孟买5万工人罢工，甘地囚居的浦那地区，社会名流相继辞去名誉职位。而警方则疯狂报复，在加尔各答，警察对群众开枪，并大肆搜捕。甘地被捕当天，军队包围了白沙瓦，国大党支部领袖均遭逮捕。军队、飞机、坦克在西北边省大肆调动，开火。6日，有500吨炸弹倾泄到帕萨族入居住地。可是枪林弹雨却压不垮向上的民心。似乎一夜之间，红衫党由800人发展到8万人。旁遮普的高压，压出一个激进的阿亥拉党。

甘地被捕了，但后继有人。甘地之后，泰伯咕又在卡底准备食盐长征。5月12日，他们上路不久便遭逮捕。21日，泰伯咕的继任人奈都夫人又率2000名志愿队员，整装上路。甘地的儿子曼尼拉尔·甘地一马当先，前往距孟买150英里的达沙拉盐场抢盐。

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

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

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呻吟。

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躺下，没有一人还手。也许警察对这些毫不还手的非暴力抵抗者打得手软，他们改用脚踢，用手拖，将他们拖到水沟处抛下，再补上几棍。暴行持续了很长时间，被暴打的队员一批又一批躺下，直到所有志愿者被打倒，领导人奈都夫人、曼尼拉尔·甘地被捕。时近中午，已有320人受伤，2人死亡。当时在场的美国记者密勒说：“在过去18年中，我到过20个国家采访，我目击过无数的暴动、巷战与暴乱，但从没有看到过像达沙拉这次的恐怖与残忍。”他写下了这一罕见的暴行过程并躲过英国政府的截留，由美联社发出，在美国1350家报纸上披露，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震惊。

抢盐行动仍在继续，镇压亦在加强。5月18日，470名志愿队员，出发往孟买城边的瓦达拉盐场，中途即遭被捕。其中10人偷偷前往，也遭逮捕。3天以后，第二次进攻，250人被捕，多人受伤。25日，第三次进攻，100名志愿队员和2000名助威者决心攻夺盐仓，军警开枪阻击。6月1日清晨，1500名志愿队员和旁观者大举进攻，群众突破了警察的防守圈，进到盐仓，抢走了一部分盐，政府立即调集骑兵来驱打群众。同样的行动在卡拉塔尔与沙利卡塔也展开了。

此时的国大党也不退缩。6月5日，国大党阿拉哈巴德会议制定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方案，包括完全抵制洋布，发动不纳税运动，每周破坏食盐法，抵制英国的银行、保险、航运和其他业务，同时继续查酒。工作委员会还呼吁印籍军警要像印度其他同胞一样，为了争取印度的自由而共同奋斗。

6月5日被定为甘地日。这一天孟买举行了盛大游行，65000名工人自动停工参加游行，有妇女、帕西族、锡克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游行的队伍长达1英里。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髦，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抵制英国货的斗争也全面展开。

政府已丧心病狂。6月30日，国大党代理主席老尼赫鲁被捕，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千人。为让出监狱关押政治犯，政府大量释放刑事犯，但监狱依然人满为患。至7月间，有67家报社、55家印刷所被查封。白色恐怖之下，《青年印度》只得游动出版。

6月间，英国政府的西蒙委员会的报告书出笼。其建议甚至没有超过总督早已发表过的那一套空洞的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的说法，他们主张酌情开放省的自治权，但必须强化中央的统治，主张采取保留选举制，并扩大中央对土邦的管辖权，尤其是对军队方面的所谓改革，他们认为印度的国防力量不可能不保留相当数量的英国军队，而由总督以总司令的身份直接统率。

上述报告使对英帝国仍抱幻想的一些政党、人士大失所望，连自由主义分子玛拉维亚等人也转而与国大党合作，这种变化使英殖民政府很感意外。眼见民心丧失，7月9日，总督表示准备召开圆桌会议，并且保证自治领地位仍是追求的目标。没有变更。1星期后，立法会议中的民族党、独立党及少数王公们共约40人开会，决议授权贾雅卡促成国大党与政府间的协商。总督也同意贾雅卡及沙甫诺前往狱中会晤甘地及尼赫鲁父子，以便使之回到谈判桌上。

7月23日及24日，贾雅卡前往那拉伏达监狱与甘地长谈。之后，甘地给尼赫鲁父子一封长信，表明了他的态度：可以接受和谈，但条件是必须释放政治犯。当然，他表示自己没有发言权，尼赫鲁的意见才具有决定作用。

27日，斯康比卒等前往内尼监狱与尼赫鲁父子进行了2天长谈。尼赫鲁父子拒绝在未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商前，特别是在未征得甘地同意以前发表任何意见。他们也给甘地写了封信。

8月1日，甘地向贾雅卡提出了他的修正意见，即假如不给予印度在适当时机脱离英帝国的权利，或印度不能自行处理关于前述11项要求的问题，则任何宪治都是不能接受的。

10日，政府只得把尼赫鲁父子送到耶拉伏达监狱，以便他们能和甘地一起代表国大党与政府特使谈判。但直到13日上午，沙甫诺爵士和贾雅卡来后，尼赫鲁父子才得以与甘地及同囚于此的奈都夫人会面，并一同与政府代表谈判。谈判持续了3天，甘地、尼赫鲁等共同签署了一份公开信，提出了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低条件，即：承认印度有自由脱离英国的权利；同意印度建立对人民负责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印度有权在必要时把国民政府认为不合理或不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英国人的要求、特权等提交独立的法院处理等。

总督断然拒绝甘地、尼赫鲁父子等提出的条件，同时加紧镇压。主要的国大党领袖都被投入监狱，国大党的活动也被迫转入地下。

但白色恐怖之下的运动并未停止发展。文件仍秘密印行，标语一夜之间又满街都是，群众集会有时突然一轰而起，靠刺刀维持的政府威信扫地，除少数效忠和归顺者外，人民多以沉默和冷脸与政府对抗。在各大城市中产阶级的罢工业已困难重重之时，农民的抗税运动又异军突起，给这一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往往运动从一地转到另一处，此伏彼起，令政府焦头烂额。

高压政策显然也难以奏效。欧文总督不得不承认：“不管我们如何谴责不合作运动，但假如我们低估了今天印度的民族意识，我们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错误。一味采用高压，不可能从根本上和永久地解决问题。”

英国政府决定不管国大党态度如何，将召开圆桌会议。第一次圆桌会议于1930年11月12日—1931年1月19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由英王亲自主持，名义上有英国3个政党和除国大党外的印度各团体代表参加。会议原则上同意建立有各土邦参加的全印联邦，由印度人负责执政，但防务、对外关系与财政仍由英国人控制。当然，圆桌会议的意见仅供政府参考，没有多大发言权，而且它始终受到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派势力的顽固抵制。

为缓和矛盾，1月25日，欧文总督下令释放甘地以及国大党所有中常委，并撤消对国大党集会的禁令。

1月26日，印度独立节。甘地及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于这一天获释，给全国人民的庆祝节日以巨大鼓舞。这一天，全国各地举行庆祝集会，重温独立宣言。甘地参加了孟买的纪念会，在这里，甘地向新闻界发表个人立场：“我个人认为，仅仅释放中常委，无补于现状。政府当局显然尚未觉察此一运动已遍及所有群众，故其领袖们虽拥有声望，却决不能随意篡改行动的方向。”

随后，甘地赶往阿拉哈巴德，探望病笃的老尼赫鲁。国大党中常委也陆续赶到那里，向这位为印度民族振兴事业已心力交瘁的伟人致敬。

1931年2月6日，老尼赫鲁逝世。在他弥留之际，甘地一直守候在身边，

葬礼及善后事宜也由甘地一手操办。甘地虽然和尼赫鲁父子观点常有分歧，但他与尼赫鲁家却有深厚的友情，他对老尼赫鲁这位不屈不挠的斗士极为尊敬。葬礼之后，甘地对报界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

就在老尼赫鲁逝世的当日，一大批自由主义分子随着其他出席圆桌会议的代表在孟买抵岸。他们立即发表声明，称印度获得自治领地位已有保障。2月8日到14日，这批人的代表沙甫诺前来阿拉哈巴德与甘地会商，但甘地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建议甘地直接去与欧文总督谈判。

甘地一向愿意主动地和他的对手见面讨论任何问题，他具有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不仅能从理智上说服对方，而且能找到引起别人善意和高尚情感的途径。

甘地很快给总督拍去长电，提议和谈，总督同意。16日，甘地便动身前往德里。几天后，国大党中常委也跟到德里。17日，甘地与总督开始正式谈判，国大党的和平条款是大赦，立即停止迫害，发还被没收的财产，撤销基于政治立场给予公务员的惩罚。准许自制食盐，禁酒与洋布，调查警察暴行等。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虽尊重和信任甘地，但对条件一点也不肯放松。政府方面的态度也很坚决，其强大压力主要来自丘吉尔为代表的强硬派。丘吉尔认为丧失印度，将是对英国的致命打击，将使之从此堕落为小国。他对甘地极力鄙薄，在一次演讲中出语惊人，他说：“瞧那位伦敦大学法学院出身的长于煽动的律师，现在却装成东方人常见的苦行僧模样，半裸着身子，居然大踏步地走进副王府，在那儿一边与我们的皇帝的代表呷茶交涉，一边还在继续煽动非暴力抵抗。”

和谈就在双方紧张的对峙中艰难进行，整个谈判时断时续，常常因微小的细节乃至措辞问题陷入僵局。如关于非暴力抵抗“中止”一词，甘地一贯表示，非暴力抵抗不能完全停止或放弃，因为它是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然而它可以暂停。欧文总督反对，要求使用含有终结意义的字眼，甘地不同意，经过艰难的磋商，最后决定采用“停止进行”。每遇问题卡壳或取得一些进展，总督与甘地都要停下来去征询各自代表的机构的意见。直到月底，双方谈判仍举步艰难。

为打破僵局，沙斯迭里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只要大原则确定，不必太拘泥于细节。最后，工作委员会接受此建议，对条件作了若干修改。同时，沙甫诺与贾雅卡也劝总督不能断然拒绝国大党所要求的调查警察失职事件，总督也表示认可。双方作了让步后，谈判才有所进展。

直到3月5日下午，甘地和欧文才在总督府签署了和谈协议。这次持续3个星期，经过8个回合，共用去24小时的谈判总算有了结果。甘地和欧文经过这场漫长而令人疲劳的谈判后，都似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欧文提议以茶代酒，举杯庆贺，甘地赞成，但他自己的杯里只要了一点柠檬水、一点盐。他们在一起轻松地谈论着丘吉尔那些讽刺甘地的话题。末了，甘地起身告辞，却忘了土布披巾。欧文为他拾起来，说道：“甘地先生，您知道，您身上本来就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乐意，当然也可以连这条披巾也留下来。”

甘地—欧文协议的内容是：民事反抗停止进行，今后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社会活动。英印政府答应释放未使用暴力的政治犯。政府拒绝修改食盐法，但准许人民自采自制并在居住范围内使用。此外，还有包括撤销若

干法令与特别限制，合法处置国大党活动程序，罚金的安排，财产的没收，辞职与解职人员的复职以及撤除军警监视等许多细目。

在德里那段难捱的日子里，甘地经常和他嘱意而又常常与他意见相左的国大党年轻领导人尼赫鲁交流思想。他们在一起散步并谈论一些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话题。甘地常对尼赫鲁说：“独立以后，如果国大党想继续存在，就必须通过一项自我约束。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否则就劝其退党，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其纯洁性。”他这时也很爱谈民主，但他的民主与众不同。“我认为假如一个人能够同人类最贫苦的人们融为一体，渴望自己不比他们生活得更好，并且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达到这种水平的时候，便有资格自称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腐败和虚伪不应该再像今天那样不容质疑地成为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不应该将大多数作为衡量民主政治的真正标准。如果少数人能代表他们想要代表的那部分人的精神、希望和志愿的话，那么这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并不矛盾。我认为不能使用强迫的方式去开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精神，不能从外界强加给人们，而必须来自内部。”

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对甘地—欧文协定极为不满，但经过痛苦抉择，还是予以通过，并责令各级党部开始执行。至于最终能不能为全体国大党人接受，尚待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决定。

而政府方面却根本无意履行协议。根据协定，非暴力政治犯必须释放，但一些地方政府态度消极，以致释放过程拖得很长。除这些政治犯之外，还有成千上万政治犯被关在牢中，这些人有的被判暴力罪，有的根本未经控告、审讯、判罪就被囚禁，而且一关就是好多年。甘地在会谈过程中，多次吁请政府也考虑释放这些政治犯，以缓和政治紧张局势，但政府不予理睬，特别在对印度爱国志士巴格特·辛格等3位政治犯的处置问题上，政府根本不顾甘地再三要求减免其死刑的请求，于3月23日晚，将3人执行绞刑。这一事件引起公愤，24日，拉合尔举行群众集会，与警察冲突，死141人，伤586人，另有341人被捕。而在孟加拉、联合省及西北边省，不仅旧的政治犯未予释放，新的逮捕仍在以各种名义进行，警察和当局往往利用对待恐怖分子的特别法律和法令，来对待国大党员、工人、农民以及当局对其行为不满的其他人士。在联合省的农村，形势日益恶化，甘地—欧文协议将这一难题交给省政府解决，但省政府对此问题敷衍塞责，拖延减租减税决定，还开始强迫征收，造成大规模驱赶农民和扣押财产的状态。

这一切表明，德里协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暂停不合作运动的目的远未达到，但甘地本人却信守不渝。他认为假如国大党能坚守诺言，则其声望必会大增，同时可以使政府相信他们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亦如他们在不合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一样。

为了说服满怀疑虑的国大党领导和群众，甘地利用各种场合解释他自己对协议的看法和理解，并规劝人们履行协议。3月6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人们对“协议是否与拉合尔大会关于独立决议相悖”的疑问时说，“我不以为我违约背信，没有人阻止未来的卡拉奇会议中重申拉合尔大会决议的原则。同时未来的圆桌会议中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我在拉合尔大会当初提出争取完全独立的提案时，我就已经讲得很清楚，独立并非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假如我们是在从事一场暴力的战争，其结果当然是一胜一负或两败俱伤。但我们所从事的是寻求协议的非暴力的战争，我们确定了，而且

也发动了。我对欧文总督所写的信，所包含的整个就是这个精神。现在的临时协议，正是我们争取我们所要求的一个开端。作为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我有义务寻找这样的开端。”此外他还先后赴德里、孟买各地旅行演讲，反复说明除了使用非暴力抵抗、争取自治外，也应试一试经过谈判并履行协定以求自治。他还在《青年印度》上不断著文解释纪律和服从纪律的重要性。

甘地因此而遭致许多群众乃至他的追随者的不满。有群众示威游行，并当面指责他的协议是卑鄙的，出卖工人利益的。还有人举黑旗喊“打倒甘地”，骂他是“独裁者”。但他的威望，他的善于变通与极强的宣传说服力，往往多次使他摆脱困境，化险为夷，这一次也不例外。许多国大党领袖人物尽管心有未甘，但对甘地还是不能不服，再说，在英国政府严酷的镇压下，运动事实上已锐气大挫，而和谈又转移了人民斗争的视线，已很难立刻重振；尼赫鲁和他的同事们一样，不希望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继续在监狱里备受煎熬与折磨，不希望在持续3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得到一个谈判破裂的结果，而让人民失望，他们更不想让他们的领袖为之呕心沥血换来的一点“成果”化为乌有。

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1931年3月29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卡拉奇召开大会，会议审阅并批准了甘地—欧文协议；同时也郑重宣布国大党所奋斗的完全自治目标并未改变；如果可能，国大党也将出席任何会议与英国代表协商争取由印度控制自己的国防、外交、财政等权利，大会授权甘地为出席圆桌会议的首席代表。

卡拉奇会议后，国大党基层组织以惊人的纪律接受了这一新指示，停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则积极准备与英国在伦敦圆桌会议上再度谈判。但甘地认为，他的伦敦之行取决于两点：即休战协议的顺利执行与教派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甘地通往伦敦的道路充满重重障碍。

维持教派分歧是英国实行分而治之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拟议召开的圆桌会议中，它同样被英国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圆桌会议的代表几乎全部由政府指派，政府遴选他们主要是为了强调教派的和局部的利益，着重于这些分歧而不是共同利益。政府甚至公然挑衅似地拒绝指派任何民族主义的穆斯林领袖。甘地认为如果英国一开始就在教派问题上纠缠不清，那么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将不会得到适当考虑。因此他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指出：只有在有关各方之间事先对教派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他才能去伦敦。

为促进教派团结，甘地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从阿赫米达巴德再到孟买，忙个不停，但所有这些努力，不过是甘地的一厢情愿，教派之争愈演愈烈。

政府方面对协议的态度也令甘地头痛。4月18日，甘地曾与即将离任的欧文总督交涉，希望其能履行诺言，对欠税的农民宽大为怀。5月中旬，他又造访新任总督威灵顿勋爵，向他报告各地政府不履行协议的严重情形，但新任总督看起来比前任似乎更为冷酷而顽固。

鉴于国内形势，6月9日，甘地向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提议在上述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不愿赴伦敦。提议遭到否决。

7月中旬，印度人民与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更趋紧张。7月底，孟买省代理省督遇刺，险些丧命，刺客为一学生。5天以后，亚里坡地方法院院长又被刺身亡，英国舆论认为是国大党所主使的，英国人纷纷集会，请求政府采取行动。甘地指出政府绝不可再滥施高压，如果没有决心和勇气来应付，不妨让国民自决。同时，甘地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也谴责暗杀行为。

8月8日，甘地再次就伦敦之行发表意见：“如果缺乏必要的气氛，此行毫无意义。如果印度教徒、穆斯林与锡克教徒不能和睦相处，我便不能前往伦敦；如果像现在这样，依协定本该释放的人还关在狱中，新的拘捕还在进行，农民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我就不能赴伦敦。”谈及这些问题，甘地忧伤无比，几次泣不成声。

14日，沙甫诺与贾雅卡等人已与甘地辞行，前往伦敦。玛拉维亚、奈都夫人和帕塔里则退掉船票，留下来等甘地。随着会期逼近，甘地与政府之间加紧争议，但双方均未真正关闭谈判大门。甘地发表声明，一旦问题得到解决，他当即赴往伦敦。同日，甘地致书威灵顿总督，想弄清楚国大党如不出席圆桌会议，临时协定是否继续有效，并表明不管政府怎样破坏协定，国大党均将信守不渝。总督立即答复甘地，指责国大党不守信用，但表示政府仍准备采取和缓措施，一切视国大党态度而定。

随后甘地又给总督去电，要求会晤，总督应允。8月25日，甘地、帕迭尔、尼赫鲁、迦法罕等前往西姆拉与总督会晤，28日谈判结果公布，称第二次协定。协定规定甘地应出席圆桌会议，政府立即调查巴多里事件，其他类似事件，则由正常方式提出。国大党如认为政府故意采取高压手段，有权恢复不合作运动。这样，直到最后一刻，甘地才下决心从西姆拉搭乘特别专列赶上了29日开往伦敦的邮船，开始了他的伦敦之行。

1931年9月7日，第二次圆桌会议在伦敦召开。圆桌会议开幕那一天，正逢星期一，是甘地的静默日。甘地初立誓言时就曾自订守则，如遇本人或旁人紧急危难必须讲话时或应总督与高级官员的约见而不能保持缄默时，虽在静默日，还是可以讲话。因此，这一天甘地还是代表国大党发了言。他表明自己是抱着合作的态度与谋取协议的精神而前来伦敦的，他希望会议闭幕时，能带着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离开英国。

可是他很快发现，会议的气氛与他的期望相去太远。英国的政策是拖延对基本问题的考虑，而把时间或多或少地消耗在次要和无关主旨的问题上。会议中大多数印度成员对英方的政策亦步亦趋，说得确切些，这些人代表着印度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并且希望从英国那里得到发展和保护。至于那些来自教派问题上的各种“少数”和“多数”集团，更是以彼此之间不能取得一致而闻名。英国政府正是看中这一点而把他们请到圆桌会议上来的。

在这样一个集会上，甘地企图接触民族的自治与发展问题，显得可怜而又可笑。甘地的不修边幅与这富丽堂皇的会议大厦和衣冠楚楚的与会代表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很多时候，甘地往往孤零零地坐着，一言不发，只是他仍以惊人的耐心坚持他的努力。在少数委员会中，他以整整一周的时间忙于召集并主持多次非正式会议，试图解决教派问题，但宣告失败。随后他建议，在事先不达成教派协议的情况下，完成制宪工作。这一建议也遭到少数党的拒绝。甘地则拒绝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并反对延期建立中央与各省的责任政府。他所主张的印度自治就是要由印度人独立地管理印度的财政、国防和外交。

这一切注定了甘地的这次伦敦之行必以无结果告终。11月28日，新任首相麦克唐纳在他亲自主持圆桌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拟议中的印度政府乃是联邦制，议会享有部分权利，若干权利仍由殖民政府把持，以及未来在印度的选举中将采取依宗教划分的保留制等。这一切令甘地

无比义愤，他即席发言，毫无掩饰地表明了他的观点：“我想印度大陆争取自由的伟业，也不是唇齿之争可以解决的。但只要野草之中尚有一寸土，我还是要来解释国大党的立场。假如大家真能了解印度是无论如何也要获得自由的，我想你们便会发现我常常有着可以协商的余地。你可以手拈一朵玫瑰，随意欣赏，可是一定要真是真玫瑰，而不是纸花。我所争的不是赶尽杀绝任何人……而是要使我的国家能由奴隶的地位得到自由。”

12月1日，第二次圆桌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实际上未达成任何协议。圆桌会议进行期间，英王曾召见圆桌会议代表。事先有人提出：甘地这种苦行僧的装束入宫觐见，不合定规。甘地表示如果要他换装，他宁可不见英王。结果甘地还是腰缠一块土布，身披一块土布，衣不蔽体地走进了白金汉宫，引起舆论哗然。当甘地被问及穿这身衣服是否合适时，他诡谲地答道：“国王陛下有足够的衣服供我们两人享用。”

虽然谈判失败，但借这次欧洲之行，甘地却给欧洲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奇异的装束、独特的饮食习惯，令人难忘。他拒绝到豪华宾馆下榻，情愿到伦敦东区贫民窟投宿，他会见矿工、孩子，还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萧伯纳、路易·乔治、拉斯基教授、林赛博士、欧文爵士、查理·卓别林等广泛接触，均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甘地旅欧期间，正值英国经济危机积重难返、失业剧增、世风日下之时。对英国人来说，甘地既富魅力，同时又令人不安。在人们怀疑与困惑、甚至怨艾的氛围中，他向世人宣传他的令人迷惑的主张：“因为我们为争取自由，选择了独一无二的途径……整个世界厌恶地看到鲜血流淌，它为此正在寻找出路。我可以自信地说，唯有印度这块古老的土地，可以为渴望和平的世人指引一条道路。”欧洲人虽然对他的学说付之一笑，然而甘地动身返回之时，数千名法国人、瑞士人、意大利人聚集在通往布林迪西港口的铁路沿线两侧，渴望一睹站在三等车厢玻璃窗下的瘦弱身影。

在巴黎，欢迎的人群把整个巴黎北部挤得水泄不通。甘地不得不站在行李车上向前来欢迎他的人发表讲话。在瑞士，他受到挚友、作家罗曼·罗兰的款待。在罗马，他警告法西斯主义将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旅欧期间，甘地对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危机发表了看法。当时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认为危机是暂时现象，甘地曾就此问题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不相信这套理论。福特的看法，含有幻想。假如不注意平均分配的问题，大量生产的结果将是世界的悲剧。如果每一国家都大量生产，市场便发生问题。眼前机器也许可以供给人们的需要，但毕竟集中在少数地区，势必要设法注意分配问题。除非能使落后的地区都能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否则便难免不发生极大麻烦。”谈到印度的未来生产计划，他肯定印度今后也是要大量生产的。但不是以暴力为基础，也不是由少数工人操作复杂机器来进行，而是在每一个劳动者家里进行，使用的机器也是最简单的机器。他否认他从根本上痛恨机器，他反对的只是集中生产的大机器，凡是不能为大众共享的东西，他都反对，尤其厌恶特权与垄断。1931年12月18日，甘地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印度。更让他失望的是，他发现在他出国期间，政府不仅未遵守他与总督的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活动，一切和平已成泡影。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

然而为时已晚。由于对政府的妥协转移了群众斗争的视线，在印度造成

了失望、消沉与屈辱感，主动权已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大大便利了它对运动的扼杀。1月4日，甘地和当时的国大党主席被关进监狱，大规模的搜捕在全国展开，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随之一切和它联盟或同情它的、或进步的组织，如农民协会、青年团、学生联谊会等数千个社团组织统统被宣布为非法。新闻、报纸、通讯受检查，言论自由被取消，房产、财物等均遭没收。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对国大党和进步力量磨刀霍霍的同时，英国也在形式上准备扩大地方自治的基础，给一些效忠政府的势力施以小惠。“分而治之”的一贯政策得以贯彻，依照麦克唐纳的“宪治方案”，少数派将实现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

轰轰烈烈的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又进入低潮。

## 七、自愿的“贱民”与隐居乡野

运动已进入低潮，甘地身陷囹圄，深感暂无回天之力。为避开政府锋芒，维系民心士气，甘地再次决定将注意力从直接的政治斗争转向建设性工作。

解救“贱民”是甘地建设性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不可接触制乃是印度教社会的一大痼疾，是英国赖以维护其分而治之统治的基础，因此甘地决定从狱中发起一场消除不可接触制、解救“贱民”的社会宗教革新运动，他称之为“哈里真”运动。

当时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依照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贱民”将以少数民族的地位参加保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开始斗争。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首相撤销“贱民”阶级分区选举的规定，否则他将绝食至死。

当日，甘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表明了心迹。他说：“我虽不是‘贱民’出身，却一向自认为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前10名，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是要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可怜大众。我想要提高他们，不在于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是我最反对的……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决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甘地要求“贱民”与非“贱民”的领袖立即签字，在一种真实的兄弟情谊之下合作。

甘地的绝食斗争，在印度社会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印度教领袖呼吁甘地不要绝食，但同时保证支持他。泰戈尔的来信对甘地是雪中送炭，诗人表示：“为印度的团结，社会的正义，即使牺牲宝贵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们忧伤的心，带着我们的敬爱与你崇高的自苦同在。”社会各界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的呼声很高。迫于压力，有关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将留给“贱民”阶级的席位增加一倍，而且全印宗教领袖达成了一项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贱民”阶级。任何过去被视为“贱民”阶级的人，今后均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般的平等权利，包括使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及准许其入庙朝拜等。初战告捷，9月26日，甘地停止绝食。

当然，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决非易事。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依然视不可接触制是印度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维护旧俗。1932年底，甘地得知契拉诺邦一所印度教庙宇不准“贱民”入庙礼拜，十分恼火，他指名要那些人纠正错误，并声称如不纠正错误，他将在狱中再度绝食。那些印度教徒则指责甘地离经叛道，动辄以绝食相逼乃是一种讹诈。甘地便与之展开论战，他发挥自己对宗教经典熟谙的优势，旁征博引，去劣取优，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明所谓“贱民”与生俱来便低人一等的说法，“不过是可怕的宗教偏见和陈规陋习”。他认为绝食乃是有宗教教养的人的最后武器，即“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他便只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一些顽固的印度教徒也如法炮制，拿绝食来对抗他，反对他绝食，甘地不为所动。他的态度是即使所有的人都拿绝食反对他，他也还要绝食。经过甘地一再呼吁，契拉诺邦印度教庙问题，经过公民投票，绝大多数居民还是赞成“贱民”入庙。

---

“哈里真”即“神之子民”的意思，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1933年1月4日是不合作运动纪念日，卜拉沙德曾策动各地群众集会，导致多人被捕，国大党领导人前往狱中征询甘地意见，是否发动不合作运动。甘地希望他们自作主张，自己将专心致力于拯救“贱民”的工作。此一时期，印度中央立法会议正在酝酿废止“贱民”阶级的法案，甘地呼吁所有印度教徒予以支持。

2月11日，甘地主办的《哈里真报》（周报）正式在浦那创刊。甘地为之撰写的发刊词，阐明该报的宗旨乃是致力于解救“贱民”，并呼吁社会各界鼎力相助，以拯救4000万“贱民”脱离奴隶枷锁。此后，《哈里真报》成为甘地领导“哈里真”运动的一块舆论阵地。

至于如何拯救“贱民”，甘地在4月15日的《哈里真报》上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我深信绝食的方法……不可接触制是一种大错，可能不须流血便可废除，但需有适当的工具。我想我能负起这个责任，如果我的牺牲被神选择。只有那些不断追求真理、爱慕真理且抛弃物欲的人，才能从事这样的绝食。如果没有准备，是决不可尝试的。”

29日，甘地又打算绝食。这天清晨早祷时，甘地写了张条子给随侍人员，说是深夜12点，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要他绝食。他虽本能抵抗，但始终违抗不过，所以他恭敬不如从命。30日，甘地向外界宣布了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的声明。他说，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只是反对自己，是一种清心的磨炼，是为了接近神，接近真理。

5月1日，甘地致信总督，表示他的绝食与政府无关，完全是基于良知的原因。

绝食预定在5月8日上午11点开始。政府担心甘地在狱中进行长时间绝食，会造成不利的后果，便于8日上午9点将甘地释放。甘地出狱后，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1个月，并要求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他则照常绝食了3星期。

待甘地体力逐渐恢复后，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会中接受甘地的意见，停止群众性的不合作运动，改由个别的不合作斗争，禁止一切地下活动。甘地的理由是，个别不合作斗争是独立作战，一个人倒下去，不影响他人，反之，群众性不合作运动则彼此影响。另一方面，前者由自己作主，后者则要依赖领袖。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有失败的可能，也可能被镇压，但个别抵抗则没有人制服得了。

会后，甘地致信总督要求会晤，遭到拒绝。英国国务大臣在下院发表演说，声明：除非国大党完全停止不合作运动，否则政府决不与甘地谈判。于是，国大党立即决定实施个人非暴力抵抗。

7月26日，甘地忍痛宣布解散他一手缔造并凝注了他18年心血与希望的真理学院，以便学员能分别参加个人不合作运动。随后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于7月31日率33名真理学院师生员工踏上征途，到农村去作长途宣传。

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生全体被捕。4日，甘地获释，但被要求不得离开浦那。甘地不从，又被抓起来，判刑1年。政府规定，甘地在狱中每天可以收阅报章杂志，但不得接见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每天不得接见2个以上的来访者。甘地要求能像过去在狱中那样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遭到拒绝。

8月16日，甘地宣布将在狱中绝食至死。2天后，政府发布公告，表示如果甘地不再从事非暴力抵抗和“哈里真”运动，政府将考虑释放他。甘地

不同意有条件释放，继续坚持绝食。1 星期后，甘地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被送至沙桑医院看管。由于政府始终不肯让步，甘地身心状况极坏，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消沉与萎靡，好像已失去活下去的兴趣，甚至把自己仅有的几件心爱之物也送给身边护士。眼看甘地已濒临死亡，8 月 23 日，政府慌忙宣布，无条件释放甘地。此后甘地恢复进食，才幸免一死。

甘地出狱后处境极为艰难，假如他继续从事个人的非暴力抵抗，必将再度入狱。而入狱后，必将因同样的“哈里真”问题而绝食，政府大概不会让步，那么甘地只有死路一条。一些国大党领导人认为，甘地当时实际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再“惹事生非”，而用全部精力去做“哈里真”工作，同时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见见面，必要时出出点子。第二个办法是在一段时间内完全退出国大党，让年轻人顶着干。

9 月 13 日，甘地正式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 1 年，直至下一年 8 月 3 日。在这段时间内，他将集中精力于解救“贱民”及其他建设性工作。

9 月 30 日，甘地开始作募集解救“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以便获得更多的捐献来支持此一全国性革新运动。

此次募捐旅行虽受到一些顽固印度教徒的抵制，但他得到的欢迎却盛况空前，也出现了许多群众慷慨解囊、感人至深的场面。整个旅行历时将近 1 年，共走过 12500 英里路程，募得基金 80 万卢比。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高潮过后，占优势的国大党右派领导人认为积极斗争和施加压力的阶段业已过去，现在必须来一个妥协的合作。所以从 1933 年末起，右派为参加本届立法会议的选举而恢复了自治党。在这个新议会派的影响下，国大党越来越右转。与此同时，以尼赫鲁为首的左派的信仰社会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他们主张不妥协地进行反帝斗争，哪怕是受到暂时的挫折也在所不惜。

甘地针对斗争高潮过后的低落情绪，提出了一个新的对策。1934 年 4 月 7 日，甘地在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中发表声明，推翻上一年 7 月发起的个别不合作运动主张，劝告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件工作。在他的有生之年，有谁想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须事先得到他的指示，经他认为此人在这方面确实超过他方可。他的理由是，为了今后能承担大任，一个非暴力者应当学习自制的艺术与自愿的贫穷。他们必须参加国家建设，诸如自纺自织、提倡土布、消除宗教壁垒、解救“贱民”、禁酒与自洁。这些都是保护穷人的工作，同时还必须服从当局的法律。

甘地的声明令尼赫鲁等左派非常失望。当时尚在狱中的尼赫鲁 8 月 13 日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了他的不满。“当我听到你停止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我已准备响应你的号召。不过你所提出的解释及对今后工作方向的指示，尤其令我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触，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它是我最珍贵的一种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甘地立即给尼赫鲁回信表示理解他的心情。但也表示他们在手段上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控制手段，便不难达到目的，否则就不会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他还解释说，他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时间因素，意思是说尼赫鲁的想法未免有点急躁冒进。

甘地发表声明后不久，便在澜溪召集国大党领袖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萧克·阿里、安沙里博士、卜纳沙德、奈都夫人、诺艾、戴赛等人。会上，甘地澄清了一种说法，即大家以为甘地是叫国大党停止所有不合作运动，其实这不是他真正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由他代表国大党来从事这项斗争。甘地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国大党停止抵抗，他本人只有退出国大党，但由于同志们的劝告，甘地答应等到 10 月份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会议时再决定。

其实导致甘地决定退出国大党的原因还很多。1934 年 9 月 10 日，甘地发表声明，阐述了他必须退出国大党的理由：“在我看来，许多党员和我本人对前途的看法有很大分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对我罕有的效忠，他们选择的方向必是与我分道扬镳。”声明中，甘地主要列举了这样一些原因：一是在纺纱与土布问题上的分野。甘地将纺纱与土布列为首要工作，而多数国大党员对此毫无信心。有些人虽纺纱，却并非出自信心而是对甘地个人的忠心。二是在议会代表团问题上，甘地主张在当时没有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情况下，在党内设立议会代表团，借以实行党的政策很有必要，而其他人则对此有尖锐的意见分歧。三是他与左派的关系将很难相处。他认为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富于勇气和牺牲精神，其主张却不合他的胃口，他不愿与之在党内处于实际对立地位。四是在非暴力问题上，甘地视之为信条，而其他人则不过是当作一种政策；在“贱民”问题上，甘地认为这是宗教与道德问题，而其他人则认为甘地大可不必停止不合作运动而致力于这一枝节问题。还有在土邦问题、个人非暴力抵抗等等问题上都有分歧。

最后，甘地提出了反映自己根本立场的几个提案交提案委员会审查。这些提案，一个是要求将党章第一条中“合法的”与“和平途径”改为“真理与非暴力途径”；二是将党员每月应缴纳党费 4 安那改为应缴双股纱 8000 英呎，其中 60 英呎必须自纺；三是任何人如不是继续在党部登记备案，履行义务达 6 个月，并经常着土布衣服者，均将丧失党内选举权。

甘地认为，国大党如果同意他为领导人，就必须通过这几项提案，没有丝毫妥协余地。他希望全党同志冷静考虑，自作抉择，切勿迁就他个人的意见而影响大家的判断。

大会于 1934 年 10 月 26 日在孟买举行，甘地所提各项修正案，多数被修正或予以保留，因此甘地决定退党。

28 日，甘地进入会场辞别，全场 8 万人一致肃立，向甘地致敬。大会当场通过决议：“本会一致信任敬爱的甘地领导，且曾殷切期望他能改变其退党决定。但全党的努力未改变圣雄的决心，本会迫不得已接受圣雄的退党要求，并对其所作的卓越贡献深致敬佩，且对其保证在必要时为党贡献卓见，尤感满意。”甘地最后致辞表示：今后他对国大党的兴趣将限于一相当距离内，注视其所坚守的原则。

甘地退出国大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参加立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恢复乡村工业是甘地土布运动计划的扩大，他认为土布运动业已取得可喜的成绩，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城市居民能够和乡村居民在精神上结合，而不是前者剥削后者，或者要乡村居民模仿城市生活。他因此进而提出由自纺自织发展到自制糙米和土面的乡村工业的想法。

1934 年 11 月 26 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著文，阐述他发展乡村工业

的一些基本思想。其中讲到了他为什么不按西方的方式去使用大机器而主张小规模乡村工业的道理。他指出：在人手不足的地方，使用机器当然是好事，但在印度这种劳动力过剩的国家，使用机器就是坏事。因为在这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替几亿人找空闲而是如何利用他们的空闲时间，因为他们平均有半年无事可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机器工人代替10个工人的工作，他就等于在农村赚了10个人的钱，造成了10个人失业。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即使他生产的東西再价廉物美，也比农民自己生产的東西要贵得多。对于一些人批评乡村工业是个体生产，不适用大规模的合作生产方式，他也提出反驳。他认为乡村生产固然限于狭小的村落，可是产品可以集中，利润可以分享。只要按照计划适当管理，只要有合作精神，分工协作也是可以进行的。但他认为土布仍是中心工作，不能因为推进其他的工业而放松了对土布的纺织。没有土布工业，其他便不能推进。

1934年12月14日，全印乡村工业协会正式成立，负责推广糙米与土面。该会为国大党外围组织，但甘地不主张其过问政治。

甘地默默致力于推进乡村工业建设引起了政府的猜疑，他们不知甘地又将在农村搞什么大动作，因而密令各地官员严密监视他的活动，以便采取防范措施。对此，甘地的态度是：“如果政府愿助我一臂之力，那是再好不过了。我所做的工作其实都是政府应当做的，随政府怎么做都可以，就是不要压迫老百姓。如果政府帮我，我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但必须是适当的协助。就我自己来说，我的一生是一张白纸，绝对没有任何秘密。我只选择旁人所不注意的工作去做，也决不干预旁人所已做的事。我推广糙米、土面，只不过要老百姓别忽视自己的健康。”

1935年正是印度国内政治活跃的一年，一般民众都热心政治活动，甘地却在这个时候远离政治斗争的前台，专心于他的乡村工业，许多人为此迷惑不解，甚至有人认为他这是逃避现实，表现灰心、失望。甘地在1935年12月28日的国大党50周年纪念日阐述了思想：“凡没有准备好从事小改革工作的人，决不能担负起伟大的改革事业。凡已好好运用其智能努力工作的人，必将发现他的才能是在不断增强。而且原以为是了不得的革新事业，其实不过是小事，只有这样安排我们的生活，才能自然。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一个人首先要忘记它，如果事事想到政治目标，便会产生不必要的困惑。何必为那些晦暗的问题伤脑筋，不到死，为什么死？”

1936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特点，国大党的许多党员越来越不满足国大党右派领袖们所提出的宪政形式，积极探寻新的反帝斗争的道路、方式与方法。他们聚集在尼赫鲁周围，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甘地退隐之时，尼赫鲁是这一时期引人注目的人物。

尼赫鲁是一位与甘地风格迥异的国大党领袖人物。他出自婆罗门世家，早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剑桥大学，对哲学、文学、法学颇有研究。他从英国回国后，即投身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在斗争中热烈追随甘地，且久经铁窗考验。然而他与甘地在这方面格格不入。尼赫鲁是个理性主义者，憎恨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认为这是印度落后停滞、四分五裂、深遭外国殖民者蹂躏的罪魁祸首，而甘地则对神有着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尼赫鲁性情暴躁，清高孤傲，甘地则谦逊柔和；尼赫鲁酷爱文学，崇尚科技，甘地则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类不幸的根源；尼赫鲁富于理性，认为目的模糊不清是可悲的事情，行动要能收效，必须导向明确，甘地往往凭本能（他本人称之为“内心的声

音”），善于体察群众的心理而相机行事，认为注意手段，目的自明。

在社会政治观上，两人也有很多不同。如 1922 年甘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尼赫鲁就极不赞成，认为它挫伤了士气，使大好革命形势丧失。1930 年德里协定及随后的圆桌会议，尼赫鲁认为它转移了人民对主要问题的关注，带来了失望与失败情绪。他认为甘地过分强调土布及解救“贱民”工作是轻重倒置，转移了人们对主要问题的关注。他也不同意甘地号召国大党停止不合作运动而由他一人代劳。尼赫鲁在提出摆脱现状的出路时，要求国大党的领导采取国大党活动的民主化和积极行动的激进纲领，以便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帝运动，同时他承认工人和农民建立自己的阶级组织来捍卫他们的经济要求的权利，他认为这些组织应当完全服从国大党。他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和在反帝斗争中采用的非暴力方法产生怀疑。尼赫鲁写道：“在政治方面，非暴力策略至今还没有取得胜利，因为印度仍然处于帝国主义的罪恶控制之下。在社会方面，这种策略也没有规定根本的改变。”

但甘地和尼赫鲁之间有着亲如父子的关系。尼赫鲁虽不同意甘地的主张，但他一直崇拜甘地的人格，并追随甘地行动。甘地对尼赫鲁也是精心培植，悉心诱导。尼赫鲁是甘地最为属意的继承人。

1936 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该法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在激烈的反对声中于 1935 年 7 月 24 日正式列入法令。该法规定，在英属印度 11 个省建立拥有一定保证的完全的责任政府和实施自治。总督拥有为保护少数派、维护法律和秩序采取行动的权利。印度各土邦和各省加入联邦政府和立法机构，管理中央事务。在中央实施两头政治。英国虽然作出了一些让步，但该法一开始就明确表明：英王和印度的关系是所有权利、一切政权和全部司法权都由英王陛下实现。它丝毫未改变印度对英国的依附地位，因而遭到印度各界人士反对。

1936 年 4 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了会议，甘地出席会议，但并未参加会议的讨论。他推荐尼赫鲁任主席之职。这次大会批准否决了 1935 年的印度政府组织法。会后尼赫鲁在组成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时，大量吸收左派参加，人数占到 1/3，但右派仍在国大党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

勒克瑙会议后，甘地迁居到西迦昂的一个僻远小村，住进了茅棚。他认为自己过去偏重于发表理论，现在该有更多的机会来长期体验实际的乡村生活，哪怕只是住上一阵，他将对印度农村的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西迦昂环境恶劣，肮脏而又闭塞，但因为甘地的到来，这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子很快闻名遐迩，成为国大党要员频繁出没、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场所。甘地就在那窄得仅容他转身的茅棚里住到 5 月下旬，因健康原因，不得不移往他处疗养。

这年 5 月，甘地得知其长子哈瑞拉·甘地在孟买改信伊斯兰教。在甘地的几个儿子中，长子酗酒成性，游手好闲，到处招摇撞骗，让甘地伤透脑筋。由于哈瑞拉曾几度宣称要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其意图不过是想捞点好处，而非出自信仰，所以当得知儿子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便在《哈里真报》上撰写了题为《致穆斯林友人》一文，对他这位不孝之子的行为进行揭露，以便穆斯林友人能考察哈瑞拉改教的动机。

英国政府考虑到印度政府组织法中有关“联邦机构”部分引起了印度社会人士的激烈批评，决定先着手实行“有关省自治的部分”，“联邦机构”部分暂时搁置不提。它公布省立法会议的选举拟在 1937 年年初举行，总督林利兹戈勋爵为分裂反帝阵线和为各反对党派拉更多选票，开展蛊惑宣传，表

示政府打算采取措施改善群众状况，并号召国大党领袖们合作，同时继续对左派分子进行迫害，企图阻挠他们进行竞选宣传，主张同政府合作的各地方组织、党派也都积极加强了自己的活动。

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决定利用选举，宣传国大党纲领，吸引各阶层参加反帝斗争。早在 1936 年 8 月，国大党就提出了竞选纲领，其中包括许多进步内容，如争取完全独立，废除 1935 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改革现存的土地制度，改善工农状况，男女平等，废除“不可接触制”，释放政治犯等。国大党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攻势。

1936 年 12 月，国大党第 50 次会议根据甘地和尼赫鲁的主意，在马哈拉斯特拉的法兹普尔村举行，意在突出国大党要与农民建立联系的愿望。

会议通过决议，明确宣布反对 1935 年印度政府组织法，以及因此而强加给印度人民曾公开反对的所谓印度宪法，认为任何与宪法合作的行为，都与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背道而驰。大会重申不与该法合作的一贯立场，且将在议会内外与之斗争。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土地纲领，规定降低地租、田赋、水税，取消欠税，禁止各项杂税，以及强迫劳动、减少高利贷债务负担等。

甘地未出席此次大会，但会后他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国大党的决议。

1937 年初的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在各地取得了胜利。2 月末，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开会，通过新的立法政策，还规定：凡国大党籍议员均不得支持帝国主义政策，不得接受封号，同时必须身着土布，实践竞选纲领。选举获胜后，国大党在是否接受各省部长职务问题上意见分歧，迟疑不决。右派有势力的领袖早在选举前就主张无条件接受，但尼赫鲁等则希望争取比“省自治更大的权益”。甘地在这个问题上起了主要作用，他提出国大党可以有条件地接受部长职务。结果 1937 年 3 月 19 日召开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遵循甘地的意见，正式决议：凡国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席位的省区，国大党籍议员可接受省级部长职务，但总督必须同意不使用行政权干涉议会。甘地这是想借合作的方式来达到不合作的目的。

选举活动和国大党在选举中胜利，导致印度全国政治生活进一步积极化，并引起群众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加强。尤其工人的罢工斗争十分活跃，英国统治集团不得不对国大党让步，同意不使用总督的特权。1937 年 7 月，各省民选代表走马上任。

选举获胜后，国大党的注意力开始主要集中到参加政府方面。甘地则一如既往地专心于乡村建设运动，并提出了他的具体方案。他认为印度的理想乡村应该是“备有完善的卫生设施，所有住宅空气流通，阳光充足，而且建筑材料应取自当地方圆 2.5 公里以内。家家应有菜园、庭院与畜栏。乡村中的道路与集市必须保持洁净。同时，设有拜神集会的场所，合作食堂，初级与中级学校，讲习技艺。另外还要设长老会，排忧解难，制止纠纷。每一乡村应能生产所需谷物、蔬菜、水果与土布。”

甘地为推进乡村建设，特意组建了“甘地社”，这一作法引起了社会上不少猜疑，似乎甘地有意在与国大党唱对台戏。为此，甘地在一次社员大会中发表了重要演讲，以正视听，他说：“开玩笑的人说，‘甘地社’与国大党变成了互相敌视的两个组织。其实‘甘地社’不过是负责推动国大党的建设方案，它怎能反对国大党呢？”

形势的变化使甘地社面临许多新问题，甘地社成员原是国大党中的抵议会派，那么现在那些已参加立法会议的人是否仍然可以成为甘地社的成

员，以及甘地社的成员能否参加立法会议，这些问题曾在当时引起广泛争议。以帕迭尔为首的一派主张赞成，以卜拉沙德与甘地社社长麻希洛瓦为首的则坚决反对。

甘地组织身边的同志反复讨论，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抵制议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这与真理和非暴力原则不同。我现在已不像过去一样地反对，但也并非回到我原来的立场，这纯粹是战略的问题。我只是说在必要时这是迫切需要。我现在虽然是不合作主义者，但大家忘了，我也是合作主义者，就是为了合作而不合作。我曾说过，假如我能用合作的方式将国家带向前进，我一定合作。我现在指示进入议会，不是提供合作，而是要求合作。我深深相信，如果不是我坚信真理与非暴力，别人将不会重视我的政治活动。我最先的动机是追求真理，随后才发现非暴力。”

当然，甘地并非鼓励“甘地社”的社员都去竞选入议会，他认为如果被指定参加竞选，就不必畏缩。因为这是去扩大影响，从事真理与非暴力的斗争，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追求个人的私利，议会是诱惑的陷阱，像一杯烈酒，但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的人，必能经得起考验。

6月初，甘地返抵西迦昂，他对一位前来采访的纳粹报纸的特派员阐述了自己对武力征服的态度。甘地告诉他：“我了解希特勒不接受不用武力而能维持人类尊严地位。但我们之中却有人相信，采用非暴力也能赢得独立。如果我们必须被迫流血，那将是世界上最坏的一天。倘使印度被迫动武以争取自由与独立，势必将使世界上的真正和平不能提早实现。我已抛弃了刀剑主义，我已使它成为可能。我所得到的结论是：人的尊严加上理智的爱，必能代替野性的残暴。”

1937年11月中旬，甘地回到瓦尔达。此时正是印度国内的多事之秋，国大党选举获胜，参加了政府后曾在国内造成过一种新气象，但很快便暴露出了各种问题。国大党右派领袖没有也不可能履行诺言，满足工农大众的需要，他们想利用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改革，步履维艰，人们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罢工、暴动、反政府游行，事件不断发生。国大党内部的纷争激烈，特别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及其他少数派关系恶化，新上台的国大党省长束手无策。这种情况使甘地又走向前台。

1938年4月1日，国大党加尔各答会议，甘地亲临指导。当时，同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关系极为紧张，领导人已进行过长时间交涉，笔墨官司不断，但不解决问题。

甘地决定亲自出马，与真纳会谈。正式会晤预定4月28日举行，在这之前，甘地几次写信给真纳，效果并不理想，但甘地仍寄望于与真纳的会晤。

真纳和甘地一样，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律师，国大党著名领袖。约有10余年，他一直在国大党内维护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组成反对英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甘地取得国大党的领导地位后，真纳不赞成甘地的不合作纲领，认为这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他于1921年脱离国大党。此后，他一直是穆斯林联盟的实际领导人，积极致力于争取穆斯林在统一印度下的自治地位，但他对原来的政治目标并未完全放弃，依然为实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团结合作不断努力。1937年的选举，他的政治生涯再度出现决定性的转变。当时，国大党取得绝对多数并拒绝在穆斯林居少数地位的省内与穆斯林联盟分享权利，采取了一些损及穆斯林利益及宗教感情的做法。真纳从中得出结论，在印度教徒占优

势的政党统治下的印度，穆斯林永远难以取得公平合理的地位。自此以后，这位昔日两大教派团结的捍卫者，成为建立巴基斯坦国方案的不屈不挠的卫士。

4月28日，甘地在孟买真纳的寓所里会晤了真纳，这次谈判仅系初步交换意见，为下一步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会谈做铺垫，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会晤后，双方只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我们曾就印穆团结作过3小时的友好会谈，这一问题将继续再谈。”

5月1日至8日，甘地访问西北边省，然后回孟买休养，6月间，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提出了11项要求：立即放弃以《祖国的命运》为国歌；目前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不得重划行政区；穆斯林宰牛不受干预；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得干扰；应制定法案保障穆斯林教徒的基本权利与伊斯兰文化；宪法中应明文规定，穆斯林能平等享有一切国有建设；国大党不得再反对分别选举制，并不得指其为危害民族主义；制定法律保障乌尔都文；地方民意机构之组成应采用分区选举制；废止三色旗或承认穆斯林联盟族以同等地位；（11）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唯一代表印度穆斯林的合法组织。

国大党拒不接受11点要求，使印穆谈判陷入僵局，教派仇杀事件到处发生，现状令甘地无比忧愁。7月27日，甘地向国大党党员发表谈话，回顾了党的斗争历程，一方面引咎自责，同时激励大家，克服困难，坚定信心。他说：“我不能”说自己退出国大党就可以推卸责任，我离开国大党的动机，是想站在党外来促进它的发展，我知道我仍旧影响国大党的政策。我以1920年党章起草人的身份对目前党纪败坏必须负责。党在1920年是从艰难中开步走的，很少人接受真理与非暴力为信条，多数党人只当它是一项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曾希望当大家看到国大党在新政策下的进展后会接受它为信条，但只有少数人如此。最初阶段，高级领导人物反应颇佳，诸位可以回忆当时像老尼赫鲁、达斯诸人在《青年印度》上所发表的公开信，他们曾领导党员表现了高度的自律、自我牺牲与严肃精神，阿里兄弟也几乎变成了苦行僧。当我在各地考察时，我发现同志们几乎都已换上了新生活，当然还有其他人，我毋需一一列举。高级领袖们的热忱无疑大大影响着同时期的许多人。

“但是，这种情形，随着一年内自治的不能实现而突然改变。我所指示的一年内自治的先决条件，大家都健忘了。马吉德甚至说作为一位非暴力抵抗部队的统帅，我必须首先认清自己提的先决条件乃是可以办到的，也许他说得对，可是我却没有办到。大规模使用非暴力手段从事非暴力斗争，对我来说也还是一种试验，所以我不能将它写成具体的条文，我所期待的只是国人的响应。他们也许会绝不赞同，错误和偏差是可能的，这些话姑且不论，问题是当争取自治的斗争延长，哈里发问题已不再成为国人热心的斗争，紧接着高潮过去，对非暴力的信心动摇，于是异端邪说便乘虚而入。本来对党章没有信心的人，当然是公开的攻击。

“我的才智有限，神并没有授权我来领导这世界走非暴力之路，但我却想神会选择我为工具在印度实行非暴力以抵抗各种邪恶。已有的进步相当惊人，但待完成的工作还很多。……不管是否需要再来一次食盐进军那样光荣的奋斗，印度也终能借非暴力达成其理想。我祈求真光驱散黑暗，愿相信非暴力的人们同我一样祈求。”

当人民的斗争危及到资产阶级统治时，甘地的态度毫不含糊，9月下旬，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德里会议上，甘地代表国大党起草了“有关人民自由”一案交大会讨论，该提案称：最近发现许多人，包括少数国大党党员在内，竟假借自由的名义，任意烧杀抢掠，实行暴力的斗争。还有几家报纸，故作不实报道，企图挑起教派间冲突。我们要唤起国人的注意，我们争取自由，并不包括自由地煽动暴乱或歪曲宣传，因此，本党对人民争取自由的政策从未改变，但将基于一贯的立场，支持国大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一议案意在授权那些参政的国大党部长们对所谓煽动暴乱或参加暴力斗争者采取制裁行动，甚至不排除使用暴力镇压。国大党左派强烈反对甘地的提案，并以退席相抗议，他们认为国大党参政放宽了人民的自由，但国大党籍部长们却扼杀了自由，这一提案不过是要为部长们提供滥用自由的方便，这和过去的官僚并无二致。

会后许多共产党人找甘地理论。他们质问甘地为什么政府可以用暴力镇压而人民不能用暴力反抗。甘地辩称：“虽然政府原则上也不应使用暴力，但假如一个人杀了小孩，抢去了他的玩具，那时我剥夺这个人的自由，不让他再犯，我这种行动就不能称之为暴力。但假如我采取的行动带有报复，那就算是使用暴力。”甘地的意思显然是说政府的制裁不是暴力，而人民的反政府则是暴力，所以他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商量的余地。

1938年底至1939年初，印度国内反帝斗争继续发展，以鲍斯、尼赫鲁为首的左派力量影响进一步上升。1938年末，国大党上席鲍斯正积极筹划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完全独立的最后通牒，如果最后通牒一旦遭到拒绝，就开始群众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个计划得到大多数反帝参加者的支持，并得到1939年2月在加尔各答举行的左派第一次代表会议的赞同。当时，印共支持整个行动计划，同时提出重要补充，它号召利用各土邦人民的运动和群众组织。

国大党内部因为这一变化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国大党主席之职也就成为左右两派力量争夺的焦点。

新主席的选举预定于1月29日举行。最早获得提名的是阿萨德、鲍斯与席塔玛亚3人。甘地和国大党右派领袖支持的是席塔玛亚。1月20日，阿萨德主动退出。但鲍斯认为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他不想退出，他坚持必须通过全党选举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人。见此情景，1月24日，帕迭尔、卜纳沙德、巴喏迦、多拉脱兰、戴荷、戴赛及克里巴拿里联名发表声明，支持席塔玛亚，但选举结果却是鲍斯以1580票对1375票获胜而当选为国大党主席。

鲍斯是上届国大党主席，一向主张坚决的反帝斗争和激进改革，甘地对他颇为不满。选举揭晓后，甘地发表声明，公开表示自己原是反对鲍斯再度竞选的，现在既然他获胜，还是应当表示祝贺。不过甘地接着指出：由于他自己先前曾支持席塔玛亚不退出竞选，席塔玛亚的失败无疑也是他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获得大多数国大党代表对其原则和政策的支持，既然如此，少数派最好退出国大党。他还提醒人们，同情国大党主张而并不在党内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所以他鼓励大家如感到不便就退党。

甘地实际上是在给鲍斯出难题，原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甘地拥护者的巨大压力下，除鲍斯的弟弟外，全部辞职。

鲍斯向甘地表示：席塔玛亚的落选并非是甘地主义及其领导的失败，他希望能得到甘地的信任。他说：“如果旁人都信任我，却丧失了印度伟人的信任，那是可悲的。”1939年3月6日，国大党全代会如期在阿萨姆的特里

普拉士邦举行，这次会议是一次关键的较量。甘地因身体虚弱未能出席。大会由于鲍斯等左派力量的提议，于3月7日通过“民族需要”一案，重申了争取独立、通过民选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决心，并且认为印度自决的时机业已成熟，要求英国当局立即答应印度人民通过制宪会议建立独立民主国家的要求。决议呼吁各级党的基层组织、国大党所组成的省政府及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加强团结，清除腐化，使国大党能成为代表民意的有效机构。

左派的激进纲领令右派极为不安。他们担心群众的真正发动会危及其根本利益，因而极力组织反击。3月8日，联合省首席部长潘迭特提出信任甘地案，宣布支持过去20年在甘地领导下制定的各项基本政策，确定这一政策不容中断，并将作为指导今后工作的准绳，认为当前形势下只有甘地领导国大党及全国人民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决议案要求国大党主席必须遵照甘地的意愿指定人选，组成国大党的执行机构——工作委员会。潘迭特提议后，由拉贾戈帕拉夏理附议，交大会讨论后获多数代表同意通过。

会后，鲍斯再三请求甘地提供人选，甘地表示他自己不能介入潘迭特案，不能提供工作委员会名单。但是他也表示不能保证鲍斯自己提名的人选能获得通过，甘地要他去找上届工作委员会商量解决。

鉴于甘地的不合作，鲍斯无法组成新的工作委员会，只得提出辞呈。尼赫鲁曾建议鲍斯撤回辞呈，鲍斯却深感无奈。最后改选卜纳沙德为1939年国大党主席。5月3日，鲍斯在党内自组前进社，以团结所有激进派与反帝进步分子为宗旨，采取各方进步人士所共同协议的方式作为斗争手段。总的看来，左派力量遭受此一打击后，基本上一蹶不振。尼赫鲁也在甘地及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软化下，渐渐失却其激进锋芒，成为其忠实代理人。

甘地的注意力除积极致力稳住国大党及其支持者的阵脚外，也十分关注这一时期的国际局势，力欲以其非暴力拯救人类于血海。

30年代中后期正是国际法西斯势力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期。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奥地利、捷克被吞并。法西斯赤裸裸的暴力与甘地所倡导的非暴力水火不容，甘地视之为“豺狼”而加以谴责。然而甘地却不赞成被侵略国家采取武力抵抗。这位多年来对非暴力信守不渝，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的老人在这世界正沉浸于法西斯血腥暴力的时候，不断向世人宣传他的“法宝”，并现身说法，要替当局者“指点迷津”。

他除了呼吁希特勒之流放弃武力政策，并对“豺狼”予以谴责外，还认为需要提醒羊不要落入豺狼的圈套，即被侵略国家无论遇到多么暴虐的考验，都不要诉诸武力，失掉光荣。这种荒谬的“提醒”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

## 八、考验与挑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日，印度总督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应负起战争责任。

印度的参战完全没有与印度人民磋商，甚至印度立法议会事前也未曾听说，这不能不引起印度舆论的强烈不满，并遭普遍反对。

印度国大党早在战前即已表明它一贯的反战立场。在1936年的竞选宣言中，它表示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印度参加一次帝国主义战争”。1938年初，国大党领导人曾抨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斥之为对民主的叛卖。1939年春，国大党曾警告说，它不会为别人的利益而战。尼赫鲁更是明确宣告，印度是否参战只能由人民决定，英国强加的任何决定都必将遭到反抗。

印度总督为试探国大党领袖对英国政策的态度，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首先召见甘地，对此广大群众和国大党要人都表示反对，但甘地执意前往总督府。他以个人的名义向总督表示，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的考虑，他同情英法。他还就自己与总督的会谈发表了公开声明。

甘地与总督会谈的声明发表后，引起各方议论和猜疑，甘地为此在9月8日发表了题为《我的同情》一文，解释自己对英法的同情是基于理智，因而希望和他持同一观点的人支持他的看法。

9月10日，大印度教会党通过一项决议，支持英国作战以保卫印度，但盼扩大中央政府，并多征募印度兵员。18日，穆斯林联盟决议，对过去2年的联省自治深表不满，除非能给穆斯林以公平待遇或征询穆联的意见以制定新宪法，否则，任何形式的应变措施均不能获得穆斯林在战争上的支持与合作。

国大党的正式立场由它的领导机构决定。工作委员会于9月8日~14日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个长篇决议，为国大党拟订了对战争的政策基础。该决议由尼赫鲁起草，经过仔细斟酌，它谴责法西斯主义，谴责德国纳粹政府对波兰的侵略，对那些遭受德国侵略和进行反侵略斗争的人表示同情。但它指出，关于印度战争与和平问题，必须由印度人民决定，如果英国不把印度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对待，国大党就不可能支持英作战。决议要求英国政府直截了当地说明它在这场战争中的目的，是否包括消灭帝国主义，给战后印度以独立。国大党提出的具体要求是战时成立对选举产生的而不是总督委派的中央立法议会负责的印度政府，它还呼吁印度人民停止内部斗争和矛盾，随时戒备，加强团结，表现出一个统一的民族精神，冷静地提出目标，争取印度的自由。这表明国大党准备有条件地支持战争。

对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决议，甘地于9月15日发表了个人声明。声明表示，虽然他发现自己的看法，即“任何对英国的可能援助都应是无条件的，只有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才能办到”没有人附议，但他对决议起草人尼赫鲁所采取的原则性立场予以称赞，认为他的声明不仅是对不列颠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同胞，也是对所有像印度一般被压迫民族的宣言。他希望工作委员会的声明能得到党内各方面的支持，也希望其他党派人士尽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要求英国政府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承认印度独立。

总督邀请了50名印度各方领袖，于9月26日赴西姆拉会商，其中包括甘地、卜纳沙德、尼赫鲁、鲍斯、帕迭尔及真纳等人。9月25日，甘地在赴西姆拉会见总督途中，在他主笔的《哈里真报》上发表《甘地的难题》一文，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甘地认为，这场战争比以往那场战争更可怕，虽然他同情盟国，但却不打算像上次那样招募志愿兵参战。他希望印度即使困难再多，但在追求和保证一个完善的民主秩序方面能起积极作用，并尽量使用非暴力。不过甘地表示：“假如我抛弃我最好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追随我扩大使用非暴力，那么我也不能达到非暴力的目的。因此，我仍将维持对他们的信心。他们所采取的暴力手段，将是极其狭窄的、暂时的。”对于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甘地表示，除了奉行非暴力，尚无其他具体方案，一切将相机行事。这些话表明，甘地已公开披露了他与国大党领导机构之间的歧见，但甘地对弥合分歧抱有希望。

同时，甘地对与穆斯林联盟在这关键时刻重修旧好也抱有希望。9月26日，甘地参加了与总督的会谈，返回瓦尔达途中，他撰写《印穆团结》一文。文中他盛赞穆斯林联盟是一伟大的组织，它的主席一度是国大党的杰出人物，是国大党新起的希望。他满怀感情地回顾了昔日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借以证明印穆之间将会出现实际的永久的团结。

10月2日，甘地71岁诞辰。人们聚会庆贺，甘地写了一篇《谢》，呼吁同志们支持他毕生所致力的工作。此时，甘地和工作委员会之间的歧见日趋明显。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英国是否作有利于印度的宣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旦遭到侵略，国大党将用什么方式进行抵抗。在这个问题上，甘地和工作委员会长谈的结果，是他发现他们对非暴力的估价仅限于用作对抗英国政府的武器，而且并不准备采取非暴力抵抗未来的进攻。甘地在10月10日的社论中说，“我相信，所有国大党的党员们都极欣赏20多年中，运用非暴力与世界最强的帝国主义斗争的合于逻辑的结果，即抵抗敌人进攻的方法应该和赶走敌人的方法相配合，而前者显然比较容易。事实上我们过去所采取的是弱者似的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一个强者的非暴力抵抗。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没有人敢响应非暴力的方式。形势如此严重，如果工作委员会决定了采用武装暴力来保卫印度，那么过去20多年国大党所接受的非暴力训练便等于徒劳。而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将印度不曾好好武装的悲剧责任，放在领导非暴力的我的身上。”“我永远不会鼓吹或支持武装的训练。相反地，我全力反对这种想法或作法。就是眼前，我也并不反悔过去，我有不变的信心。世界各国中只有印度能学非暴力艺术，哪怕就在今天来考验，我也相信必有成千上万的人，宁死也不会对侵略者以牙还牙”，“印度即便是为了保卫边疆，最好也还是完全放弃暴力，因为印度参加武装竞赛就等于自杀。印度既丧失了非暴力，整个世界便无希望。我必须保持过去半世纪我所坚持的信条，希望最后印度会服从非暴力，保持人类的尊严，不要自己堕落。”

英国的态度却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分歧暂时退居次要。10月17日，林利兹戈再任印度总督。他在伦敦发表《白皮书》，其中重申了不实现“联邦机构”，而在战争结束后召开各政党、宗教团体和王公代表会议来制定印度新宪法的原则立场。同时宣布可以采纳穆盟得以代表印度穆斯林的主张。至于国大党要求立即自治，该声明说，“考虑时局应依世界政治和印度政治的现实，取得进展应以实际可能为前提，试图做成现实政治中未必能成功的事，到头来准是一事无成”。在这里英国政府所作的唯一让步就是放弃实际上早已破产的“联邦机构”计划，没有满足国大党的合理要求。

对此甘地和国大党深感失望。甘地认为这种声明不过是英国传统分而治之策略的翻版，国大党领导机构对此激愤异常，它决定不支持英国的战争努

力，并警告英国，国大党将发动群众不合作运动，国大党执政的各省政府辞职将是第一步行动。同时，它又告诫人民，不要匆忙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这实际上是向英国政府施压，想迫使其作出更大让步，结果英国政府没有积极反应。10月27日，从马德拉斯开始，国大党执政的印度8个省的省政府便先后辞职。英国政府曾以扩大总督行政参事会安抚国大党，仍未奏效。11月初，林利兹戈不得不又一次约见甘地进行磋商，陪同甘地的是卜拉沙德，他们两人在讨论中明确表示，除非满足关于澄清战争目的的要求，否则不会考虑任何次要的建议，谈判破裂。

1940年1月10日，林利兹戈在孟买东方俱乐部发表演说，其中指出，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时期给印度自治领的地位，但各少数派和印度各王公的合法权益与要求应得到保障，这一让步使国大党中的妥协派看到一线希望。甘地也说：“总督的声明包含着对双方都光荣地解决的萌芽。”于是，国大党和英国政府间又开始接触，林利兹戈会见国大党的议会领袖德赛，德赛表示，他个人同意自治领的地位，认为自治领与独立并无实质性差异，但他无权就此作出决定，总督必须与甘地磋商。2月5日，甘地与总督再次会谈，但英方不肯作出实质性让步，会谈又归失败。28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巴特拉开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重申国大党不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决心争取印度的“完全独立”，并声明在省政府辞职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发动不合作运动，并授权甘地在他认为已准备好时开展运动。同年3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于拉姆加尔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决议。同月，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会议中通过要求成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战局在继续发展。5月10日，希特勒发起对西欧的进攻，英国张伯伦内阁倒台，丘吉尔组成战时政府。在印度，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动荡的时局加剧了国大党的政见分歧，并促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分道扬镳。

德国之占领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的投降，都向印度资产阶级表明，法西斯危险威胁印度。国大党的主战派为谋求与英国达成妥协而降低了它的要求。国大党领导机构决定，暂时搁置不合作运动的议论，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印度自治，战时在中央建立一个临时国民政府，它即愿在战争中给予充分合作。尼赫鲁认为，这是他们经过痛苦的斗争与深思熟虑而作出的抉择。国大党内以鲍斯为首的另一派，则力图迫使甘地采取行动。这年6月，鲍斯会见甘地，吁请他发动文明不服从运动。

甘地本人立场依旧。7月3日，甘地发表了有名的对每一个英国人的公开呼吁。他以一个非暴力信仰者的思维方式对于正在与纳粹浴血奋战的人们说：“我不揣冒昧，向你们建议一种最勇敢的战士使用的著名而勇敢的方法，我想要你们不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可以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他们所要的你们所有的国土，征服你们称作属地的国家。你们也可以让德国人踏上你们的美丽宝岛，占领你们的无数富丽堂皇的名胜古迹，即使要你们的家园也不妨让出，如果他们不让你安全撤退，就让他们自己和妇女与孩子任他们屠杀，但决不可丧失心志，也不要对他们效忠。”

甘地的立场，纯属无稽之谈。即便在国大党内，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也难找到支持者。在国大党可能用什么方式向英国提供战争合作的问题上，甘地一直主张非暴力同样适用于抵御外侮，因而他反对任何形式下的直接参战。但除他以外，几乎所有国大党领导人都主张，只要英国答应印度的民族

要求，一切形式的合作均可提供，自然不排除直接参战。

7月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不顾甘地的强烈反对，提出一项新的决议，要求在印度立即建立中央临时政府，与各省政府密切配合，以动员一切力量共起卫国。会议决定不能接受甘地极端非暴力立场，国大党主席阿萨德在会上说，“国大党是个政治组织，誓为国家赢得政治独立，它不是一个争取世界和平的机构。坦白地说，我们无法做到圣雄甘地要我们做的那些。”会后甘地宣布引退。7月底，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浦那开会，会议通过决议，表示有条件地支持战争。条件依然是立即宣布印度独立和建立临时国民政府，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和非暴力抵抗战争的政策。

国大党抛弃自己的领袖是为了与英国人达成妥协，然而正是丘吉尔使甘地与他们又重归于好。丘吉尔政府一贯忠于自己确立的政策，根本无意满足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要求。林利兹戈于8月8日发表声明答复国大党的要求时，依然老调重弹，表示英国政府赞成制订一项印度新宪法，只是在英国正作生死存亡斗争的时候，不宜讨论此事。

英国的态度打破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幻想。甘地对英国态度也极为不满，8月13日，他向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谈话：“我已退出国大党的实际政治活动，我尽量忍耐不评述总督的声明，但英国及印度若干朋友极盼我能表示一点意见。我认为，总督的声明更加深了印度的混乱，也扩大了国大党所代表的印度与英国之间的距离。即使站在国大党外看，印度也不欢迎这个声明。”9月15日，工作委员会在孟买召开临时全体会议，要求甘地重新出来领导。大会还确信非暴力政策不仅可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能适用于未来自由的印度。

9月16日，全印委员会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请甘地恢复领导国大党。

9月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总督直接了当地告诉甘地，“你是全心全意的反对履行作战义务，并且曾公开表示过，但我不能让你向任何人包括战士或军火厂的工人等，进行任何反战的宣传，削弱民心士气。因为说反战而不危害印度利益，包括你们所要求的言论自由在内都是不可能的。”甘地反驳：“你和印度殖民事务大臣都说我们是自愿支持作战的，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民对这一战争毫无兴趣，人民不愿支持一个为帝国主义而战的战争。老实说，印度人民更反对纳粹得胜，不过他们不以参战的方式表示反对。他们看不出纳粹主义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任何区别，如果政府承认了印度所要求的自由，那么政府就可以说是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主战与非战者之间，本可立于平等地位，只要他们相互之间不使用暴力。”

10月5日，甘地宣告与总督谈判破裂。13日，甘地在瓦尔达向工作委员会宣布了他的行动方案，2天后通告全国。这个行动方案称为“个人的萨蒂亚格拉哈”，目的是争取言论自由，参加者须经甘地挑选，逐个地投入运动，而且和以往一样，一切活动均公开，关于何时何地由谁举行象征性抵抗均一一告之政府。甘地挑选的第一个人是维诺巴·巴维，一个早年就追随甘地的梵文学者，非暴力主义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位反战斗士。10月17日，巴维在华达附近的波拉村发表反战演说，宣称出钱出力帮助英国人作战是错误的，唯有效的办法是遵循非暴力途径反战。此后三天，巴维徒步在乡村作同样的演讲。21日，他被判三个月的监禁。随即政府实行严厉新闻封锁，不准

发表巴维演讲与活动的新闻，严禁登载反战消息。18日，甘地主持的《哈里真报》和其他两个姊妹刊，也接到政府通知。24日，甘地发表声明：“我必须将有关非暴力抵抗的文字都送往新德里审查，我将不能自由执行编者任务。我所主编的3个周刊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单为了某一方面的利益。显然，如果稿件随时受到事先审查，当然并不能达到原来的目的。新闻自由乃是我们所珍爱的特权，与民事反抗无关。所以我对政府实施新闻检查的命令，不能保持沉默。”

11月10日，《哈里真》周刊及其他两刊终于向读者告别停刊。

个别民事反抗仍在继续，继巴维之后是尼赫鲁。他原被指定是在11月7日发表反战演讲，但在10月31日他就被逮捕，被判4年徒刑。11月7日顶替尼赫鲁演讲的是布拉姆·道塔，他在演讲时当场被捕，判刑半年。

11月中旬，运动发展到第二阶段，被称为代表性的非暴力运动。抵抗代表从个别改为团体。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籍议员集体发表反战演讲。过去在各省担任部长级职务的党员也纷纷到街头巷尾，高呼反战口号。其中第一个发难者是帕迭尔，他在11月17日被捕，许多高级领袖等也被关进监狱。到1940年底，计有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29个以前的部长，400个民意代表都被捕下狱。甘地随即下令从12月24日到第二年1月4日暂停作暴力抵抗14天，以表示对耶稣圣诞的善意。

1941年1月5日，开始了甘地所组织的第3阶段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规模扩大。这一次的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派遣任务。这些非暴力抵抗者一经出发决不回头，直到被捕为止。他们从一个乡村走到另一个乡村，呼着反战口号，召集群众大会。到1月底陆续被捕的达2250人。

时至4月，运动发展到第4阶段。所有各级党部的中下级干部均报名参加为志愿队员，进行反战宣传，让政府逮捕。非暴力抵抗人数超过2万，入狱的人也是成千成万，他们准备长期住进监狱。如果不是甘地加以限制，入狱的人还会更多。

这次运动看起来松散而缺乏活力，和20—30年代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相比大为逊色。甘地这种作法在当时也遭到批评，有人认为这并不能削弱英国的战斗力，但甘地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非暴力抵抗本身就是一种道义的抵制，是3亿5千万印度人民非暴力组织的一种争取自由的斗争，谁也不能让它停止。

由于国大党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入狱，运动不久就很难开展，同时，国际局势也在急剧变化，使国大党再次面临考验。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德军以强大攻势向苏联腹地推进，日本也在全力鼓噪南进，英国政府预感到日本即将参战，故印度的战略地位更显重要，军事上急需全面动员印度的战争资源。1941年12月3日，印度政府决定将参加作暴力抵抗而被捕的人，包括尼赫鲁与阿扎德在内全部释放。

形势发展使甘地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矛盾重新突出。刑满出狱和提前释放的国大党人眼见抵抗运动大势已去，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更使他们不满于老一套的作法，在世界人民积极投身反法西斯斗争，印度前途命运攸关之际，他们不希望置身事外。这些人在党内逐步聚成一股势力，强烈要求甘地改变计划，放弃不合作运动，重管各省行政权。但甘地寸步不让，他认为参加运

动人数的多少无关紧要，哪怕只有 10 个人，甚至只有 2 个人，却仍然代表国大党。他呼吁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努力推进，以支持个别民事反抗运动。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日本迅速占领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战火直逼印度国门。对此严峻形势，国大党工作委员会 12 月 23 日开会，声明国大党同情遭受侵略的，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各国人民，同意与他们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则固执己见，认为这显然违背非暴力信条，他致函阿扎德，重申反对参加战争。甘地在信中说：“我确实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使印度和世界免于灭绝。正因为如此，我必须继续完成我的使命，不论我是否孤立，是否遭到个人或组织的攻击，故请你解除孟买决议所托付给我的责任。”

工作委员会讨论了甘地的信，不能赞同甘地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此通过一项补充决议，免除甘地的职务。1 月 10 日，甘地向国大党建议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亚洲战局的剧变使英国处境极为不利，它急切希望印度在人力、物力与道义上给英国以最大限度的支持，这一需要迫使英国当局考虑采取措施，团结印度，为盟国的作战努力服务。

英国保守党首相，英帝国利益最顽固的维护者丘吉尔在华盛顿方面及其亲近同僚的敦促下，最终同意对国大党作出让步。3 月 11 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将派战时内阁阁员、掌玺大臣克里浦斯前往印度。克里浦斯为英国工党要人，被认为是同情印度的自由派人士，据说还与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私交甚笃。他性格温和，办事老练，此次受命赴印谈判，当然是最佳人选。

3 月 22 日，克里浦斯抵达新德里，29 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了从英国带来的计划草案，这就是所谓的“克里浦斯方案”。

克里浦斯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下列各点：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将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并将给予它以自治领地位。

2. 军事行动结束后，将成立省和土邦的代表会议来制定新宪法。各省将举行立法会议的选举，并由立法会议从自己的议员中选出各省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各土邦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应由王公指派。

3. 不愿加入印联邦的那些省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旧有的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

4. 在战时，对印度的统治将不做任何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政府作战，全部国防责任应由英国政府担任，它只允许在总督以下设立的执行委员会里加入一名军事顾问来监督作战的物质供应。

克里浦斯到德里第 3 天，即约见国大党主席阿萨德，说明方案全部内容。阿萨德立即召开工作委员会加以研究。

此时，甘地虽已被免职，但他的态度对国大党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深知其中奥妙的克里浦斯转而请求与甘地会晤，双方会晤长达 2 小时，克里浦斯力图说服甘地，但甘地态度非常明确。他毫不客气地告诉谈判对手：“假如你的提议不过如此，何苦劳神费力从伦敦来到新德里。老实说，如果这就是你的全部方案，我劝你还是趁早搭下一班飞机回去。”

国大党领导机构一开始对克里浦斯的使命抱有希望，但仔细研究英国方面的建议后，他们又一次失望了。这不仅因为方案本身没有答应在战时建立责任政府，而且更由于其中包括一些国大党极不赞同的条款，如允许印度各省和上邦有权不加入联邦，特别是其中规定英国仍将掌管、统治和指挥印度

国防一条最难令人接受。4月2日，国大党通知克里浦斯，表示不能接受方案。虽然克里浦斯又提出关于国防问题的另一方案，扩大其中印度人的权利，并且有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逊从中斡旋，但由于甘地的态度坚决，加以英国政府始终不肯作出重大让步，4月1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发表正式拒绝接受方案的公报。

克里浦斯调查团并没有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奠定基础，局势的发展使甘地产生了要英国退出印度的设想。甘地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同盟国将难以抵抗日本的攻势，英国没有力量守住印度。而如果英国退出，独立的印度将用它全部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4月，甘地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坚定看法是英国现在就应有秩序地退出印度”。甘地在接受美国记者路易·费舍尔的谈话中详细说明了国大党对克里浦斯建议的观点，并声明，英国人应放弃印度，只有那时的印度才能捍卫自己，并帮助中国、俄国。而且印度抗击日本的方式与众不同，他的唯一武器乃是非暴力。甘地想象将有一排排印度人，纪律严明，手无寸铁，面无惧色地向日本人的刺刀冲上，他们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直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而使敌人心慈手软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希望落空之后，1942年7月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瓦尔达召开会议，经过9天讨论，通过了甘地起草的“英国退出印度”的决议，宣称“本党鉴于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印度人民的切身经验，确认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须立即结束”。“本党主张英国撤出印度，并无意和英国为难，妨碍联合国国家正在进行的战争，更非鼓励侵略者来到印度，或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压力……本党更不想削弱盟国的防御力量。因此，本党同意盟军在印度驻防，倘有此需要，为抵抗日本及其他方面的侵略，以保障援助中国。”“如果这一要求不被接受，本党将不惜一切牺牲，运用一切非暴力的力量来达到目的。由于事关重大，本会特决议此项建议提交于1942年8月7日在孟买召开的中执会（全印委员会）作最后决议”。这实际上是给殖民当局提出最后通牒，但却留有余地。事实上，当时无论是国大党的领导机构，还是甘地本人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和具体行动，这显然只是在施加压力。

面对这一信号，英国殖民当局无动于衷。国大党就这样等待、观望、请求、宣传，又拖了很长时间，最后全印工作委员会于8月7日在孟买召开会议，审批工作委员会决议草案。次日，会议通过了决议，重申“英国政权从印度撤退，任何未来的承诺或保证都已无济于事，唯有得到自由才能使人民乐于发挥潜力，勇于战斗。印度宣布独立后，自由的印度将组成临时政府，与联合国家为友，分担争取自由斗争的义务”。决议要求全体同胞，面对艰危，奋勇前进，在甘地领导之下，奉行命令，严守纪律，为印度的自由而奋斗，而且必须恪守非暴力原则。

8月8日子夜时分，甘地袒胸赤足，在孟买一间空气闷热的大厅里向全国发出呼吁。他讲话的声音平静而庄重，但却饱含着异乎寻常的激动和兴奋：“我要求立即获得自由，为此，我向你们提出一个神圣而极为简单的办法：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我们将解救印度，或许我们将失去生命，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奴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

黎明来临时刻，甘地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幽暗的牢房。英国人经过精心策划，一举将甘地和出席孟买会议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全国委员会成员以及各省市组织负责人悉数逮捕，国大党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

逮捕甘地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国大党基层组织领导了群众反英斗争，斗争方式既有和平示威抗议，也有武装暴动，双方冲突与流血事件不断。到1942年底，全国约有250个火车站被毁，500个邮电局受袭击，150个警察局被攻打。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控制了局，从8月至11月，据官方统计，死亡群众近千人，被拘押者超过6万。殖民当局还大造舆论，把暴力斗争的责任完全加在甘地身上。

以往数度入狱，甘地都有心理准备，且都欣然就范，政府也都煞有介事的进行君子式审判。可这一次入狱出乎甘地意料，就在他被捕前1小时，他还在对秘书说：“我昨晚讲话后，他们就不会逮捕我了。”更可气的是，政府不由分说就将他关押起来，而且准备一直关到大战结束。对于这种蛮不讲理的行为，甘地深感愤怒。他在狱中不断给政府当局写信，表示抗议，政府根本不予理睬。

1943年2月8日，在被囚的第5个月，为了抗议政府的镇压行动和歪曲宣传，甘地对外宣布，决定从2月10日开始绝食21天。但英国政府执意不肯让步，丘吉尔在致总督的信中指示，如果甘地打算绝食至死，也随他的便。

2月10日，甘地绝食开始之日，政府即颁布一项长达数千字的公报，称甘地坚持在狱中绝食3周，这不是政府的过失。

此时甘地已是74岁高龄，又经过了长时间的监禁，长达3周的绝食对他来说是严峻考验。绝食进入第4天，他便不能起床，心脏益见衰弱，8天之内，体重减轻了14磅，性命已有不保之虞，12天以后，甘地已进入了弥留阶段，只有一息尚存。印度乃至全世界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关注着这位垂危老人的微弱心跳。眼看这位终身为印度民族事业奋斗的老人的生命即将逝去，全印度人民及各派领袖与中美等国报界纷纷呼吁英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然而英国政府却无动于衷，甚至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心态暗中为他准备后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似乎有着神奇的力量，他居然再一次躲过了死神之手，从第13天开始，他的神志又渐渐清醒，3月3日上午9时，他顽强地挺过了21天绝食。

对于一个无视生命和道义政府，甘地已不再呼吁、呐喊、抗议，他准备以监狱作为自己永久的归宿。他恢复了惯有的平静心态，并以书为友，打发着漫无天日的狱中生活。宗教书籍仍是他的必读之物，从那里面，他似乎找到尘世之外的无限慰藉；莎士比亚、白朗宁、萧伯纳的选集他也爱不释手；在狱中，他还接触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狱中的这段日子也是甘地同夫人患难与共的最后日子。甘地夫人是在甘地入狱后的第2天被捕的。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已共同走过了人生的一程又一程。在甘地的辅导下，嘉斯杜白这位当年目不识丁的女子，现在不仅能读会写，而且成为英勇不屈的非暴力抵抗战士。现在她又一次与甘地生死与共，栖身囚室。面对两鬓斑白、老态龙钟的妻子，甘地百感交集，他替夫人编写简易读物，教她史地与诗歌。可惜甘地夫人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眼下更是每况愈下，竟至一病不起。

1944年1月27日，甘地写信给政府，希望能准许孟买的马太医生前来狱中为夫人治病，让他的侄孙女摩奴来狱中看护病人和允许他们的儿子常来狱中探视。

政府不仅不理睬甘地的请求，而且对前来狱中探访的亲人也严加限制。2月16日，甘地再次要求政府派一位印度医生看护病人，如果政府不同意，就

请立即释放病人出狱，如果二者均得不到批准，那么他本人要求另到他处接受监禁，因他不忍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痛苦中毫无照顾，但这一请求仍然得不到回音。

1944年2月22日，这对早已弃绝世俗欲念，却依然终身厮守的患难夫妻在一起走过了64载风雨人生后，终于永别，嘉斯杜白偎在甘地怀中，安详地与世长辞。

对于夫人的遗体安葬，甘地恳请政府最好能不予干涉，交由他的儿子和亲友们公开安葬，如果这一点办不到就请亲友们到狱中送葬。一再不肯对甘地夫人施以人道救助的政府这回总算答应了甘地的要求，2月23日，150名亲友前来狱中为甘地夫人送葬，陷入极度悲伤的甘地守在夫人的遗体旁，神思恍惚地对前来的亲友点头致意。

在鲜花簇拥的灵床上，甘地夫人身着甘地亲手纺制的洁白土布纱丽，身上覆盖着一床囚犯用的床单，额上点着吉祥点，像是沉睡在甜美的梦乡。嘉斯杜白一生以丈夫的事业为己任，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她牺牲了作为一般女人所希望拥有的一切，如金银首饰、荣华富贵、安逸享乐，这种牺牲虽算不上惊天动地，但却是甘地生活与事业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甘地夫人的葬礼简单而隆重。在囚禁他们的阿格罕内搭了一处临时火化场，颂完几段《薄伽梵歌》与《可兰经》后，遗体便被放上支架，点燃了檀香木，火花一点点吞噬了她圣洁的躯体。望着老伴在如炽的烈火中渐渐消逝，甘地老泪纵横。整整6个小时，他扶着一根棍子倚在火前，不肯移动半步，老人的心久久沉浸在生离死别的极大悲哀之中。

夫人逝世的伤痛尚未抚平，新的灾难降临到甘地头上。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与阿米巴痢疾，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生命危在旦夕。16日，政府首次对外披露甘地的健康状况，此时已度过危机的丘吉尔政府不希望他在战争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死在自己的监狱里，5月5日，监狱长前来通知甘地，政府将于次日上午8点无条件释放甘地和他同囚的人。

第2天早上，钟声敲过8响，甘地手拄拐杖，获准走出了囚禁他1年9个月又15天的监狱，结束了甘地一生中最后一次囚徒生涯。截止当时为止，他已在狱中整整渡过6个春秋，共计2338天，其中249天在南非，2089天在印度。然而这一次的出狱，他的心情异常沉重，夫人生前一直盼着早日出狱，然而她将永远留在这里了。但他认为，夫人死得其所，因为她是为争取自由而死，虽死犹生。

甘地出狱后，前往孟买，住在一位富有的支持者的别墅里，身体渐渐康复，进而又开始投身火热的政治斗争。

印度的革命形势在甘地及国大党领袖被捕入狱后，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政府凭借武力很快控制了局势，国大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几乎完全停止了活动。在这个时候，穆斯林联盟实力增强，关于建立巴基斯坦主权国家的态度也日趋坚决。自由党人此时也积极开展活动。他们力图充当英印政府同国大党领导之间的调解人，主张用立宪手段解决“印度问题”，根据这个计划，英国人必须给予印度以自治领的地位，而不应把它分成两个国家。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妄想，因为当时英帝国主义根本无意对印度资产阶级作出让步。

国大党的许多领袖1944年初相继获释和5月6日甘地的出狱给印度政治生活注入了活力。

是年夏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通过沙甫诺和前马德拉斯省省督拉贾戈帕拉夏查理进行了谈判。谈判的目的在国大党领导方面是为了吸引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们参加争取立即成立印度责任政府的斗争，因为英国当局反对成立这种政府的主要口实是穆斯林联盟不参加这个政府。但谈判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1944年9月4日~27日，甘地和真纳在孟买进行了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以极秘密的通讯方式进行。由于真纳坚持要在举行公民投票前国大党就应同意穆斯林联盟建立巴基斯坦的计划，因而谈判失败。国大党和穆盟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对印度的前途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即将胜利，印度反英情绪高涨，印度各阶层人民要求完全摆脱英国统治的愿望更趋强烈，反帝群众运动也日趋激进。此时，国大党在建设性工作与议会斗争方面均趋活跃，它已放弃抵制中央议会策略转而与其他党派合作，多次击败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国大党的势力和影响上升。与此同时，为在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中获得利地位，英国忙于粉饰太平。为使印度有资格在联合国中取得一席之地，英国政府准备指派印度代表参与会议。

甘地表示抗议。4月18日，他在孟买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和平不可分的前提之一乃是印度必须脱离外国统治，得到完全的自由。”“和平的真义如果为大国所接受，则大英帝国主义者所指定的代表就不应为国际间所承认。这比没有代表更坏。在未来的旧金山会议中，印度必须自选代表出席，否则便不参加。”

此时，有关甘地及其与国大党关系的流言，又多了起来。5月4日，针对有人提出甘地是亲日派，主张释放尼赫鲁来代替甘地的领导的说法，甘地发表声明予以回击：“我坚持印度的真正独立，当然不会对日本或其他与英国作战的国家示弱。我的目的是经由不合作与非暴力结束英国或任何外人在印度的统治。”至于他与尼赫鲁的关系，他说：“应当知道我曾指定尼赫鲁作我的继承人，他毋需走到前台来，他已经在前台上了。政府不允许他做他要的工作。他和我是朋友，不是政敌，对于独立的观点我们没有分歧。我们是携手合作的兄弟，是忘年交。当然，政府释放尼赫鲁和其他政治犯，我们非常欢迎。”

## 九、独立与分治

1945 年下半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极大变化。反法西斯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秩序，推动了战后世界的进步。英国虽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却元气大伤，维持其庞大殖民统治的基础受到了严重削弱，经过反法西斯战争考验的一大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各地冲击着英国的殖民统治。

同时，随着战争胜利的来临，印度国内的革命形势也日益成熟。1945 年下半年起，罢工运动更趋活跃，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工人都转入了斗争。农民斗争也开始活跃，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差不多蔓延到印度所有省份。军队也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与骚动情绪。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经过 20~30 年代的政治斗争锻炼，影响强大且日益成熟。

长期经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冲击，至今心有余悸的殖民政府存新形势下不得不改弦易辙，加快了它的非殖民化

过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面临工农运动强大威胁的情况下，也急于通过与殖民当局的合作来解决印度的独立问题。

1945 年 6 月 14 日，印度总督魏菲尔发表广播讲话，表明了英国的立场。其要点是：英国政府不能将一个自治机构强加给印度，新宪法由印度自拟。同时政府将竭尽所能根据现行制度，与印度人民及各教派合作；中央政务会议（行政议会）即将改组，除总督及统帅外，所有其他委员均由印度人士担任，印度政治领袖、印度教及穆盟领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长及国外代表也考虑由印度人充任；总督准备立即召集会议，以便改组行政议会，会中将由各党领袖、各省现任及前任首席部长提出政务委员会参考名单；中央合作，各省自当推行责任政府制。

25 日，改组行政议会的筹备会议由总督主持在西姆拉举行。国大党的活动家中，除甘地外，有尼赫鲁、帕迭尔，他们是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尽管真纳认为国大党只能代表印度教派，坚决反对国大党穆斯林代表出席会议，但阿萨德还是应邀出席了西姆拉会议。甘地没有参加会议，他主要在会外指示。

出席会议的各派代表依总督建议，提出了组成政务委员会人选的参考名单。国大党坚持其名单中要包含 2 名国大党籍穆斯林的代表，即萧克·阿里与阿萨德。真纳则要求议会中的穆斯林成员都必须由穆斯林联盟提名。双方立场不可调和，使会议再陷破裂。

1945 年 7 月 26 日，为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的丘吉尔保守党政府因漠视人民进步要求与顽固坚持帝国主义政策而被主张改革的工党政府取代。工党政府针对新形势下殖民统治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的现实情况，决定加快推行英帝国非殖民地计划，他们认为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从印度开始。

8 月 21 日，英国政府宣布印度中央与地方议会选举将于 1945 年~1946 年冬季举行。9 月 19 日，新任首相艾德礼发表广播讲话：一旦印度选举完毕，经与各方代表磋商后，英国将尽速促成印度的制宪机构，使其立即考虑英印关系的最后安排，同时希望政务委员会早日建成。

9 月 18 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孟买会议通过决议：主张由民选的制宪会议制定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印度宪法。印度应组成联邦，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应列专章载入宪法。

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他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主张，协助英国人解决印度问题，以保证英国政权平安地移交给以国大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手中，防止爆发内战以避免英国在印度泥足深陷。

甘地为“不辱使命”，立即开始在各地旅行演讲，宣传他的非暴力主张和社会政治观，既为防止独立时刻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宗教冲突与流血事件，也为防止工人阶级暴力斗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针对当时共产党与社会党十分活跃的形势，甘地竭力宣传自己不同于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政治思想：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说如果他们执政，就可以强迫平等；依我的计划，国家应照着人民的意志行事，而不是强迫人民屈服于国家的意志。我劝人民接受我的主张，用爱胜恨，用非暴力求得经济平等。我并不需要等到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我的主张才开始实行，我自己首先来作。我并不认为假如我有50辆汽车、1000亩土地便不能作到经济平等，我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减到与穷人相等，这便是过去50多年我所努力的。

针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人类又面临原子弹威胁，非暴力再次面临挑战的情形，甘地仍表示他对“非暴力”坚信不疑。“在真理与非暴力面前，原子弹不发生丝毫作用，而且二者间截然不同。一个代表道德的精神力量，一个代表纯物质的力量。要比较他们之间的优越性，就看到何者能达到有价值的目的，精神力量是进步、无止境的。它的发扬可使举世无敌。同时这种力量存在于每一男女老幼身上，不分肤色，不过有的是潜伏着，只需加以适当训练，便能奋发。我们如果不承认真理，不实现真理，就难逃自我毁灭。”

印度独立的曙光在现，令甘地精力充沛，情绪高昂。他不仅不辞辛劳，往返各地演讲，鼓吹非暴力，而且还不时激发印度人民的生活热情。他一再说他能活到125岁。他解释道，人类的身体是为了服务而不是为了享乐而存在的。生活愉快的秘诀就在为而不有，为而不有便是生活。享乐加速死亡。所以人如服务而不计收获，便有权且应能活到125岁。这样的生命应该是完全贡献于服务，为而不有所获的至乐来自内涵，所以非任何人所能剥夺，因此便没有忧伤与苦恼，如果不是这样，长寿实不可能，即使可能，也不值一文。

1946年，印度各地饥馑肆虐，由于严重粮荒及医疗设备的缺乏，印度的死亡人数大增。甘地亲临灾区安抚民心，推广他在南非所实验过的自然疗法，并正式在乌诺里创办一所自然疗养院，亲自指导。他要人们注意吸收新鲜空气，保持户外睡眠和正确睡姿，注意讲究卫生，保持房屋、厨房、厕所以及周围环境的清洁整齐。

甘地不愧为印度各种苦行先知中的典型代表。为促进解救“贱民”工作，从1946年3月起，他决定无论到哪里，都将尽量住进“贱民”区。为此他特在3月31日的《哈里真报》上发表文章，说明他此举的动机。他说自己曾多次讲过要自视为“贱民”，但一直未能以身作则，言行相符。听说古吉拉特和卡拉底西处的“贱民”只有一口水井、一座庙的消息，他深为所动而决定住进“贱民”区。他希望这样能起到榜样，让全社会都善待“贱民”。

甘地的行动引起一些印度教徒的不满。4月1日，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准备住进“贱民”区，当日便有50多人手举黑旗，叫着反国大党的口号，向甘地投掷石子，试图阻止甘地。甘地不为所动，还是毅然搬进了一间仅容一人活动的陋室。服务人员只得在室外另搭帐篷。不过，甘地并不认为这样就算与“贱民”同甘共苦了，因为他清楚这里是特意整理过的，而一般的“贱

民”区则还要糟糕得多，所以他希望将来可以随意住进任何“贱民”区。

1946年2月，发生了孟买水兵起义。鉴于印度反帝斗争日趋高涨，英国政府决定尽快给予印度以自由独立，以免夜长梦多。它立即派出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勋爵、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阿·维·亚历山大先生组成的一个内阁大臣特别使团前往印度，和印度政治领袖讨论关于建立一个制宪机构和产生一个有主要政治党派支持的行政议会的事宜。3月底，这一使团已抵印。4月，代表团将与各方领袖在新德里共商此事。全国人民正翘首盼望这一时刻，世界人民也都关注着这一重大行动。

4月中下旬，甘地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德里与内阁代表团连续举行会议，但未达成协议，预定留待第二次西姆拉会议中商榷。

4月29日，甘地以《独立》为题撰文，展示了他对独立的理解：独立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独立。政治的独立是必须撤走任何形式的英属管制；经济的独立是不再受英国的资本和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印度的合伙人在内。换言之，最卑鄙的应该与最高贵的平等。这只有资本家以其技术与资本和最贫弱的人共享才能办到；道德的独立是必须取消国防军。“我的人生天国不允许以印度兵代替英国兵，国家如靠军队保护，国民的道德决不会好。如果内阁代表团是来推销货物的，印度便应当抉择。如想变成军国主义，则多年以后，印度可能成为第五大强国，而毫无贡献于世界。如果选择以非暴力为政策，则终必能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且能以其首创的自由，拯救世上其他被压迫民族。”

1946年4月27日，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爵士要求国大党与穆盟各派4名代表出席与内阁代表及总督的谈判。国大党派出了以阿萨德、尼赫鲁、迦法罕及帕迭尔组成的谈判阵容。甘地应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内阁使团的邀请参与了西姆拉会外协商。这次会谈和以往各次会议一样，因印度两大政党无法达成协调而破裂。最后英国代表团于5月16日宣布了他们自己的方案，提议以建立印度教徒区和穆斯林区作为和解的基础。这个方案要点是：英属印度各省组成联邦政府，掌管外交、国防、交通与财政，各省享有完全的自治，掌管除联邦权利以外的一切事务。印度教占多数的省区组成印度教联区，穆斯林占多数的省区则组成穆斯林区。各省完全自治和基于联区组织的规定意味着给予穆盟以“巴基斯坦”之实。

对制宪机构的选举机构规定也是以教派划分为基础，每一个省立法议会的议员分成3个主要教派组成的集团，按一定比例，选举他们自己参加制宪机构的代表。

至于印度各土邦，当新宪法生效时，英国政府将停止实施最高权力。这样，在法律上土邦可以自由加入印度联邦或保留他们的分散、独立状态。

甘地当然理解这份方案的实质，不过他内心清楚，由于教派冲突及英国殖民者长期统治造成的后遗症，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要双方尚能保持在统一的民族国家之内，他准备接受并努力维持这种局面。所以，他虽不满于该方案，却认为该方案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他表示理解英国的苦心经营，认为方案起草者并非草率从事，而且主观上也是想撤走时留下一个团结的印度。甘地积极呼吁各党各派能赞成这一计划。

6月初，穆盟表示同意调查团的方案，并宣布了它将根据已提出的条件参加临时政府的决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经讨论研究，也于6月26日由主席致函总督，表示决定参加拟议中的制宪会议，同时希望能尽早成立过渡时期

的政府。29日，当甘地赶火车前往浦那时，有人预先埋好炸弹想置甘地于死地，结果机车受损，甘地则无事，这是甘地第7次幸免于难。

在浦那作短暂停留后，甘地赶往孟买参加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对6月26日德里决议的表决。这次会议上左派势力对决议强烈反对。甘地在会中致辞，尽力说明参加制宪会议是唯一正确抉择，尽管建议中的制宪会议并非代表人民的国会，有许多缺点，但是作为久经考验的战士，不应求全责备，应该有勇气接受挑战而不是消极拒绝。

7月7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以204票对51票批准工作委员会所已采取的步骤。

随着独立临近，一些人的私欲急剧膨胀，开始为在未来的政府中捞一官半职而挖空心思。许多人写信给甘地，要求被提名竞选为议员。甘地公开撰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现象，他提醒人们切莫对他的影响力存在丝毫的期望。他指出：以为这样的选举含有教派斗争的意义，是错误的想法；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制宪会议的议员，也是错误的想法；认为只要能作工人运动的人就可以把握一个服务的岗位，而且是很光荣的服务，这也是很错误的想法；希望借此赚钱生活，那更是荒谬的想法。制宪会议的议员们至少要了解各国的宪法和议会政府，特别是要懂得印度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立法。倘以为只要争到一个席位，那才是真正的服务，便是低劣的念头，真正的服务是在议会以外。

这一时期，甘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阐述他对国际时局和印度独立问题的看法及他的非暴力理想。

内阁使团的计划曾为各党派接受，因而制宪议会的选举于1946年7月在全印举行。在210个“一般人”的席位中，国大党获198席，在78个穆斯林席位中，穆斯林联盟获得73席。另外的若干席位被国大党所提名的人和国大党的同盟者所获得。这种情况使真纳大吃一惊。7月29日，穆斯林联盟决定撤消对内阁使团计划的同意，同时准备“借助于直接行动来建立巴基斯坦”，并决定以8月16日为“直接行动日”。

8月16日，一场空前规模的仇杀事件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发生了。事件发生在加尔各答城，持续24小时之久，殖民政府听任其发展，没有警察出来维持秩序，甚至连交警也消失了。加尔各答大屠杀时，诺阿卡利县也爆发了流血冲突，内战阴影笼罩在印度。甘地深感愤怒，他即写下《暴力有何用途》的社论，谴责加尔各答的暴力行为。他说：暴行的结果，只会延长英国的统治，英国人是要在印度和平的状态下，将政权交还给印度手里。假如我们用得着英国的刀枪，他们是不会走的。就是他们走了，别的外国人也会取而代之……假如每一次当英国人的刺刀亮出来，我们便得意扬扬地鼓噪，那便是大错特错了。无疑的，有人是在这样做了。我们必须悬崖勒马……。

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注意到局势的严重性，于8月27日至30日紧急讨论后通过决议，呼吁大家尽力阻止暴乱，维护和平，要能宽容并忘记已有的痛苦，同时利用惨痛的教训，在最近发生的不和关系中，重建教派间友善的关系。

9月2日，尼赫鲁组成了一个由国大党提名的临时政府，尼赫鲁任临时政府总理。在这一历史性时期，甘地呼吁国人捐弃前嫌，要善待英国人。不论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是兄弟手足，必须相亲相爱。同时，甘地对临时政

府该作些什么事部一一予以指点，他认为临时政府就职后所作的首先是取消盐税，其次是致力于教派间的亲善，其三是解放“贱民”，最后便是土布运动。他特别强调自治以后的印度是推广土布运动的最好时机。他主张由政府禁止机器布进口，并且不准设立新的机器织布厂。甘地也反对由政府来合营机器布厂，以免资本家剥削工人。他认为机器布厂本身就是坏的东西，政府不应出资经营，政府应鼓励民间土布，好让全国人民服用。他的这种观点无疑得不到新政府的拥护，甘地也意识到他的呼吁就像是旷野的孤鸿，已难发挥作用，但他自己仍是坚信的。

临时政府成立后，穆斯林联盟在真纳领导下，没有参加制宪会议，也没有参加临时政府，后来由于总督的从中调停，其代表于9月底加入临时政府，但它未放弃抵制制宪会议策略。甘地忧心忡忡，他感到黑夜茫茫，看不到一线光明，50年来呕心沥血为之奋斗的真理、仁爱、非暴力原则看来已失去他所赋予的意义。

1947年新年伊始，穆斯林领袖们要求分治，不少英国人也对此表示同情。甘地认为印度各族人民及其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块经纬交错的东方地毯不可分割，他决心为维护统一贡献余热。这一次，他准备像古代印度贤哲一样，游说四方，祈求神明拯救印度。

1947年1月至3月，甘地在孟加拉的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村。3月4日转往比哈尔各地，4月1日回德里。

甘地每次抵达一村庄后，首先走进一间茅屋，当然最好是穆斯林居住的茅舍，请求主人予以款待，如遭拒绝就找下家。如果大家都不接待他，他就到树荫下歇脚。甘地依靠村民施舍的水果、蔬菜、山羊奶和椰子汁等度日。

甘地每天凌晨2点起床，诵读《薄伽梵歌》，然后进行晨祷。之后，他蹲在地上，用铅笔书写回信。据说他的每一支铅笔一直要使用到手握不住笔头才肯扔掉，因为在他眼里，铅笔是某个兄弟的劳动成果，如果浪费它，意味着对别人劳动成果的无动于衷。每天清晨同一时刻，他饮用掺盐凉水，清洗肠壁，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因为甘地热衷于自然疗法，他相信这有助于消灭肠内毒素。及至日出，甘地便走出茅屋，边散步边和村民们会晤交谈。

甘地的苦行游说不仅仅致力于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隔阂，呼吁他们和睦相处，而且他还相机行事，涉及更广泛的内容。对他来说，印度是由广大的穷乡僻壤、交通不便的农村组成，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印度农村。他殷切期望新生的印度深深植根于广大农村，为此必须使它们摆脱陈规陋习，诸如要注意饮水卫生，讲究个人卫生，利用日光浴，建造公共厕所等等。每晚他还要举行祈祷大会，同时邀请穆斯林参加。有时晚祷会上愤怒和不满的叫声震耳欲聋，甘地不得不双手塞耳，但他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和控制局势的能力。晚祷会上，他先读《薄伽梵歌》，然后有意识地背诵几段《可兰经》经文，会上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问。多年来晚祷会已成为他与群众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晚祷会的话题除宗教仪式外可以说无所不包。在这里，甘地曾宣传过糙米的营养价值，抨击过原子弹罪恶，畅谈过《薄伽梵歌》的壮美，也讨论过禁欲的深义，鞭挞过近代文明的罪恶，宣传过真理与非暴力学说。甘地每天的讲话，经过各种途径传遍印度各地。

启程奔向另一村庄时，往往是甘地在前面疾走，后面紧随一帮信徒，抵达目的地时，甘地赤裸的双脚已鲜血淋漓。几十年来，为实现印度的民族解放事业，甘地拖着这双伤痕累累的脚，走遍印度各地的偏僻地区，巡视成千

上万的农村，穿行在肮脏不堪的麻疯病人和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贫民窟中。

甘地的执著、认真，令他的国大党同志不能苟同。一向认为甘地做事不分轻重缓急的尼赫鲁谈起他敬爱领袖的巡视活动时说，甘地弄错了事情，他希望在伤口上敷点药膏就能医治整个印度的躯体，而不愿诊出引起疾病的原因。

当甘地正在印度各地为平息冲突奔走呼号，为医治裂痕清洗创口的时候，印度的政治局势迅速变化，整个国家的分治已日益迫切。

1947年2月20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宣称它的明确愿望：不迟于1947年6月，把权力转移给负责的印度人手里。

3月，刚刚卸任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统帅蒙巴顿继任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这位声名卓著、仪表轩昂的海军上将的使命是尽快地安排英国撤离印度，以免陷入更大的麻烦之中。

蒙巴顿计划是与印度3位主要领导人进行单独谈判。如达不成协议，他将让印度分治。他首先会晤了身为英属印度总理的尼赫鲁，他们两人很快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即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分治印度必将导致一场悲剧。

新任总督要实施他的计划，必须取得甘地同意，他认为，甘地虽然未在临时政府和国大党内任职，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却影响和支配着国大党的政策。而且，甘地在分治问题上态度坚决，他曾说过只要一息尚存，决不同意分治，所以蒙巴顿早在登基大典之前，就亲自致函甘地，邀他前来会晤，还主动向甘地表示，愿派专用飞机把他从比哈尔省接到德里。甘地婉言拒绝“年轻人”的盛情，表示愿像平常一样乘坐三等硬座车厢旅行。

1947年3月31日甘地与蒙巴顿的第一次会晤历时2小时，虽未取得重大成果，但双方建立了亲切友好的关系。

甘地第2次觐见蒙巴顿时，初夏时节的德里已炎热逼人。当甘地骤然从骄阳似火的外面走进凉爽宜人的蒙巴顿办公室时，顿时冻得浑身发抖，蒙巴顿不得不关闭空调，并取来一件宽大的皇家海军粗呢绒衫披在瑟瑟颤抖的甘地身上。

蒙巴顿早已耳闻甘地是位桀骜不驯的对手，知道他工于心计，极善使对手陷入被动，同时又精于使用变幻莫测的思维方式，使谈判的对手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因此，当蒙巴顿开始同甘地正式谈判时，难免心怀戒惧。他向甘地指出，英国历来的政策是决不屈从武力，但是鉴于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已取得胜利，英国现已决定撤离印度，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甘地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请您不要分裂印度，即使这一拒绝会招致一场血战。”

蒙巴顿说：“分治乃是我打算采取的最后一步棋，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办法？”

“您可以把整个印度送给穆斯林，但千万不能分裂印度，请您委托真纳及其同僚组成政府，把英国的主权移交给他们。”

蒙巴顿为甘地的此种建议惊愕不已。他心情不安地问：“您根据什么理由认为，您的党会接受这项建议呢？”

“因为国大党首先希望避免分治。”

在蒙巴顿看来，甘地的建议纯属空想，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为尽快从印度脱身，他也准备试一下这种可能性。蒙巴顿最后说：“如果您能正式

保证，国大党确实打算批准这项方案，同时准备诚心诚意地通力协作使之付诸实施，那么我也担保将予以答复。”

甘地从沙发上跳起：“我完全是肺腑之言，如果您同意此项决定，我打算周游印度各地，说服人民接受这项方案。”

数天之后，甘地召集国大党的领袖们到他栖身的一处“贱民”区的破房子里开会，他试图说服这些由他一手培养并安置在领导岗位的国大党现任领袖。

虽然甘地再三呼吁，费尽口舌，始终未能说服尼赫鲁以及国大党的其他负责人。这些 25 年来始终不渝拥戴甘地，为他的事业脱掉西装，身着土布，手摇纺车，解救“贱民”，并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昔日同志，虽然过去有过分歧，但共同的斗争曾使这一切分歧退居次要。而今在独立已成为现实，政权唾手可得之时，甘地要他们把胜利成果让给对手，是无论如何难得被说服的。因此甘地与他们之间再次出现严重裂痕。最后甘地只好无可奈何地动身前去告诉蒙巴顿这一结果。

实际上，当时操纵着印度命运的最关键人物是那位多年来为维护印度穆斯林利益坚韧不拔的人物真纳。1947 年 4 月上旬，总督和真纳共进行了 6 轮关键性会晤，在这些决定印度命运的会晤中，无论蒙巴顿怎样善于雄辩，工于心计，都丝毫未能打动对方建立巴基斯坦国的决心。

真纳认为，印度目前已超越讨价还价的阶段，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解决巴基斯坦问题，他对蒙巴顿表示：此项手术一旦结束，动乱即告终止，两国从此将和睦相处，就像两兄弟为对家父遗产分配不均而打官司一样，法院判决 2 年之后，一定又会重归于好，亲密无间。他还进一步强调，印度从未形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国家，它不过是在地图上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出现而已，而印度穆斯林构成一个国家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它拥有自己的文化、文明、语言、文学、艺术、建筑、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历法以及明显的历史和传统特征。

他提出，为了建立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穆斯林居大多数的省份必须全归巴基斯坦。在这些问题上，真纳的态度十分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

4 月 11 日，蒙巴顿和同僚一起研究分析了时局，便起草分治印度方案。他很快召集了英属印度 11 个省督，向他们介绍了分治计划的概况，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下一步的问题是争取国大党的同意。甘地显然对分治计划满怀忧虑，但是情况表明，他已不能对国大党领袖们发生作用，一般的国大党领袖认为分治虽令人痛心，但还是愿意选择分治换取独立。此时最为难的是尼赫鲁。尼赫鲁对甘地非常尊重，圣雄在良心深处对他的呼唤不可等闲视之，再说他也本能地反对分治；但理性又告诉他，分治乃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最后，蒙巴顿的分治计划得到尼赫鲁及国大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1947 年 5 月 2 日，蒙巴顿的助手伊斯梅前往伦敦呈送印度分治方案，交由国王陛下政府批准。蒙巴顿向印度领导人宣布，将在 5 月 17 日，当他返回德里后，向他们公布解决方案。

方案送抵伦敦后，蒙巴顿邀尼赫鲁去西姆拉作客并向他透露了方案副本，尼赫鲁研究过方案后，立即致函蒙巴顿，认为这一方案给人一种制造分裂，孕育冲突和混乱的强烈印象，因而它必然会遭到国大党的严厉谴责和断然拒绝。

最后尼赫鲁和蒙巴顿对方案进行了修改，删去了一些条款，赋予 11 个省份和各王公土邦唯一的选择：或者与印度合并，或者加入巴基斯坦。磋商完毕，蒙巴顿指令火速起草一份新的印度独立方案，其基本精神不变——分治印度，责任要由印度人承担。

5 月对于甘地是一段苦难的日子，印度分治已成定局。可是国大党的同志们不顾他再三呼吁，已接受了分治作为换取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使甘地神情沮丧，心灰意冷。甘地第一次对自己失去信心，担心人民将不会与他一道前进。

5 月 8 日，甘地致函蒙巴顿，希望英国人不要分裂印度，并认为任何情况下瓜分孟加拉和旁遮普都是错误的。同时提出英国不应交权于土邦，以免造成其独立，而应还政于国家等 11 点要求。

6 月 1 日，总督从伦敦回到德里，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全国的空气再度紧张。2 日，蒙巴顿召开印度各领袖的圆桌会议，为了防止把会议变成一场讨论，蒙巴顿独揽了会议的发言权。他向与会者叙述了自己临危受命的来龙去脉，扼要阐述了方案的要点，并只给与会者一天的考虑时间。

为防止甘地在这一关键时刻挫败他的方案，6 月 2 日中午 12 点 30 分，即在圆桌会议结束后的 1 个半小时，总督在办公室约见甘地。这天正是甘地静默日，当蒙巴顿叙述完方案后，甘地从“拖地”的下摆里掏出一团破旧信封和一支短得可怜的铅笔头。甘地舔舔铅笔心，开始书写答复，他写满了 5 张信封的背面，大意是：“我为不能和您谈话感到难过，当我决定每一静默时，我规定必遇下列两种情况方可破戒：一是与主要人物商谈紧急要事，二是医治病人，我心里明白，今天您不希望我打破静默，但我有一二件事需秉告于您，然而今天不宜交谈，如有机会，来日再谈。”写完之后，甘地起身离去，这意味着他暂时保持沉默。

6 月 3 日，各派领袖集会，再三表明他们赞成分治的态度。当日晚上，总督蒙巴顿和各教派代表走进新德里广播电台播音室，向各自代表的人民宣布，印度已划分为 2 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6 月 4 日，甘地准备在当天晚上的晚祷会上公开谴责分治方案，蒙巴顿得悉这一消息，急忙派特使前往甘地处，邀他前来觐见。

蒙巴顿使出浑身解数，力图说服甘地相信蒙巴顿方案的精神也合乎甘地一直主张的让印度人民自由选择的思想。因为方案规定，由各省人民选举产生的省议会 will 仲裁每个省的前途问题，各省议会举行投票，决定本省加入印度或与巴基斯坦合并。甘地听了似有所动。

在当日的晚祷会上，面对水泥平台前摩肩接踵前来聆听他发表反对分治方案宣战书的听众，甘地没有发表任何谴责言论，在独立前夕、分治在即的非常时期，甘地表现了极大的冷静与理智。当有人向甘地提出疑问，他是否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再一次绝食时，甘地表示，他现在不能听任何人的指使来绝食。这种绝食不是随心所欲的，也是完全不需要的。不能因愤怒而绝食，愤怒仅次于疯狂，除非来自神谕。他是国家的公仆，因此也是国大党的仆人，不能因为国大党的主张与他不同就绝食，他必须冷静观察，再作行动。他表示愿和真纳前往乱区。他请求参加晚祷会的听众们和那些批评家，宽恕国大党，宽恕穆盟，宽恕他自己。

由于分治，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种意见和想法包围了甘地。有不少人对分治不满而迁怒于甘地，认为正是甘地迁就真纳，才造成今天的局面。

也有不少人拿甘地曾经说过的一些前后矛盾的话，质问甘地，认为他现已软化，向虚伪低头。6月9日，甘地用书面文告，说明他为何不积极反对国大党接受新的分治方案的原因。他说：“我得坦率承认，我已成为或已被认为是落伍的人物了。我们都忘记了过去30年的教训，我们也忘记了唯有真理可胜过虚伪，非暴力才能战胜暴力；坚韧可以克服浮躁；冷静可以镇压激动。我们已开始畏惧自己的影子了。很多人请我来领导反抗，但除了反抗一事外，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的反抗动机和我完全不同。爱与恨怎能合作呢？”他安慰人们不要悲伤，不必恐惧，因为没有人能强迫他们改变信仰和地位。

国大党全印委员会6月14日~15日在德里举行会议，讨论6月3日的分治方案。会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土邦问题。会议作出决议，不准许印度任何一个土邦有宣布脱离印度独立的权力。甘地的态度也很明确，他认为，不过问土邦的时代已经过去，独立来临之际，任何不顾整个印度利益，不顾人民意愿的土邦王公们将得不到允许。会议在审议通过6月3日分治方案时，赞成与反对的人意见尖锐对立，争执不休。甘地力劝大会接受分治。他说，既然主席和工作委员会已同意，我劝大家必须通盘考虑，慎重行事，不要轻易否决。因为接受与否，不只取决于国大党一方，还有英国、穆盟，在各方已接受方案时，国大党却反悔，显然不当。最后，大会批准了工作委员会决议。

此一时期，甘地不断接受来访者，回答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疑问、误解和谴责，安抚他们的担心，并不断撰文著述和利用晚祷会表明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还亲自前往难民区。

6月29日，甘地写《权利与义务》一文，在论及印穆关系时，他说，印度教徒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邻居的义务就是要和他交朋友，欢乐同享，患难与共，只有这样做，他才能有权希望得到穆斯林朋友的善待。假如在一个印度教徒占多数的村里，只有少数穆斯林杂居其间，那么，这多数的居民就有义务特别善待异教邻居，让他们感到并不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受歧视。然后，印度教徒才有权希望作穆斯林的朋友，在遇到困难时得到他们的通力合作。至于王公和人民，也应遵守同样的原则。王公的义务是作人民的仆人，他们不应凭外国政府所赋予的权势来统治，不应依仗刀剑来统治。他们应以服务为权利，以最高的智慧来治理。假如王公们不能履行此一简单的基本义务，则老百姓不仅不必服从，而且有义务反抗暴政。但如用谋杀或强取豪夺的方式履行反抗的权利，那便是犯罪。唯有经过非暴力与不合作的精神力量，才是实践上述理论的力量。

7月4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并明确规定：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自治领将分别独立。届时，英国政府将放弃英属印度政府任何领土上所负责任及国会在两个自治领内的管制。同时，英国在印度土邦及边远地区的最高权利，也予放弃。

随着独立与分治临近，各种不祥之兆开始大量出现。在印度全国管理上堪称首屈一指的旁遮普省，悲惨事件开始露头。全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已失去安全保障，暗杀和洗劫浪潮席卷拉合尔城。由于土著警察多开小差，维持治安的只是少数英国警察。

就在国大党发布指示，准备在8月15日那天关闭所有屠宰场，全国电影院免费开放，各地学校为学生发放糖果和纪念章的同时，恐怖组织也发出行

动指令。如旁遮普刑事调查部获悉，一小群锡克族的极端分子，已与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组织串通一气，准备联手采取恐怖行动。锡克人担任炸毁开往巴基斯坦的专用列车的任务，印度教徒则乔装成穆斯林，潜入卡拉奇城，埋伏在8月14日真纳乘车离开国民议会前往官邸的沿途，伺机刺杀巴基斯坦之父——真纳。

在人口稠密、管理混乱，素以血腥和恐怖事件著称的加尔各答城，前景更是不妙。这里的街头巷尾除了往昔的肮脏、贫穷和悲惨外，到处充满了血腥与恐怖的幽灵。1年前的大屠杀使这里的宗教仇恨愈演愈烈，此刻双方正摩拳擦掌，随时准备血洗这座拥有250万人口的印度古城。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事件，将会引起一场血流成河的大屠杀。

还有最易引发巨澜的秘密尚未揭开，这就是旁遮普和孟加拉最后的边界划分。8月13日，这一结果已送至总督府，但为了防止在8月15日这天引发灾难性事件，总督吩咐下属，在8月16日之前实行严格保密。

为了对付如箭在弦的暴力和流血事件，蒙巴顿在旁遮普已派遣部队增援，同时发布48小时宵禁令，还决定建立一支由55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但是，如何遏制加尔各答可能爆发的疯狂暴力行为，蒙巴顿无计可施。最后，他灵机一动，找到了他认为唯一有效的武器。7月底，蒙巴顿会晤甘地，希望他能发挥他个人的威望和非暴力学说，遏制可能出现的大屠杀。他解释说，在旁遮普军队的支持下，他尚可控制该省的局势，但如果加尔各答发生骚乱，整个城市将会化为灰烬。除蒙巴顿外，当时的孟加拉省省长、穆斯林领导人赛义德·苏拉瓦尔蒂也前来向甘地求援。

甘地早已预见印度独立时会有一场大规模灾难性事件发生，而绝不可能像兄弟俩分家产那样分手道别，所以他已打定主意，在印度独立的日子进行祈祷、纺线，并在位于孟加拉南部的诺阿卡利县惶恐不安的少数族居民中绝食。就在甘地准备动身前往诺阿卡利县的前一日，苏拉瓦尔蒂急冲冲地赶来见甘地，恳求甘地不要抛弃加尔各答。他表示现在唯有甘地能拯救加尔各答，平息时刻威胁该城的强大怒潮与燎原烈火。

为了群众的利益，甘地历来不惜冒险甚至贡献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欣然同意留在加尔各答，但他也提出两项条件：首先，苏拉瓦尔蒂必须向诺阿卡利县居多数的穆斯林作出庄严保证，绝对保证印度教居民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一名印度教徒遭到杀害，甘地将绝食至死；第二，苏拉瓦尔蒂必须日夜和甘地住在一起，生活在加尔各答城最肮脏不堪的贫民窟中心，同时不带任何武器和保镖。在贫民窟内，两人一起用生命作抵押，以换取加尔各答城的平静。

1947年8月13日下午，甘地来到加尔各答印穆杂居的乱区贝利亚加达大街，下榻在一处穆斯林的老宅——海达利公馆，据说该屋的主人是在去年的血洗中被印度教徒所杀。这里年久失修，已成虫蛇、蟑螂出没之地。

印度教徒对甘地寄居穆斯林居所十分震怒，他们聚在甘地的房子外高声抗议，有些年轻人还厉声质问甘地为什么去年印度教徒遭屠杀时他不出来，而现在却要保护穆斯林，甘地出门时，也经常有人向他投掷石头与砖块。

甘地极善驾驭群众情绪，他时而声色俱厉，咄咄逼人；时而缄默不语，以不变应万变。初到贝利亚加达大街时，群众围在车外投掷石头、砖块，甘地索性打开车门，面对示威群众高喊：“你们恨我？好吧，我来了。我是为捍卫印度教徒，也是为捍卫穆斯林而来！你们有权反对我，如果你们愿意这

样做的话。我的一生也快到头了，我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但是，与其看着你们陷入疯狂中，还不如我马上死去。”领袖的威仪使人们的急躁情绪逐渐缓和下来，而后，他便循循善诱，耐心细致地进行说服疏导工作，暴怒不安和惊恐万状的人都能从他温和、质朴而饱含真知灼见的语言和大慈大悲的胸怀中，感受到宁静与慰藉。

8月14日，在真纳参加巴基斯坦成立的盛大庆典时，加尔各答没有出事，甘地住处周围尤为平静。甘地像平常一样在为印度祈祷。下午5时，甘地骨瘦如柴的身影在他的两根“拐杖”——侄孙女摩奴与阿巴的左右搀扶下，出现在海达利公馆门口，参加每日一次的晚祷。

独立和分治前夜的最后一次祈祷活动盛况空前。这是甘地在充满仇恨的加尔各答举行的首次群众祈祷活动，前来参加者达1万人之众。甘地在会上宣布：“从明天起，我们将摆脱大不列颠的桎梏，但是从今日子夜起，印度将一分为二，喜庆之时也是痛苦的日子。”“如果加尔各答恢复理智，维持手足之情，那么整个印度也许能得救。但如果兄弟残杀的战火蔓延到全国，我们刚刚获得的自由将不复存在。”他表示他本人不参加独立庆祝活动。在他看来，虽然祖国独立值得庆幸，但国家分治，兄弟相残，人民缺衣少食，领袖殚精竭虑之时，应该向人民忏悔，向神祈祷。他要求他的弟子们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同他一样为印度的解放绝食24小时，并且祈祷、纺纱。

8月14日午夜时分，苦难深重的印度终于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枷锁，宣告独立。在这庄严的时刻，印度议会代表团正式进驻新德里王宫，接替政权。卜纳沙德以新的立法议会主席资格，郑重邀请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出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督。新总理尼赫鲁对全国发表划时代的演说：“多年以前，我们曾相信命运，如今命运注定的时刻已经来临。午夜时分，当世界正在酣睡之中，印度奋起获得了新生和自由。一个历史上罕见的时刻业已来临，这正是我们告别旧世界，迈向新世纪，宣告结束一个旧时代，一个长期备受压抑的民族心灵获得解放的伟大时刻。”在这历史性的讲话中，尼赫鲁代表全印人民表达了对甘地的崇高敬意：“在今天，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自由的缔造者，我们的国父。他弘扬了印度立国的传统精神，高擎着自由的火炬，驱散了四周的黑暗。我们时常不配作他的追随者，违背他的指示，但不只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均将铭记国父的指示，铭记这个伟人，他的信心与力量、勇敢与仁爱的精神。我们将决不让自由之火熄灭！”

在印度举国上下庆祝独立与新生的历史性夜晚，独立印度的缔造者，在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实现的时刻，却孤独地躺在海达利公馆地上的草席上沉睡。

8月15日，加尔各答市民川流不息、成群结队地来到海达利公馆，向他们的国父表示由衷的敬意。但甘地却不愿抛头露面。当政府宣传广播部派员来进行录音访问时，他表示自己无话可说。随后英国广播公司来人要求甘地向世界听众讲话，他希望来人忘记他是懂英文的，他将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他对祖国新生的祝愿：绝食、纺纱、祈祷。祈求神灵保佑正深陷苦海的人民。

独立之夜，灾难事件首先在古城拉合尔发生，大规模的仇杀开始在旁遮普全省蔓延。蒙巴顿为维持旁遮普秩序而建的55000人的别动队紧急出动，却只见成片的尸体和熊熊燃烧的火焰。首都德里和孟买东南的浦那城，也开始出现了威胁、恐吓和骚乱，一些狂热的极端分子还发誓要为印度复仇，铲除甘地。

独立之夜的加尔各答却出奇地平静。由于甘地的祈祷，暴力之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智与宽容，24小时前还准备互相切断对方喉管的狂热分子一起上街游行。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女人和孩子互赠甜食。

甘地丝毫没有陶醉于暂时的胜利，他在公馆里一边手摇纺车，一边接待前来会见他的各色人等。这天下午，有3万人赶来参加晚祷会。甘地坐在临时设置在一片空地上的木制讲坛上讲话。他高度赞扬和感谢众人在加尔各答所表现出的理智与宽容，也希望大众再接再厉，成为全国的榜样。晚祷会后，甘地与苏拉瓦尔蒂乘坐陈旧的雪佛莱汽车绕城一周，亲眼目睹了人民庆祝节日与印穆亲善的真实情形。8月16日，甘地以《奇迹或偶然》为题，发表重要社论，阐释加尔各答的奇迹是因为“喝过仇恨之酒，再接受了友爱的甘露，将更应珍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16日，揭开新国家边界走向的时刻来临。这天清晨，蒙巴顿把新的边界走向结果交给了双方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列雅格林·阿里汗。新边界的公布乃成为各种悲惨事件总爆发的引火线，各种难以想象的过火行为顷刻之间在这两个新生的国家爆发出来，印度北部为之陷入了一场持续一个半月的疯狂厮杀和混乱之中，到处是少数袭击多数，报复报之以反报复。政府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警察部队瓦解了，行政机构的权威消失了，它们甚至不能指望部队效忠。滥杀造成50万无辜平民丧生，不到半年，从印巴两自治领相互逃亡的人数达1200万之多，这次空前的逃难造成的难民比“二战”造成的流离失所者还要多4倍。

## 十、最后的祈祷

时至 1947 年 8 月底，印度独立刚满半月，旁遮普省的 12 个县已在血泊与火海中挣扎了 2 周，倒是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因为甘地的坐镇一直没有爆炸。参加甘地祈祷会以空前规模在扩大，1 万、10 万、继而 50 万，甚至高达 100 万，在一个宗教狂热的国度里，当亿万信徒聆听一种声音的时候，它所创造的奇迹与神话可想而知。甘地在加尔各答创造的奇迹，曾引起举世瞩目。当时《伦敦时报》这样评说：“这座城市是印度的奇观。”蒙巴顿从新德里致函甘地，盛赞他的功德无量：“在旁遮普，我们有一支 55000 名士兵组成的别动队，他们被大规模的暴乱弄得一筹莫展，在孟加拉，我们的干预部队只有 1 个，那里却没有发生任何暴乱。”

1947 年 8 月 31 日早晨，奇迹出现 16 天之后，宗教仇恨之火终于还是点燃了加尔各答这个火药库。当晚 10 点，一群狂热的印度教青年突然闯进海达利公馆院内，要求与甘地谈话。当时甘地正躺在草垫上，身边是他的侄孙女摩奴和阿巴。甘地被吵声惊醒，站起身来，说：“嚷什么，我在这儿，你们杀我吧？”说话间，两位浑身是血的穆斯林挣脱人群，躲藏到甘地身后，但一根根棍子向他们飞去，好在甘地个子不高，才没被击中，直到增援的警察赶来才解了围。随后，对穆斯林贫民窟一系列的袭击行为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这些都是国民公仆团极端分子策划的。

加尔各答事变给甘地以致命的打击，这位终生致力于非暴力理想的老人似已有一种幻灭感。为了使加尔各答恢复理智，拯救千百万无辜者免于死亡，甘地只有拿生命孤注一掷了。

他对外发表声明，决定从 9 月 1 日起开始绝食，一直到动乱结束，不成功便成仁。

这次绝食无论对他本人和他的同志们来说都是一次冒险。此时甘地已 78 岁高龄，最近长时间的焦虑与奔波又使他精疲力竭，绝食开始后他的体力很快衰竭，几小时后便出现心律不齐，时至午夜，他说话的声音就含糊不清了。

甘地绝食的消息几小时就传遍了加尔各答城。多少年来，甘地的绝食斗争已成为激发人们斗争的信号。整个印度虽然 85% 的居民不识字，没有收音机，但人们总能了解他绝食的各个阶段的详细情况，每当甘地受到死亡威胁时，人们都一致本能地为他担忧，一批又一批焦虑不安的群众纷纷来到海达利公馆看望他。但疯狂的暴力行为似脱缰的野马一时难以遏制，纵火、杀人、抢劫仍在进行。

从第 2 天早晨起，前来海达利公馆询问甘地健康状况的人越来越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纷纷来到甘地卧榻前，请求甘地停止绝食。

第 3 天凌晨，甘地健康恶化的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加尔各答沉浸在焦虑与悔恨之中，一股友善的浪潮突然席卷了这座难以驾驭的大都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一起在暴行肆虐的贫民区游行，呼吁恢复秩序与平静。中午时分，27 名市区的极端分子来到海达利寓所门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活动，当晚，全城恢复平静。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显要人物起草了一项共同声明，庄严保证阻止宗教仇恨再起。

1947 年 9 月 4 日晚，甘地喝了几口桔子汁，宣告结束了 73 小时的绝食斗争。甘地不惜牺牲生命以捍卫和平的举动终于制止了加尔各答暴乱的蔓延，他因此获得了极高的声誉。甘地的老友，独立印度的首任孟加拉省督拉贾戈帕拉莫查理说：“甘地建树过许多丰功伟绩，然而最为神奇的乃是在

加尔各答战胜了邪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印度独立。”

在确信加尔各答不会再有问题时，甘地决定前往被血与火吞噬的旁遮普省。然而，还没来得及到那里，首都新德里又发生了新的暴力事件。由于周围的农村极不安全，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都涌到这里避难。9月3日早晨，印度教徒从杀害中央车站的穆斯林苦力开始，接着大规模洗劫穆斯林的商店，打死商店老板。新德里的暴乱将对整个印度半岛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警察多半开小差，仅有的部队人心涣散，公共秩序严重瘫痪，新总理尼赫鲁甚至不得不亲自挥舞棍棒，驱散暴乱分子。

新政府对于局势几乎一筹莫展。这些人执政前大部分时间都在英国人的监狱中度过，而且一直从事不合作斗争，从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和治理这个国家。现在英国人丢下一个烂摊子让他们收拾，他们哪里应付得过来。9月6日，总理尼赫鲁和内政部长帕迭尔急电招回当时正在西姆拉休假的蒙巴顿，由他出面组织应急委员会。

9月9日，甘地前往旁遮普时路过新德里。一下火车，帕迭尔便一脸沮丧地告诉他德里的情形，甘地于是决定留下来。由于原先甘地住过的“贱民”区已挤满难民，他只好住到了国大党的支持者、甘地的忠实拥护者比尔拉的寓所。甘地当即发表声明，一定要尽力使德里的空气恢复平静。

9月10日，甘地来的第一天就作了40公里旅行，视察了许多难民区。当大的祈祷会中，他发表了一篇动人心弦的演讲（全文向全国转播），追述了他初到新德里的印象。他感到这里就像一座死城，没有欢笑，没有希望，只有恐怖、混乱与仇恨。他感到不理解，在独立自由的印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被赶出家园，在自己的国家内还会出现难民问题。他认为“政府应负责，人民也有责任”。甘地每天都去视察难民营，试图打动那些因仇恨而咬牙切齿、面容扭曲的人们，然而收效甚微，一次，在一座难民营出口处，一位男子把他小孩的尸体扔到甘地怀里，再有一次，甘地在无人护卫的情况下进入难民营，一群被仇恨激怒的人围住他的汽车狂喊乱叫。一天晚上，当甘地一如既往地祈祷会上把《雅歌》、《可兰经》、《新约》、《旧约》与《薄伽梵歌》一起颂读时，人群中有人大叫：“以你赞美真主的名义，我们的妻子和姐妹遭到强奸，我们的兄弟被屠杀！”“打死甘地！”甘地不得不停止祈祷。尽管如此，甘地并不灰心，他每天照例去乱区视察，安抚民心，排忧解难，并照例每天举行晚祷，发表他的观点与见解，抨击人们的失去理智，谴责政府的办事不力，建议人们该如何遵纪守法，勿施暴力；同时，他还得应付外界的各种问题与来访者，并替《哈里真报》撰稿。

1947年10月2日，甘地78岁诞辰。数千封来自世界各国和独立印度的电报和信件向他表示祝贺。各界领导人、难民、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相继来到比尔拉官邸，向他敬献水果、糖果和鲜花。尼赫鲁总理及其他各部部长、新闻记者、外国使节和蒙巴顿夫妇亲临甘地卧室向他表示祝贺。然而付地的状况令来访者无比震惊，他一反惯常的生动表情与狡黠神色，一脸的忧郁与沉闷。他决定以祈祷、斋戒与手摇纺车来过生日。在这天的晚祷上，他语气低沉：“你们要祈祷神灵，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态；或者为我早日离开人间祷告上苍，我不想烈日纷争的印度过生日。”

11月末的一天晚上，新德里东北90公里的小城帕尼帕特又发生锡克教徒屠杀穆斯林事件，甘地只身驱车前往那里，平息动乱。在市政当局临时搭

起的一座小平台上，甘地对潮水般涌来的群众进行演讲，并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争论。他不厌其烦、深入浅出地讲述信仰自由、宗教平等的理论，用整个心灵设身处地地安抚受苦受难的难民，恳请他们摒弃暴力和仇恨，发扬理智和宽容。他的逻辑那样不可辩驳，他的言辞那样恳切真诚，他的意志那样坚韧不拔，人们的狂怒与伤痛渐渐平息。仅仅几小时后，帕尼帕特的居民倾城而出，拥戴他们的圣人离去。

1947年岁末的日子，甘地始终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印度的分治给他的心灵以致命的创伤，终生宣扬非暴力却无法改变印度内乱四起的现状，旧日印度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并未在新生的印度中消逝，这一系列现实令甘地无限感伤；而现在他又发现那些追随他革命的同志登上政权宝座后丝毫无意执行他的理想。他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甘地指责印度政府日益腐败，谴责各部部长举行盛大豪华的酒宴而不顾数百万难民的饿死，指责印度的新生知识分子打算使国家工业化，而不关心农民利益，他建议这些知识分子应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了解农民的真实需要。

由于他的尖锐言论，令新政府领导大为不悦，他们渐渐不愿再征询甘地的意见。

除了这些烦恼外，当时困扰甘地的还有两大问题，一是首都新德里的局势。政府借助于武力而不是甘地所倡导的人民心灵的力量暂时维持平静，但是各种隐患大量存在，一些人骨子里暗藏杀机，暴乱随时可能再度发生。二是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国大党拒不偿还分给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的款项，想从经济上扼杀它；甘地认为这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有损印度的精神传统。

为使以上这两个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甘地决定再次进行无限期绝食，直至新德里恢复平静和政府答应偿还巴基斯坦的款项。

1948年1月13日，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这天早上，甘地在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出席这一仪式的有尼赫鲁、摩奴、阿巴、秘书普雅雷拉尔·纳耶尔等，还有印度新闻界和其他国家驻印度首都的数10名记者。11点55分，绝食开始了，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慢慢进入梦乡。

甘地宣布进行绝食和停止绝食条件，使很多人感到震惊和沮丧，甚至反感。当时新德里的局势与加尔各答有所不同，这里到处挤满难民，不少难民为逃避难民营内寒冷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占领清真寺和穆斯林的住宅，现在甘地要他们归还栖身之地，再回到难民营去，他们极不情愿。而且，甘地要求偿还巴基斯坦巨额款项，也令一些人愤愤不平。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有偏见的阴谋诡计。甘地停止绝食的条件也激怒了大多数部长，他们认为拒偿这笔款项理所当然。

由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国民公仆团获悉甘地进行绝食的原因，增加了他们的仇恨心理，他们认为甘地此举无异于政治讹诈，他们准备立即铲除甘地。绝食当晚，甘地例行晚祷，他用发自内心的微弱声音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间的纷争，让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兄弟般和睦相处。他说：“我要使德里经受一场考验，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多么严重的屠杀事件，我恳请首都人民不要放弃自己的义务……各个教派，全体印度人必须以人道主义取代野蛮行径，必须使自己成为名符其实的印度人，如果你们不能如此，我也无需继续活在尘世。”

这一次甘地的体力消耗更快。自上次加尔各答城的绝食后，甘地的肾功能已开始减弱；加上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打击，他的血压急剧上升，一直靠一种特制的镇静剂维持。因为绝食之故，镇静剂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

14日上午，甘地体重仅有49.5公斤，这意味着绝食一天后体重即下降了1公斤，用不了多久，甘地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绝食的人来说，当机体已开始消耗蕴藏在肌肉内的蛋白质时，危险即已来临，其结果必然导致死亡。

1月15日，可能危及甘地生命的危险征兆出现。这天的小便化验结果中发现了含有丙酮和酸性成分的毒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症状，证明导致死亡的过程业已开始。医生力劝甘地停止绝食，但甘地置若罔闻。

这一次人们对甘地的绝食反应迟缓，直到绝食的第3天，新德里街头才开始出现小规模游行，呼吁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生命。这天下午，印度政府经过长期的争论和犹豫，终于决定立即偿付巴基斯坦的55000万卢比。尼赫鲁在红堡广场向德里市民发表演讲，希望人们以实际行动拯救甘地生命，“因为丧失圣雄的生命，也就是丧失印度的灵魂”。

1月15日的晚祷会，甘地因极为虚弱，无力行走，甚至无法支撑起来，没有出现在比尔拉寓所外的草坪上。他竭尽全力，用麦克风向聚在草坪外的数百名群众说了几句话，他的声音细如游丝，人们预感到圣雄的生命已危在旦夕。这一不祥之兆唤醒了人们沉睡的良知和麻木的神经，群众排成长阵，人人双手合十，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中依次从甘地的阳台前走过。

1月16日的清晨，第一号有关甘地的健康公报发布，告之印度人民甘地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这一不幸消息使印度全国的气氛发生巨大变化。各个城市内，人们纷纷涌向广场，高呼“亲善”、“团结”和“拯救甘地”的口号。各教派与各界领袖代表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拯救甘地生命委员会”，数10万人举行聚会，为甘地祈祷。

尼赫鲁率领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甘地草垫前，安慰甘地，希望他停止绝食。

现在无动于衷的却是甘地。不管人民多么激动，也不管尼赫鲁如何劝寻，他依然不肯停止绝食。他期待的是“人民心灵深处的反应，是真心诚意的幡然悔悟，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

1月17日上午，新的健康公报表明急性尿毒症即将夺去甘地的生命，这时甘地已进入绝食的第3个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他的精神突然好了起来，整个地沉浸在安静之中，除了关节痛外，没有其他不适。他向秘书口授了停止绝食的7项条件，这些条件几乎涉及到新德里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度教和锡克教难民必须把改成住房的117座清真寺归还给穆斯林，取消对德里穆斯林商人的抵制，保证乘坐印度火车旅行的穆斯林的人身安全等。甘地要求新德里各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包括他的敌手印度教大会的极端分子必须在他的声明上签字。

当晚，整个京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尽快让甘地终止绝食上。商业活动停止了，机关、商店、作坊、工厂、咖啡馆关闭了，在大清真寺广场上，来自各种族和各教派的数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强烈呼吁他们的领导人接受甘地声明的条款。

比尔拉寓所内，甘地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短暂的清醒后是长时间的虚脱，同时伴有谵妄现象，医生与身边工作人员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再次来到甘地卧榻前，见到他敬爱的“巴布”（“巴布”即父亲）奄奄一息，禁不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蒙巴顿也来到甘地身旁，此情此景，也令这位戎马一生的异域军人倍觉酸楚。

1月17日晚，甘地大部分时间陷入昏厥与谵妄状态，脉搏微弱而不规则，身体各重要器官的功能已经开始崩溃。秘书拿来各派领袖在他的口授声明上的签字，这上面除了没有印度教大会地方代表和国民公仆团的代表签字外，新德里几乎所有派别组织的领导都签字保证恢复平静，和睦相处。医生劝甘地喝点东西，甘地轻轻叹息了一下，而后摇摇头说：“不，任何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在我中断绝食前，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心的。”

1月18日上午，甘地处境危急，很快将进入长时间的人事不省。国大党主席紧急动员，他派出一帮人前去寻找甘地所要的签字，自己带了一帮人亲自前往比尔拉寓所。不一会，各派代表终于聚齐，其中包括印度教极端分子及国民公仆团的神秘代表，他们都已在7项声明上庄严签字，并依次走到甘地卧榻前，亲自确认自己的庄严保证。

甘地获得了这场绝食的全部胜利，但执著的老人仍不肯中止绝食，他在死亡的边缘，用尽浑身力气，口授了一项声明。他希望各派代表不仅要保证新德里的平静局面，而且应使全印度都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他说：最大的错误观点，莫过于认为印度只属于印度教徒，或认为巴基斯坦只属于穆斯林。虽然要改变全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的意识是件艰苦的事，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甘地讲话后，在场的所有人一一俯身表示了他们的庄严承诺，当最后一个人立下誓言后，甘地宣布停止绝食。一场令世界人民惊心动魄的绝食斗争终于圆满结束。

绝食胜利似乎给垂暮之年的甘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世界各国舆论的赞誉是一个重要原因。伦敦《新闻纪事报》报道：“一位78岁的瘦弱老人竟以神奇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希望；它所显示的力量，可以胜过原子弹的威力。”始终敌视甘地的《泰晤士报》也不得不承认“甘地先生推崇的勇敢的唯心主义，这一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加充分的肯定”。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善良的甘地再次证实，他自己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叛逆者”。美国《华盛顿邮报》写道，“获悉甘地安然脱险的消息后，慰藉的浪潮席卷全球。这足以说明甘地的圣洁之心受到人们普遍颂扬”。埃及报纸颂扬甘地是“东方世界一位品德高尚的儿子，将其毕生精力献给和平、宽仁与博爱事业”。印尼报纸认为甘地的功德“为把亚洲人从苦难中救出来带来了曙光”。“巴基斯坦之父”真纳也在甘地绝食停止的当日宣布欢迎昔日的政敌前来访问他的新国家。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美誉，甘地感到由衷的欣慰，他认为这意味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终为世人瞩目和接受，此时他又萌生一个宏伟的计划，准备以步当车，穿越刚被冲突弄得伤痕累累的旁遮普大地，沿着难民逃亡的大道一步一步走向巴基斯坦。这样他既可以体察民情，安抚民心，又可以广泛传播非暴力和博爱思想。为了这一计划，他必须养精蓄锐。

1948年1月20日下午，甘地按时举行晚祷，进行中，突然有人向平台上投掷炸弹，炸弹在甘地身边响起，引起人群慌乱，然而甘地却安然无恙。投掷炸弹的凶手当场被警察抓获，另一批来不及下手的凶手落荒而逃。

暗杀事件发生后，新德里警察局从刺客口中得知了炸弹案的幕后操纵者及活动计划的若干情况，但后来却因至今仍不为人知的真实原因和各种阴差

阳错，没有将所有阴谋分子一网打尽，以致最终甘地为之付出了生命。

比尔拉寓所挨炸后，警方为加强对甘地的安全保障，德里警察局副局长来到比尔拉寓所，请求甘地允许他加强比尔拉寓所的警力，并建议搜查前来参加祈祷会的所有可疑分子。但甘地对此坚决拒绝。他的理由是：警察不能干预正在做祈祷的信徒。还说：“神是我的唯一保护人，如果它想结束我的生命，任何人也不能拯救。”他还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这样做，我立即离开德里。我将宣布，你对我的出走负全部责任。”对此警方也无可奈何，只能派出一些便衣警察和保安人员出席甘地每日例行的祈祷会，并指定专人随侍在甘地左右，以防不测。

1月26日是印度国庆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以确定国大党在印度独立后的新目标和作用。现在甘地已恢复正常。

此时甘地正准备开始他前往巴基斯坦的长征。他指示医生兼秘书苏悉拉女士立即动身前去巴基斯坦，为这一行动作准备，并要求她必须在1月30日返回。他准备在2月3日离开比尔拉寓所，开始他的巴基斯坦之行。

1月29日，甘地一如既往，手摇纺车，练习书写孟加拉文，给几位友人写信，同客人交谈，然后进行清水灌肠和1小时的泥土糊汁治疗。他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并对她讲美国必须放弃原子弹，非暴力是原子弹难以摧毁的武器。这一天下午，有40名从巴基斯坦逃出来的锡克教和印度教难民来到比尔拉寓所，要求会见甘地。有人高声叫嚷：“你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滚开这里，你应该立即退到喜马拉雅山的山洞里去。”甘地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所遵循的唯一指示来自神，神在我内心深处。我看你们如兄弟姐妹或儿女，你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不知道你们所受的苦呢？”“我不受任何人的差遣为社会服务，也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停止服务。”“我诚愿住在喜马拉雅山，在那儿不用愁吃、愁穿、愁住。那将是宁静的住处。但我不要那种宁静，我愿从痛苦中求宁静，我的喜马拉雅山就在这里。”这天晚上，甘地在十分郁闷的心境下继续新党章的起草，并在21时15分完成了他的这一遗作。

1948年1月30日是星期五，这是耶稣受难日，也是甘地人生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甘地接待了很多客人，下午4点，甘地处理了他这一天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桀傲不驯、注重实际的内政部长帕迭尔与刚烈执著、富于理想的尼赫鲁无法合作共事，帕迭尔已提出辞呈，并给甘地送来辞呈副本。甘地力图说服帕迭尔改变主意，因此之故，一向守时的甘地耽误了10分钟才赶到晚祷会场。

5点10分，甘地在摩奴与阿巴的扶持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但平日随侍左右的两位关键人物不在场：苏悉拉医生尚未从巴基斯坦返回，负责保护他的警官因市政部门的职员计划罢工而被紧急招回警察局。

甘地平日走路时，常把双手搭在摩奴和阿巴肩上，当靠近人群时他习惯地收回手臂，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此时就在甘地收回双手即将走向平台的一刹那，早已潜伏在此的国民公仆团的头目纳图拉姆·戈德森跑到甘地面前，他先向甘地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您好！”摩奴以为此人想要抚摸甘地的脚，伸手礼貌地将他挡开，纳图拉姆猛然推开摩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住甘地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甘地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这位终

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了狂热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那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此时正是 1948 年 1 月 30 日下午 5 点 17 分。

凶手打死甘地后并未趁机逃走，反而大声呼喊警察，束手就擒。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出身婆罗门，他奉行素食，节欲，早年崇拜甘地，投身不合作运动，并因此而入狱。1937 年，他受沙瓦迦尔的影响，参加了以复兴印度教统治地位为目标的印度教大会，并创办了“国民公仆团”。1944 年买下一家报纸《印度民族报》，自任社长，宣传反甘地和反伊斯兰教及其他非印度教等派的政治主张，不遗余力宣传暴力和种族至上，并因此而刺杀了甘地。

甘地被抬进房间，人们把他放在卧榻上，阿巴在血迹斑斑的“拖地”上盖上被子。人们开始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3 只小猴雕像，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

甘地遇刺极有可能导致全印宗教仇杀的大混乱，印度政府决定全国处于戒备状态。18 点，即甘地遇刺 43 分钟后，政府发表了一个经过审慎推敲的公报，向全国人民通告圣雄甘地于 17 点 17 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

总督蒙巴顿得悉甘地遇刺的噩耗后，立即赶到比尔拉寓所。他来到时，房间里已挤满了人，尼赫鲁面色惨白，脸上留有泪痕。帕迭尔紧挨尼赫鲁坐着，两眼迷惘愣视前方，他实在难以接受刚才还同他热烈争执的领袖已永难复生。甘地周围的女眷们强忍悲痛，低声念祷《薄伽梵歌》。房间内点燃了数盏油灯和香烛，甘地安详地躺在由灯光与烛光映成的金黄色的光环中。蒙巴顿接过装有玫瑰花瓣的杯子，在死者身上撒下片片花瓣，表示印度最后一任总督对这位终身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伟人的敬意。

总督蒙巴顿亲自负责安排葬礼，他本想采用防腐香料保存甘地的遗体，周游印度各地，以使甘地爱戴和终身为之效劳的人们能瞻仰他的遗容，但由于甘地生前立有遗嘱，遗体将在他死后 24 小时内按印度教的习俗火化，蒙巴顿只有按甘地的遗愿安排他的后事。为防止群众太多，无法维持秩序，蒙巴顿建议动用军队护送灵柩和准备葬礼。虽然甘地的很多信徒明知此举有悖甘地的心愿和非暴力理想，但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印度举国上下因失去他们的精神领袖而无比悲伤，人们以传统的方式寄托哀思。一望无垠的恒河平原上，再也看不到一缕炊烟，大地一片沉寂，只有甘地生前最喜欢听的赞美诗在上空低回盘旋。在浦那城，愤怒的群众难以遏制对夺去甘地生命的仇敌的满腔怒火，他们力图冲破警察的警戒线，要捣毁国民公仆团及其机关报《印度民族报》社址。在孟买城，1000 多名群众拥入沙瓦迪尔的住处。在其他城市，极端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成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办事机构也被群众捣毁。在巴基斯坦，数百万妇女打碎戴在手上的玻璃手镯，以传统方式表达她们哀痛的心情。

甘地殉难的比尔拉寓所成为全国最催人泪下的所在。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比尔拉寓所一楼的平台上，上面洒满玫瑰和茉莉花瓣，五盏油灯环绕四周，象征自然界的四大组成部分——火、水、空气和土地以及将他们连为一体的阳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到这里，最后看一眼他们的救星。

新德里的另一隅，印度广播电台传出了尼赫鲁沉痛的声音：我们生命中

的光辉消失了，整个国家沉浸在黑暗之中。我们敬爱的首领，我们称之为巴布或国父的人离开了我们。我刚才说光明消逝了。不，我说错了，因为照射在这一国土上的光辉并非普通的光芒，千年之后，它将永远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世人们将看到这灿烂的光辉，因为它将为所有人带来慰藉，它代表生命与永恒的真理，带我们古老的国家走向自由。

2月1日，新德里成了世界人民寄托哀思和祭奠英灵的圣地。印度各地的群众已走了整整一夜，一清早，街头巷尾挤满了哀悼的群众，号陶声、呜咽声和啜泣声响彻街区上空。世界各地的唁电也雪片似的飞向新德里，吊唁这位伟大的和平主义者。乔治六世国王、艾德礼首相乃至甘地的宿敌温斯顿·丘吉尔；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数千名英国人纷纷对甘地遇难一事表示慰问。史末资将军也从南非发来唁电，称“全人类的巨擘刚刚离开了人世”。在梵蒂冈，教皇庇护十四盛赞甘地是“和平世界的捍卫者、基督教徒的朋友”。在华盛顿，杜鲁门指出：“全世界同印度一起悲哀地哭泣。”真纳在唁电中提到：“面对死亡，一切争论已不复存在。因为甘地是印度教派空前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上午11时，灵床放置到平板灵车上，灵车将穿过首都，然后到亚穆纳河附近的拉杰加特火葬场，那里是火化历代国王的地方。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白红两色布单和独立印度的三色国旗。为了尊重甘地极为厌恶现代机械化的思想，灵车由250名士兵用四条长麻绳牵引徐徐移动。送葬行列以4辆装甲车和总督卫队为前导，这是有史以来驻印总督的古老卫队的骑兵们第一次向一位印度人致敬。

送葬队伍后面跟着首尾不能相望的不同种姓、宗教、种族、肤色的群众队伍。在通往亚穆纳河长达8公里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与茉莉花。沿途各处的人行道上、河堤上、树枝上、窗户上、屋顶上和电线杆上，到处是等候与甘地诀别的人群。整整5小时，人流不断加入送葬队伍。在亚穆纳河河滨广场，还有数10万群众等候在那里。

下午4点，火化仪式开始。甘地的两位儿子把甘地的遗体安放在檀香木柴堆上，按照印度教葬仪规定，头部朝向北方。当火舌开始吞噬檀香木时，人群中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哭叫声和难以抑制的激动表现。随着来自河边的凉风扇起一阵阵冲天火焰，甘地安祥的面孔终于消失在金色火焰与彩霞交织的帷幕后面。

遗体火化的第12天，甘地的骨灰像千百万印度亡灵的骨灰一样，撒入了一条注入大海的河流之中。

## 后 记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曾得到过自己的不少老师、同事和学生们的关心、指导与帮助。特别是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高明振教授、庄万友老师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袁喜清同志的鼎力相助，特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参阅引用了大量有关著述，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深表歉意。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加之传主活动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大，思想及行为方式复杂，而笔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难免，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徐友珍

1995年12月

## 附 录

### 甘地年表

1869年 10月2日，生于印度西部卡提阿瓦半岛的波尔班达邦。  
1876年 随父迁入拉奇科特邦，在此就读小学与中学。  
1882年 13岁的甘地与同龄女孩嘉斯社白结婚。  
1885年 父亲逝世。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夭折。  
1887年 中学毕业后考入巴纳迦尔城的萨玛尔达斯学院就读。  
1888年 9月，甘地只身赴英深造，通过入学考试进入伦敦大学攻读法律。

1891年 6月10日，甘地完成伦敦大学学业，通过考试取得律师资格；11日在伦敦高等法院注册，12日启程回国。回国之初，甘地先去孟买当律师，历经挫折。半年后重返拉奇科特，依靠其兄的帮助，勉强维持律师业务，没多久又辗转回到波尔班达王公手下供职，为其争权夺利，深感苦闷、压抑。

1893年 5月底，应聘抵达南非处理一宗40000英镑的债务纠纷，在从德班到比勒托利亚途中遭受了一连串歧视，开始关注南非印侨的处境，并力图予以改善。

1894年 甘地打赢了第一场官司，在南非印侨为之举行的饯别会上，偶然得知纳塔耳立法议会正讨论一个旨在剥夺南非印度人选举权的法案，决定推迟归期，领导南非印侨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并在纳塔耳高等法院登记为第一个有色人种律师。5月22日，发起成立了南非印侨第一个政治团体——纳塔耳印度人大会。下半年，为一个可怜的泰米尔人伸张正义，因而在南非契的工人中声名远扬。

1896年 夏，甘地回国，先后赴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孟买、浦那、马德拉斯、拉奇科特等地广泛结交新闻界人士与印度国大党领袖，宣传南非印侨的疾苦，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11月，携家眷返抵南非。继续从事律师业务，为南非印侨谋取正当权益。

1899年 10月，英布战争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为英军效劳，直到1900年2月印度救护队解散。

1901年 12月，携妻儿返回印度，参加国大党的加尔各答年会，向大会提出一个有关南非问题的议案，获得通过。与温和派领袖戈卡利过从甚密，随后开始坐三等车旅行各地，在拉奇科特、孟买重操律师业务。

1902年 12月，被南非急电召回，准备向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递交请愿书，请求给予印侨平等待遇，没有结果。他决定定居约翰内斯堡，坚持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1904年 在南非创办《印度舆论报》（周刊）。受哲学家鲁斯金《给那最后的》一书启示，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创办凤凰村，奉行没有阶级压迫、种族歧视、人人自食其力的“乌托邦”理想。

1906年 4—6月，南非发生“祖鲁人叛乱”，甘地解散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前往德班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救护队，开赴前线。“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立下绝欲誓言。8月22日，德兰士瓦政府公布亚细亚法草案，其中印侨管理法规定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登记并领取带个人手印的身份证，随时接受检察，否则要被处以重罚或驱逐出境。甘地组织了请

愿团和抗议集会；11月，甘地赴伦敦请愿游说，试图通过合法途径实施补救。英殖民大臣额尔金宣布：亚细亚法暂缓实施，该法的附属法规也应停止执行。

1907年 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获得自治权。德兰士瓦第一届国会又通过了亚细亚法，甘地发动非暴力抵抗，反歧视性立法。12月27日，政府传讯甘地及其他24名领袖，28日，甘地及其同志以无证居留罪被判驱逐出境。

1908年 1月10日，对甘地的判决开始执行。甘地发表声明，要求改判重刑，政府改判甘地2个月徒刑，将其押往约翰内斯堡监狱。甘地入狱，反政府情绪激化，史末资屈于压力与甘地秘密谈判，达成协议。31日，甘地获释。5月9日，印侨完成自愿登记，但政府背信弃义，甘地决定再次发动反击。9月29日，甘地被捕，被关押在伏克斯洛斯监狱。10月16日，转到约翰内斯堡监狱。12月初，甘地刑满出狱后恢复律师业务与政治活动。10日因夫人病重回到德班。

1909年 1月15日，返回德兰士瓦，因无身份证被驱逐出境，几次违抗，被判刑3个月。5月24日刑满出狱。6月23日，甘地率团赴伦敦请愿，徒劳无获。11月13日，离开伦敦。回南非途中，写就《印度自治》一书。

1910年 5月，甘地接受德国建筑师卡伦巴赫的捐献，创建了托尔斯泰农场，并开始和托尔斯泰通讯，深受其影响。

1910年 停止了年收入6000英镑的律师业务，每月领取3英镑生活费，全部积蓄捐献于南非公益事业。

1911年 2月，由于甘地领导的南非印侨斗争，南非政府公布新移民法，对亚洲人入境不再采取直接拒绝，而代以严格的教育考试。甘地同史末资达成临时协议。南非政府不再通过歧视性立法，印侨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6月1日，在押的非暴力抵抗犯全部获释。

1912年 10月22日，印度国大党领袖戈卡利访问南非。11月15日，戈卡利与南非政府达成谅解，南非当局废止“黑法”，修改移民法中种族歧视的内容，取消3英镑人头税。但南非政府口是心非，一如既往推行旧制。

1913年 9月13日，甘地再度组织印侨进行非暴力抵抗，以抗议歧视印度侨民的立法。10月28日，甘地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示威长征。途中，甘地几度被捉，几度具保外释，11月10日上午，示威长征者全体被捕，11日上午，甘地被判刑9月或罚金60英镑，甘地选择入狱。甘地入狱引起纳塔耳印侨更大的反抗，政府高压亦无效。

1914年 1月，史末资与甘地取得协议，取消3英镑人头税，承认印度人婚姻的合法性，同意印度人持有按手印的移民证即可进入南非。7月，甘地离南非前往伦敦。适值“一战”爆发，甘地组织印度救护队，准备开赴前线，自己因病于12月启程回国。

1915年 1月，甘地回国。受到隆重欢迎。回国之初，甘地在国内旅行，以了解印度的实际情况，5月在阿赫米达巴德创立了真理学院。

1916年 甘地继续旅行各地，开始发表一系列重要演讲。

1917年 甘地采取实际行动，尝试非暴力抵抗斗争。2月9日开始，鼓动废除契约劳工制，接着奔赴三巴朗，调查佃农受剥削的情况，迫使政府废除了对靛青工人的契约制，并开始在那里从事建设性工作。

1918年 2月，甘地应纺织工人代表之邀，前往阿赫米达巴德处理劳资纠纷。他支持工人罢工，并以绝食鼓舞工人士气，迫使资方让步。后又前往

凯达地区，组织农民非暴力抗税，迫使政府免征歉收农民的田赋。4月，应印度总督之邀，参加作战会议，在总督答应考虑自治领地位和哈里发问题后，支持募兵决议案。7月，“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法案公布后，国大党内出现分裂，温和派主张全盘接收，激进派表示拒绝，甘地主张有条件的接受方案。

1919年3月，剥夺人民民主的“罗拉特法案”公布。甘地抱病发动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4月6日，全国总罢市。政府血腥镇压酿成阿姆利则惨案与旁遮普暴行18日，甘地要求暂缓非暴力运动。同一时期，甘地接办《青年印度》与《新生活》两刊物，宣传非暴力主义。10月17日，得到政府许可后赴旁遮普调查旁遮普事件真相。11月24日，应穆斯林领袖之邀赴德里主持召开了全印哈里发印穆联席会议，会上甘地首次提出“不合作”一词。12月，出席国大党阿姆利则年会，提出谴责人民暴力案及主张对正式颁行的孟太古—蔡姆斯福特改革法案予以接受，因此与国大党元老提拉克、达斯等意见分歧。会上甘地受命调查旁遮普事件，负责修改党章和为纪念阿姆利则惨案募捐。

1920年3月19日，甘地在哈里发运动中提出不合作运动计划。5月14日，印度政府公布的协约国瓜分土耳其条款及5月28日亨特委员会调查书使甘地放弃了对大英帝国的幻想，坚决走上了不合作之路。8月1日，甘地在未取得国大党大会通过之前，率先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发动了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经过激烈争议，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提案。12月，国大党那普尔年会确认了加尔各答特别会议精神，还通过了甘地起草的新党章及其建设性纲领。自此，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路线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从而开始了国大党的“甘地时代”。

1921年2月，甘地赴加尔各答为国民学院揭幕，全国各地创办国民学校，蔚然成风。不合作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也出现了暴力冲突与农民暴动。为防止大规模暴力发生，甘地决定暂缓群众性不合作运动，集中精力于9月30日以前禁绝洋布，推广土布。7月31日，甘地聚众焚烧洋布，各地响应。9月，甘地宣布每天纺纱半小时，从此以后，放弃任何服饰，只缠一块手工纺织制作的腰布，必要时搭一块土布披巾，剃光头发。10月，甘地等50人发表宣言谴责印度政府迫害穆斯林领袖阿里兄弟，再次准备发动不合作运动，获11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批准。

1922年2月1日，甘地向总督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政府释放政治犯，恢复人民言论自由，限政府7日内答复，否则将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2月5日发生暴力事件，甘地决定取消拟议中的不合作运动，代以纺纱、改革和教育性工作，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挫。3月10日，甘地被捕，判刑6年。

1924年2月5日，甘地因急性盲肠炎施行手术后，获释出狱。此时，印度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严重的离心倾向，国大党分裂为主张参与立法会议的“自治派”和坚持不合作路线的“维持派”，印穆团结局面被破坏，宗教冲突严重。甘地提出集中全力从事土纺土织、印穆亲善、解救“贱民”三大中心工作，以重振士气，维系民心。为平息教派冲突，他绝食自苦，为团结“自治派”，他主动让贤，并压制支持他的维持派，获得国大党和人民再度信任。

1925年 甘地旅行全国各地，推广其建设性方案。

1926年 甘地因健康原因回沙巴玛迭真理学院静养，开始撰写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连续3年。

1927年 甘地旅行全国各地，宣传服用土布、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取消“贱民”阶级、统一语言等问题。12月，国大党马德拉斯年会，通过贾·尼赫鲁的“独立案”等一系列激进纲领，甘地暂时保持沉默。

1928年 年初，甘地返回真理学院。1月12日，在《青年印度》上发表声明，批评国大党通过的独立案，流于空想和形式。2月3日，西门调查团抵印，印度各阶层一致抵抗，出现有利的革命形势。甘地批评运动中出现的苏俄暴力斗争方式，但主张发扬其牺牲精神。12月，国大党加尔各答年会讨论宪法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国大党内代表保守与激进两派力量的尼赫鲁父子意见尖锐冲突。甘地提出折衷办法，如果宪法委员会起草的自决案不能在1929年12月31日前被英国国会通过，国大党将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宣布独立。

1929年 1月，甘地在加尔各答亲自主持一家土布店的开幕式，并通过给买主发票签名及加盖全印土布协会印章等方式鼓励服用土布。2月，甘地又开始焚烧洋布。5月，甘地参加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号召在1930年8月前要组织75万党员，准备迎接革命高潮。10月31日，印度总督欧文发表声明，表示准备举行圆桌会议并声称英国准备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甘地等印度各方人士立即在德里举行“领袖会议”，通过联合宣言，提出了参加圆桌会议的各项条件。但是英国政府对欧文总督的谈话予以澄清，表明英国并不准备给印度自治领地位。12月23日，欧文总督与甘地等各方印度人士的谈判无果而终。12月，国大党拉合尔年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独立问题的主要决议，并准备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1930年 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决定1月26日为全国支持独立日。26日，印度全国举行独立誓师。31日，甘地向欧文总督提出包括降低卢比兑换率、降低田赋、减少军费、削减英国官员薪俸、保护关税等11项具体要求，如要求得不到满足，即发动不合作运动。2月27日，甘地在《青年印度》上宣布不合作运动的几点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3月2日，甘地再次致信总督，重申11点要求，希望总督立即答复，总督拒绝。3月12日，甘地发动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全国积极响应，英国政府残酷镇压。5月4日，甘地被捕，全国人民报以更大规模的斗争，英国当局无法控制局势。7月，为缓和矛盾，英国宣布将在伦敦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地位问题，呼吁各党派领袖参加，并开始同狱中的甘地及尼赫鲁父子谈判，英国政府拒绝和谈条件，谈判破裂。

11月12日至1931年1月19日，圆桌会议在伦敦举行，国大党无人参加。

1931年 1月26日，为缓和矛盾，英印政府无条件释放甘地等国大党领袖。2月17日—3月5日，甘地赴德里与欧文总督谈判，达成甘地—欧文协议，双方休战。这一协议遭到国大党左派及群众的不满抗议。3月，全印委员会通过甘地—欧文协议，还决定派甘地到伦敦出席第二次圆桌会议，因政府无意履行休战协议和在印穆关系上设置障碍，甘地表示不出席圆桌会议；8月25日，甘地赴西姆拉会晤印度总督威灵顿，政府答应履行甘地—欧文协议，对破坏协议事件实行调查，甘地最终同意前往伦敦。9月7日—

—11月28日，甘地出席伦敦圆桌会议，英国政府无意给予印度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国大党想通过与英国谈判解决独立问题，希望破灭。12月28日，甘地返回印度，政府在他出国期间不仅未遵守停战协议，而且还在加紧镇压，一切和平均成泡影。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4日，甘地及国大党主席被捕，运动进入低潮，甘地在狱中发动“哈里真”运动。8月18日，甘地对外宣布，除非英国首相撤销“贱民”保障名额分区选举，他将绝食至死。9月20日开始绝食，25日，国大党领袖与“贱民”协会代表就议席问题达成协议，全印宗教领袖也签署协议，取消印度教中所谓“贱民”阶级，“贱民”将享有和普通印度教徒一样的平等权利。26日，甘地停止绝食。

1933年2月11日，甘地主办《哈里真报》（周刊）。4月15日，甘地在《哈里真报》上表示，他将以绝食为主要手段解救“贱民”。30日，甘地对外宣布他将从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5月8日上午，政府释放甘地。甘地出狱后，仍坚持绝食21天。随后，召集国大党领袖开会，决定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改由个人的不合作运动。7月26日，甘地宣布解散真理学院，以便学员能分别参加不合作运动。31日，甘地率33名真理学院师生踏上征途到农村作长途宣传。8月1日，甘地与夫人、秘书戴赛及其他真理学院学员全体被捕。3天后获释，但被禁止离开浦那，甘地不从，被判刑1年。8月16日，甘地抗议政府阻挠其在狱中继续进行哈里真运动，表示绝食至死，绝食1周后，甘地濒临死亡，政府宣布无条件释放甘地。9月13日，甘地发表声明，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将集中精力于解放“贱民”。9月30日开始作募集“贱民”基金的长途旅行，历时将近1年。行程12500英里，募得基金80万卢比。

1934年4月7日，甘地发表声明，劝告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人代表国大党来从事这一斗争，恢复不合作运动必须经他同意。这一声明，遭到国大党左派的谴责和右派的不满。他表示将退出国大党。9月10日，甘地阐述了他必须退出国大党的理由，并提出了他留在国大党的先决条件。10月26日，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孟买开会，与会代表无法接受甘地的条件，甘地决定退党。甘地退党后，国大党全印委员会通过决议，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参加立法会议选举。甘地本人则专心致力于乡村工业建设。

1936年印度政府组织法正式颁行。4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勒克瑙举行会议，否决了印度政府组织法，甘地出席会议，推荐尼赫鲁为国大党主席。勒克瑙会议后，甘地迁居西迦昂的一个偏远小村，住进茅棚，体验实际的乡村生活。12月，国大党年会重申不与印度政府合作的一贯立场，还通过有关降低地租、田赋等土地纲领，甘地未出席大会，但发表声明支持国大党的决议。

1937年年初，立法会议选举，国大党获全胜。甘地提出，在英国省督保证不干预国大党政府的条件下，国大党可以接受部长职务，为国大党领导机构采纳。但国大党在各省上台执政后，暴露出各种问题，阶级关系尖锐，党派分歧与宗教冲突严重，甘地不得不花更多精力解决国大党面临的难题。

1938年4月，甘地与真纳会谈没有结果，印穆关系进一步恶化。9月，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甘地提议授权参政的各部部长，对煽动暴乱或参加暴

力斗争者采取制裁。

1939年 1月~4月，国大党新主席选举时，激进派领袖鲍斯当选，而甘地支持的席塔玛利亚落选。甘地施展手腕，迫使鲍斯辞职，改选右派领袖卜纳沙德。在国际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甘地加紧宣传其非暴力主张，并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断提出见解。

1939年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3日，英国对德宣战。同时，印度总督宣布印度进入战争状态，5日，甘地应邀会晤总督。甘地以个人的名义表示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可能支持战争，但出于纯人道考虑，他同情英法。9月13—1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尼赫鲁起草的决议，谴责法西斯主义及其侵略行为，表示除非英国把印度当作平等国家看待，并明确保证在战后给印度独立，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否则不支持英国作战。15日，甘地发表个人声明，原则上赞成工作委员会决议。10月17日，林利兹戈在继任总督时发表白皮书，保证在战后考虑召开制宪会议来制定印度宪法，但拒绝在战时成立责任政府。甘地和国大党对此深感失望，国大党表示将不支持英国战争努力，并警告英国将发动不合作运动，借以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

1940年 1月10日，林利兹戈在孟买东方俱乐部发表演说，表示英国准备在战后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给印度自治领地位。甘地恢复与政府间谈判，但谈判很快破裂。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授权甘地准备必要时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5月10日，希特勒进攻西欧，英法节节败退，丘吉尔政府组阁。局势的变化使国大党内主战派急于同英国妥协，表示只要英国承认印度自治，战时在中央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它便准备与英国充分合作。甘地则仍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直接参战，只能用非暴力对付外来侵略。甘地因而退出国大党。8月8日，林利兹戈发表声明，拒绝国大党最低限度的要求，打破了国大党领导机构的幻想。甘地与国大党领导之间立场又趋一致。9月15日，工作委员会孟买临时会议，要求甘地复出领导，确认非暴力不仅可用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而且适合于未来自由的印度。9月16日，全印委员会通过这一决议。27日和30日，甘地两度与总督林利兹戈在西姆拉会谈，要求有反战自由，总督拒绝。10月5日，甘地宣布谈判破裂，15日，甘地通告全国，决定开展个人非暴力抵抗运动。11月中旬，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由甘地指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全印委员会、中央及地方议会中的国大党籍议员，集体发表反战演说，到年底计有11个中央常务委员，176个中央执行委员，400个民意代表被捕下狱。

1941年 1月5日，开始第三阶段的非暴力斗争，抵抗代表由各级党部推选名单，送由甘地批准并亲自派遣任务，到月底被捕达2250人。4月运动发展到第四阶段，所有各级党部中下级干部均参加，入狱者成千上万，由于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相继入狱，运动很难开展，随着1941年 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战局继续恶化，甘地和国大党领导机构矛盾再度突出。

1941年 12月初，英国政府在战争形势更为紧迫的形势下，宣布释放全部非暴力抵抗政治犯。新形势下很多人强烈要求甘地改变计划，放弃不合作运动，重掌各省政权，甘地寸步不让。12月23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声明国大党同情受侵略的各国人民，为自己祖国的前途命运考虑，同意与战争努力合作以制止侵略。甘地固执己见，反对参战。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免除甘地职务。1月10日，甘地向国大党建议尼赫鲁作为他的继承人。

1942年 3月11日，丘吉尔派内阁大臣克里浦斯赴印，提出战后成立印度联邦，具有自治领地位，由各省和土邦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各省和土邦有权决定是否加入印度联邦，在战时则不准备任何变更的克里浦斯方案。甘地对克里浦斯方案坚决拒绝，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亦于4月10日正式表示拒绝，甘地萌生了“英国人立即退出印度”的主张，并开始宣传鼓动。7月6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瓦尔达会议经过9天讨论，14日通过甘地提出的英国退出印度计划。8月7日全印委员会通过了这一决议。8月8日子夜，甘地呼吁全国“或者行动起来，或者走向死亡”。9日黎明，甘地及国大党全体工作委员会委员被捕，印度发生激烈动荡，甘地夫人因参加示威游行，亦被捕入狱。英国人依靠武力控制了局势。

1943年 2月10日，甘地为抗议政府高压，绝食3周。

1944年 2月22日，甘地夫人病死狱中；4月初，甘地身染虐疾及阿米巴痢疾，生命垂危。5月6日，甘地获释，国大党其他领袖也相继出狱。9月8—27日，甘地同真纳举行最后一次会谈，试图解决印穆关系和印度未来地位问题，真纳坚持印穆分治，建立巴基斯坦，谈判破裂。

1945年 6月14日，印度总督发表广播演说，建议给予印度自治，由印度自拟宪法，立即改组政务会议，英国保留总督及军队统帅之职。25日，西姆拉会议召开。甘地未参加会议，但赶往西姆拉会外指导。由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对立，会谈破裂。7月26日，工党政府上台，加快印度非殖民化过程；11月10日，总督韦维尔约见甘地，希望利用甘地的威信和非暴力，协助英国政权平安移交给以国大党为主的资产阶级手中，防止爆发内战。甘地开始在各地旅行演讲，宣传其非暴力主张和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1946年 年初，甘地到印度饥荒发生区视察指导，4月1日，动身前往德里，住进“贱民”应，与国大党中常委一起同英国内阁代表团商谈，未获一致协议。5月2日，甘地抵西姆拉参与国大党与穆盟同英国政府内阁代表团谈判，由于穆盟坚持原来立场，谈判破裂。5月16日，英国内阁代表团宣布了自己的独立方案，提议建立印度教徒区与穆斯林区作为和解基础。甘地虽不满意该方案，但认为它是当时形势下英国所能提出的最好方案，要求国大党及其他党派接受。随后，国大党、穆盟双方表示接受。6月29日，甘地前往浦那时，火车挨炸，但甘地安然无事。7月，制宪会议选举揭晓，国大党取得了绝对支配性地位。29日，真纳撤回对内阁使团计划的同意。8月16日，加尔各答发生宗教仇杀，随后，诺阿卡利县及附近比哈尔省相继出现复仇行动。甘地谴责暴力行为，并亲临乱区。9月2日，印度临时政府成立，尼赫鲁任临时政府总理。

1947年 1—3月，甘地在孟加拉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村，3月4日转往比哈尔各地，4月1日返回德里，致力于平息宗教仇恨。3月，蒙巴顿接任印度总督，被授予特命全权，安排英国尽快撤离印度事务，准备让印度分治。甘地与蒙巴顿两度会谈，要求蒙巴顿维护印度统一，4月11日，蒙巴顿决定立即起草分治印度方案，国大党接受分治，甘地深感失望。5月1日甘地又开始苦行游说。6月3日，印度各派领袖同意蒙巴顿分治方案，并于当晚对全国广播。甘地准备在6月4日晚祷会上公开谴责分治方案，但被蒙巴顿说服。此后，他又致力于说服人们接受分治，因此而遭到非议和怀恨。7月4日，英国国会通过印度独立法案，宣布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自治领将分别独立。独立与分治临近，旁遮普、加尔各答、

德里各地出现宗教仇杀。7月底，蒙巴顿与穆斯林联盟领导人苏拉瓦尔蒂恳请甘地前往加尔各答，遏制即将爆发的宗教仇杀事件。8月13日下午，甘地来到加尔各答乱区贝利亚加达大街，控制了加尔各答局势。14日子夜，印度宣布独立，普天同庆。甘地没有参加庆祝活动，他以绝食祈祷、纺纱度过了独立日。由于甘地坐镇，加尔各答一直保持平静。31日，加尔各答也出现宗教仇杀，9月1日，甘地开始绝食，直到加尔各答恢复平静。9月7日，德里又发生仇杀；9月9日甘地到德里平息暴乱。

1948年 1月13日，为从根本上消除德里不安定因素和迫使政府偿还巴基斯坦55000万卢比款项，甘地开始无限期绝食。16日，政府答应付款巴基斯坦，18日各派代表签署甘地所提有关印穆团结的七项声明，甘地停止绝食。1月20日，甘地举行的晚祷会上有人投掷炸弹，未造成伤亡。1月26日，甘地应尼赫鲁请求，开始着手为国大党起草新党章；29日，完成新党章起草。30日17点17分，在晚祷会场被一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杀。

